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传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传播的偏向

[加]·哈罗德·伊尼斯 / 著
何道宽 / 译

2Y421

传播的偏向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 何道宽／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的偏向 / [加] 伊尼斯著;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7-300-04522-7/D·750

I. 传…

II. ①伊… ②何…

III. 新闻学: 传播学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692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传播的偏向

[加] 哈罗德·伊尼斯 著

何道宽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7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炼，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

势众的研究队伍将 80% 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 80% 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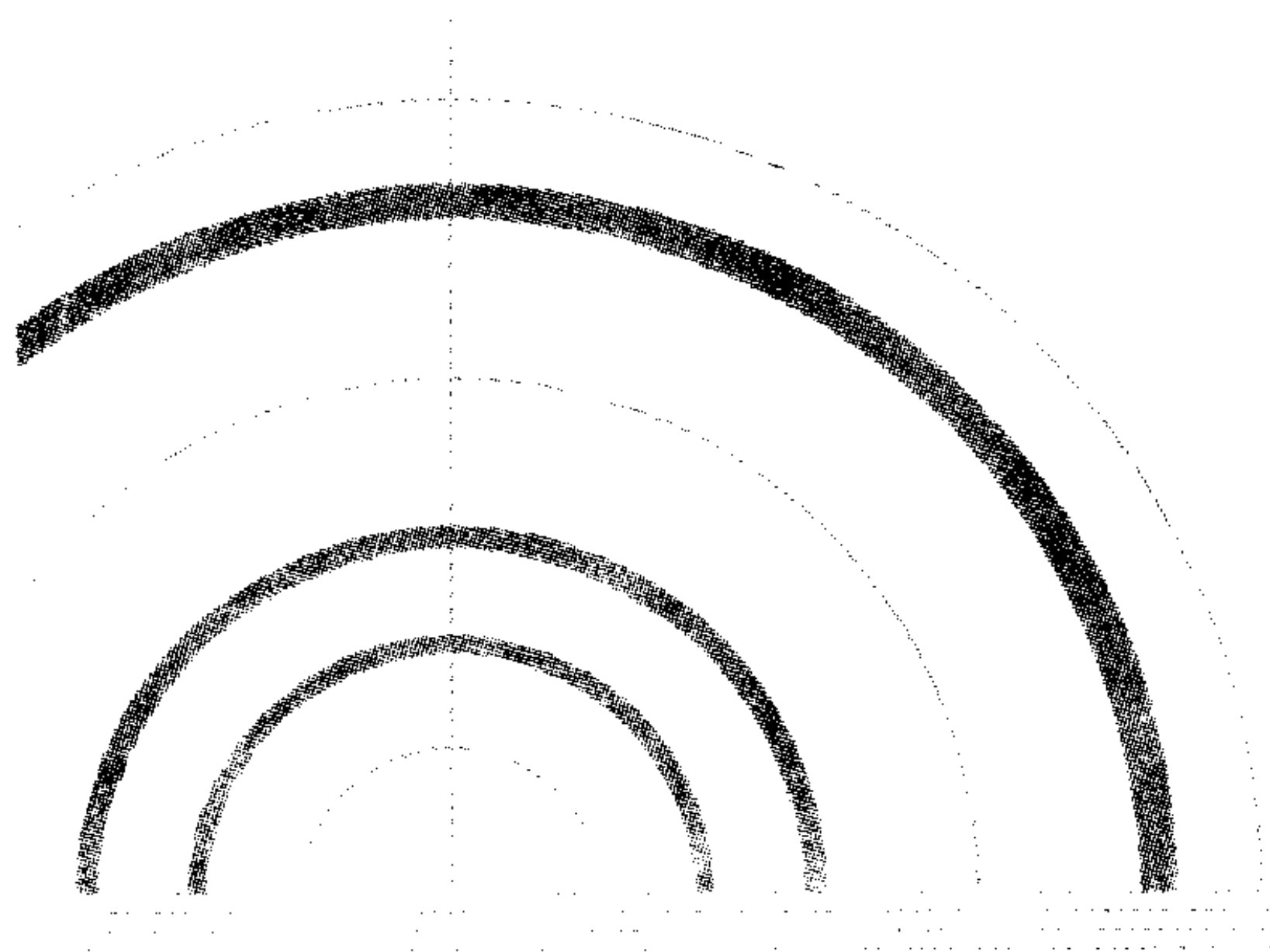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 20 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 and 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译者序言

近年来，我致力于介绍加拿大传播学派。先后翻译出版了三本书：《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和《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这位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媒介理论家，已经广为人知。现在介绍伊尼斯自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因为他们两人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加拿大传播学派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人。伊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

一、学术地位

这个奠基人伊尼斯（1894—1952）离开我们已经 50 余年，迄今为人称颂。他留下的经典《传播的偏向》自 1951 年问世以来，已经 50 余年，至今仍然被新闻传播界奉为圭臬。为什么？因为它开创了“媒介决定论”的先河，作者伊尼斯就是该学派的先驱。他的思想，经麦克卢汉发扬，成为 20 世纪最显赫的传播学流派之一。麦克卢汉传承他的思想，可以用麦克卢汉本人的话为例证。

1951年3月14日，麦克卢汉在给伊尼斯的信里说：“亲爱的伊尼斯：谢谢你重印的讲稿。这给我机会说一说对你的传播研究的兴趣。比如，《帝国与传播》里有些话似乎暗示说，有可能组织起整整一个学派。”^[1]麦克卢汉为《传播的偏向》做序。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麦克卢汉的自谦，虽然有其惯用的夸张成分，但是多伦多学派这个承继关系，伊尼斯作为开山祖的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

麦克卢汉把伊尼斯叫做“最好的老师”。他说：

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会花费一些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2]

关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先驱和继承关系，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做了简洁明快的论述。现摘录其中的两段，予以说明：

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研究给麦克卢汉提供了灵感。

80年代麦克卢汉声誉下降的同时，伊尼斯的地位却上升了。加拿大学界似乎常常贬低麦克卢汉，神化伊尼斯。

麦克卢汉欣赏伊尼斯那种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他把伊尼斯的求索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伊尼斯纯粹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后期的伊尼斯才成为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在本书的序言里赞扬这种从“观点”转向“界面”的方法：

“后期的伊尼斯”踏上了求索变革原因的征程。写《加拿大的皮货贸易》的“早期的伊尼斯”，在很大程度上，谨守常规的只做

报导和叙述的学术模式。到了皮货贸易研究的末期，他才冒险把复杂的事件编结起来，以揭示变革的因果过程。他认为，美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定居者和皮货商的利益冲突。这一洞见成为后期伊尼斯的典型特征。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

这种独特的方法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麦克卢汉把伊尼斯和汤因比进行对照，认为汤因比只叙述不解说，伊尼斯却要寻求历史的模式、传播的模式。在本书序言里，他又说：

伊尼斯把历史当作科学实验室，当作研究形态的生命和性质的一整套受控的条件，与汤因比常规的叙述相隔千里。汤因比像体育评论员……伊尼斯却会说，运动的系统是一种有趣的感知模式。

伊尼斯本人对汤因比也进行过类似的批评。他说：“汤因比之类学者的文明研究往往有一种偏向：倚重宗教的问题，忽视空间的问题，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

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是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Robert Park），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麦克卢汉说：

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更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大师级的学者，必然是跨学科的奇才。伊尼斯亦不例外。其师帕克是20世纪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帅，世界级的社会学家。伊尼斯本人是政治经济学家，初期专攻经济史，但是他在传播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也独树一帜，成为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他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突出的有四种：《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后期的两本代表作却成为传播学的经典。这两本书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承认自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

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西方文明的危机

他提出传播偏向论，是有感而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经验告诉他，西方文明是咄咄逼人的扩展的文明。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大帝国为了争夺资源、领土和市场，不惜血战。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他开始潜心研究自己的国家。他放弃了芝加哥学派驾轻就熟的小社区研究路子，转而研究加拿大的宏观经济。这是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发展，为了保存、发扬和阐述加拿大的传统，为了研究加拿大的特点和国民性，为了使加拿大不依附于人，为了抗拒南边那个大国对加拿大的挤压。他认为，加拿大不应该沦为边缘，而应该经济上独立，学术上发展。

研究了加拿大经济史以后，他进一步转向更加宏大的主题。他研究文明史、传播史，寻找规律，总结教训，给西方文明敲响警钟。

他希望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抱谦虚的态度：

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对我们自己文明的特征，我们可能会抱更加谦虚的态度。

1948年7月23日，在“英联邦大学研讨会”上，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

我们这个主题是：“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我

请诸位自己试试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个主题的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对经济学的兴趣暗示着对专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工作的忽视。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无意之间，这个会议预设了一个学问分科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一致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用一般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西方文明已经到了这一步，这个会议的与会者，主要是大学行政领导……我们大家在这里相聚，似乎就说明西方文明出了什么问题。

他批评西方文明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

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张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展，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请愿诉诸于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

2. 文明分期

他按照媒介对文明进行扫描和分期。他认为文明有这样的特质：

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它们的覆盖面有多大？在时间上延续了多久？文化在时间上的局限，盖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至少这是原因之一；盖源于它不能把思想资源用来避免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厌烦和停滞的历史还没有人写。

他按照传播媒介的形态和性质对世界文明作了这样的分期：1) 苏美尔文明；2) 埃及文明；3) 希腊—罗马文明；4) 中世纪时期文明；5) 中国纸笔时期文明；6) 印刷术初期文明；7) 启蒙时期文明；8) 机器印刷时期的文明；9) 电影时期的文明；10) 广播时期的文明。他说：

我这篇讲话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从两河流

域苏美尔文明开始到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僧侣阶级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10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的使用相互交叠，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纸的应用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毛笔和欧洲使用纸、羽毛笔的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和印刷术到19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19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19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珞时期；最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

3. 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

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是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他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时间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空间的束缚。

他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古希腊的口头传统，认为该传统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他认为，这样的平衡境界可以

给当代的西方文明以非常有益的启示。所以他说：

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为此目的，我们应该弄懂那种对生活（或者生活传统）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对活生生的传统重要的东西。这些重要的东西，是口头传统独特的东西，是和机械化传统相悖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

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因为口头传统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所以他说：

口头传统之式微，意味着对文字的倚重（因而倚重眼睛而不是耳朵），意味着对视觉艺术、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倚重（因而倚重空间而不是时间）。时间的重要性之经久不衰，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使用的物质材料之中，这些物质材料的性质经久不衰，石料的性质尤其如此。

他惋惜向书面传统的回归，所以他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于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和印刷术一样，摄影术也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

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首先他推崇希腊文明的“勿过”：

“万事勿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里都是如此。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

接着，他批评西方文明的“太过”。他说：

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妨碍我们理解这些文明。工业主义就是关注技术，就意味着把时间切分成精确的段落，以满足工程师和会计师的需要。如果不能逃避工业主义对时间的要求，我们评价空间局限的能力就会削弱。

4. “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他说：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口语，他可以诉求于人数少的群体和民族……和印刷工业的需求相关的政治边界，在这个新的传播媒介面前已经不复存在。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于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

纸在中国的大量供应，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

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

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仅见于本书的，就有上百条，难以一一列举。请读者慢慢欣赏。

三、思想遗产

1994年，伊尼斯百年诞辰之际，多伦多大学和几所大学联手，隆重纪念加拿大这位学术泰斗。凑巧在这一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加拿大学界在成熟的信息社会里、在数字时代的门槛上，重温伊尼斯的思想遗产。这次纪念的主要成果陆续问世，笔者已经见到有三本书，一本特刊。第一本是《教育技术棱镜下的伊尼斯》^[3]，全面检讨伊尼斯的学术思想。第二本是《伊尼斯在新世纪》^[4]。第三本是传记：《伊尼斯画像》^[5]。特刊是《加拿大传播学季刊》1998年第一期，题名“伊尼斯百年诞辰纪念专集”。他的思想遗产，还见诸以他命名的基金会、学院、网站之中。

兹将他的思想遗产略加梳理，简单概括如下：

他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对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摆脱对西方大国的依附，走向独立与辉煌。

他首创“大宗初级产品论”，研究加拿大的皮货、纸张、采矿业、木材业、渔业、谷物、石油等产业，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加拿大不能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不能受制于人。加拿大人必须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也不能受制于人，不能成为英美等国的边缘，不能受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

他的媒介“偏向论”似乎着重研究世界文化史、传播史。其实，他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希望给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这个思想对社会的权力、文化和价值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认为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由此观之，后人给他和麦克卢汉强加的帽子“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

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

主导媒介造成的知识垄断，使知识和权力集中在富裕的权势集团手中。要避免知识垄断才能避免文明的危机。

他对加拿大的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多有进言，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意见。本书英文版的两个附录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赘。本书的主题是传播的偏向和媒介的偏向，两个附录似乎游离于这个主题之外。中译本有意识地省略之，相信读者能够理解。特此说明。

何道宽

2003年4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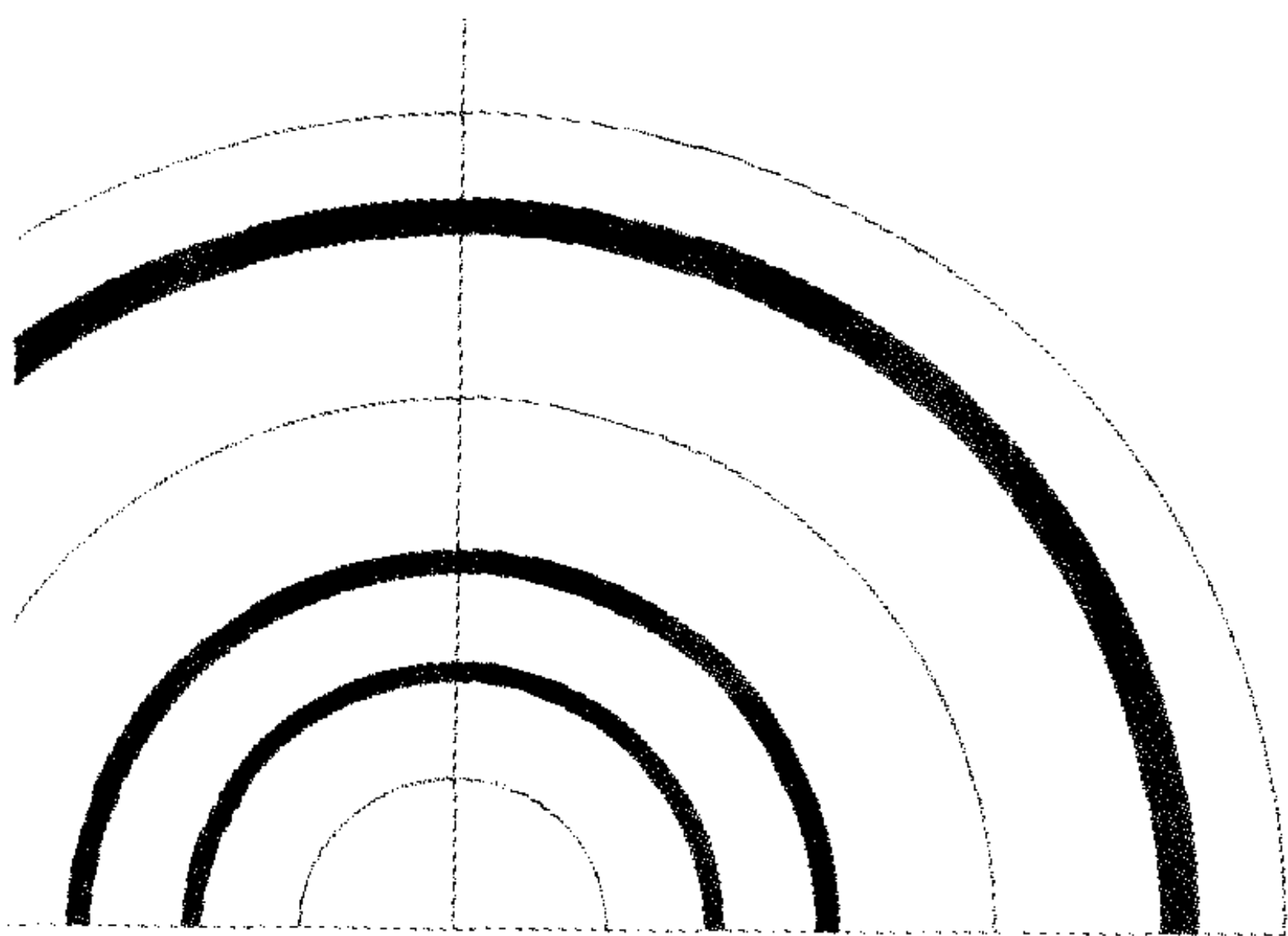
【注释】

[1] [2] 《麦克卢汉精粹》，11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 *Harold Innis Through the Len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Glenn Clark,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pril, 2000.

[4] *Harold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 ed. Charles R. Acland et. 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Harold Adams Innis: Portrait of a Scholar*, Creighton, Donald G.,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麦克卢汉序言

对那些对波德莱尔以来的诗歌和塞尚以来的绘画略知一二的人而言，哈罗德·伊尼斯后期的世界都是一目了然的。他用电力时代诗歌绘画中的当代意识，组织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数据资料。他从未染指现代艺术和诗歌，然而他发现了自己的洞见组成的颇像当代艺术形式的模式。他推出的洞见，呈现马赛克结构。这些结构，似乎是由毫不搭界的比例失调的句子和警句组成的。比如 108 页就很耐读，它的一个脚注就很有学问。凡是查检过他的参考文献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能够从枯燥的并列中抽取出令人兴奋的事实。他仿佛在用一个“盖达尔”计数器去探索资料。反过来，他的探索结果，用的是一种洞见的模式，其包装是不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他期待读者去完成他忽略了一个又一个发现。他认为，我们的大学搞知识分割肢解的专门化，是不光彩的知识垄断（109 页）：“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大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记住这句话：‘科学的整个外部历史，就是学者和大学抵抗知识进步的历史。’”

我们可以用罗素评爱因斯坦的话来评说伊尼斯。罗素在《相对论ABC》(1925年)中评爱因斯坦时,是这样说的:“许多新的思想都可以用非数学语言来表述,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困难。我们所需要的,是修正我们想象之中的世界画面。”“后期的伊尼斯”踏上了求索变革原因的征程。写《加拿大的皮货贸易》的“早期的伊尼斯”,在很大程度上,谨守常规的、只做报导和叙述的学术模式。到了皮货贸易研究的末期,他才冒险把复杂的事件编结起来,以揭示变革的因果过程。他认为,美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定居者和皮货商的利益冲突。这一洞见成为后期伊尼斯的典型特征。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在艺术和诗歌中,这是“象征主义”(希腊词的“象征”是并列在一起)技巧,就是并置而不用连接成分的意合法。这是聊天或对话的自然形态,而不是书面话语的自然形态。写作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从题材中分离出一个方面,将注意力死死地指向它。对话还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洞见和发现。与此相对,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洞见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洞见是与各种形态生命的一次接触。计算机编程的学生必须要学习如何从结构上去处理一切知识。为了把知识转移到磁带上,就有必要了解其形态。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发现:分类知识和模式识别的区别。读伊尼斯的时候,记住这个区别很有好处,因为他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在《大脑的模式化》中,塞耶尔(Kenneth Sayre)博士对模式识别作了这样的解释:“分类是一个过程,要花时间。进行分类,你可能勉为其难,很不乐意,也可能很热情;你的成绩可能或多或少,结果也可能或好或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模式识别并不花费时间。模式识别产生之前,观察可能要消耗很长的时间,模式识别一旦发生,它却是‘瞬即完成’的。它不是行动,不能够说它是勉强的、热情的、顺从的或是在抗争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关于模式识别成功与否或差劲与否的观念,是毫无意义的。”^[1]

在这本书中,伊尼斯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学习过程中的口头法和书面法的对立。在《挑剔的批评》一章中,他解释说:“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见英文版190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曾与他共事的哈弗洛克(E.A.Havelock)在最近的一本书中,以全部的篇幅讲述希腊口头文化和新兴书面文化的冲突。他的《柏拉图导读》^[2]会使伊尼斯含笑九泉。

伊尼斯的许多话应该成为如此充分研究的题材。

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3]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他注意到我的一些著作，我为此而受宠若惊，于是就生平第一次找他的著作来读。从第一篇“米涅瓦的猫头鹰”开始读，那真是我的福分。遇见了这样一位作家，他的话使我陷入长期的沉思和探索，那是多么激动人心：“亚历山大城切断了科学与哲学的联系。这里的帝国图书馆成了帝国抵消埃及僧侣影响的工具。”（10页）

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要花掉不少的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上面引用的两句话就意味着并吸引人们注意：对科学和哲学的具体的结构形态应该了解，对帝国、图书馆和僧侣职位的结构性质和功能也应该了解。大多数作者都一心想给读者提供哲学、科学、图书馆、帝国和宗教的内容。伊尼斯却有所不同。他引导我们去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种权力机构的形态对其他形态起了什么作用。所有成分的存在，都要靠自己 and 彼此正在经历的过程。至于什么是“科学”和“哲学”，那是要了解，在历史和社会进程中，每一种成分有何作用，它们对其他成分又有何影响。它们在历史的动态中说明了自身的效用。伊尼斯计上心来，把历史作为手段，就像物理学家把云室作为手段一样。他让未知的形态去撞击已知的形态，从而发现了新形态或知之甚少的形态是什么性质。

他把历史当做科学实验室，当做研究形态的生命和性质的一整套受控的条件，这和汤因比的常规叙述相隔千里。汤因比像体育评论员，对比赛发表大量的评论。他以认真关切的语气告诉读者或听众比赛的意义。在同样的情况下，伊尼斯却会说，运动的系统是一种有趣的感知模式。他立即就把社会动机和模型的形象传递给我们，这是社会的一种团体延伸形象。接下来他就会说，他这位评论员的角色，和其他受众一样，是运动的结构成分。他的角色有一些偏向，发挥了使感知和声音放大的扭曲作用。这就给比赛赋予了强大的政治和商业力量。

伊尼斯关注的是，一种媒介与其他媒介遭遇时，会释放出什么力量使其他媒介改变。掌握了这一点，读者就可以立刻像他那样去研究问题

了，就可以着手去观察和估计古今各种媒介的作用和反作用。读者会发现，伊尼斯绝不会重复自己，绝不会停止检验知识的口头形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也绝不会停止检验社会组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伊尼斯检验口头形态在不同的书面文化中的反应。同样，他检验按时间构建的制度与空间取向的社会接触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认为伊尼斯已经从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他检验社会形态结构属性的方法，是有效的。比如他说：“希腊人接过拼音字母，用来造字，使之成为适合灵活的口头传统需要的灵活的工具。”字母表是视觉分割和专门化的技术，它引导希腊人去发现可以分类的数据。哈弗洛克的《柏拉图导读》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只要口头文化还没有被字母表的视觉力量的延伸压垮，口头形态和书面形态的相互作用常常会产生丰富的文化成果。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与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结局”是分类数据的荒漠，我们的“结局”是新型的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

有的时候，伊尼斯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的相互作用搞错了。他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杂交的结果算到了书面形态的头上：“他们借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加上元音，使之更加适合希腊口语的需要。于是耳朵就代替了眼睛。随着文字的流布，口头传统反而开发出了新的抵抗力，表现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之中。”（136页）倘若他更加精细地分析拼音字母表固有的视觉形态，倘若他更加彻底地研究口头形态的活力，他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疏漏。不过，他发现的方法保留了下来。他找到了一种手段，就是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伊尼斯告诉我们如何把文化和传播的偏向当做研究工具来使用。他把注意力指向文化中的主导形象和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许多学者使我们意识到“估量我们自己文化的品性（quality）难，估量别的文化的品性也难”（132页）。把一切学术观点的这种脆弱性当做最好的研究和发现机会，伊尼斯可能是天下第一人。德鲁克（Peter Druck）的《出效益的管理》^[4]中说明，在任何一种人类组

织或情景中，90%的事情是由于10%的事情引起的。人的主要注意力分配给了90%的领域，这正是问题多的领域。剩下的10%的领域是令人焦躁的领域，但也是求得机会的领域。伊尼斯不让90%的问题领域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就是他的天才所在。他直奔10%的隐藏着机会的核心，搜求洞悉整个情景底层的原因。比如他说：“我们这种文明追随印刷工业的发展。也许，我们和它的关系实际是太密切了，所以我们探察不到它的特征。用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话说，教育成了教书匠用印刷词语教育人们自我欺骗的艺术。”（139页）

一旦确定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伊尼斯就可以断定：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还可以肯定，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形态及其力量必然要受到掩盖，该文化中的人看不到它们，这个遮蔽的面具就是所谓的“保护性抑制”。伊尼斯一举解决了两个大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人头统计员”（nose-counters）和统计研究员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旦认准了一种文化的主要技术成就，他就知道该文化的模式必然是什么，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模式。第二，他准确地知道，该文化的成员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什么东西不了解。所谓“创造性麻木”（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正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发明视而不见。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伊尼斯对技术视而不见。他把广播和电力技术误认为是机械技术模式的进一步延伸：“广播传播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阶级界线，它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82页）他又说：“广播这个新媒介是个挑战，它诉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眼睛，因此它强调的是集中化。”（188页）这个例子说明伊尼斯没有忠实于自己的方法。他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眼睛的空间约束力和耳朵的时间约束力。此后，他却畏缩不前，没有能够把广播功能的结构原理贯彻到底。突然之间，他从广播的听觉世界转入视觉世界的轨道，把眼睛和视觉文化的一切集中化力量都套到广播的头上。在此，伊尼斯受到了他那个时代普通共识的误导。正如其他一切电子媒介一样，电光和电能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上具有深刻的非集中化和分离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尊重无孔不入的常规观点，因而陷入了催眠状态。否则，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新型的电子文化模式。

伊尼斯提到刘易斯（Wyndham Lewis）的观点，这在他的著作里难得一见。他说：“温德汉姆·刘易斯争辩说，时髦的脑子是拒绝时间束缚的脑子。”他指的是刘易斯的《时间和西方人》。这本书批判柏格森

(Bergson)、亚历山大 (Alexander) 和怀特海 (Whitehead) 对时间的那种宗教神秘主义般的执著。由于他自己非常关心传统价值和时间的连续性，所以他大大地误读了刘易斯。早些时候，在同一篇文章《时间的诉求》中，伊尼斯提出的一个问题，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他的结构分析方法偶尔会出错。他说印刷术的发展对 20 世纪文化的极大冲击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80 页) 伊尼斯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垄断。他认为垄断会产生猛烈的反应：“视觉本位传播的垄断，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它对听觉本位传播的发展会构成威胁。听觉本位的传播建立在广播中，建立在声音和影视的结合中。”(81 页) 伊尼斯在此失误了，他没有对视觉形态和听觉形态做结构分析。他只是假定，信息的空间延伸具有集中化的力量，无论它放大和延伸的是人的哪一种官能。视觉技术创造一种中心—边缘的组织模式，无论它借助的是什么手段，文字、产业、价格体系的手段都是如此。然而电子技术传递的信息是瞬息完成的、无所不在的，它创造没有边缘的多中心。视觉技术创造的国家是同一、均质、一体的国家，无论这种视觉技术用的是文字的还是产业的手段。但是，电子技术创造的却不是国家模式，而是部落模式——不是平等人肤浅联系的模式，而是全身心介入的亲属群体的、凝聚力强大的深度模式。视觉技术——无论它的基础是纸莎草还是纸张，都哺育分割化、专门化、军队和帝国。电子技术宠爱的不是分割而是整合，不是机械的东西而是有机的东西。伊尼斯没有想到，电子技术实际上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好像是覆盖全球的一张膜。他搞经济史，对人体力量的延伸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看到这个最新、最令人吃惊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的性质，这一点不足为怪。

有一个方面伊尼斯从来都不会失误——他那无所不知的情趣不会在这里失去——这就是他的幽默。他把不协调的东西用格言警句联系起来，其实质就是幽默。他把不同形态的东西并列在一起，去求得新的发现。这一技巧处处都适宜，而且导致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令人吃惊的发现。在第 77 页上，他在思考北美殖民地的反叛和 19 世纪的战争时突然发现了一种相似性。这些战争与赫斯特和普利策两大报系的新闻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闻战使漫画诞生。伊尼斯能够在当代史中发现精当的事件去说明重要的考古发现。这种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指出人们忽视了马在军事史中的作用。他回忆说：“狄龙 (E. J. Dillon) 说到骑警时，说他常常惊讶地看到马聪明的面部表情。”(95 页) 伊尼斯在后期

著作中运用富有洞察力的马赛克结构。在这一点上，他和林肯总统的谐谑反讽相去不远。他发现自己的洞察技巧产生惊奇和聪明的喜剧，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愉悦。

把造就伊尼斯成就的思想影响记录下来，实在是一项庞大的任务，虽然这是颇有收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到芝加哥大学求学时，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涂尔干（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和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造就了一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秀。他们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帕克。在20年代的芝加哥，他们创造了一种吸引和激励新秀的氛围。和伊尼斯一样，他们大多数人的青年时代都是在小城镇里度过的。这个大都会的快速发展，给这些社会学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他们的许多工作都用于都市分析研究。同时，他们用小城镇作为比照的基础。虽然伊尼斯深深地感谢帕克，但是他遵循的却是另一种模式。19世纪分析社会学的鼻祖涂尔干研究的是整个的人口。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不过，他从帕克那里学到了如何确认异质社区中的控制机制，这些机制在安排社区事务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同一性。也许，他在做这一挑选时，加拿大稳定的经济对他助了一臂之力。这个半工业化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小麦、木材、矿产、皮毛、渔业、纸浆等主要资源。和更加多样、发达的国家比较，加拿大过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生活。伊尼斯抓住机会去研究这个独特的大宗产品经济（staple economy）的模式。他没有被牵着鼻子去追随走红的都市研究模式——激动人心而多产的芝加哥学派追求的模式。我要说的是，伊尼斯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进一步的转变，他从研究大宗产品经济的历史转向研究媒介的历史。正如大宗产品一样，媒介也是主要的资源。事实上，如果没有铁路，小麦和木材这样的大宗产品很难存在。如果没有报纸杂志，纸浆也不可能作为大宗产品而存在。

1940年，《加拿大经济学及政治学报》发表了帕克的文章《物理学与社会》。甫一落笔，帕克就引用白哲特（Walter Bagehot）的话说，社会是由社会过程维持的社会有机体。文章的主题是这样概括的：“我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传播的角色和功能，因为传播显然是社会过程中根本的东西，因为物理学使传播手段的延伸和改进对社会的存在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帕克的思想对伊尼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它对其他学生的吸引力。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这类言论中听到伊尼斯的调子：“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似乎可以说，每一种技术设备，从手推车到飞机，就其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动装置来说，已经而且也应该标志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同理，据说每一种文明自身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种子可能就是那些引进新的社会形态、送走旧的社会形态的技术设备。”^[6]同一年，正如他在《物理学与社会》中所说的一样，帕克在《作为知识形态的新闻》里说：“我已经说明，就新闻提供的议论形成舆论的基础而言，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在世界经济关系中，新闻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因为商品价格，包括货币和证券的价格，都依赖新闻，都是以新闻为基础，世界市场登录的价格和地方市场的价格都是这样的。”

这些思想并非没有对伊尼斯产生影响。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注释】

[1] *The Modelling of Mind*, p.17,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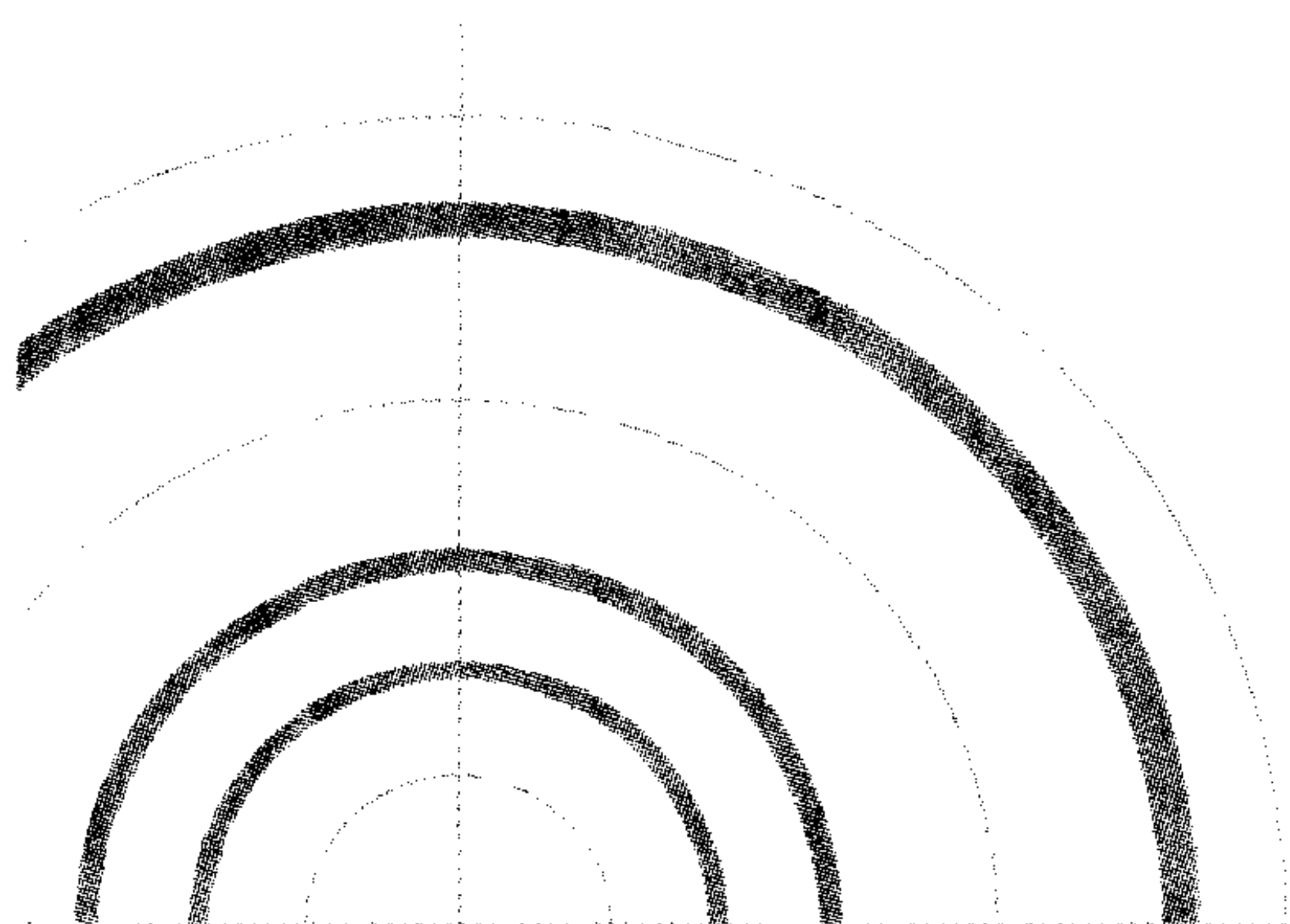
[2] *Preface to Plato*, Harvard, 1963.

[3] *The Gutenberg Galax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4] *Managing For Results*, Harper and Row, 1964.

[5]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printed in *Society*, p.314,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55.

[6] *Society*, pp.309~310.



作者前言

本书集结了一些略经修订的旧文。集结的目的是便于读者翻检，同时也便于以更加详尽的形式支持我在《帝国与传播》（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中提出的主题。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本书试图回答一篇心理学文章提出的一个问题。已故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哲学教授詹姆斯·本·布洛克（James Ben Broeke）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注意我们所注意的事情？”我这些文章未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反映了我受到吸引以后所做的一些思考。它们强调，在决定“我们所注意的事情”方面，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又说明，“我们所注意的事情”发生变化之后，传播的变化就接踵而至。

据信，历史并非疏而不漏的一张大网，历史由时空经纬编织而成，这张大网是不平坦的，它产生了许多扭曲的模式。作为经济学家的我，有一种偏向，或许会把垄断理论推向不合适的极端。然而，社会学家有责任去检测其工具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他受到诱惑想完全抛弃这些工具的时候。同样，循环理论的延伸也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是，

传播界忽视对循环现象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考虑，知识垄断的崩溃和外部材料的缺失达到什么程度，才会出现一个新的前景：强调一个新的传播媒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再者，这些文章首先关注的是政治方法，反映的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执著。它们仅限于考虑政治组织的两个方面。一是该组织存续的时间，一是它控制的领土空间。这些文章本身，也许是它们企图描写的那种不稳定的产物。这种不稳定，是时间被分成片断的时期的特征吧。最乐观地说，我这些文章也只能提高我们的灾难意识。如果太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灾难就可能接踵而至。字面上的意义也能伤害人，我关心的是不同字面意义的多重涵义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这些文章原载《加拿大政治经济学杂志》、加拿大《皇家学会论文集》、《曼尼托巴艺术评论》和《英联邦大学第六届会议论文集》(1948)，我在此深表谢忱。有一篇是在新布伦瑞克大学 150 周年庆典上的讲话，由该校出版。承其允许，在此重印。我还要感谢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弗朗西丝·哈尔彭尼小姐。她对编印准确的关心，精细入微。当然，这不能作为“错误在所难免”的借口。如果忽略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诸位女士、先生的帮助，那将是大不敬。我也不能忘记本校的诸位老师，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系的同仁。他们的帮助，正是因为其理所当然，所以容易被人们忘记。为了避免啰嗦而使人生厌，恕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我不能不提及希亚 (A. A. Shea) 先生。

哈罗德·亚当斯·伊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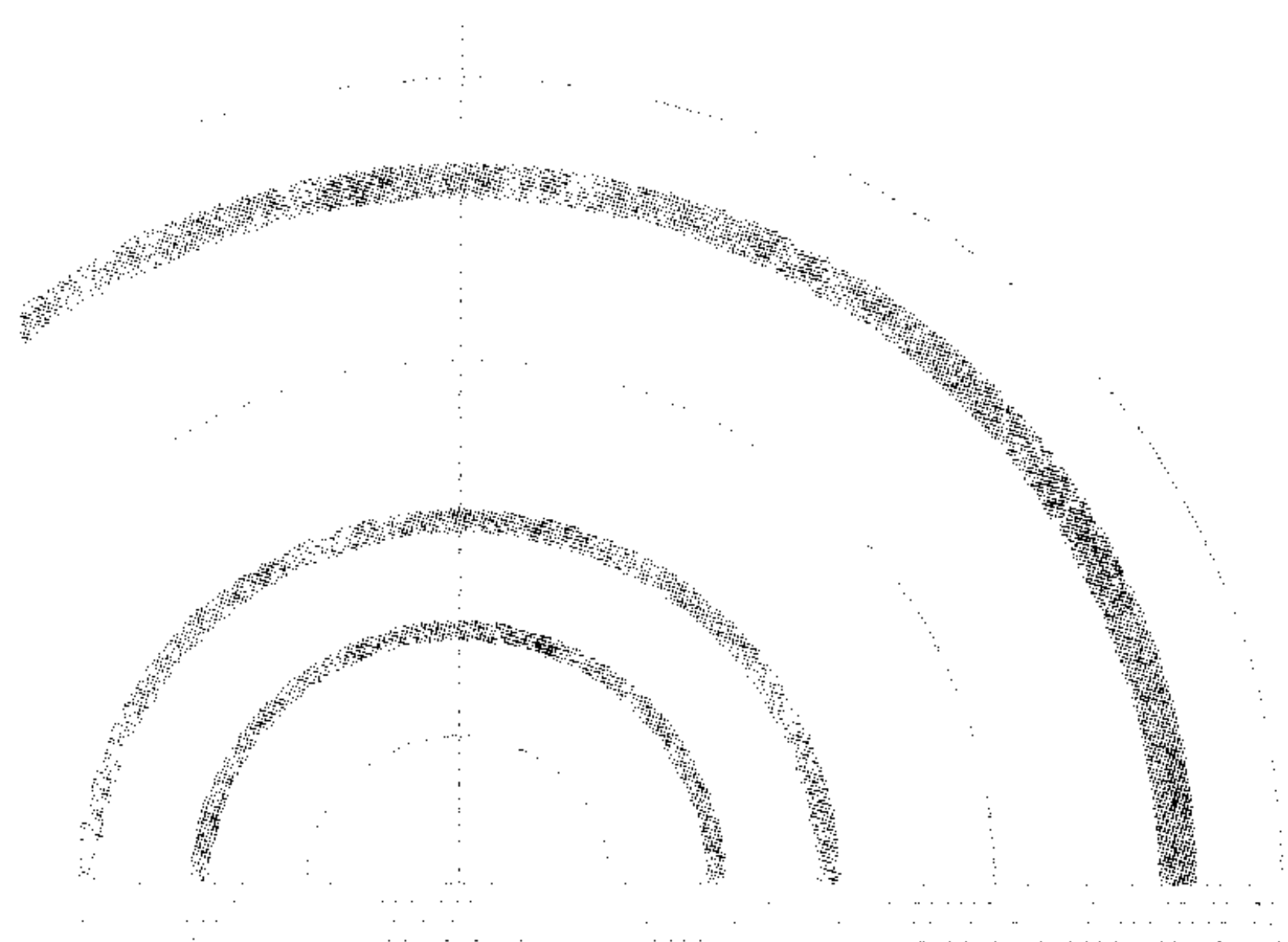
策划编辑：司马兰

责任编辑：李玉静 杨宗元

装帧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
吕敬人 + 杜晓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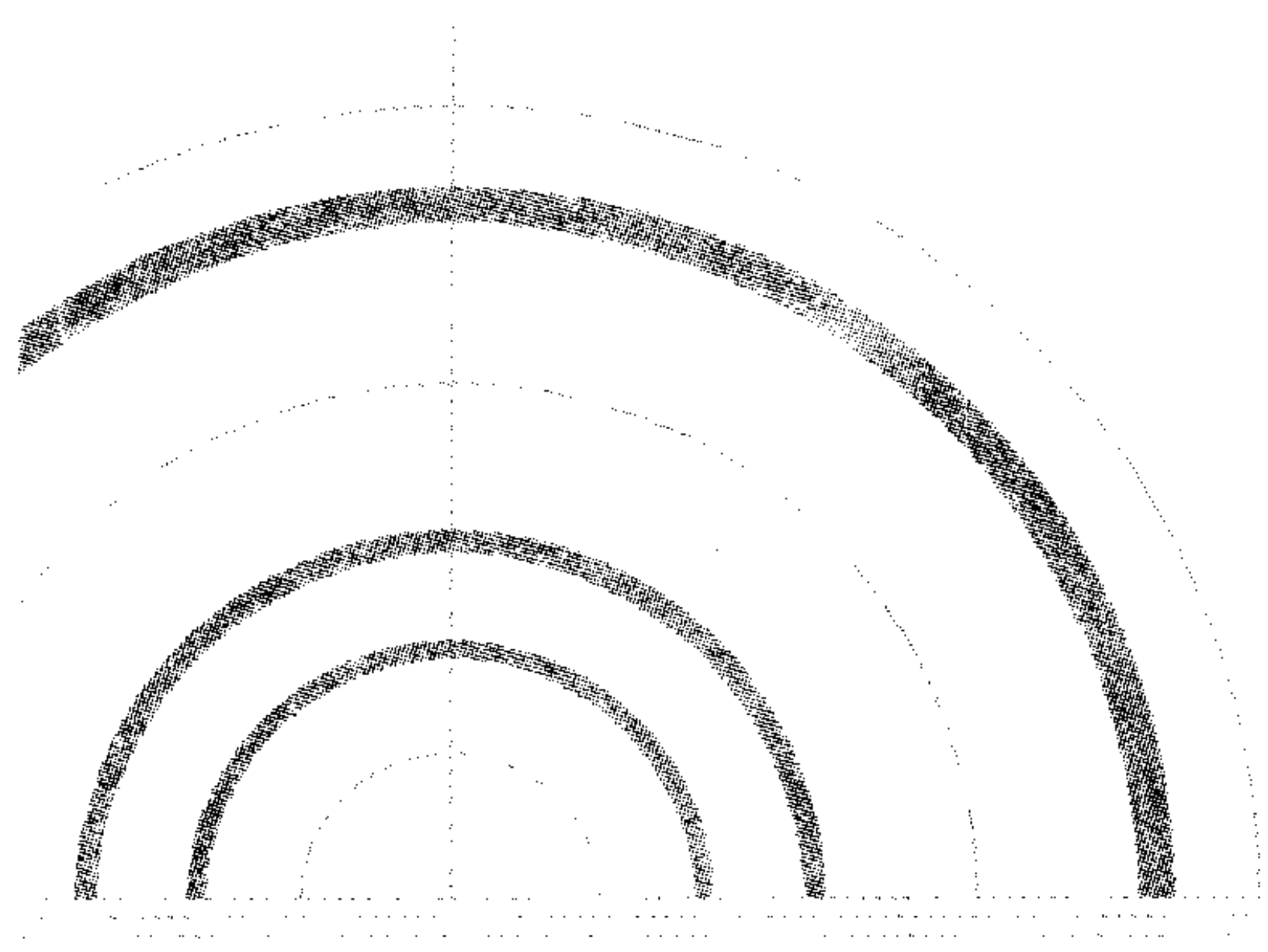
版式设计：赵星华

伊尼斯 (Harold Innis, 1894—1952)，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1920年起直至去世，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要者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目 录

麦克卢汉序言	(1)
作者前言	(9)
第一章 密涅瓦的猫头鹰	(1)
第二章 传播的偏向	(27)
第三章 时间的诉求	(51)
第四章 空间的问题	(77)
第五章 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	(112)
第六章 18 世纪的英格兰出版业	(121)
第七章 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	(134)
第八章 挑剔的批评	(165)
译者后记	(171)



密涅瓦的猫头鹰^{*}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黑格尔这句话，指的是希腊文明衰落时期的文化结晶，那些经典著作的文化结晶。那个时期的文化丰富、独特，对西方历史产生影响。这说明，智慧的猫头鹰的飞翔，不仅开始于希腊文明的黄昏时期，而且开启了西方文明的黎明。

我试图说明，西方文明受到传播的深刻影响，传播的显著变化具有重大的涵义。简而言之，我这篇讲话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开始的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僧侣阶级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10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的使用相互交叠，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纸的应用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毛笔和欧洲使用纸、羽毛笔的

^{*} 该文是担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主席时发表的讲演辞。

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和印刷术到 19 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 19 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 19 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珞时期；最后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在每一个时期，我都试图追踪，传播媒介对于知识的性质有何含义，并试图说明，知识的垄断或寡头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平衡就扰乱了。

口头传统^[1]的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但是人类学家又指出，原始文化的习俗富有束缚性。复杂的文字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权，倾向于支持贵族。简单而灵活的文字，留有余地，适应口语。但是其适应过程缓慢，因此它又有利于知识的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阅读与文字相应，暗示着对写作能力的被动承认。传播中的种种发明，迫使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的重新组合。与文字专项能力偶然挂钩的知识垄断，由于它削弱了和口语的接触，最终要被外力瓦解。用休谟^①的话说：“力量总是站在被治者一边，治人者除舆论外，没有其他东西支持。因此，政府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这个原理适用于最自由和最得人心的政府，也适用于最暴虐和最好战的政府。”在文明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中，知识垄断与有组织力量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学习的兴趣意味着社会的稳定。在稳定的社会中，有组织的力量较为强大，足以给社会提供持久的保护。专注于学习必然形成文字的传统，而且要产生垄断的文化成分。垄断成分必然产生僵化，必然缺乏与口头传统和口语的接触。“一种伟大的制度是其创建者的坟墓，也许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多数组织之所以要建立，似乎是为了让其创建者的思想无痛苦地死亡。”“对于一个学派的创建者来说，一切均可原谅，惟有其学派不可原谅。”^[2]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有组织力量和口语的关系随之削弱。在技术变迁面前，崩溃随之发生。这种崩溃发生在边缘地区，因为知识垄断的影响达不到边缘的地区。据说，公元 267 年，哥特人占领雅典时，曾经说过：“我们让希腊人把这些书留下来吧，因为书使他们柔弱，使他們不喜欢打仗。”

由于有组织力量对他们的保护减弱，文人学士更加努力。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的繁荣出现在崩溃的前夕。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渐浓的黄昏开始飞翔，不仅古典希腊时代是这样，而且以后也是这样。在亚

① 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知觉是认识的惟一对象，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代表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等。本书脚注中的内容均为译者注，以下不一一注明。

历山大大帝时代如此，罗马时代如此；君士坦丁堡如此，意大利共和制的城邦也是如此；以后的法国、荷兰、德国无不如此。有人说，拜占庭帝国“在注定毁灭的前夜，它很像希腊的精神力量，放射出最后一道灿烂的落日余晖”^[3]，“……这个十四五世纪行将就木的帝国，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成为热情奔放的文化中心，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都是文化中心”^[4]。在密涅瓦的猫头鹰飞行的地方，有组织力量的成绩，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热情，产生文化的高度繁荣，这种现象凑巧和文人学士的迁移有关系。这些献身学术的人，从一个正在没落的文明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寻求可能的文化保护。有组织力量的成功，依靠口头传统和口头舆论与技术和科学的有效结合。武功成就之后的有组织的舆论，做好了接受文化输入的准备。

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说：“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些伟大的艺术品一定要消亡，以便后来的艺术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创造。比如，倘若 15 世纪已经发现了大批保存完好的希腊雕塑和绘画，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和柯勒乔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完成巨作。相反，他们完成了各自的杰作，这些作品与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东西相比，毫不逊色。又比如，18 世纪中叶之后，在复兴语文学和古文献的热潮中，倘若突然发现了已经失传的希腊抒情诗作，盛极一时的德国诗歌，就可能会黯然失色。不错，几十年之后，重新发现的大批古希腊诗歌也可能和德国的诗歌融合，但是决定性的繁荣时刻是绝对不可能回到巅峰的状态，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古代的遗存使 15 世纪的艺术和 18 世纪的诗歌，受到足够的激励，而不是受到窒息。”^[5]休谟说：“艺术和科学在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完美境界时，就必然开始自然地衰落，或者说必然要衰落，就是说，它们很难、甚至是绝对不可能再复兴，虽然它们曾经繁荣昌盛……也许，任何国家从邻国引进的艺术，如果太完美，那是于己不利的。这就扑灭了模仿的火苗，使大胆学习的青年热情冷落。”^[6]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对黏土的依赖，需要一种独特的文字和独特的书写工具，即苇管笔。泥版上的楔形文字需要精湛的技术，需要强化训练，需要将持久的记录集中保存。僧侣集中的寺庙成为城市的中心。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武力，入侵这里的城邦。新技术围绕马而发展起来，先是有马车，后是用骑兵。外来的人侵带来了城邦的联合，但是这里的文化以楔形文字为基础，文字能力需要强化训练。这种文化使集中控制不稳定，给有组织的宗教以巨大的影响。于是法律就冒出来，以

抑制武力和宗教的影响。在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宗教的影响在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发展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相信命运，七天一轮的周期，60进位的计时制，都反映了宗教的影响。虽然埃及以象形文字为传播媒介，但以法老为代表的统治力量还是建立了成功的帝国组织。埃及帝国之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承袭了这种帝国组织。

东方帝国的政治组织以埃及为模式。但是，他们的宗教组织却受到巴比伦的强烈影响。这一点可以在巴勒斯坦领土边缘的希伯来传统中看出来。希伯来的先知能够更加方便地用上羊皮纸、莎草纸等媒介，可以使用更加有效的字母表，他们给口头和文字的传统以刺激。这种传统在《圣经》里，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长期保存下来。这些宗教的经典能够被更加的人接受，躲过了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寺庙的沉重压力。

埃及人有大量的莎草纸，又有软笔，所以创造出了精细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依靠泥版和硬笔，开发出了一种简洁的楔形文字。闪米特人借用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又在和埃及人接触的过程中改进了文字。腓尼基人这个地处边缘的闪米特民族，喜欢在地中海沿岸交流经商，他们改进了的文字把辅音从元音里分离出来。希腊人把这个字母表接过来，使之成为灵活的工具，以适应他们构词灵活的口语传统。这个口语传统的繁荣，反映在泛雅典娜节日的庆典中。这个节日给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提供了机会，又为公元前500年之后悲剧的诞生提供了舞台。

各种背景的学者对希腊文明表现出强烈而持久的兴趣，这指明了希腊文化繁荣的许多原因。爱奥尼亚^①文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与早期丰富的米诺斯^②文明接触的产物，反映了一个强大的口语传统的兴起。整个文明吸收和改进了地中海对岸的书面传统创造的工具。汤因比^③强调指出，漂洋过海的移民深受局限，应运而生的文化借用，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书面文化的传统中，改进了的字母表能够表达细微的差别和细腻

① 爱奥尼亚 (Ionia) 文化，约公元前 11 世纪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古希腊人创造的文化。

② 米诺斯 (Minos) 文明，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古代青铜文明，兴盛于约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

③ 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重要著作有《历史研究》(共 10 卷)，发展了德国施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的文化形态观。

的意思。公元前 670 年，埃及的港口向希腊开放，公元前 650 年，诺克里特斯港建立，使埃及莎草纸的进口更加便利。公元前 7 世纪希腊抒情诗的勃兴，就归功于莎草纸的流布。沃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证明了散文对法律和城邦兴起的重要意义。围绕德拉古^①、梭伦^②、克莱塞尼兹^③ 等名字展开的法律改革，显示出法律的灵活性。这种情况，只有在文字传统牢牢扎根之前才是可能的。成文法典不仅意味着一致性、公正和对法律的信任，而且包含着刚性、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急剧的变革性。希腊人没有找到有效的手段，去促进经常的权力迁移。正如在今天的俄国一样，流放政策是必需的。在这个世界中逃避了公正的人，到了另一个世界，法律对惩治他们的兴趣就削弱了。梭伦给法院提供的体制，来自于人民，这反映了口头传统对灵活性的要求。克莱塞尼兹把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赋予全体公民，就是让全体公民参与事务的处理。政治学成为实用科学的最高形式。与政治自由伴生的是经济自由，公元前 700 年金属货币大量使用之后，尤其是如此。用米拉波^④ 的话说：“人脑最伟大的两种发明是文字和货币——这是思想的共同语言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语言。”

东方的集权帝国通过波斯人向西侵蚀，使爱奥尼亚人逃亡。爱奥尼亚人曾经最大限度地从米利都^⑤ 继承了早期文明的遗产。他们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对雅典人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了兴趣。他们提出了普天法治的伟大思想。他们使科学和神学分离，把希腊从宗教暴政中拯救出来，使自我和外客体拉开距离。但是局限也就随之产生。他们对音乐和几何学的兴趣，使这种局限更加强化。几何学关心的是形式和计量、比例和数，忽视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局限，爱奥尼亚人却对原子论和科学感兴趣。凭借这两个东西，欧洲人跳出了东方人的形式模式。从公元前 404 年到公元前 403 年，雅典采用了爱奥尼亚人的字母表。这说明，雅典需要更加规范的文字。到了公元前 4 世纪的中叶，散

① 德拉古（Draco），公元前 7 世纪雅典立法者，他依据习惯法制定的第一部严酷的成文法，后世称为“德拉古法”。

② 梭伦（Solon，公元前 638？—前 559？），古雅典政治家、诗人、执政官，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③ 克莱塞尼兹（Cleisthenese，公元前 570—前 508），雅典政治家，曾任首席执政官，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建者。

④ 米拉波（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王室秘书顾问。

⑤ 米利都（Miletus），古希腊城市，今土耳其瑟凯市南，因爱奥尼亚人的迁入而繁荣。该市对希腊人在黑海的广泛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希腊人曾经在黑海沿岸建立过 60 多个城市。

文走向完美。柏拉图主张排除诗歌，并且用自己的榜样来推行散文至上。公元前454年，雅典成为希腊联邦中心的时候，法律灵活性的道路打开了。原因有二：雄辩家的贡献，散文质量的提高。到公元前430年，雅典涌现出了一个很大的读书群体。于是希罗多德^①的朗诵被写成了历史书。文字的流布阻挡了神话的发展，使希腊人对自己的很多神产生怀疑。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②可以这样说：“我写下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因为希腊人的传统似乎杂乱多样、滑稽可笑。”色诺芬尼^③也可以说：“如果马和牛长着脑袋，并且能够创作图画和雕刻，马就可能用马的形态来表现神，牛就可能用牛的形态来表现神。”世俗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的迅速膨胀，对有组织的僧侣制度和仪式形成钳制。

苏格拉底反对物理科学的形而下漂移，他从寻求起点转向寻求终点。他集中精力思考人生，发现了灵魂。灵魂的独裁意味着人的自治。美德即知识。“无人乐意错。”雅典衰落，苏格拉底去世之后，柏拉图失去了对国家的兴趣。苏格拉底受到医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可是柏拉图很少注意实验科学。城邦崩溃，依附在城邦之上的宗教也随之崩溃，代而起的是自觉的个体本位。在大范围的文化成就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完美性上，个体本位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口头传统的重大意义，表现在集会的立场、民主的兴起、戏剧的出现之中，表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表现在众多的演说辞中，包括收入修昔底德^④著作中的伯里克利^⑤的悼词。黑格尔评论伯里克利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对人类最重要的诸多事情之中，重中之重是支配那些有意志的人的意志。”希腊人创造了欧洲完整的、具有独创意义的文学。其史诗和抒情诗有助于戏剧的发展。民主带来了阿里斯托芬^⑥的喜剧。诗学和戏剧对社会有集体净化的作用。但是，随着戏剧的衰落，雄辩术和修辞反映了个体的影响。

①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0），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所著《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

② 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著作历史书和游记，代表作为《系谱》和《周游世界》。

③ 色诺芬尼（Xenophanes，公元前570？—前480？），古希腊诗人、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先驱。提出神是一的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④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4），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不朽之作，从政治、心理上描写了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

⑤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雅典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期为雅典全盛期。

⑥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8？—前385？），希腊喜剧作家，被誉为“喜剧之父”。相传著喜剧44部，现存《阿卡奈人》、《骑士》、《蛙》等8部。

口头传统强调的是记忆和训练。我们没有一部会话和口头传统的历史，只有书面和印刷文献中模模糊糊透露出来的一点信息。戏剧反映口头传统的力量，但是戏剧在希腊和英格兰都仅仅盛极一时，这说明口头传统遭遇到困难。简化而灵活的字母表和读书写字的传播，都强化了逻辑，并必然加强广泛的一致性。文字的传播拓宽了可供筛选的范围，使人才的筛选成为可能。对文字的倚重削弱了希腊的封建等级制，文字已经成为对智力的考验，一个倚重书写的时代基本上自我取向的时代。掌握写作技巧需要大量的精力，考虑技术潜在命题的精力就所剩无几了。

口头传统的丰富造成了灵活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不可能纪律严明，达不到有效的政治统一。希腊城邦不足以应付国际事务。因此，它屈服于马其顿人的武力，虽然亚历山大大帝高超的征服艺术，明显表现出希腊人的天才。希腊的重甲步兵和海军，哪里是亚历山大轻步兵和轻骑兵的对手，他的军队常常奇袭敌后。技术的沉重打击开始显露。武力和方言沉重地打击了知识的垄断，将它敲打成可以重塑的形态。亚历山大帝国里希腊化的各个王国，都喜欢把亚历山大城作为地中海的文化中心。

亚里士多德弥合了城邦和亚历山大帝国之间的鸿沟。他拒绝柏拉图的二元论，肯定了人脑的绝对独断性。他标志着“从口头传统到看书习惯的转变”。由于强调文字，柏拉图流芳百世的口头传统，就不再可能了。有人说，传授的法律是严酷的法律，传授的哲学是难啃的哲学。柏拉图的著作，是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的混合，这使他支配了西方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对美学的兴趣反映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带来的是鉴赏力、品味、体面、集体疯狂和大型图书馆。作为帝国的中心，亚历山大城倚重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文字传统。学者关心的是保存和阐释昔日文明的奇珍异宝。密涅瓦的猫头鹰在展翅飞翔。帝国的其他中心比如帕加马^①，成为亚历山大城的竞争对手。它们也建立图书馆，但是它们用的是羊皮纸，而不是莎草纸。接下来的时代把伟大的书当作很大的罪孽。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已经饱览百家经书的人阅读。对其他未及读完一切书籍的人来说，这些大部头的书真是不知所云。文学与生活脱节。用默里^②的话来说，亚历山大帝国时代的荷马“尽享风光，但这是致

① 帕加马 (Pergamum)，古希腊城市，今属土耳其。

② 默里 (Gilbert Murray, 1745—1836)，英国古典学者，用押韵诗句翻译古代希腊戏剧，著有《希腊史诗的兴起》、《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等。

命的风光，由书籍散布的错误知识造成的致命的风光”。亚历山大城切断了科学与哲学的联系。这里的图书馆成为帝国抵消埃及僧侣阶级影响的工具。希腊数学取得的进步得到加强，亚里士多德作为伟大的生物学家的成就得到了拓展。

用简化字母表写作遏制了口头传统的习惯势力，但是它又暗示着表达力的衰落，形成了新的常规。这些常规决定了读者和后来作家的思想渠道。莎草纸卷难以摆弄，又不耐久。虽然莎草纸便于修改，但是它的影响受到局限，至少在帝国体制组织之下的图书馆出现之前，其影响是受到限制的。希腊有一个强大的口头传统，有单一语言的集中优势。由于欧洲民族强大的父权制结构，希腊一方面抵抗巴比伦僧侣集团和女神的强权，另一方面又抵抗金字塔反映的埃及君主制。

正如希腊人吸收了一个较早的文化，使之适应自己的语言一样，拉丁人吸收了埃特鲁斯坎人^①的文化。希腊、罗马和英格兰的语言，具有很强吸收能力。语言与较早而发达的文化接触，又不完全被淹没，就能够避免发达文化中某些精湛成分的影响。这就促进了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兴起，使其哲学和科学与宗教形成强烈的反差。希腊人倚重方法的统一，罗马人却吸收修辞，排斥科学。在东方，波斯和阿拉伯文献排斥了希腊文学，吸收了希腊的科学。语言的广泛渗透力成为调动力量的有利因素，尤其成为在各阶级中传播舆论的重要载体。受到重大入侵的语言更加灵活，促进了阶级流动，有利于技术的扩散，有利于迅速的调整。

罗马的力量支持罗马共和政体向迦太基^②和科林特^③扩张，时间是公元前146年。接着，希腊化文化反过来又入侵罗马。对埃及的兼并加深了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的鸿沟，东方的影响乘机渗透罗马。亚历山大城收集和编辑的希腊文献对罗马形成冲击。罗马文学“被极端孤立、内部完美的希腊文学压倒”。希腊语成为一门有学问的语言，它窒息了拉丁语，使之不能发展。源源不断的莎草纸使图书馆繁荣，使政府机关兴旺。希腊化文明使罗马的发展变形，使它向着倚重武力、行政和法律的方向发展。虽然西塞罗^④使拉丁语散文走向完美，但是他倚重的范

① 埃特鲁斯坎人 (Etruscan)，今意大利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古代居民。管乐器出现，其都市文明达到顶峰，罗马人吸收其文化。

② 迦太基 (Carthage)，位于今北非突尼斯境内。

③ 科林特 (Corinth)，位于今希腊东南部。

④ 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力图恢复共和政体。

本还是伊索克拉底^①。雅典的雄辩家和教育家呼吁马其顿国王反对波斯帝国。在共和时代之后的帝国时代，罗马的元老院和口头传统受到了限制。审查制度使政治活动消失，这意味着罗马更加倚重法律和修辞。知识的文献和纯粹的文学相脱离，文学最后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雄辩术和历史从属于国家，戏剧被角斗取代。“知识文献成为法学，仅仅是法学而已，它横亘在诗歌和历史的路上，阻挡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7]罗马对希腊语的兴趣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加强了它对制定法律的兴趣。

军事扩张意味着强调国家的领土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同时，它又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张扬，意味着暂时推翻惯常的束缚。血缘关系和群体至上，不适合罗马军团的军事效率。庞大的罗马帝国和小小的罗马城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有必要制定成文法来限制军事力量的要求。随着共和体制和元老院的衰落，一个职业的律师阶层冒了出来。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有一个显著的标志，这就是法制的形成，其结果是削弱了家族对个人的权力。武力和法律削弱了父权制。家庭关系是人为的关系，梅恩^②在《古代的法律》中作了这样的评论：“我想人类没有比家庭关系更加情深义重的关系了”。法律义务和宗教责任分离开来。合同是从财产转让中演变出来的。它是加上义务的契约。我们再次借用梅恩的话来说：合同是“罗马法学家智慧的最美丽的丰碑”。书面证言和其他文书工具取代了口头传统累赘的仪式。有人这样评论罗马法：不可摧毁的物质，和不可摧毁的思想比较，那真是望尘莫及，哪能够同日而语。罗马法有它的灵活性，但是这个灵活性存在于它和地中海贸易需求的关系之中，掌握在律师和法学家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法院的手里。不过，在希腊学者和评论家的影响下，它逐渐走向固化，最终它受制于精细繁复的法典。“人们要喝水时，才想到挖水库。据说，直到其优点和品味消亡之后，罗马的法律才成为一种体系。”^[8]莎草纸及其纸卷，使罗马法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局限。

法律日益固化，东方的影响日益增长——这种影响表现在绝对皇权的兴起之中。这两种趋势为东方宗教的进入开辟了道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政治动物，变成了亚历山大时代的个人主义者。罗马的建筑、道路和法律提高了罗马的吸引力、渗透力和威望。亚历山大的科学和学问传

^①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公元前 436—前 338)，雅典雄辩家、教育家，呼吁马其顿国王反对波斯帝国。

^② 梅恩 (Maine, 1822—1888) 英国法学家和法律历史学家。

统，不仅意味着对希腊经典的研究，而且意味着对希伯来经典的研究和翻译。希伯来文学从一个被东方帝国大军蹂躏的民族身上产生出来了。这个民族还经历了被东方影响囚禁的时期，它尤其深受波斯宗教的影响，包括波斯宗教不朽的观念和魔鬼的观念。法律和先知写进了《圣经》。在一神教的影响下，经书成为神圣的典籍。经书设定了一神教、教义和圣职。“无经书则无教义，无教义则无经书。”（德·昆西^①语）。异教徒文化缺乏感恩和忏悔。多神教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支持的是帝国，而《圣经》是不适合帝国的。希腊哲学的代表是导师，东方宗教的代表是僧侣和先知。“主如是说。”芝诺这个斯多葛派^②哲人把东方宗教引进希腊哲学，东方宗教的影响明显反映在罗马法对斯多葛派哲学的吸收之中。“犹太人的流亡和希腊的战败带来了基督教和斯多葛派哲学。一切伟大的理想主义似乎都是从物质上战败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9]

帝国和罗马法的成长反映了一种制度需求，以满足新兴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两种主义是城邦和城市国家（the polis and the city state）崩溃之后兴起的。罗马帝国为人的组织关系的大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各种宗教崇拜的流布铺平了道路。有组织宗教（organized religion）的兴起，是要防止希腊文明包含的那种统一的意义。希伯来字母表之类的相当固化的字母表和有限的传播工具，使教育局限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圈子或特殊阶级的手里。这个字母表在《旧约》里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它在保持与变化中的口语的接触中，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明显的危险。人们的口语是阿拉姆语，希伯来语则成为学者的书面语言。基督教之所以没有沦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那是因为它需要向希腊口语提出诉求。所以《新约》是用希腊口语写就的。“书是写的……但是主对你们说话。”

基督教利用了一种新技术的长处，使用了一种新材料。抄《圣经》的羊皮纸取代了抄卷中的莎草纸。羊皮纸抄的《圣经》更加耐用、紧凑，且容易翻检。《福音书》和《祈祷文》既可以抄成单独的四卷羊皮纸，也可以合成一卷。翻检的方便加强了《圣经》的地位，也加强了法典的地位。有了羊皮纸的耐久和翻检的方便，就突出了《圣经》的厚重和权威。诗歌和散文过去是集体高声朗诵的。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和公元4世

^①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英国散文家和评论家，以《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而一举成名。

^② 斯多葛派（Stoic），希腊一个重要哲学流派，主张普世主义、恬淡寡欲，重视逻辑。

纪，这样的朗诵就走下坡路了。不动嘴唇的默读引进了一种品味和风格。古代世界为语音而煞费苦心，现代世界为思想而绞尽脑汁。自我利益取代了对群体的兴趣。到了公元 125 年，用希腊口语写就的条理严密的福音书小册子已经出现。这些小册子成为《新约》的基础。它们和《旧约》一道，合成了一个大部头，并且成为学问兴趣的主要中心。

北方蛮族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找一个比罗马更加安全的首都。于是人们就在公元 330 年选中了君士坦丁堡。公元 410 年，罗马终于陷入北方蛮族之手。宫廷不再是法律发展的中心，而是转向有组织的宗教，将其作为自己倚重的基础。基督教以《新约》和《旧约》合而为一的《圣经》为依据，对其他宗教，如密特拉教^①，或是吸收，或是驱逐。基督教与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在东方，昔日埃及、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的帝国观念，如今又得到了恢复。在西方，法律调和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东方，尤其是在查士丁尼法典^②颁布之后，法律调和了绝对皇权的影响。容我再引梅恩的话：“法律的影响强大起来。因此，君士坦丁堡才奠定了基础，东西罗马帝国才分离开来。这是哲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在所有吊现代人胃口的学科中，除了物理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没有经过罗马法学的过滤。”^[10]拉丁语绝对不是希腊形而上学文献的对手，所以它全盘接受希腊的传统，几乎没有一丝疑问。自由意志和必然这样的哲学问题，随着罗马法一起出现了。

罗马帝国未能驾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分裂势头。帝国无力吸收希腊文化，其显著表现是：帝国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希腊语言文化顽强的生命力支撑东罗马帝国，直至 1453 年。在方言的压力下，希腊语在罗马消失，拉丁语也在君士坦丁堡消失。字母表对语言的变通力和适应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事实证明，语言胜于武力，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历史就是武力适应语言的历史。在拜占庭帝国，希腊文明资源丰富，宗教、法律与皇帝力量平衡，凭借这两个特点，拜占庭帝国能够抗衡新的武力发展势头。

威廉·里奇维（W. Ridgeway）说明了轻巧的利比亚马和粗壮的亚洲马杂交的意义。这种杂交马高大强壮，可以驮载人，也可以供骑兵使用。他描写了公元 379 年在阿德里安堡的战役。在此，罗马皇帝瓦伦斯

① 密特拉教（Mithraism），奉祀密特拉神的宗教，公元 3 世纪传至罗马帝国。

② 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s），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83—565）主持编纂的法典。他曾经征战波斯，征服北非及意大利等地。

被哥特人的重甲骑兵打得落花流水。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军队经过重组之后战败了蛮族，成功地抵御了蛮族的东侵。于是蛮族掉头向西，征服了西方。查尔斯·欧曼（C. Oman）对上述情况做了详细的描绘。和波斯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依赖道路。道路促进了帝国的管理和侵略。在西方，面对蛮族的蚕食，罗马帝国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教会的教阶制度。东方帝国的君主制与西方罗马教廷的君主制，是相互平行的。在东方，皇帝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位，受到宗教分歧和异教的影响。西方教皇的地位，却是受到政治分歧的影响。

基督教在东方的分裂削弱了政权。受到地方主义强化的异教，使埃及和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区陷入伊斯兰教徒之手。这个以《古兰经》为基本教义的新宗教，狂热，行多妻制，为拥挤的民族开辟了新的领土。它有幸遇到分裂的基督教世界，所以它迅速向东西两个方向推进。公元677年，伊斯兰教徒攻打君士坦丁堡受挫。此后，他们集中力量专攻西方，直至他们被查理·马特^①阻止。我们再次用里奇维的话来解释：法兰克人用杂交马组建的重甲骑兵打败了阿拉伯人的轻装骑兵。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压力促使西方的集中化增强，最后促成查理曼帝国^②的建立和日尔曼皇帝的兴起。“如果没有伊斯兰，法兰克帝国就不可能出现，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皮雷纳^③语）公元800年，拜占庭帝国的君主是女皇，西方对男性血统的强调，就加强了查理曼的地位。他的加冕礼是教皇主持的。查理曼大帝之后是卡洛林王朝时期的复兴。

东罗马皇帝的地位与修道制度冲突，与关于偶像崇拜的争论冲突，导致它与西罗马教会的分裂。西罗马不受限制的修道制度，突出了独身禁欲的影响和拉丁文在教会的影响。在东方，修道制度受到控制。在西方，它的地位却得到加强。政治史受到政教斗争的强大影响，直至今今天。埃及的莎草纸供应被伊斯兰教徒切断之后，产生了知识的垄断，修道制度的势力因此而得到加强。“地中海曾经是罗马的小湖，如今它大多数时候成了穆斯林的小湖。”（皮雷纳语）。在东方，雅典的最后一批

①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法兰克王国国王，公元732年在普瓦蒂埃打败阿拉伯人。

② 查理曼帝国，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建立的大帝国，查理曼称查理一世。

③ 皮雷纳（Henry Pirenne, 1862—1935），比利时历史学家。一战中被德国占领军监禁，在狱中凭借记忆写出一部欧洲史。其他著作有：《比利时史》、《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结束》、《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等。

学校在 529 年被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学问中心。然而在西方，修道院的传统挫败了学习经典的兴趣。修道院只关注《圣经》和注经。《圣经》取代了希腊经典。穆斯林堵塞了来自西班牙的学问，欧洲对新闻的兴趣受到局限。这就是说，欧洲最偏远的爱尔兰孤悬一隅，它成了惟一对知识怀抱热情的地方。从这里，对学习的兴趣回流到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阿尔昆^① 应召从英格兰北部到查理曼大帝的麾下效力。对新闻兴趣的复兴带来了写作的改进，卡洛林王朝时期小书写体应运而生。这种字体的效率显而易见，它迅速传遍欧洲并最终战胜了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Beneventan）书写体，成为现代字母表的一个样板。

学问从不列颠群岛向大陆传播之后不久，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开始入侵不列颠。公元 911 年，诺曼底的公国出现，欧洲的防务实现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北方的压力显而易见。到了 11 世纪，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留下了骑兵，使封建骑士地位至上。语言的文化韧性，在被征服者最终战胜征服者的现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诺曼底接受了法语，英格兰的诺曼底人最终又采用了英语。欧洲实现军事重组，罗马教廷地位上升；1054 年东方教廷和西方教廷分裂，接着十字军东征；1061 年诺曼底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1066 年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穆尔人被赶出西班牙。于是，西方的能量转而对付圣地的穆斯林和闹分裂的拜占庭帝国。1204 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之后，东罗马帝国就开始衰落了。

伊斯兰教传播开来之后，莎草纸的使用进一步减少，羊皮纸遂成为必需品。羊皮纸适合写大部头的书，无论它是罗马法还是希伯来圣经。拜占庭帝国继续不断地制定罗马法典。凌驾在教会之上的政府和反对偶像崇拜的争论，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控制。在西方，蛮族的法律是个人性质的，教会强调的是《圣经》和注经。对希腊人而言，美德即是知识；不了解的知识，更是美德。对希伯来的先知来说，知识是邪恶。也许，这是为了抗议埃及和巴比伦的抄书人对知识的垄断。西部强调《圣经》和注经的权威性，并且辅之以宗教仪式和和讽喻著作。古典诗歌的韵律被重音和节奏取代。阅读预设服从权威。

然而，此前很久，希腊文化的影响经过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过

^① 阿尔昆（Alcuin），英国神学家和教育家，改革天主教礼拜仪式，把盎格鲁—撒克逊的人文主义传统带到西欧。著作涉及教育、神学和哲学。

滤，已经传到了南方的西班牙、西西里，并最终传到了欧洲大陆。这个传播过程由于一种新媒介的出现而加快了。这种媒介就是来自中国的纸。公元2世纪的初期，中国发明用碎布造纸。中国还发明了用毛笔画画写字，用灯烟造墨。所有这些发明，都标志着一个文字传统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读书人阶级的兴起。中文里保留着象形文字，虽然大多数的汉字还是形声字。大约靠有限的1500个汉字，中国的文字就能够以非凡的能力，成为表现许多方言的媒介。但是，其复杂性突出了读书人的重要地位，舆论的有限影响、政治宗教制度的持久性，也突显出来。儒学和经典至为重要，人们崇拜文字，准确地再生产书籍的印刷术随之发明。当时的中国忽视了劳苦大众，这就加速了佛教的传播，加速了印经技术的开发，尤其是符咒印刷的开发。佛教来自印度。在这里，婆罗门的口头传统繁荣辉煌，可是它牺牲了文字传统。口头传统适应文盲众多的印度，是它得天独厚的传统。印刷术的出现就适应了佛教的需要，所以它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同时，印刷术也适应儒学的需要，儒学的兴趣在经典，经典是读书人需要的文献。因为汉字复杂，所以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大量地印制经书，都需要国家的支持。第一本雕版经书，是公元668年印制的。舆论受到严重的束缚，造成长期的动荡，引起改朝换代，导致蒙古人征服中原。然而，口头传统的韧性给中国的制度和文人赋予巨大的力量。

随着伊斯兰教扩张和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夺取土耳其斯坦，纸传到西方。巴格达成为造纸中心。纸的引进恰好与哈伦·赖世德^①在位时的文学繁荣相吻合。9世纪中叶，纸进入埃及。10世纪，纸迅速传播开来。11世纪，用纸量迅速减少。12世纪纸进入西班牙，13世纪进入意大利。到14世纪末，纸在意大利的价格只及羊皮纸价格的1/6。碎布是造纸的主要原料。用亨利·哈兰^②的话说，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垄断了莎草纸和纸张之后，穆斯林支持对图书馆的兴趣，支持希腊经典，尤其是支持亚里士多德和科学的传播。伊斯兰教对偶像崇拜的禁止，促

① 哈伦·赖世德 (Haroun-al-Raschid, 763—809)，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

② 亨利·哈兰 (Henry Hallam, 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学引论》等。

使穆斯林倚重学问。从西班牙的图书馆那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传到了欧洲，成为马格努斯和阿奎那^①著作的重要源泉。阿拉伯数字、数学、天文学、科学和医学知识，从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欧洲。著书立说在修道院的墙外兴起。到12世纪，出现了攻击教会腐败的著作。桑巴特^②强调指出，阿拉伯数字对精确计算的传播，对商业的发展，对1275年至1325年的商业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3世纪出现了草写体。商业扩张有利于世俗学校的发展。修道院把世俗的学生关在门外，这就使教会办的各级学校更加重要。乡下人对修道院的兴趣，让位于都市人对大学的兴趣。从君士坦丁堡引进的建筑学知识，为适应北欧环境而改造的建筑风格，导致了1150年到1250年修建哥特式教堂的热潮。与教堂同时来临的，是艺术的改进，比如彩绘玻璃和对位法音乐。1170年建立了巴黎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成为后来大学模仿的对象。

中国纸的推广加速了意大利和北欧商业的发展。它促进了修道院院墙之外的著书立说。穿过穆斯林地区，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效率更高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凭借阿拉伯文，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迈蒙尼德^③和阿奎那的著作，显然在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圣经》。大教堂中心区出现了大学。这些大学支持对口头传统、辩证法和经院哲学的兴趣。拜占庭帝国曾经是维持罗马教廷和罗马帝国平衡的力量，它消亡之后，教廷和帝国斗得你死我活。罗马教廷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土地权利的纷争。由于“阿维尼翁囚禁期”^④，教廷引起英格兰的敌视。罗马教廷再也不能制止各国用本土语言来翻译《圣经》。拜占庭帝国普及的罗马法，加强了法国和英格兰新君主的地位。对本土语言的专注促进了新型而强大的文学的产生。

意大利的商业活动重新激发起人们对法律的兴趣。历史上的蛮族入侵，意味着对私法（personal law）的强调。这样的罗马法，以法典的形式流传下来。12世纪初，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出现了精心研究罗马法的兴趣，出现了与研究型大学的兴趣。拜占庭帝国衰落之后，西方出现了教会和帝国的斗争。帝国抓住罗马法，把它作为强大的工具，

① 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 —1274），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其神学称为托马斯主义。

②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史家，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

③ 迈蒙尼德（Maimonides），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生于西班牙，定居埃及，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写作。著有《密西拿评注》、《犹太律法辅导》、《迷途指津》等。

④ “阿维尼翁囚禁期”（Babylonian captivity in Avignon），14世纪罗马教皇迁居法国东南部阿维尼翁城，受制于法国国王。

以强化皇帝的地位。罗马法的影响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广泛传播。在教会内部的教义立法中，罗马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世纪最严重的腐败，出现在神职人员向律师阶层的转变过程中。”（黑斯廷斯·拉什达尔语）用弗里德里克·哈里森^①的话来说：“拜占庭文献得天独厚、不可或缺的功劳，就是它保存了希腊的语言、语文学和考古学。”不过，拜占庭文献最大的影响，恐怕是在罗马法这个领域。

欧洲北方教会力量强大，罗马城市和罗马法的传统比较弱小，这从巴黎大学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在法国，尤其是在英格兰，书面传统比较弱，这有利于习惯和习惯法的地位。在这里，法律是发现的，而不是制定的。其意义突出表现在陪审团制度、钦定法庭、普通法和议会之中。在英国，法律和宗教并没有受到大学的强化，因为大学并不在首都或有大教堂的城市里。法律和宗教对口头传统的要求是积极回应的。欧洲语言的入侵，产生了英语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促成了普通法、议会体制和贸易。苏格兰的大学是典型的都市大学，位于大都市，成为18世纪哲学大发展的基地。大学类型和地域的多样性，给多种多样的兴趣提供了基础，并形成欧洲思想活动的典型特征。方言力量的加强，削弱了巴黎大学的地位。牛津大学的方济各会教徒复兴了对柏拉图的兴趣。与此相反，巴黎大学的多明我会教徒对亚里士多德感兴趣。教会的公会议（councils）越来越虚弱无效，罗马教廷的君主制越来越绝对。禁欲至上有利于权力向罗马教廷集中，阻止了基督教王朝的建立，促进了人们对智力的诉求。权力向罗马的集中加速了天主教会的发展。

欧洲商业、城市和大学的兴起带来了修道院与居家教士的冲突，尤其是教会与国家在争夺教育控制权方面的冲突。纸的引进和文字的普及加速了本土语言的成长和拉丁文的衰落。教会的控制不足以制止口头传统，也不足以钳制异教的流传。贸易的发展、拜占庭帝国的衰落都促使异教流传。但是，教会发动了第一次反改革浪潮。119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一封信中，表示了对《圣经》翻译的不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信仰的神秘，是不应该向一切地方的一切人解释的。”法国韦尔多派教徒翻译《新约》，他们对《新约》的世俗解读、法国普罗旺斯城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那里的浪漫主义诗歌也许受

^① 弗里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英国作家、律师，宣传实证主义。著有《实证主义：它的观点、目的和理想》、《宗教的实证和发展》、《常识哲学》等。

到了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新教派的成立，宗教裁判所的建立，都是为了钳制异教的流传。异教的流传、《圣经》的本土译本和大学的口头传统，也许都不无关系。欧洲新兴的法院，因为用本土语的律师和作家而得到了加强。但丁^① 这样写道：“人的本地话对他最亲切，和他结合得很紧。”“我们发现，在我们之前还没有人研究过俗语的科学。我们看到，俗语对一切人都是很需要的。对一切男人，甚至对妇女和儿童，这种俗语都是必需的，造化允许他们去学会说话……”“我们借助智慧之神，他从天上向我们传授机宜，我们要尽力为普通人的俗语效力。”^[11]在民族主义的成长中，在大学的兴起、尤其是它在德国的兴起中，本土俗语的力量都是显而易见的。威克里夫^② 翻译的罗拉德教派《圣经》，及其对波希米亚的胡斯^③ 的影响，都说明教会的权力在欧洲边缘正在土崩瓦解。为了抗衡巴黎大学的影响，抗衡它对公会议的兴趣，罗马教廷支持在德国和西班牙办大学。随着拜占庭帝国商业走向衰落，随着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走向衰落，意大利城邦尤其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出现了繁荣。来自东方的希腊学者，对经典文明抱着强烈的兴趣，并为此而作出了贡献。佛罗伦萨热心文学和艺术，成为第二个雅典。拜占庭帝国学术的火焰熄灭了，但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它的火苗又熊熊燃烧起来。希腊经典的生命力反映出来的，是建立在口头传统之上的文明的力量。这种生命力逐渐削弱了教会的知识垄断。“现代世界里一切运动的东西，无不以希腊为源泉。”（梅恩语）

起初，欧洲人歧视纸，因为它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产品。但是这种歧视由于商业的普及而崩溃。作为抄写《圣经》和经典的媒介，羊皮纸的地位反而提高，手抄书和精印插图书因而升值。对手抄书的垄断及手抄书的较高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促使人们开发一种复制书的技术，像抄书人复制书那样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德国成功了。从油画中用油墨延伸到在印刷中用油墨、开发低温溶解的合金、冲压技术的提高、可调节排字范型的发明，印刷机的改进——所有这些技术都纳入了

①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散文家、修辞学家、政治思想家，文艺复兴先驱，与莎士比亚、歌德并称为西欧文学的三大巨匠。他反对贵族和教皇，被判终身放逐。代表作为《神曲》、《新尘》、《论俗语》、《帝制论》等。

②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英国神学家、宗教改革先驱，把《圣经》译成英语，自创罗拉德教派。

③ 胡斯（John Huss，1372？—1415），捷克爱国者、宗教改革家，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压迫，被判火刑处死。

一个统一的系统，构成了印刷业的基础。大批量地印刷《圣经》之类的书籍，要求相当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必然造成源源不断的书籍生产。有限的运输设施和书籍的有限市场，加速了印刷工人的流动，尤其是向意大利的移民。那里有充足的纸张供应，纸成了适用于印刷机的商品。印刷业向新市场的迁移，迫使人们使用新型铅字。意大利的罗马体代替了德国特有的粗黑哥特体。法国抄书人的抵制造成了该国印刷业的滞后，但是这种滞后可能反而促进了法国铅字艺术的发展。印刷机需要很多手稿，印刷业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这就促成希腊经典作品的大量生产，促成了更加紧凑的排版，促成了袖珍的意大利体的版本，促成了人们对俗语的倚重。印刷技术跨过英吉利海峡，印刷机发明人卡克斯顿^① 关心市场，他集中印英语书，避免古典语言的不景气市场。

书籍的产量和种类急剧增加，要不断寻求新的市场，这就加速了出版商的兴起。出版社倚重商业，损害了印刷商，忽视了技艺。千百年积累的羊皮纸手稿书，由于印刷业的发展而付梓出版，用俗语创作的作家逐渐训练成为书稿的作者。但是，他们难得有能力生产大部头的作品，反而被迫写颇有争议的小册子。小册子可以是急就章，可以横跨不同的领域，可以使资金迅速周转。出版社关心的是利润。欧洲的字母表灵活，其字母不过几十个，字母组合的可能性不计其数。这一切都促成印刷厂大量诞生，调动了书籍商品的市场，这个商品能够适应各种消费者的需要。出版商对市场的了解多样化了，他们有意识地设计和拓宽自己的市场。广告的使用就反映了他们对市场的了解。

教会对《圣经》和拉丁语的垄断被印刷机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印刷的俗语《圣经》的广阔市场和对《圣经》的释义的关注。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印刷商使我们再也不能心宁神静、意见统一”。用雨果的话来说，机器印刷的书籍“毁灭了古老的哥特建筑天才，那个光辉的太阳在梅因兹（德国地名——译者注）巨大的印刷机背后落山了”。六千年来，建筑一直是“人类伟大的手笔”，可是它不再地位至上。意味深长的是，印刷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欧洲大教堂不占据支配地位的地区，是政治分裂最令人瞩目的地区——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始终有联系，意大利印书的重点是古典书籍。在德国，印书的重点首先是大部头的神学著作。后来，印刷业中心转移到莱比锡之后，印书的重点

^① 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1422? —1491），英国印刷商、翻译家。创办英国第一家印刷厂，出版第一部英文百科全书《世界镜鉴》，译书 24 种。

就转为论辩性的小册子，还有用高地德语翻译的《圣经》。小册子是路德^①写作的特点，也是其他宗教改革后继者写作的特点。“这个大胆的教派〔路德教派〕的发展和令人吃惊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刷术发明得比较晚，也是因为文艺复兴来得晚。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休谟语）“路德及其教徒的书，义愤洋溢、大声呼号、论辩粗鲁，普及速度快，印刷数量大。”（休谟语）“印刷术初期的效果之一就是：骄傲者认为它使人斯文扫地，因为它把学问送到了普通人的手里。”（骚塞语）

正如教会在纸媒介的革命中作出反击一样，它不得不动调其资源对印刷术进行反击。这种反击突出地表现在特伦托会议^②和耶稣会^③的建立。在意大利，法律和教会的力量及各个共和国的纷争，阻碍了宗教改革的传播，产生了马基雅弗利^④。他写道：“所以，我们意大利人要感谢罗马教会和教士，因为我们既不虔诚又很邪恶。我们还欠它的另一份更重的情。我们的国家被毁灭，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国家分裂，根子就是教会。”在法国，希腊语的影响很受局限，拉丁语却至高无上，这就有利于文学活动的蓬勃发展，表现在蒙田^⑤和拉伯雷^⑥的俗语创作中。由于对新教的镇压，埃蒂安纳^⑦和加尔文^⑧被迫逃到日内瓦。到16世纪末，法国的大学者们背井离乡到荷兰去。在德国，政治分裂给17世纪末残酷的宗教战争奠定了基础。在英国，随着意大利金融家的衰落，奥坎姆的威廉和威克里夫的主张势头上升。教会、隐修制度和大学力量薄弱，使国王能够与罗马教廷决裂。印刷业的兴起在技术性失

① 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② 特伦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召开的天主教第19次普世会议（1545—1563），是天主教反对和回应宗教改革的自救措施。

③ 耶稣会（Jesuit），基督教修会，1534年在巴黎成立，会员一二万人，但能量很大，建会不久即派人到中国传教，既咄咄逼人，又讲究策略。

④ 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认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主张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代表作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

⑤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散文大家，其著作已经有许多译本。

⑥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83?—1553），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巨人传》。

⑦ 埃蒂安纳（Robert Estienne I，1503—1559），法国出生的学者兼印刷家，印制第一部完整的拉丁语《圣经》，完成《拉丁语词典》，受巴黎大学神学院神学家们的敌视而被迫流亡日内瓦。

⑧ 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世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曾经把日内瓦变为“新教的罗马”。在宗教上有不宽容的倾向。

业中有一定的影响，隐修制度的衰落也是技术性失业的某种表现。

反宗教改革的失败反映了武力的影响。工业主义的成长，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城市的繁荣，都对火药和大炮的使用产生影响。1453年，大炮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这显然说明，骑兵和防御系统衰落了。它们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进攻的工具比防御的工具强大，非集中化开始让位于集中化。骑兵的局限性在瑞士的山脉和荷兰的低地中已经显露出来，已经在这些地区走向独立的运动中显示出来。克伦威尔^①和古斯塔夫^②富有军事天才，使用新的武器，这是确保英格兰和德国新教地位的有力工具。

伴随武力性质的变化，发生了一场金融革命。意大利独立的小共和国，继承了罗马强调市政设施的传统。市政设施中城防的重要性，使市政府必须举债，使公民必须对一个法人承担债务。1689年，英格兰议会终于占了上风，这意味着金融制度走向精细。对公共债务的承认，表现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之中。从罗马法继承的法人原则，经过延伸之后，终于和普通法的传统发生冲突，这场冲突表现在18世纪美洲殖民地的反叛之中。公共债务增加了，信息的重要性随之增加，有组织的新闻机构和舆论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有组织的交易所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浮出水面。与金融有关的舆论的重要性，使俗语的重要性得到加强。

对印刷业的压制、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1685年撤销的南特敕令^③——这些都是法国反宗教改革的结果。在基督教的要求之下，印刷业受到压制，与此同时，公众对纸的生产和出口，却越来越感兴趣。一方面是限制消费，一方面是增加生产和出口。限制和增加必然要产生冲突。结果，荷兰和日内瓦的纸很便宜。在这些国家里，印刷业是自由的。印刷品从这些处在边缘的地区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在19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

① 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格兰军人、政治家，清教革命领袖，反对国王，捍卫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1653年任“护国公”，从此统治英伦三岛五年。

② 古斯塔夫 (Gustavus, 1594—1632)，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使瑞典由衰变强，在与欧洲许多国家的战争中屡屡得手，战绩辉煌。

③ 南特敕令 (Edict of Nantes)，1598年4月13日法国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的敕令，给新教徒广泛的自由，1685年11月18日，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敕令，剥夺新教徒的一切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使法国失去最勤劳的商业阶层。

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中。

英国国教废除了修道院和教士独身制度。16 世纪上半叶,英国进行教育改革。16 世纪下半叶,它又实行新闻审查。结果使莎士比亚的戏剧繁荣。在斯图尔特时代,王权受到削弱。与此同时,钦定版《圣经》^①问世,弥尔顿^②的散文崛起,戏剧急剧衰落。钦定版《圣经》的冲击,表现在清教徒主张的政教分离中。这个钦定版承认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的冲突。口头传统保留在议会中,书面传统保留在《圣经》中。在王政复辟时期,德莱顿^③支持王朝的利益。1689 年革命和 1694 废除执照法之后,政党的要求在艾迪生^④、斯蒂尔^⑤、斯威夫特^⑥、笛福^⑦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满足。暂时禁止印刷的政策把交流和讨论逼进了咖啡屋。德莱顿和蒲柏^⑧复活经典作品的工作,形成蒲柏、约翰生^⑨和哥尔德斯密斯^⑩个人经济独立的前奏。沃尔波尔^⑪首相的限制政策和广告对报纸收入的重要性,把作家的兴趣引向编辑作品、儿童故事和小说创作,把读者的兴趣引向巡回图书馆。在议会至上和君主立宪的情况下,教会的立场一方面有利于自然神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循道宗教义的发展。

英国和欧洲的书商大规模地向殖民地贩卖书籍。殖民地的印刷业主

① 钦定版《圣经》,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英文版《圣经》,1611 年出版,在英国历史及英语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② 弥尔顿 (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诗人,对 17 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诗剧《力士参生》等。

③ 德莱顿 (John Dryden, 1631—1700), 英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诗歌《奇异的年代》,剧作《奥伦·蔡比》,文学评论《论戏剧诗》等。

④ 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1672—1719), 英国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诗人,英国期刊文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与斯蒂尔合办《旁观者》、《闲话报》等刊物。其他著作有悲剧《卡托》、诗歌《战役》等。

⑤ 斯蒂尔 (Richard Steele, 1672—1729), 英国散文家、评论家、剧作家。著作有喜剧《葬礼》、《自觉的情人》等。

⑥ 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英国 18 世纪著名政论家、讽刺小说家。其小说《格列佛游记》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直至今天都很盛行。

⑦ 笛福 (Daniel Defoe, 1660? —1731), 英国小说家,曾经自办过《评论》杂志。代表作为《鲁滨逊漂流记》。

⑧ 蒲柏 (Alexander Pope, 1688—1744), 英国诗人、翻译家、批评家,长于讽刺。代表作有长篇讽刺诗《夺发记》。译作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

⑨ 约翰生 (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文学家、词典学家,编写了英国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词典,编注《莎士比亚戏剧集》,著有长诗《伦敦》、《人类欲望的虚幻》等。

⑩ 哥尔德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 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约翰生博士俱乐部成员。代表作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长诗《荒村》、喜剧《委曲求全》、散文《世界公民》等。

⑪ 沃尔波尔 (Robert Walpole, 1717—1787), 英国政治家,保守,曾任财政大臣、英国第一任首相。

则把注意力转向报纸。沃尔波尔首相的压制政策出台之前，18世纪伦敦的报界生气勃勃，威尔克斯^① 议员等人获得出版议会辩论稿的权利。这些情况为殖民地的报人树立了榜样。美国《人权法案》的第一条，就承认了报纸在美国革命中的突出作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英国通过税收限制新闻业。与此同时，美国却坚持新闻自由。意大利向美国出口的用于造纸的碎布迅速增加，就说明了新闻自由的结果。

从纸的发明到19世纪初，纸和印刷品的生产用的是手工艺流程。机制纸的发明和印刷机的使用，引起了传播设施的一场革命。在英国，对纸张和广告课税的政策，有利于19世纪中叶《时代》报的垄断。1861年，停止对纸张和广告征税之后，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都急剧增加，对原料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在美国，报纸众多，市场需求很大。快速印刷机的问世，广告的普及，无线电报和有线电报的发明，整行铸排机的发明，从碎布造纸迅速转向用木浆造纸——所有这一切，都由于报业的要求而加速发展。狄更斯^② 等作家之所以强调伤感和轰动，原因之一是新兴的读书阶层和美国市场有这个要求。“狄更斯把儿童引进故事，他可以在舒缓音乐的伴奏中让儿童死去。”（巴里^③ 语）由于缺乏版权保护，美国作家转向新闻。阿蒂默斯·沃德^④ 说：“莎士比亚写了优秀剧本，可是他的成功，赶不上纽约一家日报驻华盛顿记者的成功。他缺乏最胡乱的幻想。”美国报纸的拓展对英国产生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南非战争之后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兴起。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斯克利斯（Edward Wyllis Scripps）、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此为笔名，原名叫 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和比弗布鲁克（William Maxwell Aitken Beaverbrook）等人成为美国和英国报业的巨头。新闻记者的政治野心，在美国受到竞争的钳制，在英国受到上院的压制，在加拿大受到博士学位的限制。到了20世纪，英国新闻记者的力量，在政府专营广播电台的限

① 威尔克斯（John Wilkes, 1725—1795），英国下院议员，新闻工作者，创办报纸《北不列颠人》，攻击政府和国王，曾经被免去议员席位，对推动英国新闻出版自由发挥了积极作用。

②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英国小说家、记者，著有《艰难时世》、《双城记》。

③ 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 1860—1937），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曾任英国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为小说《小牧师》、儿童剧《彼得·潘》。

④ 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 1834—1867），美国幽默作家，本名 Charles Farrar Browne，塑造了阿蒂默斯·沃德这个人物。作品有《阿蒂默斯·沃德旅行记》和《阿蒂默斯·沃德在伦敦》。

制中，折射得清清楚楚；美国新闻记者的力量，却是表现在罗斯福有效使用电台的讲话之中。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技术进步对“边疆”的冲击，使政府对传播和教育的兴趣时起时落。从旧金山起家的赫斯特和从圣路易斯起家的普利策，在纽约的报界引起了革命性变化。贝内特（J. G. Bennett）和里德（Whitelaw Reid）加速了英国和欧洲的革命性变化。特许经营的延伸和军事组织的问题，都要求技术知识和训练有素的人才，因此它们推动了邮政的改进和义务教育学制的延长。在欧洲，书籍占据支配的地位。其后果是，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的报纸发展比较慢，限制也比较多，法国的新闻业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和政治色彩。传播设施发展速度的不同，加剧了彼此理解的困难。传播手段的改进，就像两国边境桥梁上把门的大兵一样，反而使交流的困难增加。电报迫使语言紧缩，加剧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鸿沟。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广阔的小说界，报纸、电影和电台对畅销书的影响显而易见。报纸、电影和电台在培养专门读者群方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读者群之间沟通的前景微乎其微。出版商追求名人名著，尤其是不需要买版权的名人名著。知识的大规模机械化以不完全的竞争、积极制造语言的垄断为特征。这就阻碍了理解，加速了对武力的诉求。

我想借用马克·帕提森（Mark Pattison）的话来说明问题。他说：“作家们可能会恭维自己，说他们不像埋头干事的人，不是环境的奴隶。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无论我们想什么、策划什么，一旦我们谋求把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传递给别人，我们就必然像在生活和行动中一样，陷入同样的妥协、同样的行动轨迹、同样的失败可能性、同样的折中办法。”^[12]印刷术发明的后果，在16世纪和17世纪野蛮的宗教战争中，彰显出来。武力在传播产业中的运用，加速了俗语的巩固，加速了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兴起，也加速了20世纪野蛮行为的重新爆发。印刷术发明之前，拉丁语的地位和双语能力对脑力的消耗，表现在经院哲学研究的问题之中。印刷术发明之后，意大利和法国对经典的兴趣，新教国家对《圣经》的兴趣，使西方世界产生分裂。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难以调和，就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难以调和一样。意大利的罗马法和经典阻碍了《圣经》的影响，法国的大教堂既阻碍了《圣经》的影响，又突出了对文学的兴趣。在德国，《圣经》的影响加强了国家的权力，有利于音乐和文学的发展，它的音乐和文学不依赖

政治生活。在英国，王权、议会、法律、大学和贸易的分割，钳制了单一利益集团的主宰地位，有利于不温不火的东西，只有金融和贸易是例外。在英国，隐修院制度使教育和印刷业滞后。这就加强了俗语的地位，导致了16世纪的摧毁修道院，导致了17世纪的内战和18世纪的美国革命。

在欧洲的自由国家中，经典的复兴，印刷对逻辑的要求，反映在笛卡尔^①身上是数学对哲学的冲击，反映在霍布斯^②身上是数学对政治学的冲击。权力在传播产业中的运用，在1800年以后加速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报纸的兴起，加强了人们对俗语的兴趣，加速了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兴起。机械化的传播使理性和情感分裂，它强调的是情感。印刷术标志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激情对集会者的影响，随着集会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理性对集会者的影响却不是这样。”（J. Scarlett 语）印刷术越来越关注印刷品的销售和广告的问题。但是印刷术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书籍降低到名牌广告的水平，摩天大厦和商业大厦对建筑艺术的取代，简化的拼写和语义，都显示了印刷术的局限性。一位避难的德国学者卡西尔^③描写过生造词汇的人，说他们是政治宣传艺术的老手。《纳粹德语》这个当代德语词汇手册，搜集了一长串他无法翻译成英语的词汇。由于这些生造出来的支持希特勒法西斯神话的词汇，他发现自己已经读不懂德语了。

自从密涅瓦的猫头鹰从君士坦丁堡起飞之后，它只是短暂地在西方找到了栖息之地。它从意大利飞到法国、荷兰、德国。法国革命之后，它飞回法国，飞到英国，最后它又飞到美国。它来去匆匆，举棋不定，没有留下多少精力，这使它容易遭到各种敌人的伤害。普莱斯（Parnassus Plays）有诗为证：

让文人士子节省吃喝，一个子儿两用，
让他们穷困潦倒，直至命中注定垂死病榻；
原本是，学问和贫寒长拥相吻，不会分离。

①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提出“我思故我在”，代表作有《几何学》、《方法论》、《哲学原理》等。

②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代表作为《利维坦》、《论物体》等。

③ 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德国犹太哲学家、教育家和多产作家。代表作有《语言与神话》、《国家的神话》、《人论》，均有中译本问世。

约翰生博士亦有诗证：

瞧，什么苦难困扰文人，潦倒一生——
辛劳、妒忌、匮乏、施舍，还有囚禁。

工业革命和机械化的知识，把学者的影响摧毁殆尽。外在的力量再不会呵护他们，而是要千方百计置之于死地。传播技术的伟大进步，反而加重彼此的理解困难。就连科学、数学和音乐这些西方思想的最后庇护所，也落入了机械化俗语的控制。商业主义需要造成新的语言垄断和新的理解困难。甚至阶级斗争和语言族群的斗争，也成为语言的垄断。《共产党宣言》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这句话也铸造了新的锁链。

我试图说明，传播的突然进展，是文化动荡的反映。黏土的使用有利于庙堂至上，突出了僧侣和宗教的作用。在巴比伦和亚述首都尼尼微修建图书馆，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莎草纸有利于埃及政治组织的发展。在希腊，莎草纸和简化的字母表，促进民主组织、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继之而起的帝国，或将首都迁回到亚历山大城，或建都在其他地方，但是无论定都何方，图书馆始终是帝国君主力量的源泉。罗马发展了希腊的政治组织，强调法律，并最终突出帝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的首都之后，帝国的政治组织模仿东方的模式，尤其是在官方正式承认基督教之后。经典的完善，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大，使犹太人能够大难不死。他们凭借的力量，是《旧约》和书籍。反过来，基督教也利用羊皮纸和《圣经》手抄本的优点。凭借纸张的力量，巴格达的穆斯林以及后来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穆斯林，给西方世界送来一种新的媒介——纸。他们用纸来传播希腊科学。希腊科学和纸促使人们用俗语写作。这就在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使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伊斯兰帝国的衰落意味着对科学的刺激。同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意味着对希腊文学和哲学的刺激。印刷术重新强调书籍的作用，带来宗教改革的兴起。反过来，新的传播方法削弱了对书籍的崇拜，为新的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建立起来，处于守势的力量需要这样的垄断或寡头。但是技术的改进，使处于攻势的力量得到加强。这就迫使力量的重组有利于俗语的发展。以武力治国占重要地位的时期，就出现文化的动荡。动荡之后又是平静，平静时期的法律，又确保天下太平。马其顿的动荡和罗马的战争之后，罗马法随之

发展，蛮族入侵随之结束。后来，在格劳秀斯^①的推动之下，国际法问世，宗教战争结束。此时，在寻求国际法新基础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战争结束的局面出现了。

或许，讲话结束前，我们可以提请大家考虑口头传统的作用。这个传统打下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复兴有效而富有意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大学领导可以认识到，老师和学生都活得很好，而且都有人情味。用霍姆斯^②法官的话说：“对自己的首要原则是否提出过怀疑，这是一个人文明与否的标志。”然而，就是这位精明的法官，在阿伯拉姆诉美国政府的案子中又说：“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是看思想的力量是否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被人们接受。”他没有认识到，在这个案子中，就像在其他的市场中一样，垄断和寡头显露出来了。

【注释】

[1] “Communications and Archae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XVII, May, 1951, 237~240.

[2] Albert Guérar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oston, 1935), p.286.

[3] Cited by 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istory”, No. 14 (Madison, 1929), p.401.

[4] Ibid., p.400.

[5] Jacob Burckhardt, *Force and Freedom* (New York, 1943), pp.368~369.

[6]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London, 1875), I, p.195~196.

[7] H. S. Maine, *Ancient Law* (London, 1906), p.352.

[8] Thomas Constable,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His Literary Correspondents* (Edinburgh, 1823), I, p.261.

[9] R. T. Flewelling, *The Survival of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1943), p.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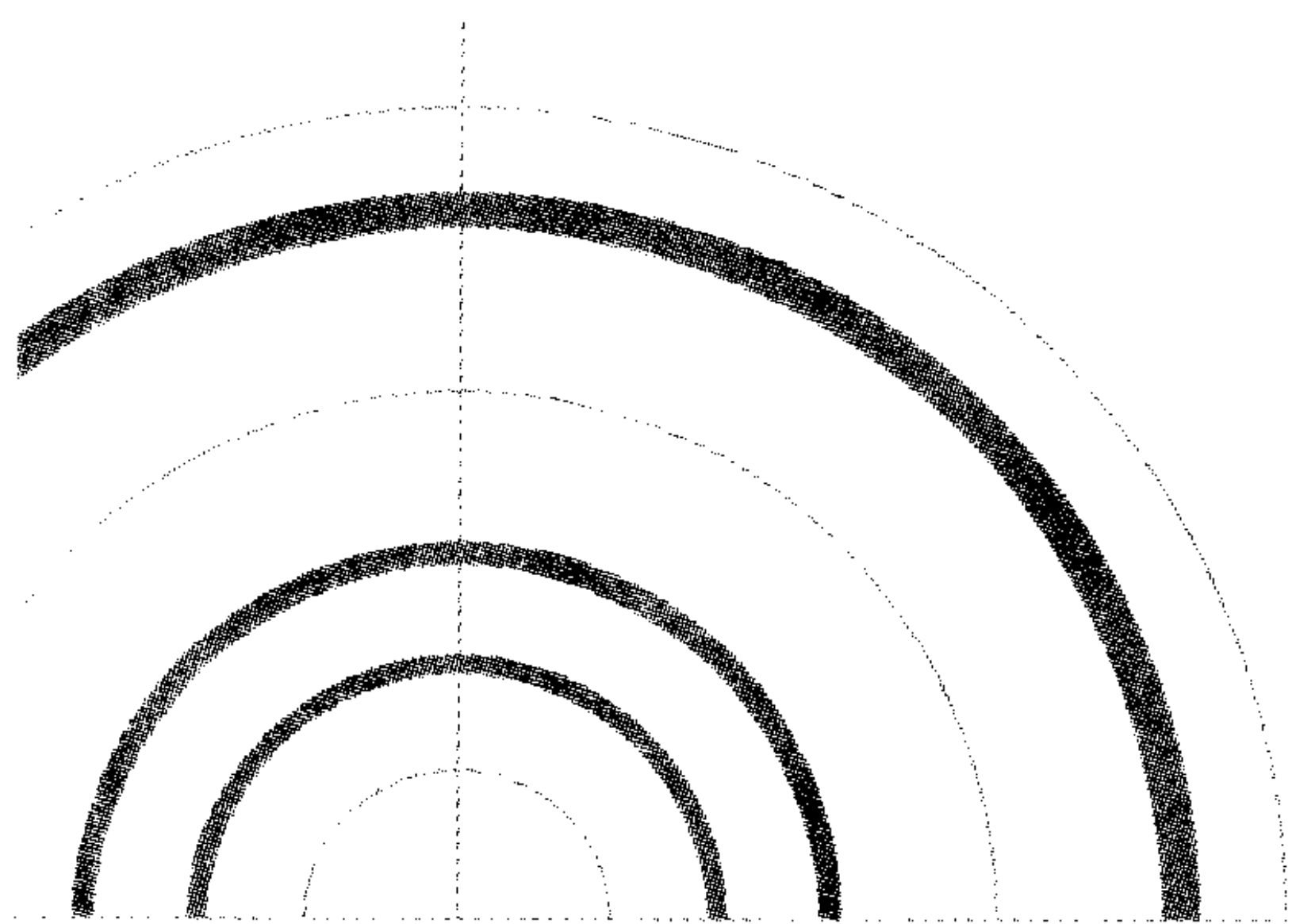
[10] H. S. Maine, *Ancient Law*, pp.351~352.

[11] Dante in *De vulgari eloquentia*; cited in Vernon Hall, Jr., *Renaissance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1945), pp.16~17.

[12] Mark Pattison, *Isaac Casaubon (1559—1614)* (London, 1875), p.383.

① 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 1583—1645)，荷兰法学家、诗人，国际法先驱之一。法学巨著有《战争与和平法》，诗歌有《圣诗》，剧作有《亚当在流亡》、《基督受难》等。

② 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美国法学家，连续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30年，主张司法克制，认为“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被称为“伟大的异议者”。著作有《美国法律评注》、《普通法》等。



第二章

传播的偏向^{*}

克罗伯教授在《文化发展概貌》（伯克莱，1946）中，对西方文明史各个阶段广泛的文化现象，已经进行了描绘。在许多地方，他做了暗示，用以解释文化成分的相对长处和短处，不过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我打算做一点补充，就算给他当一个注脚吧，仅此而已。在此过程中，我准备探讨一下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传播的特征，目的是评估传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 这是1949年4月18日在密执安大学宣读的论文。

一旦我们冒险做这样的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其间的文化有一定的偏向。对其他文明偏向的兴趣本身就可能暗示，我们自己有偏向。我们对其他文明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文明所用的媒介的性质。我们的了解，要看其是否能够保存下来，或者是否能够被发现。考古发现就是这样的情况。^[1]黏土和石头上的文字比莎草纸上的文字，能够更加有效地保存，因为物质产品突出时间和持久性。汤因比之类的文明研究往往有一种偏向：倚重宗教的问题，忽视空间问题，尤其是行政和法律问题。现代文明和报纸广播有密切关系，它在考察其他媒介支配的其他文明时，自然要偏重视觉。我们只能敦请大家注意，我们必须始终警觉这种偏向的涵义。也许还希望，我们考虑其他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这可以使我们对自已文明的特征抱更加谦虚的态度。也许可以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埃及文明似乎受到尼罗河特性的强烈影响。要利用定期泛滥的河水，就要依赖一个绝对权威的统一的领导。有人说，公元前 4241 年，埃及人发现恒星年以后，能够计算出新的历法，从而避免太阴历遭遇的困难。恒星年年历的发现和使用，使宗教节日固定。这就促进了绝对王权的建立，也把奥西里斯^① 和太阳神拉的权威强加于人，把尼罗河和太阳的权威强加于人。这样的王权和神权首先在上埃及出现。君主制度在空间上成功控制了埃及以后，对万世千秋的关注，即对时间的关注，就应运而生。永生的观念加强了君主的地位。木乃伊的制作和金字塔的修建成为强调时间控制的手段，同时出现的还有葬礼中的象形艺术和象形文字的雏形。君主饬令依赖的口语本身，也具有创新的有效性。墓葬中的文字使这种有效性永存不息。这样的装饰演变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逐渐向腓尼基人的拼音文字前进。到了美尼斯王时代（约公元前 3315 年），许多字符已经具有纯音符的价值，而且逐渐按照拼音文字书写。君权神授的独裁制度，终于在公元前 2850 年促进了金字塔的产生。私有财产不复存在，一切可耕地非王土莫属。

以石头和象形文字为核心的知识垄断，受到莎草纸的挑战。这是一

① 奥西里斯 (Osiris)，冥神和鬼判。

种更为有效的新媒介。公元前 2540 年之后，国王的权威开始走下坡路。王权的衰落也许和太阳历的发现同时发生。僧侣阶级用太阳历来克服恒星年的缺点，恒星年每年要多出一天。自此，国王的地位下降，从伟大的王降格为太阳神拉的儿子。太阳神崇拜的主祭被推崇到主神的显赫位置，日光城（Heliopolis）成为僧侣权力的中心。寡头政治取代了绝对的王权。约公元前 2000 年之后，普通人获准参加宗教仪式，可以流芳百世，可以享受政治权利。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虎口同时向人打开，“一种驾驭人的桀骜不驯的最有力的工具”^[2]就设计成功了。莎草纸和软管笔日益普及，僧侣书写体和职业抄书人也同时出现。文字和思想因此而世俗化。读书写字普及以后，国家的行政管理随之而延伸。这场社会革命的结果，是读书写字的媒介从石头转为莎草纸，僧侣阶级的地位日益重要。这就给埃及文明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使之暴露在入侵者的锋芒之下。这些入侵者装备了有效的进攻武器。公元前 1660 年至公元前 1580 年，入侵者建立的喜克索王朝即“牧人”王朝夺取并统治埃及。但是，埃及的文化成分促进了力量的重组，资源的调动向着驱逐入侵者的目标前进。马的引进，轻型马车的使用，不仅使埃及统治者赶走喜克索人，而且使之征服大量的领地，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政治组织的拓展包容了不同种族和宗教的民族，这反映了用时间办法解决空间问题的行政管理。于是，国王就不得不解决政权在时间上的延续问题。于是，日轮（the solar disc）崇拜应运而生。这种崇拜提供的帝国宗教，表示埃及人和外族人的区别。但是，埃及没有解决强大僧侣阶级的敌视问题，所以帝国还是慢慢走向衰落，并且最终被亚述人和波斯人征服。难以书写的象形文字支撑的知识垄断，抗拒变革的要求，终于使埃及帝国寿终正寝。莎草纸的供应充足，宗教又对文字产生保守的影响，所以象形文字维持不变。辅音符号的出现，主要是用来转写外国人的姓名和词汇。口语越来越和文字脱节，尽管伊珂拉顿（Ikhнатon）曾经努力使之接近一些。

和尼罗河文明相比，两河流域缺乏团结的必然要求，所以它一早就出现了若干个神权政治的城邦。在这些城邦里，神庙的首席僧侣直接代表神。这些城邦的发展呈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表现出读写文化的成长过程。凭借读书写字，复杂的计算系统使人能够彼此交流，后代也可以看懂这些计算系统了。黏土作为书写的媒介，隐藏着一些必然的结果。这些泥版难以运输，有促进非集中化的倾向。潮湿的泥版上刻字比较困难，象形文字因而消失。约定俗成的符号和程式化的楔形文字模式随之

产生。和黏土刻写相关的硬笔应运而生。这里的语言基本上是单音节词汇，字符的开发要满足简单和一致的需要，以确保分散城邦的交流。寺院财产和贸易的管理，自然要在早期文字的发展中突出数学的作用，又在以后的发展中强调抽象过程的作用。

寺庙财富的积累引起城邦之间的竞争和战乱，因此而出现了军事领袖和军队。宗教组织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与此相对的空间控制问题，必然使权力向国王的集中。对广袤的领土进行控制，必然要求权威的委任，必然要强调法律，以抵消宗教组织的嫉妒。摧毁旧都城，建立新都城，以增加国王的名望，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被征服都市的神祇被放在征服者的神祇之下。苏美尔帝国的最终崩溃，闪米特入侵者的胜利——政治组织遭遇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苏美尔帝国的文化制度在外族的统治下顽强地保留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闪米特入侵者把各个城邦主神的地位重新做了安排。

巴比伦成为新的都城，汉穆拉比^①的改革，是闪米特民族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君主集权有利于宫殿建筑的发展，君主们喜欢用石头雕刻，把石头作为铭刻的媒介，尤其喜欢把法律刻在石头上。其意图是建立庞大的帝国并使之协调一致。征服者的语言不能和被征服者的语言统一，但是征服者还是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字。汉穆拉比把闪米特语定为官方语言。他们说的是闪米特语，但是他们的书面语言却是苏美尔人的非闪米特文字。征服者的需要加速了文字的定形。“苏美尔文字是词本位，阿卡德文字是以音节为本位。”^[3]苏美尔语固化为僧侣阶级的神圣语言。汉穆拉比建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它有共同的成文法、共同的首都、共同的历法。统一的度量衡促进了辽阔领土上的贸易。60进位制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这种进位制对分数很方便，英国至今还在利用其优点。24小时计日的进位制保存至今。

在操亚利安语的几个民族的统治下，略有修正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保留下来。他们的战争工具更加有效，尤其是马和战车。这些入侵者在公元前1740年攻陷巴比伦，统治巴比伦，直到公元前13世纪末。北方地区没有充足的书写材料，比如黏土，虽然这些地区也建立了政治组织，但是他们找不到解决时间问题的有效办法。赫梯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他们有一个强大的都城，一套四

^① 汉穆拉比（Hammurabi，？—前1750），巴比伦国王（公元前1792—前1750）武力统一两河流域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统治，颁布《汉穆拉比法典》。

通八达的传播系统，可是他们在公元前 1150 年进攻巴比伦，就是久攻不下。亚述人成功地颠覆了赫梯人的联盟，把阿拉米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靠的是骑兵和赫梯人开发的铁制工具。亚述帝国的组织以行省为基础，行省由总督管理，总督收缴贡赋。公元前 729 年巴比伦陷落，万神殿又重新排序，亚述人的亚设神（Ashur）身居众神之首。巴比伦的宗教和文化力量强大，所以亚述人发现它难以管理，公元前 689 年，亚述人摧毁巴比伦，在尼尼微建立一个图书馆，来收藏苏美尔人的文献，试图以此建立一个有威望的都城。他们入侵埃及，于公元前 674 年把埃及变成一个行省。然而，事实证明，管理两个强大而迥异的宗教中心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公元前 612 年，尼尼微城就被毁掉了。

亚述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许多不同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民族，摧毁了阿拉米人的城邦。亚述人大规模驱逐异族，以根除当地小规模的文化。这些政策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公元前 12 世纪，骆驼驯化之后，骆驼商旅线路得以延伸。帝国版图的扩大，促进了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反过来，贸易和产业的发展又要求高效率的文字，阿拉米文字日益加强主流地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知识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僧侣组织的支配，受到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这类复杂文字的保护。知识垄断阻碍了政治组织的发展。摆脱这些知识垄断的现象，发生在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地区。在这些地区，原始民族中新兴的语言需要简单明快。公元前 1500 年之前，闪米特民族在和埃及的接触中，显然是在巴勒斯坦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母，然后在腓尼基海岸边完善了这个字母表。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到莎草纸，又熟悉苇管笔，所以这些处在边缘的闪米特人能够借用埃及文字中最简单的符号，并抛弃其中复杂的成分。喜克索人的入侵显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南部之间制造了一条壁垒，使阿拉米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分道扬镳。阿拉米文字的演变和陆路贸易有关，它要一套简明规范的字母、可以写在羊皮纸上的字母。腓尼基文字的演变，要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这和莎草纸的使用有关。腓尼基文字把人类语音分解为代表 22 个辅音的基本成分。

灵活的字母表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腓尼基商贸中心的兴起，依靠独特语言的一些小国应运而生。公元前 1200 年之后，巴勒斯坦地区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希伯来语。口头传统有了文字记录，而且埃及人强调文字的神圣也反映在希伯来人留下的文献中。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重视雕塑，这反映在希伯来人对偶像的禁止中。于是，文字取代

了雕像。对文字抽象的专注，为从血缘关系走向普遍的伦理标准铺平了道路，为反对绝对王权的先知铺平了道路，也为强调一神教铺平了道路。法律被汇集起来，编制成法典。《旧约》之类的文献扎根，开花。亚述王塞纳克里布捣毁了地方上的圣所，公元前 621 年之后，他强调耶路撒冷是惟一的圣所。^[4]亚述帝国陷落之后，巴比伦人开疆辟土，于公元前 586 年夺取了耶路撒冷。

波斯人拥有长弓长矛这类新武器的优势，还有改良后的拼音字母的优势，他们迅速建立了一个取代亚述帝国的波斯帝国。在僧侣的支持下，居鲁士于公元前 536 年成为巴比伦国王。冈比西斯于公元前 525 年又把埃及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亚述人统治两个风格迥异的宗教中心所遭遇的困难，由波斯人继承下来。但是，他们用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困难；他们容许臣服的民族保留自己的神祇和宗教。公元前 539 年，犹太人从巴比伦囚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犹太城成为一个有效的宗教组织的中心。波斯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行政系统，其基础是一个道路网和邮路网。他们用驿马维持地方和首都之间的通讯联系。帝国划分为三个总督辖区，每区由三位官员治理，总督、都督、国务秘书各一位。三人各自为政，直接向都城和国王负责，由国王任命。然而，国王集权的体制很快就产生了一个行政能力的问题，一个连续性即时间的问题。巴比伦、埃及和耶路撒冷等顽强的宗教中心的问题，帝国边缘的民族比如希腊人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帝国千秋万代的困难。亚历山大引进新战术，在公元前 333 年和公元前 331 年的决定性战役中取得胜利，推翻了波斯帝国的统治。这些东方帝国把辽阔的地区组织起来，成功地解决了领土问题，但是它们不能够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和千秋万代的问题。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着力于空间上的控制，然而，面对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地区的宗教垄断，它们并不能解决时间的问题。

地中海北岸的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闪米特人辅音型的字母表，和小亚细亚的操亚利安语言的民族不同，他们没有受到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全面影响。不得不跨越海洋的实际情况，使希腊人能够选择对于自己重要的文化特质，并拒绝其他的文化特质。由于没有文字，他们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而且善辩。他们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北方来的王朝何以能够征服其他民族。《荷马史诗》这个代代相传的反复吟唱作品，反映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需要。这个强大的口头传统，修正了腓尼基人的辅音型字母表，使之适合希腊人自己的需要。他们用 24 个字母中的 5 个字母来表现元音。元音和辅音同样重要，所以每个词里都要使

用元音字母。他们的书面语成为适应口头传统需要的工具，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音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以前的几个帝国建立在以视觉为基础的传播之上。与此相对，希腊的政治组织注重的是口头讨论。希腊免于受文字崇拜问题的困扰，东方的帝国被它搞得很尴尬。在希腊，文字的引进大概拖延到公元前7世纪初。大量而经常从埃及得到莎草纸有困难，石头用作媒介又有局限性——这些因素相加的结果，是保护了希腊人的口语传统。他们没有浪费精力去学习第二语言，围绕复杂的文字，是无法建立知识垄断的。

口头传统及其活力在希腊文明中至关重要。这个传统对西方后来的历史产生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口头传统的影响如此深重，以至于产生这样的后果：凡是传承了这个传统的欧洲人，都不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传统。文字和印刷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增加了理解以这个传统为基础的文明的困难。也许，我们可以引用勒南^①的一句话，从中得到一些满足。他说：“进步永远是在发展希腊人的构想中产生的。”

口头传统的强大，在荷马史诗和六韵步诗行中表露无遗。六韵步诗行能够灵活地表达各种内容。赫西奥德^②的诗歌和与荷马的诗歌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的诗歌促进了个人与行吟诗人的决裂。他发展了挽歌抑扬格的形式，用以满足人们更加敏感的追求。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埃及的莎草纸传入希腊，里拉琴问世，职业行吟诗人的地位因此而削弱，抒情诗歌的大发展令人瞩目。

口头传统的强大不仅使字母表适应其需要，而且使希腊人借用的文明得到适当的修正。《荷马史诗》中的神祇被赋予了人的形象。对自然和科学的关注取代了超自然力。爱奥尼亚哲学家拒绝了词语含有创造力的观念。希伯来人的“上帝云”不再是创造的标志。公元前747年，擅长占星术的迦勒底人^③发明了准确的纪年体系。这就促进了对周期性天象的研究。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泰勒斯^④预测到日食。迦勒底人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奥林匹亚人的传统认为，神和人的力量都是有

① 勒南 (Renan)：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历史观点研究宗教。代表作有《基督教起源史》。

② 赫西奥德 (Homerich)，活跃于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牧人出身，代表作为《工作与时日》、《神谱》。

③ 建立新巴比伦王国的民族。

④ 泰勒斯 (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24?—前547?)，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希腊七贤”之一，认为水为万物之本，相传参加准确预测到公元前那一次日食。

限的。这个传统突出了空间观念，以后又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几何学主宰的自然科学关注的是事物的内部属性，而不是其外部关系。

在希腊生活中，人们对几何学和空间关系的关注，在他们殖民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关心土地，执著地寻找土地。这个关注的弊端十分显著，其结果就是土地的垄断。公元前7世纪，殖民地和雅典的成文法都得到了发展。这就给债务人构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口头传统的力量仍然是彰显突出的。希腊人寻求获得自由的手段，其结果非常有效。个人的成就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就在这里。德拉古、梭伦、克莱塞尼兹等人建立了一套能够不断调整的机制。根据爱奥尼亚人的传统，梭伦寻求普世的真理。他相信，违背公正必然要扰乱公众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权威的根基就被摧毁了。房子旁边铭刻着债权人权利的石头，被推倒摧毁了。这避免了奴役他人劳动的破坏性力量。梭伦发现民主的秘密在于“在全体民众中生长出来的法律”。

贸易对土地而言日益重要，梭伦改革就是其反映。但是随着一个商业阶级的兴起，随着公元前6世纪僭主（tyrants）的兴起，这些改革之不足，又暴露无遗。酒神狄俄尼索斯崇拜，抵消了太阳神阿波罗崇拜和爱奥尼亚人的哲学。僭主鼓励艺术。公元前537年，他们搜集了许多神谕，以抗衡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威望。随着贸易的增长，人们对金钱日益关注。这说明，对几何学和空间关系的兴趣是有局限的，对算术和时间的兴趣是有必要的。关于空间的外在关系的学说涉及离散的关系，但忽略了连续性的重要意义。酒神崇拜后来有所修正，东方传入的密特拉教以及神秘的奥菲士教^①的复活，都对它有影响。稍后，毕达哥拉斯^②提出了数论而不是几何学理论。由于这些时空观念的细化，酒神崇拜和太阳神崇拜的妥协就可以实现了。这就为推翻僭主和克莱塞尼兹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梭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与土地、空间和几何有关的问题，克莱塞尼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与贸易、时间和算术有关的问题。克莱塞尼兹从贵族的手里夺取了对时间的控制，他采用了太阳历，用太阳历来管理议事会定期轮流选举的制度。于是城邦就取代了家族国家。

口头传统的有效作用在国家的发展中表现出来。希腊人成功地阻止

① 奥菲士教，古希腊神秘宗教，相传由奥菲士创立，故名。

②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数为万物之本。

了波斯帝国的扩张。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文化蓬勃发展。从米利都来的爱奥尼亚难民，有力地刺激了哲学思辨。品达^①完善了酒神仪式和合唱抒情诗，为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在埃斯库罗斯^②、索福克勒斯^③、欧里庇得斯^④的笔下，戏剧取得长足的进步。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写作开始侵蚀口头传统。尼采指出，音乐的意义是个体在音乐的欢乐中消解，他又指出音乐对悲剧的意义。先是音乐精神的消失，接着就是悲剧的衰落。^[6]法律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们对散文的兴趣。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后，散文文学迅速增长。到欧里庇得斯的时代，人们已经在大量阅读剧本。到公元前5世纪末，牛耕式的转行书写法已经被放弃，书写法改成从左到右。雅典人采用了爱奥尼亚人的拼音字母。他们还编制了法典，把许多律法重新出版。^[7]

雅典文献的增加使希腊人产生分化，加重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分歧。雅典帝国无力对付分歧的文化产生的紧张关系。雅典的法庭无法逃避偏爱民主国家的指控。雅典帝国不能满足国家之间合作的要求，结果是战争爆发，雅典战败。

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试图用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来拯救希腊文化的残余。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苏格拉底的对话处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在第七封书简中，柏拉图说：“没有一位有理智的人，胆敢把他理性思考过的东西转换成语言，尤其不敢把它转换成一种不可改变的形式——凡是文字表现的东西都是不可改变的。”他对科学的兴趣是以散文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都没有想到，图书馆对于城邦是必需之物。意味深长的是，后来在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还是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另一座图书馆开馆于公元前330年。文字传统使口头传统的活力走到尽头。用尼采的话来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容许人人读书，不仅会糟蹋写作，而且会糟蹋思想。”

口头传统为希腊的文化活动提供了社会环境，它对西方的历史具有

① 品达 (Pindar, 公元前518?—前438?), 古希腊诗人, 著有合唱琴歌、竞技者颂歌等, 仅存45首, 品达体因此而得名。

②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公元前525?—前456),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写剧本80余个, 仅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7部。

③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公元前496?—前406),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共写123部剧本, 仅存《奥狄浦斯王》等7部。

④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公元前485—前406),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写悲剧90余部, 仅存《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19部。

重大的意义，对罗马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意义。希腊文化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这对罗马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希腊文化唤醒了罗马本土的力量。在公元前6世纪的后期，希腊神话和建筑引进了罗马。希腊为改革而作的斗争，以德拉古、梭伦和克莱塞尼兹的著作而告终。以后在罗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十大执政官在公元前451年和450年制定的“十二表法”，使平民的权力日益增长。公元前253年，一位平民出任祭司长——这就是改革的圆满结局。

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彼此相对隔绝。此后却是希腊影响又一轮的入侵。此时，丰富的希腊文化阻碍了罗马文化的发展，使之把精力集中在它力所能及的方面，尤其是集中在法律上。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在制度变迁中，在律师的活动中，在机制创新以便适应调整的需要中，都可以看到口头传统固有的灵活性。公元前242年，第二号执政官的席位设定给一位外国人。这说明与外族日益扩大的贸易是何等重要。虽然文字更加普及，但是执政的形式却更加灵活。执政官上台伊始，就根据已经变化的需要来发布自己的政令。父权制的崩溃，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合同这种“最贪婪的法律文书”得到了发展。财产的观念独立出来。个体观念出现以后，人们更加关心共和国，对国家这样一个法律观念产生兴趣。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期，文字的影响显然反映在对法典的需求中。到了西塞罗的时代，人们满脑子想的，已经是法律和口头传统中的先例。公元前54年，元老院办了一份官方的公报。它迫使议员讲话时考虑广泛的公众，从而形成了一种朴实的文风。公元前52年，法院限定法庭陈述的时间，又加强了这个趋势。适应公众要求的拉丁散文，是在格拉古兄弟^①、加图^②和西塞罗的讲演中形成的。^[8]这个口头传统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创始人的哲学，罗马法受到普世主义要求的影响。罗马风俗受到批评，法律上体现出来的宗教和仪式的风格受到削弱，平等得到提倡，严刑峻法有所减轻，主观意图受到强调。

罗马法适应口头传统，罗马军团又攻无不克，罗马帝国自然扩张。

① 格拉古兄弟，罗马政治家，推行改革。兄（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63—前132）在选举保民官的公民大会上被打死，弟（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53—前121）与贵族冲突，被迫自杀。

② 加图，罗马政治家。大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censorius，公元前234—前149）是拉丁散文文学一开创者，著有《起源》和《农书》。小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Uticensis，公元前95—前46）支持元老院共和派，被迫自杀。

和迦太基的战争使罗马和希腊化的国家产生接触。在马其顿，继亚历山大而起的安提柯王朝把希腊城邦变成自治市。但是，希腊城邦麻烦不断，这就使罗马人能够在公元前 168 年摧毁亚该亚同盟^①。于是罗马人就控制了希腊和马其顿。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新的都城。他们还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创造了一个新的地下神塞拉皮斯。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抵消底比斯僧侣阶级的影响。俗语系统和硬管笔受到鼓励，从而损害了僧侣书写体和软管笔。罗马人控制埃及之后，他们采用了托勒密王朝的政策。阿塔罗斯王朝在帕加马修了一座图书馆，以便抵消托勒密王朝的威望。托勒密王朝禁止向他们出口莎草纸，所以他们不得不大规模使用羊皮纸。阿塔罗斯王朝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公元前 204 年，他们把《伟大的母亲》的抄本转送给罗马人，这是他们友好关系的见证。塞琉西王朝继承了波斯王朝的问题。波斯王朝的统治，遇到了波斯、巴比伦和希伯来等地宗教不同的麻烦。塞琉西人试图引进城邦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终于失败。这个王朝崩溃了。罗马也成为这个不幸遗产的继承者。

罗马帝国向东方的扩张，使它充分感受到希腊的文化成就。它把大量的希腊藏书搬运回国。莎草纸从埃及流传进来。书籍贸易发展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建立起来。文字的流布激起了人们编制法典的兴趣。官僚行政机构冒出来。帝国取代了共和国。皇帝不得不面对过去那些文明帝国曾经遭遇的问题，他也不得不依靠东方帝国使用过的解决办法。对皇帝的崇拜越来越重要。过去拥有绝对王权的君主，都遭遇过改朝换代的问题；他们企图长久地拥有统治权，但是改朝换代的问题，对他们始终是一个威胁。这个威胁加强了军队和官僚行政机构的力量。

在法律的影响下，个人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因为帝国内部的法典越来越严厉，个人就转向东方宗教。排斥异教的努力逐渐土崩瓦解。波利比阿^②说，过去罗马帝国结为一体的原因是人们对神的敬畏，可是这种敬畏已经无法承担统一的重任。^[9]贵族企图维持国家的传统宗教，以对抗新的宗教倾向。可是这意味着一个阶级要向广大的民众宣战，要和“那些没有社会威望的人的宗教感情”（韦伯语）^[10]发生冲突。东方的军事战

① 以希腊北部的亚该亚地区为核心的同盟。

② 波利比阿（Polybius，公元前 200？—前 118？），古希腊历史学家，其《通史》40 卷，叙述公元前 264 至公元前 146 年罗马帝国的历史。

役之后，密特拉教兴起了。公元前 274 年，奥雷连^① 皇帝修建了一座神庙，献给“无敌神”。他认识到东方宗教是获得政治拥护的基础，但是这又使泛希腊主义的敌视态度死灰复燃。于是皇帝不得不接受一种更加适合希腊人要求的宗教。罗马帝国不能给希腊和波斯架设联系的桥梁，因为希腊人拒绝接受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罗马被迫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接近波斯模式的政权。后来，帝国分裂为操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和操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这反映了官僚机构的要求。伊利里亚山脉妨碍建立一个能够联系帝国东西两部的首都，就像后来的阿尔卑斯山阻挡了建立一个把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和意大利联系起来的首都一样。^[11]

罗马帝国官僚机构的发展，以及它对广袤国土进行行政管理成功，都有赖于莎草纸的供应。这种媒介的偏向是显而易见的。莎草纸被官僚机构垄断，它不能找到解决帝国第三种问题即时间问题的办法。一种新的媒介浮出水面，以解决莎草纸的局限问题。耐久的羊皮纸抄本弥补了容易破损的莎草纸卷的缺陷，有了羊皮纸之后，基督徒就可以有效地利用希伯来经文，就可以积累大量的基督教文献了。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公元前 231 年之后，在恺撒治理的地区建立了基督教学术中心。这些因素都钳制了巴比伦僧侣的影响。塞琉西王朝曾经鼓励巴比伦僧侣的影响，以钳制波斯宗教的影响。公元前 125 年，巴比伦陷落之后，巴比伦宗教曾经和波斯宗教妥协。公元 228 年之后，波斯萨桑王朝（Sassanid）支持这些东方宗教，阻止了罗马帝国的扩张。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② 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的首都，以便在这里照顾基督徒的利益。由于得到基督教会的支持，罗马帝国在时间上的延续问题，终于解决了。在和官僚机构的关系中，长期积累的莎草纸的偏向，由于转向使用羊皮纸而被抵消了。羊皮纸成为一个力量强大的宗教组织的传播媒介。帝国承认基督教之后，接着就出现了对外教的严厉镇压。

历代皇帝都企图把君士坦丁堡建成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情况尤其如此。他们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制定了一部民法典。这使他们和罗马及亚历山大城产生摩擦。查士

① 奥雷连（Aurelian，公元前 275？—前 215），罗马帝国皇帝，恢复罗马帝国的统一，赢得“世界光复者”的称号。

②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the Great, 280？—337），罗马皇帝，统一全国后，加强中央集权，支持基督教，于公元 330 年迁都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丁尼一世在《法规汇要》的序言里对法律的描绘和狄摩西尼^①的论述是一致的。这些一致之处有：神的创造和天才，理性人的意见，有意无意做错事的赔偿，再加一个总体的契约，这个契约是全体国民共同生活所应遵守的，以此决定恰当的言行。^[12]然而，地理的隔绝加重了宗教的分歧，使东罗马帝国受到波斯人和以后的阿拉伯人的攻击。

伊斯兰教的传播切断了莎草纸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出口。西方用羊皮纸取代莎草纸的时间，大约是从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卡洛林王朝的兴起到默洛温王朝衰落的时间。莎草纸的生产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它适合集权政府的需要。相反，羊皮纸适合非集中化的农业经济。羊皮纸耐久，用它抄的书查检方便，所以它特别适合大部头的书，尤其是《圣经》和法律书。反过来，抄写大部头的书又很困难，所以其产量很受限制。大部头不多的小型图书馆可以修建在很多地区。因为主要靠莎草纸保存的材料，必须用羊皮纸重新抄写，因此就兴起了一个彻底的审查制度。异教的著作受到忽视，基督教的著作则受到重视。“世界上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数量庞大的文献遭到如此彻底的毁灭。”^[13]“凡是《圣经》之外的知识，只要它有害，就宣判死刑，凡是它有益，就加以收录。”^[14]“世俗学问被禁，神学研究优先，罗马取得支配地位。”^[15]围绕羊皮纸的知识垄断重视宗教，损害了法律。

羊皮纸这种媒介适合隐修制度从埃及向欧洲的传播。大约在公元520年，圣本尼迪克^②在卡西诺山创建了修道院。他强调规章制度，把保存书籍作为修道院的神圣使命。他追随卡西奥多鲁斯^③，给“西方的隐修制度赋予学术的倾向”。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学术在西方还是衰落了。学术复兴的到来发生在西方的边缘，发生在爱尔兰独立自主的修道院中。传教的热情开花结果，修道院在苏格兰和北英格兰相继建立；公元7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也建立了修道院。查里曼大帝的支持使复兴的势头更加迅猛，阿尔昆修士也应召从北英格兰的约克到查理曼麾下效命。英格兰和法兰西北部受到丹麦人入侵，但是欧洲大陆的修道院已经抄写了英格兰的羊皮纸抄卷，而且用罗马的抄本补其不足。耐久的羊皮

①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384—前322)，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

② 圣本尼迪克 (St. Benedict, 480?—547?)，西方基督教隐修制度的创始人，创办意大利卡西诺山隐修院，建成12所隐修院，每院收容修士12人。修士每日劳动、读经、抄书。日后采纳这一制度的修会，叫本笃会，即本尼狄克会。

③ 卡西奥多鲁斯 (Cassiodorus, 490?—535?)，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僧侣，建立寺院，组织僧侣抄书，保存了罗马文化。

纸抄本可以长途运输，可以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拜占庭帝国试图阻止伊斯兰教的影响。它的独特影响产生于禁止偶像崇拜，抨击隐修制度对经济生活的消耗。东方对伊斯兰教的抵抗，加大了伊斯兰教在西方的压力。但是，查里·马特^①在公元732年成功地堵住了伊斯兰教在西部的扩张。其终极的效果表现为东部和西部的分割。在西部成功阻止伊斯兰教扩张的鼓舞之下，罗马教廷与卡洛林王朝结盟，强烈谴责东方的偶像崇拜反对者。为了夺回西部，拜占庭皇帝在公元775年放弃了关于捣毁偶像的争论。后来，查理曼大帝也禁止偶像崇拜。公元797年女皇艾琳（Irene）在帝国登基，可是查理曼和罗马教廷根据萨利法典认为，皇位仍然空缺，于是查理曼就加冕为拜占庭皇帝。查理曼对政府效率的关心，表现在他努力改善教会控制的教育机构，推出高效而统一的文字，即小书写体。^[16]查理曼实现欧洲统一的努力，受到挫败，因为他实行日耳曼人的一种制度：继承人平分财产。在阻止丹麦人影响的过程中，巴黎出现了一个权力核心。在打败马扎尔人的过程中，德国也出现了一个权力核心。神圣罗马帝国蚕食罗马教廷的势力，接着出现了宗教改革，形成了强大的传教士组织。羊皮纸成为通用的媒介。凭借这个媒介，基督教逐渐建立起了对知识的垄断。

知识垄断激起了一种新媒介的竞争。这个新媒介就是中国传到欧洲的纸。中国人发明了用碎布造纸，用毛笔写字，完善了一套象形文字，约四五千字，用以满足一般的需要。“用笔而不是用舌头使彼此不能通话的人能够交流。”^[17]用汉字通话的效果，使中国人不用再去开发字母表。

精妙的文字，对仕宦阶级在管理帝国中的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反过来，少数的治人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鸿沟，又导致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婆罗门对知识的垄断建立在口头传统之上。这种传播的局限，导致了佛教的流布，因为它强调的是文字，而且对下层阶级有吸引力。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之后，佛教受到鼓励。但是，马其顿帝国衰落之后，婆罗门的势力在印度复兴，佛教的影响向中国迁移。纸在中国的大量应用，使佛教徒能够大规模发展雕版印刷。儒家势力由于国家的影响和儒家经典的大量刊布而壮大。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从1280年到1368年，它受到蒙古人统治。

伊斯兰教向东传播之后，造纸术传入西方。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

① 查里·马特（Charles Martel），法兰克王国大臣。

都之后,造纸业大发展,为满足强烈的学术兴趣提供了基础。被逐出教门的聂斯脱利教^①兴办学校,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翻译成古叙利亚文。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在雅典关闭了聂斯脱利教兴办的学校,其中的学者被迫迁居波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巴格达成为翻译中心,大量的希腊文、古叙利亚文和波斯文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在9世纪,巴格达的威望刺激了希腊学问在君士坦丁堡的复活,也激发了拉丁学问在西部的复活。^[18]希腊学问在君士坦丁堡复活之后,西罗马对东罗马抱敌视的态度。东西两个教会产生竞争。与此同时,东部教会的传教活动使东正教传入保加利亚。一方面,东正教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俗语。另一方面,西部的教会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俗语。发明了书写斯拉夫语的西里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之后,斯拉夫语具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19]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强调世俗的学问。1054年,东西教会终于分道扬镳。阿拔斯王朝衰落,塞尔柱突厥人开始活跃。1070年,耶路撒冷陷落。罗马教廷拒绝给拜占庭皇帝提供帮助,并组织十字军东征。东征最终失败,十字军无法维持对耶路撒冷的控制,被迫退回君士坦丁堡。自1204年到1261年,君士坦丁堡臣服于拉丁国家。1261年,希腊人又把它从十字军的手里夺回来。

造纸术从巴格达流传到西方。1258年,蒙古人攻占巴格达之后,造纸只集中在西部一些中心。13世纪后期,意大利开发了造纸术的新工艺,纸的质量大大改善。14世纪,造纸术又传入法国。因为碎布是造纸的主要原料,大城市是主要市场,于是纸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靠近城市,是否有充足的水和动力。1275年前后,商业革命兴起,纸的产量随之增加。意大利商业都市的活动削弱了拜占庭帝国。对由阿拉伯人传来的纸的宗教偏见,随之瓦解。随着城市、大教堂和大学的发展,乡村地区修道院的知识垄断,也受到削弱。

巴格达的兴起说明,纸传入欧洲的效果还表现为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关注学问。西班牙有许多图书馆。夺回摩尔人占领的西班牙城市之后,欧洲人就可以利用书里的哲学、数学和医学内容了。深受亚里士多德著作影响的托马斯·阿奎纳试图调和希腊经典与基督教教义。形式逻辑的创造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被吸收进正统的观念。教会企图控制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又试图控制俗语本《圣经》的传播。起初,教会迫害韦尔多派等异教和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接着又组织了多明我会和

^① 即景教,抨击阿里乌派的上帝“一位论”,倡导基督“二位二性”说。

圣方济各会，然后又建立了宗教裁判所。12世纪，研究罗马法的兴趣复兴，这就加强了罗马皇帝的地位，但是这种加强又被宗教法的制度化所抵消。尽管教会积极进行上述种种活动，但纸的增加和贸易的增长还是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通俗语日益重要，律师地位上升，这就加强了政治组织的力量，而不是基督教组织的力量。罗马教廷被迫客居法国阿维尼翁的时期（1308—1378），法国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英格兰的敌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英格兰，罗马法没有留下什么印记，普通法却表现在陪审团制度和议会制度之中。再者，英法战争之后，法庭更加鼓励人们用通俗语。在知识垄断的情况下，基督教组织强调的是对时间的控制，而知识垄断是以羊皮纸为基础的。后来纸和羊皮纸唱起了对台戏。贸易和城市的发展，俗语地位的上升，律师地位的日益重要，都要依靠纸张的支持。纸张加强的是民族主义的空间观念。

先是修道院垄断知识，接着是大城市的抄书匠行会垄断知识。大部头书籍的价格不菲，于是就有人企图用机器来对书籍进行再生产，结果就是德国人发明印刷机。当时的德国处在抄书匠行会所能把持的地缘的边缘。集中控制使法国不善于逃避行会的垄断，而政治上分裂的德国却易于逃避行会的控制。手写的哥特体比较美观^[20]，适合印刷，这些因素也使人们对与印刷术发明相关的问题很感兴趣：油墨、大规模生产统一字钉的、快速运作的印刷机。意大利的纸张供应充足，政治上的分割又和德国类似，所以许多印刷工人迁居意大利的城市，于是罗马字体和意大利字体就出现了。巴黎的印刷业迟至1469年才出现，英国的印刷业还要晚一些。

几千年积累的手稿印制出来。到了15世纪末，印刷人开始考虑能否开辟新市场。出版商的商业主义取代了印刷人的技艺。通俗语给新作者和新读者提供了机会。小开本的书和小册子开始取代大开本的书。在英格兰，卡克斯顿避免与欧洲大陆印制的拉丁文书籍的竞争，努力拓宽市场。他在《百科全书》的序言里说：“那种正在形成的英语，在各个郡是不一样的……我把这本书的规模压缩一下，翻译成我们的英语，不是用我们粗俗的语言，也不是用奇特的语言，而是用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21]在德国，德语抵制巴黎法语形成的那种经院气息。这就突出了对神秘的东西和通俗语言的传授。托马

斯^①的话反映出当时对经院哲学的攻击：“但是，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智慧还有什么用呢？”^[22]“由于缺乏训练，脑子才转向理性。”（亨利·亚当斯^②语）在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③抵制教会的侵蚀，保护了音乐。社会对俗语感兴趣，罗伊希林^④和伊拉斯谟^⑤之类的学者又关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研究，于是就出现了路德和廷德尔^⑥翻译的德文版和英文版《圣经》。俗语版《圣经》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注经和争论。注经和争论用的是小册子和传单。对《圣经》的直解成为异端和教派之争的根源。

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印刷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法国却出现了对异端出版物的镇压。巴黎大学的权威和法兰克福书展、莱比锡出版中心的兴起，形成鲜明的对比。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到邻国瑞士与荷兰，把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在16世纪的法国，学术研究走下坡路。但是，俗语得到了蒙田^⑦和拉伯雷的支持。1539年之后，法语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法语的影响，在有关胡格诺教派^⑧的争论中表现出来，关于胡格诺教派的争论见诸南特敕令。法国成为第一个允许异端享受民权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它一方面对出版物进行限制，另一方面鼓励纸的出口。那些鼓励出版自由的国家，从法国纸张出口的重商政策中得到经济“补贴”。禁止出版物走私越来越困难。在神圣罗马帝国，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对走私出版物进行镇压。随后，许多印刷工人涌入荷兰，普朗坦^⑨即为其中之一。荷兰的印刷业取得长足进展，它建立了大型的铸字工业。在印刷业得到发展的同时，邮票印制和邮政业也发展起来，安特卫普成为金融中心。1576年，安特

① 托马斯 (Thomas à Kempis, 1379? —1471)，德意志天主教修士。终身从事抄写书稿的工作。

② 亚当斯 (Henry Brooks Adams, 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著作有9卷本《美国史》、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③ 霍亨斯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12世纪到13世纪统治德国，并且向意大利扩张。

④ 罗伊希林 (Johann Reuchlin, 1455—1522)，德国人文主义者、古典学者，研究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的先驱。

⑤ 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6? —1536)，荷兰神学家、人文主义者，编定希腊文本的《新约全书》。

⑥ 廷德尔 (William Tyndale, 1492—1536)，英格兰新教殉教者、人文主义者，曾经将《圣经》翻译成英语，为1611年的钦定本打下了基础。

⑦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散文大家，其著作已经有许多译本。

⑧ 胡格诺教派 (Huguenot)，16世纪—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多属于加尔文教派。

⑨ 普朗坦 (Plantin, 1520—1589)，法国印刷商，曾经在玻璃丝安特卫普出版过几种文字对照的《圣经》，对《圣经》文字的定型起到了积极作用。

卫普被摧毁之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上升。1579 年的乌得勒支联盟^① 拥有充足的财力，所以它能够满足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要求。

在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专制主义压制印刷业，但是它鼓励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修道院遭到废除，神职人员独身现象不复存在，接着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改革。印刷机成为“攻城槌，把教堂和城堡夷为平地”^[23]。从萨利法^② 的约束中解脱出来，使妇女可以问鼎御座，并促进了宫廷文学的发展。对印刷的限制激发了人们对戏剧的兴趣，推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口头传统的繁荣。

到了 16 世纪末，字母表的灵活性和印刷术的发展，使不同种类的俗语文学发展起来，这就给产生欧洲分裂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基础。18 世纪的法国继续奉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压制出版物，鼓励出口纸。1685 年南特敕令废除后，熟练的造纸工人移居国外，英国与荷兰的造纸工业得到发展。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荷兰却引进了更为高效的造纸方法。法国的难民如培尔^③ 和笛卡尔发展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这些学说对 18 世纪后期的批评产生强烈的影响。在荷兰，铸字成为一种产业，埃尔泽菲尔这样的家族公司开拓了欧洲的印刷品市场。在英国，对印刷业的压制对内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商增加，他们使用更多的印刷机，以求降低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煽动叛乱的读物，于是又引起新一轮的镇压，以至于内战期间产生大量引起争论的出版物。^[24]《圣经》的强调，伴随着对印刷业的限制，出现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和经院哲学的攻击。人们对当代的一切更感兴趣，科学和自然神论随之兴起。1662 年建立的皇家学会关注科学的发展，推动英语的改良，以使英语成为散文的载体。皇家学会要求“像数学一样简洁明快的语言”，它拒绝“一切铺陈、离题和冗长的文风”^[25]。

对印刷业的压制使英国人不像法兰西那样重视语言。英语词典逐渐编辑出版，但是英语不足以准确表达欧洲大陆的法典。印刷业和得到改进的传播加强了国会的代议制。压制引起时事通讯和咖啡馆的兴起。国

① 乌得勒支联盟 (Union of Utrecht)，1579 年，荷兰被覆省在此建立联盟，反抗西班牙统治，为此后的荷兰王国奠定了基础。

② 萨利法 (Salic Law)，5 世纪征服高卢的萨利人的法典，主要是一部刑法典和程序法典，也包括一些民法的法令。

③ 培尔 (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的早期代表。主要著作有《历史批判辞典》。

会的绝对权力抵制了国王的绝对权威，并摧毁殖民地根深蒂固的普通法。国会的权威成为公共信誉的基础。1689年革命之后，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同年废除了执照法。随即出现了大量的报纸，第一份日报于1701年问世。在极盛期，艾迪生和斯蒂尔“在才智与美德的长期灾难性的分裂之后”，终于使之互相妥协。“在二者分家的时期，放荡使才智误入歧途，疯狂使美德步入旁门”。手摇印刷机的印制速度慢，篇幅较小的政治小册子容易印刷，大量的政治小册子随即问世，并展开混战。1712年的印花税也随之而起。低价售出的印刷品不堪重税，印刷商被迫印制短小精干的周刊和月刊。1728年，钱伯斯的《艺术科学大词典》问世。对政治作品的限制，加速了其他作品比如小说和儿童读物的发展，也加速了图书馆的建立。1710年的版权法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但是，1774年的法庭裁决，又根据普通法否决了永恒的版权。这个裁决摧毁了对出版物的垄断，鼓励大批小本经营的出版商重印图书，推动庞大的旧书业，迫使大型出版社集中搞昂贵的出版物。18世纪上半叶，苏格兰作家却没有受到文丐的牵制，而是得到大学和罗马法背景的支持。他们集中精力写哲学思辨性的著作，比如休谟的哲学著作和亚当·斯密^①的经济学著作。^[26] 苏格兰王室关心的是出版司各特^②的小说和《爱丁堡评论》。

沃尔波尔^③的创作走下坡路后，政治审查制度也逐渐被消解。纸的产量增加。英国铸字工人卡斯隆^④的努力使英国摆脱了荷兰铸字业的垄断。反对张贴的立法出台之后，对广告的依赖日益增加，所以报纸的版面也日益加大。伦敦城抵制国会的绝对支配地位，这是对威尔克斯和朱尼厄斯^⑤的有力支持，使他们争取到了出版国会辩论稿的权利。国会议员奥利维尔（Alderman Oliver）说：“每当国王、上院和下院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时，我就要反对这种权力。”^[27] 报界抨击“国王、上院和下院三位一体，携手反对英格兰”。新闻报道取代了社论和朱尼厄

①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主张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代表作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等。

② 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先驱，代表作有长诗《玛米恩》、《湖上夫人》，历史小说《威弗利》、《艾凡赫》等。

③ 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英国作家，创作了英国第一部哥特体小说《奥兰托堡》，存世的作品为篇幅庞大的书信集。

④ 卡斯隆（William Caslon, 1692—1766），英国铸字工人，铸造了很多种类的铅活字。

⑤ 朱尼厄斯（Junius），匿名作者，1789年至1792年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内阁的一系列信件。

斯的文章。作者之所以要用笔名朱尼厄斯，那是“因为没有必要遭到全国最坏最有权势的人的嫉恨”。虽然有这样一些进步，沉重的赋税、诽谤罪官司的威胁还是束缚了报纸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教会在革命期间存在的问题加强了自然神论的立场。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抨击又弱化了教会的地位。浪漫主义的大门洞开。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① 两个教派的对台戏随即开场。

与英国本土对文学的兴趣伴生的，是殖民地对文学的压制。所以殖民地被迫在报纸上下工夫。殖民地需要印刷商出版议会制定的法律，随之而起的是印刷商对报纸和邮政的兴趣，他们尤其关心的是鼓动人们反对对出版业限制。他们争取在第一时间里刊发英格兰议会的辩论稿。1765年，政府对低价书报征收印花税，遭到民众反对，他们要求废除印花税，而且取得成功。威尔克斯和朱尼厄斯对议会绝对权威的抗议，在殖民地得到了充分传扬。报纸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权利法案》中得到承认，这个法案保障新闻自由。对普通法的依赖意味着拒绝议会的绝对权威。由于不能在绝对依赖和绝对自由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大不列颠帝国开始分裂。在具有绝对权威的议会里，罗马法的影响显而易见。其结果是，议会与强调普通法的殖民地，可能会发生冲突。

在法国，日益加强的集中化对君主的行政能力构成了沉重的包袱。出口纸和限制出版物的双重努力，越来越不平衡。这就促进了荷兰和瑞士印刷业的发展，使书籍走私禁而不绝。法国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越来越激烈地抨击对出版业的限制。以英格兰钱伯斯的《艺术科学大词典》为蓝本的《百科全书》，成为抨击君主制的弹药库。革命爆发之时，报纸就成为思想的大炮。革命之后，拿破仑建立了一套审查制度。整个19世纪，为新闻自由的斗争持续不断，既有进展，也有倒退，进展的结局是1830年的革命，倒退发生在路易·拿破仑的手中，进展发生在共和国期间。新闻记者和政治人物一样，扮演积极的角色，结果造成法兰西政治史中的动荡。

英国对法兰西革命的恐惧，在对报纸征收的重税之中显而易见。^[28]造纸用上了机器，印刷也用上了机器，对报纸却实行限制的政策。结果使媒介侧重于物质材料，而不是新闻本身。期刊、杂志和书籍日益重要，

^① 卫斯理 (John Wesley, 1703—1791) 和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英国两位著名传教士，先合作在北美传教，后分道扬镳。前者创立卫斯理宗，后者创立循道公会。

这就要求减少纳税和邮费。1830 年的法国革命比较温和，接着是英国议会的几次选举法修正案^[29]。19 世纪下半叶，受到优惠税收保护的《时报》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伦敦和殖民地的报纸在数量和发行量上，都迅速增加。电报的发明，打破了伦敦受铁路强化的垄断地位。1868 年之后，电报促进了边缘地区和伦敦的竞争。^[30]人们认为德国人在教育上获得成功，是他们 1866 年打败奥地利的的原因，也是他们 1870 战胜法国的原因。这导致 1879 年英国的教育法案，从而产生了新的读者群。纽尼斯（Newnes）和诺思克利夫探索新新闻的新市场。在新期刊、廉价小说和文学经纪人的面前，巡回图书馆的垄断销声匿迹。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倚重文学，与此相伴的是报纸对知识的垄断。这个垄断地位受到优惠赋税的保护。与此同时，美国却没有版权的立法，这就迫使美国作家倚重新闻业。^[31]纽约的出版商如哈泼使用蒸汽船的运输线，将英国文学的巨量宝藏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32]1852 年，出版商和书商如塞路斯·菲尔德公司反对搞国际版权公约。^[33]美国人对新闻的倚重成为美国新闻业的特征，美国新闻业受到《人权法案》的保护。这就给技术发明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些技术发明有：快速印刷机、铅版浇铸法、整行铸排机、木浆造纸术。正如在英格兰一样，电报摧毁了政治中心的垄断地位，摧毁了政治权力，这对内战的爆发，不无作用。技术发展对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新新闻，产生了影响。从美国传来的技术摧毁了欧洲的统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无影响。俾斯麦说，英国之所以不能够参加欧洲外交的核心圈子，那是因为它对议会负责；新新闻的出现使它在这个方面更加无能为力。^[34]俾斯麦的态度表现在这句话中：“决不要相信任何一句话，除非你看到它受到诘难。”^[35]这句话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新闻形成鲜明的对比。德国早期思想生活的先驱们，留下了一笔领导艺术的遗产。1832 年之后，国家继承了这笔遗产，最终形成了没有生气的官僚阶层。^[36]在寻找新闻的过程中，诺思克利夫使用前所未有的电报和私营线路，把巴黎作为庞大而廉价的新闻源泉，结果使法国的影响更加有力。^[37]在报业、电气通讯、普及识字和普选权的环境中，王朝内阁政治的外交机构和手腕，运转不灵。^[38]印刷业倚重的是自决，自决产生分割，凡尔赛和约^①把分割的影响记录在案。以印刷机为中心的知识垄断结束了人们对空间的执著，结束了对

① 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结束，次年召开巴黎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

连续性和时间问题的忽视。报纸垄断时间，但是它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有地方特点。报纸垄断具有不稳定和危机的特征。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关注的是连续性。纸张和印刷业传播的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①的话来说，民主以牺牲过去和未来为代价，它为当前开路，它注定要被规划和官僚主义抵消。

【注释】

[1] See S. Clarke and R. Engelbach, *Ancient Egyptian Masonry, the Building Craft* (London, 1930) p. vi. 其中表达了对考古学家的不满，说他们太拘泥于艺术客体。

[2] V.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New York, 1946), p.150.

[3] See G. R. Driver, *Semitic Writing from Pictograph to Alphabet* (London, 1948), p.59.

[4] J. M. P. Smith,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Hebrew Law* (Chicago, 1931), p.55.

[5] J. E. Harrison,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1908), p.568.

[6] F.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from the Spirit of Music* (Edinburgh, 1923) pp.120~127.

[7] W. S. Ferguson, *The Treasures of Athena* (Cambridge, Mass., 1923), p.178.

[8] 斯宾格勒语：“罗马句子的结构是罗马征战的另一个后果。在战胜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这个民族也被迫一行政管理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9] T. R. Glover, *The Conflict of Religion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London, 1932), p.17.

[10] Franz Altheim, *A History of Roman Religion* (London, 1938), p.330.

[11] Vaughan Cornish, *The Great Capital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London, 1923), p.140.

[12] J. L. Myers,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Greeks* (New York, 1927), pp.308~316.

[13] T. K. Osterreich, *Possession Demoniactal and Other, among Primitive Races, Antiquity,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London, 1930) p.160.

[14] Benjamin Farrington,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① 基佐 (Francois Pierre Guil Laume Guizot, 1787—1874)，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历史学家，曾任教育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主要著作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

1939), p.46.

[15] P. H. Lang,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41), p.46.

[16] 小书写体是莎草纸草书的是安色尔字体 (vellum uncials) 的后继者, 安色尔字体在公元 4 世纪曾经被湮没。See F. G. Kenyon, *The Palaeography of Greek Papyri* (Oxford, 1899), pp.124~125.

[17] Edward Clodd, *The Story of the Alphabet* (New York, 1913), p.182.

[18] Werner Jaeger, *Humanism and Theology* (Milwaukee, Wisc., 1943), p.24.

[19] 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London, n.d.), p.475.

[20] A. W. Pollard, *Early Illustrated Books* (New York, 1927), pp.7~8.

[21] Cited 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1942), p.82.

[22] Jaeger, *Humanism and Theology*, p.14.

[23]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p.58.

[24] H. R. Plomer,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rinting, 1476—1900*, (New York, 1927), p.169.

[25] M. M. Lewis, *Language in Society* (London, 1947), p.38.

[26] See L. E. Gates, *Three Studies in Literature* (New York, 1899), pp.50ff.; also J. A. Greig, *Francis Jeffrey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Edinburgh, 1948). 关于罗马法对亚当·斯密的影响, 参见 Rt. Hon. Lord Macmillan, *Two Ways of Thinking* (Cambridge, 1934), pp.28~30.

[27] Michael MacDonagh, *The Reporters' Gallery* (London, n.d.), p.236.

[28] See A. Aspinall, *Politics and the Press, c. 1780—1850* (London, 1949); and W. H. Wickwar, *The Struggl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1819—1832* (London, 1928).

[29] Emery Neff, *A Revolution in European Poetry, 1660—1900* (New York, 1940), p.110.

[30] James Samuelson, ed., *The Civilization of Our Day* (London, 1896), p.277.

[31] E. L. Bradsher, *Mathew Carey, Editor, Author and Publisher: A Study in American Literary Development* (New York, 1912), p.79; and L. F. Tooker, *The Joys and Tribulations of an Editor* (New York, 1924), pp.3~10.

[32] J. H. Harper, *The House of Harper* (New York, 1912), p.89.

[33] Ibid., p.108.

[34] J. A. Spender, *The Public Life* (London, 1923), p.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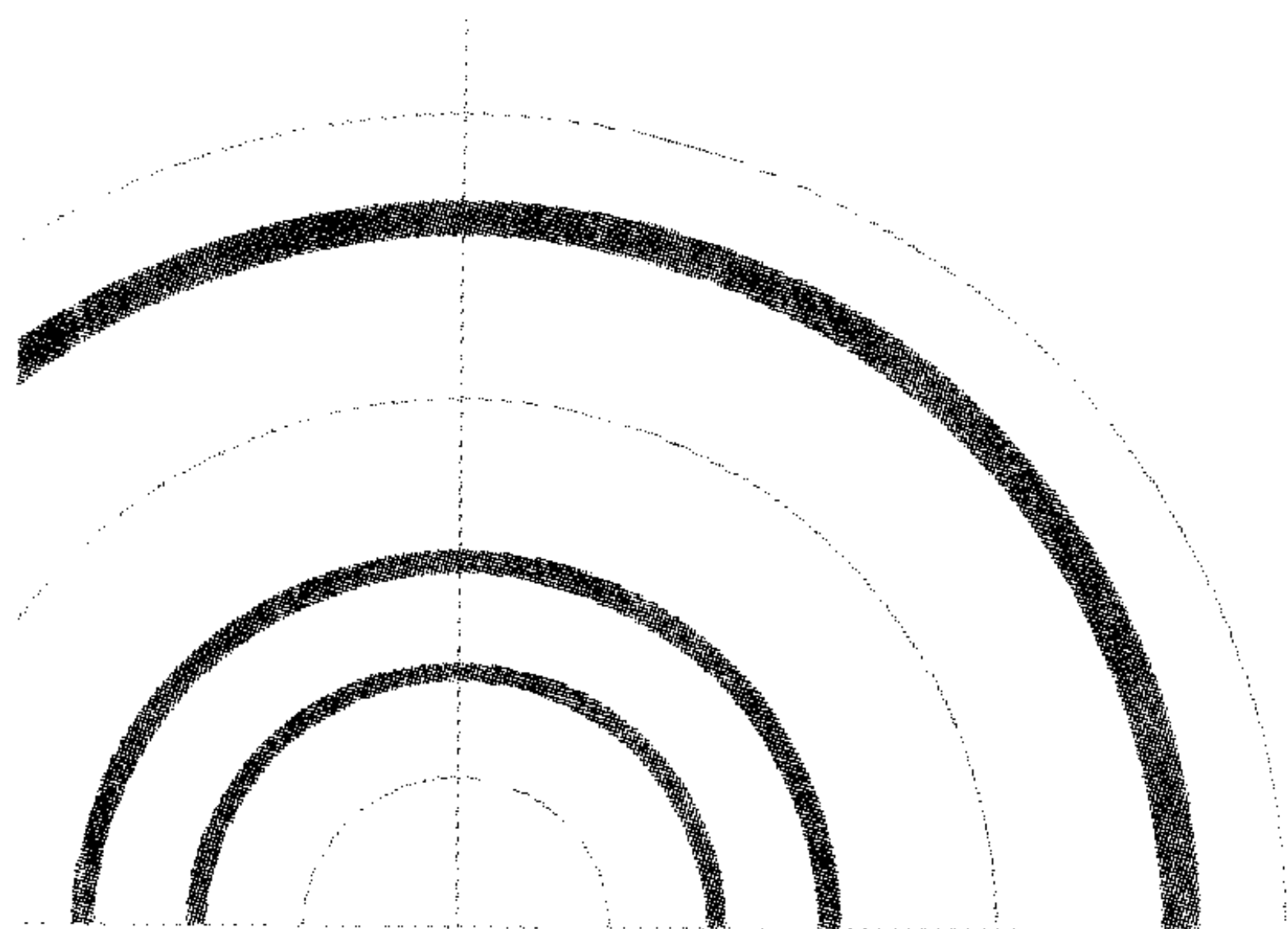
[35] Harold Spender, *The Fire of Life: A Book of Memoires* (London, n.d.),

p.36.

[36] Viscount Haldane, *Selected Addresses and Essays* (London, 1928), p.22.

[37] Max Pemberton, *Lord Northcliffe: A Memoir* (New York, n.d.), p.62.

[38] O. J. Hale, *Publicity and Diplomac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and and Germany, 1890—1914*, (New York, 1940), p.209.



第三章

时间的诉求^{*}

我必须要为本文的题目进行辩护，我对这个题目特别感兴趣。经济史家和一切历史学家都设定一个时间的因素。他们的预设反映了他们写作时对时间的态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大约有四百年的历史^[1]。不过，历史学这个词获得了一些内涵，其关注点未必是对历史事实本身的兴趣，其内容反映的却对当前的事实感兴趣。比如，“一切历史证明”这句话，就暗示对当前的事实感兴趣。结果，历史有自我重复的倾向。不过在写特定时期的历史时，这种重复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然而，历史有可能受到威胁，一是它对现在的执著，二是它受到好古癖的指控。经济史尤其容易受到指控。史家倾向于把它和经济学区别开来，或者把它当作经济学的基础。“在任何时候，对过去的了解，仅仅是为了服务现在和将来，而不是为了削弱现在，也不是为了连根拔除未来生活的虎虎生气。”（尼

^{*} 本文是 1950 年在新不瑞克大学 150 周年校庆典礼上的讲演辞。

采^①语)忽视过去的知识,可能会达到危险的程度^[2],以至于这种知识再也不能为当前和未来服务——也许,我们对当前的执著正好支持我的观点:我担心的是,我们对时间的兴趣会荡然无存。

也许,经济史暴露的立场可以加强我们的欲望,推动我们去寻求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尤其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我们分析经济变革时,要看看人们对时间的态度,看看这种态度对变革有何意义。研究变革时期的时候,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他避不开笔下那个时期人们的偏向,但他可以估量那个时期的时间观念,指出这种偏向的危险。

有人指出,天文时间仅仅是若干种时间观念之一。比如,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3]时间受语言的影响。语言使流行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受到局限,产生观念和思维的僵化。马塞尔·格拉内(Marcel Granet)认为,中国人不能用推理去形成观念、陈述信条。汉字不是用特定的抽象或概括来固定观念,而是激发一大批不确定的具体的意象。汉字完全不适合形式上的精密。^[4]时间和空间都不是抽象的;时间以循环的方式展开,是圆的;空间是方的。^[5]

线性时间观念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研究而变得有效。1582年,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在天主教世界强制执行儒略历。与此同时,斯卡利杰^②出版了《马尼利乌斯^③传》(1579),接着他又出了《时间的矫正》和《时间宝典》(1606)。《时间宝典》“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书”^[6]。根据他对时间的研究,他把古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提出了历史是一个整体的观点。这个观点与教会的观点相左。在夺取教会对时间的控制权的斗争中,他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对哲学的历史传统也作出了贡献,直到笛卡尔。笛卡尔强调的是数学,他那非历史的禀性(unhistorical temper)使他把哲学从史学中解放出来。数学科学的理想在17世纪占了支配地位。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史学世界才屈居第

① 尼采(Fr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代表作有《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等。

② 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意大利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通晓许多语言。重要著作是研究各种历法的《时间校正篇》(1583)。比较各古文明计时方法,纠正错误,破天荒第一次把年代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③ 马尼利乌斯(Manilius, 活跃于公元1世纪),最后一位罗马劝世诗人,生平不详,著有《天文学》。

二。到了稍后的赫德尔^①和浪漫主义运动，历史胜于哲学和科学的首要地位又被确定下来。历史主义几乎完全是19世纪的产物。^[7]在地理学中，爱尔兰主教厄舍尔（Bishop Ussher）关于地球形成史的断代说被粉碎。“人们用《圣经》‘创世纪’解释地质学，一系列牵强附会、令人讨厌的尝试开始了”^[8]。在考古学中，对古文明的认识暗示着时间的极大延伸。在达尔文那里，历史研究法被引进生物学，给科学思想提供了崭新的一维。在天文学中，时间无限延伸。就是在数学中，算术也摆脱了几何与代数的枷锁，成为“纯粹按时间和顺序展开的科学”（哈密顿^②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人们认识到，笔录的东西和印刷的文字都具有局限性，这种认识对历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蒙森^③把政治本身变成历史知识题材。不过，在19世纪后期，政治学的修史法（political historiography）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布尔克哈特^④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研究文明史，兰普雷茨（Karl Gottfried Lamprecht）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艺术的最高价值，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它使人摆脱对意志的屈从，把人从具体目标和宗旨羁绊中解放出来。^[9]泰纳^⑤认为，思想发展是政治事务的推动力，古典精神是法国革命的推动力。^[10]甫斯特尔·德·库朗日^⑥强调神话^[11]在史前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人们对死者的崇拜，是联系各种信仰的内心纽带。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表明^[12]，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知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只

① 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狂飙运动先驱，其著作以总体主义、民主主义和历史主义为基本思想。代表作有《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

② 哈密顿（William Hamilton, 1805—1865），爱尔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发展了几何光学理论，提出“哈密顿函数”。

③ 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罗马法》、《拉丁铭文集成》、《罗马国家法》等。

④ 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从事文化艺术史研究，强调研究文化艺术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代表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

⑤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法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实证主义者。代表作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由来》等。

⑥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康熙方法研究法国历史的首创者。所著《古代城邦》研究宗教在希腊罗马历史上的作用。

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是在产生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得到抵消的。于是，卡西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第二王朝时期，就实现了相当长期的稳定。古希腊口头传统的力量限制了文字媒介产生的偏向，对一段时期的文化活动提供了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的繁荣期。罗马帝国官僚机构依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其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后一种依赖是对前一种依赖的抵消。拜占庭帝国维持了两者之间的平衡，直到1453年。“教会和军队通过纪律和等级制维持社会秩序”（梅特涅语）^[13]。另一方面，西方使用羊皮纸抄本的偏向，显著表现在教会的绝对支配权威之中，羊皮纸支持的知识垄断又欢迎纸这种新媒介的竞争。现代国家引进纸和印刷机之后，宗教垄断被俗语的垄断取代。空间的垄断之后是时间的垄断。简单地巡视一下突出的时间问题，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文明的局限性。

时间观念具有无所不在的渗透性，因此要理解其属性有一定的困难，要说明其保守性也有一定的困难。一天分为24小时，一小时分为60分钟，一分钟分为60秒，这种流行的60进位制把我们立即带回巴比伦的历史。^[14]60进位制的影响在度量制度中经久不衰，尤其是表现在英国，其货币仍然维持着60进位制^①。这个进位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计算中避免分数。它在航空业的发展中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因为航空业要求快速运算。

在依靠灌溉的农业体系中，时间的计量很重要。这里要预测周期性的洪水，预测重要的四时节令、播种期和耕耘的时机。对时间的关心表现在宗教的重要性中，表现在对庆典日期的挑选之中。挑选宗教节日必须依靠一定的手段，才可以显示什么时间合适，才可以避免亵渎神圣的节日。^[15]依靠月亮来计量时间显示出一种不规则性，流传至今的那种确定复活节的办法，就是其表现。苏美尔僧侣显然有办法纠正太阴历中的误差。不过，计算太阳历的困难，可能也促使闪米特国王对太阳感兴趣，从而使他们最终驾驭太阳历，并且在他们控制的广袤地域里做一些必要的调整。^[16]我们现在的历法和基督纪元前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和过去国王登基的年号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君主对时间的控制要受到朝代和军事力量的局限，而且还要受到僧侣阶级连续性的局限和教阶制度的局限。

① 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经改变。

在埃及和巴比伦，自然界的主要变化都有与之对应的仪式。于是，这些仪式就成为宇宙事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间就是人为计划反复轮回的序列展开，每个计划又自有其价值和意义。^[17]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生物学时间，是人生基本阶段的序列展开。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巴比伦的情况也是如此。也许，埃及王朝的绝对王权有一个依靠，那就是国王有能力根据天狼星的出现来确定恒星年。埃及人对第一王朝的承认，暗示着承认从第一王朝开始的纪年。上下埃及的合并刚好和王位的兴起同时，暗示着对宗教仪礼的强调。国王对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控制力反映在金字塔中，金字塔是证明国王自信的永恒丰碑。国王这种绝对控制力，还表现在制作木乃伊的技术之中，这种技术是对永恒的礼赞。国王的绝对控制力，也反映在永生的信仰之中。僧侣阶级发现了更加可靠的太阳历之后，绝对王权可能就被削弱了。控制时间的绝对权力转移到僧侣阶级的手里之后，埃及王国在空间上的扩张就受到了牵制。

在埃及，金字塔和雕刻中反映的绝对王权，受到僧侣力量的抵消。僧侣的力量建立在复杂的文字和莎草纸上。倚重时间延伸媒介的文明，它同时倚重时间的永恒，埃及就是这样。这样的文明在时间不重要的时期，自然占有突出的地位，比如现在它就很突出。在巴比伦，僧侣阶级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他们掌握了在泥版上刻写的复杂的楔形文字。同时，由于新建城市的力量越来越大，而且强调雕塑和建筑，所以君主的权力也随之加强。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达成了长期的妥协，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卡西特人、亚述人和波斯人都先后承认巴比伦僧侣阶级的权力。在埃及，僧侣的权力阻止了王朝向君主政体的方向发展，使之免于外族的征服，比如喜克索人、亚述人和波斯人的征服。在埃及和巴比伦，僧侣阶级对时间控制力的垄断，造成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组织问题，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是这样，后来的帝国也是这样。

巴比伦的僧侣阶级关注时间，因此他们对占星术和天文学作出了贡献。公元前 747 年，巴比伦的那波尼王朝时期，僧侣阶级制订了纪年法。此前，他们发现，每过 18 年又 11 天，月亮回到与太阳相关的原来的位置。纪年法的发明，也许和月亮的运行周期不无关系。^[18]巴比伦人发现天象的周期性质，而且发现可以预报天象，这就对宗教狂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宿命论占据了上风。

政治组织拓展对空间的控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僧侣阶级却垄断了

时间知识。这两种现象凑巧并存。这就给边缘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如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边缘组织。政治组织在埃及和巴比伦经历了扩张和缩小的周期变化。这就削弱了对政治组织的倚重，加强了对宗教组织的依靠。有些文化垄断了复杂的文字，边缘地区的地位却有利于比较简单的文字。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居住区兴起的字母表，就是比较简单的文字。在这些边缘文化中，宗教组织倚重的文字与埃及、巴比伦的文字截然相反。边缘文化的宗教倚重简单的文字，这对政治组织的缺乏是一种补偿，对复杂教阶制度的缺乏也是一种补偿。复杂的教阶制度控制时间，它强调文字的神圣，吸收了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资源。对研究《旧约》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没有对当前表示专注，只是充分认识到人生是一条伟大的小溪，当前仅仅是人们意识到的时刻……人类历史上最虔诚的民族，同样是第一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绝非偶然。”（W. A. 欧文语）。历史学和希伯来人一道出现。这是他们关注时间的结果。

地中海北岸的蛮族与古老文明接触之后，希腊文明浮出水面。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对空间问题的强调与对开疆辟土的关注相伴生。几何学偏向于计量和空间，它限制了人们对时间的关注。货币经济的传播加强了人们对数字和算术的兴趣。反过来它又加强了人们对神秘宗教的兴趣，神秘宗教与已有的阿波罗宗教产生冲突。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克莱塞尼兹的改革，把时间控制权从宗教手里夺过来，交给国家。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实现了文化的繁荣，这就是社会平衡的结果。不过，社会平衡没有维持很久。^[19]克莱塞尼兹创造了一个参议院工作年历制，每年开会10次，会期36天到37天。但是，他用的太阳历平均每年还是 $365\frac{1}{4}$ 天，没有闰年闰月。此外，宗教传统原有的民事年历还是继续有效。雅典天文学家默冬的19年周期^[20]，每月30天的历法，于公元前432年6月27日起正式启用（这就是儒略周）。这个历法成为精确计量时间的标准。参议院工作年的修正，大概是公元前404年—403年混乱的时候发生的。民主制恢复之后，参议院工作年经过调节，和民事年一致起来。公元前330年6月27日—28日的夏至日，开始启用卡利普周期（每76年一个周期——译者注）。这种历法每月30天，每64年的闰年不再使用。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和公元前4世纪，文字的普及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关系，摧毁了雅典文明。希腊衰落，亚历山大继之而起，东方分裂为

若干个希腊化的国家。在埃及，新首都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王朝，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鼓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研究工作，试图以此抵消底比斯僧侣和巴比伦科学的影响。在科学关怀和天文学发展中，显然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行星和星座的名字证明古人对天文学的兴趣。公元前 239 年（238 年？），托勒密王朝启用闰年，后来又将其废弃。后来的罗马人才恢复了闰年。

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恺撒命令埃及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编制一个精确的历法。耐人寻味的是，新的历法承认了古埃及生殖女神伊西斯节日，促进了埃及宗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然而，出于政治目的而实行的不规则计时^[21]，人们对历法的规整化的要求，恺撒实行新历法的权力——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对这个历法的修正。公元前 46 年，或者说罗马建城后的 708 年，元旦从 3 月 1 日改为 1 月 1 日，每年的时间调整为 $365\frac{1}{4}$ 天。确定罗马建城的日期，说明了罗马人对特定的某日某时感兴趣，说明他们相信一个时间序列是由单个的时刻组成的。强调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情，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尤其是合同制的成熟，因为时间是合同的实质问题。奇数的月份安排了 31 天，偶数的月份为 30 天。2 月例外，只有 29 天，每 4 年才有一次是 30 天。7 月以恺撒的名字命名，叫 July，8 月以屋大维（Augustus）的名字命名，叫 August，安排了 31 天。这多出的一天是从 2 月里抽出来的，这样 2 月只有 28 天。9 月和 11 月减少到 30 天，12 月增加到 31 天，这就避免连续 3 个月都是 31 天的局面。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体制维持了对时间的控制。到了公元 3 世纪末，罗马帝国开始实行 15 年一轮的税务年周期。公元 312 年以后，埃及人的 15 年税务年周期的起始日期，从 8 月 29 日改为 9 月 1 日。这是拜占庭帝国的元旦。大约到了屋大维在位的时候，由于天文学的影响，每一天都和一个行星相联系，带上了神圣的涵义；密特拉神的神秘仪式，使 7 天一周代替了罗马 8 天一周的习俗。从公元 354 年到公元 360 年这段时间，密特拉崇拜中 12 月 25 日的太阳诞辰，被圣诞节取代。^[22]在春分时节，复活节大概取代了阿提斯^①神的庆典。^[23]基督徒按照摩西律书关于逾越节的规定，把 3 月 1 日定为元旦。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教会支持把纪元定为据说是基督诞生的那一

① 阿提斯（Attis），众神之母，源出小亚细亚，传至罗马各地，2 世纪成为太阳神，每年庆祝春回大地的活动，就是对这个众神之母的崇拜。

年。宗教对时间的关怀，表现在洪水神话中。洪水神话意在说明，旧世纪灭亡了，新世纪诞生了。这种关怀，还表现在埃及人时间观念的起源中，表现在希腊罗马的历史中，他们的历史在基督纪元以后延续下来了。公元284年，圣西里尔^①编制了一个95年的历法（每19年为一个周期，一共5个周期），在戴克里先^②皇帝登基时使用。这个年表后来修正为基督道成肉身历法的基础。公元525年，小狄奥尼西^③把这个年表引进西方的历法。公元664年，在惠特比会议上，威尔弗雷德^④确定用这个历法来定复活节，将其定在3月15日或3月15日之后。这和凯尔特人的历法截然相反。凯尔特人用月亮的盈亏和84年为周期的历法来确定复活节，他们的复活节是3月14日。从彼德进入英格兰传教的时间算起，纪元就以基督诞生那一年为起点。这个历法被教士们带到法兰克的东部地区，道成肉身的年代正式定在公元839年。公元963年，在奥托大帝^⑤的影响下，主教法官法庭采纳了这个历法。^[24]显然，主教法官法庭537年已经采纳了帝国纪年和15年期财政年度制。公元550年，这两种历法已经在普遍使用之中。公元781年之后，这两种历法再也无人问津。^[25]那年，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造访罗马。在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治下，法兰克人喜欢用两种纪年。在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纪年取代了用皇帝年号的纪年。

至迟到9世纪的下半叶，法兰克皇帝把圣诞日作为元旦。提倡敬奉圣母的宗教运动的结果圣母节（3月25日）的产生。1112年，法国的法官法庭（chancery）把圣母节当做元旦。12世纪后半叶，英国也如法跟进。13世纪中期以后，也许是由于研究罗马法和日益频繁地使用历书，人们逐渐回归罗马人的历法，把1月1日作为元旦。直到1725年，英国才把元旦从3月25日改为1月1日。^[26]近代国家逐渐恢复使用这种异教计时制。正如在埃及和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这样的建筑是永久的丰碑。

① 圣西里尔（Saint Cyril, 827—869），希腊基督教神学家，向斯拉夫人传教，与其兄共同创造斯拉夫语字母。

②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3?—316?），罗马皇帝，开创四帝分制，改革内政，迫害基督徒。

③ 小狄奥尼西（Dionysius Exiguus, 500?—560?），教会法学者，制订新的复活节日期查定表。公元525年应教皇圣约翰的要求编定历法，对95年周期表加以修正。历法现在仍然使用。

④ 威尔弗雷德（Saint Wilfrid, 634—709?），英格兰基督教教士。664年在惠特比会议上主张废除凯尔特教会的礼仪，采用罗马教会的礼仪。

⑤ 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 912—973），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82年，格列高利八世改革历法，纠正一年 $365\frac{1}{4}$ 天的历法积累下来的不准确现象，把10月5日当作10月15日。罗马天主教在控制时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犹太教和新教也维护自己掌握时间的权力，尤其是确定节日的时间。罗马天主教与犹太教和新教在时间控制上的分歧因加重摩擦而削弱了国家。但它们都坚持历法的统一，又加强了国家的权力。意味深长的是，新教国家不得不勉强让步，承认历法修正的好处。但是，直到1750年，英国才颁布法令，将1752年9月2日之后那一天定为9月14日。直到推翻沙皇，俄国才用格列高利历法取代了儒略历。

基督教继承了罗马宗教的计时制，给基督的生辰年赋予独特的地位。对时间的控制不仅表现在纪年中，而且表现在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中。静修制的推广、敲钟计时辰的办法、宗教仪式的地位——这一切都在西方引进了日常生活。因为在阴天比较多的北方，日晷的用处是比较受限的，因此它逐渐让位于水漏，最终又让位于更加精确的计时器。^[27]敲钟报时的现代小时制，是在14世纪普及的。^[28]

有规律的工作时间产生行政管理，使生产增加，贸易增长，城市发展。数学从印度传播到巴格达和西班牙的摩尔人大学，阿拉伯数字逐渐取代了罗马数字，大大提高了计算的效率。^[29]时间的计量促进了信贷和交换的增长，可预测未来的计算能力对保险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纸的引进、印刷机的发明加速了拉丁语的衰落和俗语的兴起。天文学的发展、时间计量方法的精密化，这些科学成果满足了航海、工业、贸易和金融的需求，没有给神话和宗教留下多少地位。印刷机支持宗教改革，摧毁了教会对时间的垄断，虽然对时间的兴趣在宗教节日中还是保留了下来。教会很早就意识到天文学家对其时间垄断构成的威胁，所以对天文学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教会和国家争夺时间控制权的斗争，在西部国家集中表现为一系列具体措施，在东部集中表现为拜占庭帝国反对偶像崇拜的争论。1453年，随着火炮的改善，君士坦丁堡陷落。欧洲为之深深震撼。反对教皇至高无上地位的堡垒被扫除了，新国家对长治久安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对拜占庭帝国享年数百载的手段产生了兴趣。都铎王朝^[30]的试验和拜占庭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亨利八世凌驾于教会之上，他成为英国国教的教主；摧毁静修院，这和拜占庭反对偶像崇拜的争论差不多；强调女王的地位，这和斯拉夫禁止女性为王截然相反。都铎王朝继承了教皇赐予的神圣权力，这就给国内争夺时间控制权的斗争打下了基础。伊丽

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31]，争夺时间控制的垄断权和议会的绝对权威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议会对时间的兴趣表现在对专利和版权的时间限制上，在反对遗嘱永远有效的裁决中，在不动产的限嗣继承（entail）中。国家对时间的兴趣，首先表现在对永久营业权（mortmain）的兴趣上，接着又表现在对地产税的兴趣上，国家想要掌握超越生命时限的控制权。到1774年，普通法中的永恒版权被废弃。苏格兰法庭拒绝承认英格兰习惯法和伦敦出版商的要求。王室对时间问题的关切、对江山永驻的关切表现在君主的名字中，乔治王朝四位国王的名字就是例证。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体现了对不列颠帝国长盛不衰与日俱增的兴趣。欧洲大陆对时间控制权的争夺，使法国人在1792年9月22日开创一个共和国的新时代。一些描绘节令的名字开始出现，比如把11月叫做“热月”。1802年法国政府与教皇和解之后，这些月份的名字到1805年就废弃了。教会决定的假日受到压抑，现代国家确定了新的假日。经济效率不高，凑巧与宗教节日的增加，以及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的争论同时发生的。

教会对时间的控制削弱，国家对时间的控制也有限，工业填补了留下的真空。在时钟和钟楼普及之后，教会尤其是修士开始实行严格的暮鼓晨钟礼拜仪式。但是，工业需要重新强调机械时间的永恒流动。时区的划分引进了不同地区的统一性。工业主义的进展反映了报纸的传播速度。广播是生物时间地位衰落的标志，生物时间是农业决定的。伴随工业主义的冲击，兴起了改革历法和实行冬时制和夏时制的要求。复活节始终维持不固定日子的习俗，反映了时间安排的保守性。

与工业对时间的要求同步产生的，是商业对时间的要求。家庭对时间的关切跨越几代，商务伙伴和公司的时间安排却更加灵活、更加持久。某些类型的工业比如传播业，尤其是报业，显然适合家族控制。究其原因，一是它们需要广告，二是它们需要长时间使用同一品牌，表现出经久不衰的样子。在这些行业中，持久和可靠是千金难买的。公司寿命的长短，有赖于管理层对影响公司寿命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有赖于管理层对公司性质的把握。有些公司出版了自己的百年史，以说明其长寿，这也是一种自我宣传。哈得孙湾公司有悠久历史，也许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它的业务时间跨度要五六年，这是从购货到卖出皮毛的周期。扩张时期和巩固时期的交替，暗示着对控制时间或空间的兴趣的交替。

群体间在时间垄断上的冲突，加速了国家的干预。强调货物快速周

转的手段，技术的也好（比如用巴士取代有轨电车），商业的也好（比如用分币来确保售报的方便，汽车款式的时尚变化，流行作家的出书），往往和长线的投资发生冲突，长线投资依靠的是储蓄——志愿或强制的储蓄，比如保险金，或者养老金。耐用品和快速周转的消费品的竞争，暗示着经济运行机制内部的冲突，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冲突——偏重商品耐用性的国家（如英国）和不太偏重商品耐用性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冲突。结果，国家采用干涉的政策，包括打破托拉斯，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手段。在耐用品领域，在长期投资的领域，比如铁路、电力、森林和钢铁领域，国家干预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干预的极端步骤有长期预算、长期投资和五年计划。在极权主义国家，由于官僚主义的增长，在控制垄断中的时间问题上，在利润理论的整个领域，在其他的方向，健全和平衡的方法显然是需要的。经济理论的静态方法，在满足时间问题的需求中帮不了什么忙。

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达到平衡的文明，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就寿命长短而言，可以说，关心时间持续的政权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击败了——如果前后相继的王朝不能提供有效的、持续的治理能力。政权也可以在技术上被打倒^[32]——如果侵略者利用改进的战争手段，而被侵略者又忽视这些东西的话。作为传播媒介的文字，给征服者提供了治理被征服领土的体制。在宗教事务中，文字提供了一种连续的体制。但是，反过来，文字往往又形成复杂的垄断体制，从而遏制人们对工业技术的兴趣，结果就鼓励新的侵略。“因为凡是不敬畏神的地方，国家的命运有两个：一是必然的毁灭，一是由一位人人敬畏的王公统治，从而使国家得到支持。这样的敬畏确实可以支撑国家于一时，它可以填补臣民中宗教的缺乏。然而由于人生苦短，如果国家曾经倡导的道德消亡了的话，国家的治理必然要陷入衰朽。”（马基雅弗利语）对空间即领土幅员的关心和对寿命长短的关心有一个平衡点，它似乎有赖于这样一个二元布局，即教会从属于国家，并且保证宗教或国家能够调动和利用该文明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来精心规划未来，治理确定的疆域。如果社会分层太僵化，如果态度积极的人无权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富豪统治的社会中就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超越个人权利的结构就会受到造反的威胁。^[33]

宗教对时间的垄断可能会导致财富的聚敛，国家就可能向教会发起攻击，要求重新分配财富。中世纪的教会就遭遇过这种尴尬的局面。英国和拜占庭帝国对静修院的攻击、没收犹太人的财富都是财富重新分配

的表现。在绝对权力的君主体制下，教会和国家的勾结、财富的聚敛，可能会导致革命，像在法国和俄国那样。这意味着与时间观念的彻底决裂，因为这个时间观念和强调空间的官僚体制的要求越来越不协调。传播的空间偏向或时间偏向，演绎出一个财富分配的海绵理论，它预设着一个暴力前提。

——列举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说明其在现代工业发展中的意义，那是本文力所不及的。本文关注的是，现代人对时间的执著出现之前，人们对时间的态度有何变化。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展，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印刷业倚重的是通俗语和因它对时间没有兴致而导致的与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会产生新的垄断，其结果在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的演进中是显而易见的，在地区分割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北美殖民地的反叛，南北分割及其向西部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刷业扩张的结果。在大不列颠帝国，英联邦成员国自治和独立势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咎于印刷业的发展。在欧洲，印刷业的发展使语言的差异得到不同程度的加重。在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印刷技术的变迁支持了报业的迅速发展。报业向其他英语国家的传播，使英语和其他地区的口语的差异增大了。反过来，语言的鸿沟也是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原因。报纸不仅确立了英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英语国家内部造成了阶级的分化。对教育的强调，义务教育的实施，必然要倚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书报杂志。于是，关心改善技艺的艺术家和关心市场最大化的作家之间的鸿沟，也就扩大了。对轰动效应和战争的兴趣必然使历史的修撰产生扭曲。图书馆的编目分为专题、事件、时期和个人，反映了图书馆的商业主义执著，只需略举几个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林肯、拿破仑、丘吉尔、罗斯福等。

19世纪下半叶大规模生产的木浆纸，促进了新闻纸工厂的大发展，为拓宽报纸市场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南非战争在英国引起的激动和轰动、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在美国引起的激动和轰动，和大报的市场需求不无关系。漫画出现的时候^[34]，刚好是赫斯特和普利策两大报系为了在纽约争夺市场而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发行量的增加满足了刊发广告的需求，满足了新的营销方法的需求，尤其满足了大百货店的需求。对

于扩大发行量、广告和新闻销售量来说，必不可少的是使人激动的新闻。人们对狂欢和刺激有势不可挡的兴趣，这种兴趣被用来谋求商业利益。一方面，追求刺激和轰动的新闻的倾向，对稳定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外交政策又日益成为新闻的源泉。美国新闻记者马加汉（McGahan）对土耳其的报道，被格莱斯顿^①抓住了，所以他就成功，迪斯累里^②没有抓住这样的新闻，于是就吃了败仗。^[35]斯特德^③在《蓓尔美尔街新闻报》任主笔，他的活动是使戈登^④对埃及的远征遭到惨败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如果接受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影响力，就有可能会犯致命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把握说，把英国的注意力从德国转向法国，把英国的政策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诺思克利夫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报业的技术进步和大都会的发展同步进行。在美国的西部扩张中，“所有这些兴趣带动了报纸，报纸启动了政治，启动了一条铁路”^[36]。大量的小中心区在大都会的面前形同侏儒。反过来，大都会的意见反映在其报纸中，反映在对不同之处的强调中。杜雷（Dooley）先生说：“他们一定要登载不同的东西。”^[37]大都会成为新闻源泉，这些新闻由新闻社发布。新闻社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不同的新闻社偏重互不兼容的新闻类型。合众社（the United Press）成为国际新闻社（th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赫斯特）的竞争者，它和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也唱起对台戏。要维持稳定的发行量，仅仅依靠新闻这个基础是难以施展拳脚的，于是特稿应运而生，漫画和摄影图片尤其得到长足的发展。新闻图片的改进与电影的开发同步进行。新闻和电影都强调非稳定性，在这一点上它们构成互补的关系。由于各个地区和大都会之间的竞争，政治稳定是很难实现的。“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特有的弱点之一，我们最棒的人也不能在国会里混得很久。”^[38]随着国会的削弱，总统的力量就得到加强。罗斯福诉诸中产阶级的大众心理，在白宫给新闻界提供了永

①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曾任四届首相。

② 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发动侵略阿富汗及南非的战争。

③ 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 1849—1912），英国记者、主编和发行人，先后主持《评论的评论》、《北方回声报》、《蓓尔美尔街新闻报》，主张“新的新闻编辑”方法，使他报纸生气勃勃、不落俗套、采用采访记等写作形式。

④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殖民军官，曾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摧毁圆明园，镇压太平天国，任苏丹总督时被起义军击毙。

久性的办公用房，其意义深远。^[39]维拉德^①说：“罗斯福使新闻界堕落，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厉害。”^[40]

书籍是长期思考的成果，具有稳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被期刊和报纸的增长破坏了。早在1831年拉马丁^②就说过：“书来得太晚，今后可能到的书，只有一本。这就是报纸。”毛奇^③曾经就国际事务中的非稳定性影响指出：“对和平构成危险的，再也不是王公的野心，而是人民的情绪，是面对国内情况而感到不舒服的人民，是政党的行为，尤其是其领袖的行为。”^[41]机器工业用于传播，使西方社会裂变为原子性的个体。据说，有人指责贝内特^④在《纽约先驱报》的立场前后不一致时，他回敬道：“我每天出报。”他是在不一致中达到一致。他又说：“广告寓于一天的世界之中。”^[42]

哲学和宗教反映了总体的变化。用伦敦幽默刊物《笨伯》杂志的话说：“由于印刷机的使用逐渐推广，政治经济学朦朦胧胧的恐怖景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欧洲的西方国家中，新的教派气焰嚣张。”享乐主义倾向通过边沁^⑤的著作而加强。凯恩斯^⑥描述自己早期的经验时说，他是第一代把享乐主义扔出窗外、躲避边沁主义传统的人。“我并不把这个变化当成从内部啮噬现代文明的蛀虫，我并不认为这是当前道德败坏的原因。我们曾经把基督徒当成是敌人，因为他们好像是传统、陈规和咒语的代表。实际上，由于边沁的计算方法建立在过高估计经济标准的基础之上，它正在摧毁大众理想的品质。正是由于躲避了边沁主义，再加上我们哲学中不可逾越的个人主义，我们大家才得到保护，我们才不至于沦为简化和荒谬的边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43]稍后，凯恩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把个体个人主义推向了极端。”这个过程进

① 维拉德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1872—1949)，美国报人，主持《纽约晚邮报》、《民族》周刊等，主张和平主义、女权和黑人民权，著作有《报纸和报人》等。

② 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代表作有《沉思集》、《吉仑特派的历史》、小说《葛莱齐拉》等。

③ 毛奇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1800—1891)，德国军事家，击败丹麦、法国和奥地利，因战功而封伯爵。

④ 贝内特 (J. G. Bennett, 1795—1872)，美国报人，创办《纽约先驱报》，首创用图片报道等手法。

⑤ 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代表，认为利益是行为的惟一标准和目的，如果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表作有《道德及立法原理》、《义务论或道德科学》等。

⑥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代表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一步证明了原子化的社会。在宗教中，“对未来和种族进步的新兴趣”，无意之间瓦解了“对生命超越坟墓的兴趣。令人沮丧的极端堕落的教义，也消解殆尽”^[44]。我们要记住英奇教长^①的论断，他说，通俗宗教使哲学受制于迷信。黑格尔、孔德^②、达尔文之类的哲学家迷信进步，成为这种迷信的奴仆。在政治学的堕落中，令人讨厌、难以辩驳的狂妄的预测，代替了正确与错误的讨论。^[45]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相信，由于财富的增加，社会向着幸福的未来前进。同时，财富的增加又依赖公正和‘自由’的增加。他们坚持知识增长和传播的重要意义”^[46]。随印刷业的技术进步而出现的知识垄断，以及人们坚守的出版自由，阻碍了走向幸福未来的步伐。

凡尔赛和约通过接受了自决权的原则，承认了印刷术的冲击。它摧毁了大型的政治组织，比如奥地利帝国。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先是战争的威胁，后是和平的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并且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

视觉本位传播的垄断地位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对它的冤家对头听觉本位的传播，它反而起到加速发展的作用。听觉本位的传播建立在广播中，建立在声音和影视的结合中。在传播的有效性上，印刷品让位于广播和喇叭。^[47]政治领袖能够直接向选民发出，这逐渐给立法机构加大压力。1924年，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直接向民众发表广播讲话，使共和党人反对的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利用报纸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1945）利用广播。虽然后者担心报纸反对，怕引起它们的敌视，但毋庸赘言，他淋漓尽致地利用了广播这种新媒介，并因此而大获全胜。

在欧洲，对耳朵的诉求，使凡尔赛和约的成果毁于一旦。以自决权为基础的政治地图，记录了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借助口语，他可以诉求于人数少的群体和民族。广播可以把他的广播讲话送达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奥地利的德国人。和印刷工业的需求相关的政治边界，在这个新的传播媒介面前已经不复存在。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对更多的

① 英奇教长（William Ralph Inge, 1913—1973），英国神学家，任圣公会主教牧师，专攻古代哲学，以悲观主义闻名。代表作有《基督教神秘主义》等。

②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始祖。

人发生作用，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

新传播媒介的后果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中，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加剧。军队立即将之用于作战和对内、对外宣传。在德国，作战记录片立即在电影院里放映。^[48]德国人因此而得到逼真的印象，他们不得不相信德国军队占尽优势。真实的感觉非常令人信服。随着德国人在前线的崩溃，真实的感觉就成为最大的灾难。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人的问题就是西方文明的问题。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虚幻。“有趣的是，科学学说到处用沉重的事实，来窒息研究道德问题的自由。唯物主义成为每一种暴政的辅助教义，无论它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49]现在，怀特海^①所谓“错位具体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谬论像咒语一样把我们迷住了。他把乡村集市上玩的游戏夸大，提高到普遍适用的高度。

印刷工业有一个特征：非集中化和地方主义，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分歧就是其表现，国家内部的地区分割和不稳定也是其表现。广播传通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它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而打破了阶级界线，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一个人可以同时向众多操同一语言的人讲话，还可以通过翻译间接地对操其他语言的人讲话，虽然效果比较逊色。以语言为基础划分了新的分割界线，在同一语言内部，集中化和亲和性令人瞩目。语言群体内部的稳定性更加清晰，语言群体之间的非稳定性更加危险。

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被变成艺术。广播使短暂肤浅之物增加了重要性。寻找娱乐成为电影和广播必不可少的追求。“广播……异乎寻常地降低了我们的思想标准。”^[50]新媒介的要求被强加到旧媒介的头上，强加到报纸和书籍的头上。由于新媒介的强劲发展，时间受到毁灭性打击，要确保连续性日益困难，要考虑未来也日益困难。古话说：“一个小时是黄金，60秒就是60颗钻石”（sixty diamond seconds set in a golden hour）。这句话反映了商业主义对时间的冲击。“时间就是金钱——这是老少皆知的最庸俗的谚语。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就看到了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金钱就是时间。”^[51]

①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5—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其他著作有《科学与现代世界》、《过程与实在》等。

容我离题说一说这些趋势对大学的影响。威廉·詹姆斯^①认为，“居于美国思想的领导地位的正在从大学转向廉价杂志”^[52]。今天，他可能会说，美国思想的领导地位已经传递给了广播和电视。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说一说戈德金^②在19世纪说过的话：“破除几代人积累起来的禁忌，把主要大学的毕业生一举毁掉，将要给美国的幸福和进步造成致命的打击。恐怕没有比这个打击更加可怕的了。其他一切方式，都不可能比这种打击更加严重地耗尽人格、雄心和思想文化的储备力量。这样的储备力量构成了民族活力的很大一部分。”^[53]他所谓的文化是“能够完成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艺术。这是为意志服务的力量的重大突破”^[54]。

如果我们冒险借用他这个文化定义，我们立即就意识到大学里增加课程的趋势，之所以加课是因为人们想加，或因为这些课对学生毕业后有用，能使他们多挣一些钱。老师也喜欢这样，增加课程等于扩大系的规模和增加经费，而且使人能够跟上课题的潮流。这些倾向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关切，得到教材产业和其他产业如信息产业的支持。图书馆、百科全书和书籍提供了浩如烟海的信息。新的传播媒介，包括电影、喇叭和即将来临的广播电视使信息在大学校园里流布。老师和学生都要接受考试，看他们传播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精巧的仪器、问卷、智能测试等都用上了，旨在告诉学生他处在什么水平。经过这样的测试之后，学生也用类似的手段来衡量老师。千军万马的研究人员和学生都关心如何简化英语，使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学会英语，使更多的人可以学会读书写字。用桑塔雅那^③的话来说：“只要他们在读相同的东西，读什么倒是不要紧的。”美国诗人庞德引用一位美国教授的话说：“大学不是为才智出色的人办的。”^[55]亚当斯在哈佛的一次讨论会上说：“那是办不到的。”^[56]我试图始终如一地使用信息这个词，虽然我意识到，恰当的字眼是教育。英国作家吉辛（George Gissing）提到“一大把半拉子读书人，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危险”。“教育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就的东西，无论你多么卖劲地教，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从我最热情的投入中有所收获。”^[57]“在我看来，鼓吹人类的知识成就似乎是最为幼稚的。现

①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9），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② 戈德金（E. L. Godkin），美国《民族》周刊创办人。

③ 桑塔雅那（Santayana, 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移居美国。代表作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

在，如同过去一样，我们只知道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无知。”^[58]

各学科对机械传输的相对适应力，可能会摧毁大学的统一。“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此外没有其他功能。它传授的不是本能，而是智能，智能是超自然意志的最高形式。”^[59]大学变成一堆贪婪的系科，醉心于搞经费，借以证明其肤浅或其作用，仿佛这样的系科才是成功的。政府对大学的平衡统一的关键意义麻木不仁，却对具体科目的要求作出回应。结果，对统一的兴趣受到扭曲，产生了奇怪的、毫无艺术性的你争我夺的系科的大杂烩，名之曰现代大学。牛津大学认识到了这种威胁，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学校拨款对学科平衡的影响。也许可以说，社会科学家在争取政府拨款的竞争中输了。或者说，他们本该吃败仗，因为他们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政府对社会科学的直接干预，可能给社会的政治健全造成危险。不过，等到政府拨款的时候，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恐怕社会科学也应该提出论证得最完美的联邦政府肯花钱买的研究项目。

在此情况下，我们才豁然开朗，认识到为什么一位剑桥大学的老师，在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之后会这样说：“感谢上帝，谁也不会使用这个答案。”没有什么大学科目号称享受豁免权，没有什么大学不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开设的课程有这样那样的用处。^[60]为了争经费而玩弄的谎言和花招，困扰着大学。自我原谅的托词是，大学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农民和工业，有助于国防。当然，大学起不了这样的作用。有人进行这样的辩护时，你和我都能够闻到臭鱼烂虾味。文化和这些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文化是用来训练人的，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需要多少信息，以便使自己得到平衡和比例协调的感觉，使自己不受狂人的干扰。狂人说什么呢？狂人会说：如果他不多学一点地理、历史、经济、理科什么的，加拿大就要输给俄国。文化和个人的能力有关。他要能够评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他要能够在恰当的时候迈出恰当的步骤。在这一点上，现代文化的悲剧出现了，因为商业主义的发明摧毁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因为外部环境过分的组织化导致了我们的缺乏思想的组织化。”^[61]“人们模模糊糊地怀疑，这种对科学的迷信是否完全是一种健康的势头——就事论事的、有增无减的知识渴求，总体上只能使人类退化，使人不舒服。从眼前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看是这样，从随之而来的物质生活的后果来看，也是这样的。”^[62]“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功利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只不过是幻想力的虚构。它很可能是我们致命的愚蠢，这样的错误总有一

天会使我们走向灭亡。”（尼采语）

也许，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可以用社会科学来说明，我对其情况略知一二。浩如烟海的统计数字摆在社会科学家的面前，他被迫去解释并去发现模式和趋势，以便能够预测未来。凭借精细的计算器和数学技巧，他能够提出对策，供工商业和政府使用。不过，精细计算的预设是短期的预测。社会科学工作日益关注专题研究，社会科学部门成了新闻学校。经济理论在时间观念的处理上，在寻求动态和静态研究法的妥协中，遇到困难，这反映了西方文明对时间因素的忽视。耐人寻味的是，凯恩斯竟然会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凡人皆死，我们对其他一切均无兴趣，我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为了近在眼前的未来而生活。计划仅仅是一个用于短期的字眼——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规划是值得怀疑的，那只能是规划师的事情。波拉尼^①对我们这个两难困境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自由放任政策是规划出来的，计划却不是规划出来的（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is not.）。”其结果显而易见，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人民都要求政府搞批发商似的一揽子活动。于是，周期性的商界奢靡之风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的协调一致的政策。由于缺乏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军备支出。

与广播这个新媒介同时兴起的集中化倾向，迫使规划在其他方向作有限的扩展。保护自然资源，政府对铁路和电力的所有权（比如加拿大的情况和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及洪水的治理，都能够说明对时间问题的关切正在日益增长。然而，这些行为，主要还是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的结果。对2000年西方文明地位的关切，是难以想象的。对1984年的关切，仅见于讥讽和乌托邦^②，可是这种暴政并不符合北美的真实情况。不错，曾经有人试图估计未来的人口、电力储备和矿产资源。但是，其预测重点总是搁在科学资源上，总是关心所得税、财政政策或别的什么对策所决定的资源储备。执著于当前的心态，排除了对时期和时间的思考。莫利（Viscount Morley）描写过这样的危险：“用最狭隘的政治观点取代其他一切思考人类事务进程的办法，把局限于处理紧急事务的办法上升到处理问题的一般原理，这样的趋势是危险的。我

① 波拉尼（Carl Paul Polanyi），匈牙利经济学家、政治领袖，后移居英国和美国。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经济学家，他关注的是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关注总体观念的演变。代表作有《伟大转变》、《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等。

② 寓指政治讽刺小说《198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49年发表的作品，描写未来的极权主义国家，影射当时的苏联。

们的信心日益萎缩，这是由于我们的心绪总体上受到了影响。它给我们造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从头到尾削弱我们的判断力，从政治到道德、哲学、艺术、宗教都是这样的。”^[63]

国家对时间的垄断日益受到削弱和损害，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对科学的诉求，如美国人追随牛顿数学，对平衡感兴趣，强调平衡，或者追随达尔文思想，强调发展、竞争和适者生存，都支持这种关切。逃避国家监察的企图，在遗产继承税、公司法、反康采恩立法的面前，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挫败。有限责任公司的原理，有时间保证的长期租赁等手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满足了连续性的技术要求。但是这些原理和手段成为国家积极干预的基础，国家的干预手段就是征收所得税。除了一般性政策之外，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对未来资源的利用，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贪婪的价格政策牺牲了无数的发展机会。一个垄断企业试图以合理的利润求得发展，而不是获取最大限度的眼前利润。^[64]市场和交换的组织促进了对预测的判断和详细的核算；反过来，详细核算又对眼前的生产产生影响；而眼前的生产又企图提供连续性和稳定性。然而，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局限性总是不断增加。在商务的周期变化及其对刚性时间的破坏中，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均势垄断终于被大萧条打破，它不得不让位于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垄断。时间垄断的消失加速了国家控制的扩张，加速了新宗教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就是显著的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显著的证明。

在对时间的执著里，存在着普遍的焦躁。这种焦躁情绪使人尝试用各种方法恢复过去文明中的社区观念。对经济史家、行会社会主义者(guild socialists)和哲学家，尤其是对阿奎纳感兴趣的哲学家，中世纪似乎具有吸引力。“为培育形式而培育形式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共同特征，虽然它们是互相排斥的：浪漫主义凭借与现实的距离来培育形式，古典主义则通过顺从传统来培育形式。”^[65]也许，我们陷入了瘫痪的状态，而且对持久性已经提不起兴趣。也许，只有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太愿意对拜占庭帝国进行评估。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讨论俄国政府的先驱形式。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传统关心的是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希腊人建立起来的社区意识，有一个设定的关注点，那就是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不是“一系列互不关联的稍纵即逝的几个闪光点”(凯恩斯语)。吸引罗马人和西方基督教的却是这种一系列的闪光点。“陈述的直接性是平稳构建的天敌。正如情绪的节奏一样，灵魂的基本而热烈的成分产生的

表达方式往往是不连续、不平衡的。”^[66]存在着这样一种“平行现象。在一切艺术中，产生了偏离需求的运动。无论这种需求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人们都感觉到这种运动，并尊重这种运动：渴望某种形式上的连续性”^[67]。追求形式上连续性的努力，暗示着独立于学校、时尚和表达方式的压力。用卡扎米安（Cazamian）的话来说，文学艺术的生产活力，具有不确定的持久性。它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把作家或读者应该充分享受的权利还给他们。^[68]

温德汉姆·刘易斯说明，时髦的头脑是不考虑时间的头脑。传播学发展的结果，反映在柏格森^①、爱因斯坦、怀特海、亚历山大^②和罗素的哲学之中。柏格森推崇此刻的生命，他不提超越此刻的时间，他不说绝对价值或普世价值。^[69]现代的“职员”“考虑一切事物时，仅仅是把它们当作时间里的存在物来考虑。换言之，就是把它们当作一连串具体的状态组成的序列，当成一个‘生成’的过程，或一段‘历史’；从来不把它们当成超越时间的永恒状态，不把它们当成一连串不同的状态之下表现出来的状态”。威廉·詹姆斯写过这样几句话：“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竟然争辩，谁最鄙弃具体的知识，谁最崇尚最一般的知识。这实在是难以理解。因为毕竟最值得尊敬的知识，是有关最有价值的现实的知识！况且，还有什么有价值的现实不是具体而独特的知识呢！”^[70]从柏拉图到康德，思想的形态给存在赋予超越变化的神圣色彩，可是这个思想形态却被宣判为堕落的东西。当代人的这个态度，既不能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又不能鼓励个人行使自己的意志。追求权力感和自由的本能，被证明代价太高，取而代之的是虚假的民主独立性。^[71]民主在政治上的实现形式必然鼓励催眠师。^[72]行为主义者和心理测试师我行我素。还是引用他们之中一个人的话吧：“假如我们把战争中学会的人类工程学直接的还是间接地迁移到民用机构与活动中去，我们会洪福齐天。”^[73]这样不讲策略的愚鲁，如此冒犯我们的良好感觉的言论，正在对心理学家这门职业构成危害。生活在此刻，为此刻而生活，其实质是驱逐个体生存的连续性。^[74]施宾格勒^③所谓浮士德^④的西方，是生活在

①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20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生命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创造进化论》为其代表作之一。

② 亚历山大（Harley Burr Alexander, 1873—1939），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

③ 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哲学家，认为任何文化都有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代表作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④ 浮士德（Faust），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术士，为了获得青春、知识和魔力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歌德曾经创作同名歌剧。

思想和历史中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西方与其他“非历史”的重要文明构成强烈的反差。对希腊远古文明的仇视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希腊人的思想是非历史的，缺乏透视点的。^[75]在艺术中，古典时代的人热爱的是造型艺术，浮士德式的人热爱的是音乐^[76]。雕塑成为音乐的牺牲品。^[77]

视觉和触觉的分离，对这两种感官的不同处理方式，既产生了主观的分裂，也产生了外界的分裂。^[78]一方面，我们必须逃离对此刻的执著。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著。摆脱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培养我们对文化活动的兴趣。

倘若在欧洲大陆这所大学 150 周年校庆之际，本文能够引起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注意，其目的已经达到。周年纪念使我们想到时间的重要性。用多少年代来计算时间的方法是可能起误导作用的办法，就像统一在 65 岁退休的规定不那么人道一样，因为它不尊重生理年龄的差别。尽管如此，这种计算方法还是引起人们关注被忽略了的时间因素。也许，大学比希腊化时期的文明还要古老，也许它反映了它得以繁荣的那个文明的特征。但是，在它与宗教和政治组织的关系中，文明与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都有关系。结束本文最完美的办法，是诉求于《圣经》：“人无远见，必死无疑（Without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注释】

[1] A. D. 和 B. C. 的使用显然开始于 18 世纪。希腊化的理性主义可以说持续了 700 年，接着又黯淡了 1500 年。“人类历史上可以进行归纳的最长的时期，总体上说，是思想道德的黑暗时期。” Julien Benda, *The Great Betrayal* (London, 1928), p.159.

[2] 历史“有堕落的危险。它可能从广泛扫描人类社会的伟大时期货物大运动，堕落到堆砌无数鸡毛蒜皮的事实，枯燥无味的知识和轻浮好古癖” (Morley in 1878)。Emery Neff, *The Poetry of History* (New York, 1947), p.193.

[3] P.A. Sorokin and R. K. Merton,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LII, 1936—1937.

[4] 丘吉尔说：“一般地说，日本人的谋划很严密；如果其计划不能按部就班执行，他们往往会放弃目标。据信，其主要原因，是日语的性质不灵活、不精确，在符号交流中，要它来一点即兴发挥，是极其困难的。”

[5] R.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ed. G. Gurvich and W. E. Moore (New York, 1945), pp.387~388.

[6] H. W. Garrod, *Scholarship, Its Meaning and Value* (Cambridge, 1946), p.42.

[7] 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Philosophy, Science, and History since Hegel*, trans. W. H. Woglom and C.W. Hendel (New Haven, Conn., 1950), pp.170~173.

[8] Leslie Stephen,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876), I, 458.

[9] 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Philosophy, Science, and History since Hegel*, p. 277.

[10] Ibid., p.251.

[11] see H. and H. A. Frankfort, J. A. Wilson, T. Jacobsen, and W. A. Irwin,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n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1946).

[12] Harold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Oxford, 1950).

[13] Cited by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New York, 1937), p.16.

[14] See J. T. Shotwell, "The Discovery of Tim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1915, 198—206, 254—316. 他认为, 数学使时间成为可能。See F. Thureau-Dangin, "Sketch of a History of the Sexagesimal System", *Osiris*, VII. 苏美尔人的60进位制是10乘6演绎出来的。巴比伦科学的弱项在几何, 希腊科学的强项却正是几何。希腊人在天文学中学到60进位制, 发现了印度教徒的“零”数。

[15] J. T. Shotw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New York, 1922), pp.43~44.

[16] 显然历法是由巴比伦人的主神马杜克安排, 由两河流域的统治者掌握的。Frankfort et al.,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n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181.

[17] Ibid., pp.23~25.

[18] J. T. Shotw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p.45.

[19] 在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中, 对时间新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所做的事情并不会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淡漠, 伟大的著作也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盛誉。这些著作既有希腊人的成果, 也有蛮族的成果”。又见修昔底德为何要写历史的论述。

[20] See J. K. Fotheringham, "The Metonic and Callipic Cycles",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LXXXIV 384; also B. D. Meritt, *The Athenian Calendar in the Fi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28), pp.72, 102, 122, 126.

[21] 历法由大僧团控制。一年之中可以集会的日子有 192 天，再扣除集市日（罗马人一周 8 天，最后一天是集市日）和四时节令的运动日之后，只剩下 150 天。每两年闰二月，使线性年（linear year）和太阳年协调。不过，在公元前 2 世纪僧侣得到任意安排闰月的权力。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任意修改用作立法、公共合同等活动的行政年。恺撒制止了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加上一些用于开会的办公日（*dies fasti*）。See L.R. Taylo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 Calif., 1949), pp 79~80.

[22] Franz Cumont, *Astrology and Religion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New York, 1912), pp.162~165.

[23] J. G. Frazer, *Adonis, Attis, Osir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 Religion* (London, 1906), p.200.

[24] R. L. Poole, *Chronicles and Annals: A Brief Outline of Their Origin and Growth* (Oxford, 1926), p.26.

[25] R. L. Poole,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pal Chancery Down to the Time Innocent III* (Cambridge, 1915), p.38.

[26] See R. L. Pool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n the Middle Ag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

[27] A. P. Usher,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New York, 1929); also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28] M. P. Nilsson,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ondon, 1920).

[29] L. T. Hogben, *From Cave Painting to Comic Strip* (London, 1949), pp.103 ff.; see also Etienne Hajnal, "Le rôle social de l'écriture et l'évolution européenne", *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1934.

[30] 拜占庭帝国的政策对法国也产生了影响。南特敕令受到的支持，表现在雅克·奥古斯都（Jacques-Auguste de Thou, 1533—1617）的宽容精神中。他在《上帝时间史》中说，教皇 526 年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呼吁不要迫害阿里乌教徒。See A. A. 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the Great* (Cambridge, Mass., 1950), pp.220~221.

[31] C. H. 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Ithaca, N. Y., 1940), p.124.

[32] See Benjamin Farrington, *Head and Hand in Ancient Greece: Four Studies i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ought* (London, 1947).

[33] N. S. Timashef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 (Cambridge, Mass., 1939), p.207.

[34] Coulton Waugh, *The Comics* (New York, 1947).

[35] Archibald Forbes, *Souvenirs of Some Continents* (London, 1894).

[36]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New York, 1934), p.27.

[37] Cited by L. M. Salmon, *The Newspaper and the Historian* (New York, 1923), p.29.

[38] Brand Whitlock, *Forty Years of It* (New York, 1925), p.157.

[39] Matthew Josephson, *The President Makers, 1896—1919* (New York, 1940), p.145.

[40]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Fighting Years: Memoirs of a Liberal Editor*, (New York, 1939), p.151.

[41]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p.173.

[42] Wyndham Lewis, *Time and Western Man* (London, 1927), p.28.

[43] John Maynard Keynes, *Two Memoirs* (London, 1949), pp.96~97.

[44] J. B. Bury,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London, 1928), p.227.

[45] W. R. Inge, *Diary of a Dean, St. Paul's 1911—1934* (London, 1950), p.193~198.

[46] 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Growth* (London, 1920), p.175.

[47] William Albio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1939), p.220.

[48] S.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Princeton, N. J., 1947), pp.297~298.

[49] Amiel, *Journal intime*, June 17, 1852.

[50] Ilka Chase, *Past Imperfect* (New York, 1942), p.236.

[51] George Gissing,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London, 1914), p.287.

[52] Norman Hapgood, *The Changing Years: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30)

[53] E. L. Godkin, *Reflections and Comments, 1865—1895* (New York, 1895), p.157.

[54] Ibid., p.202.

[55] *The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 ed. D. D. Paige (New York, 1950) p.xxiii.

[56] Ibid. p.338.

[57] George Gissing,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p.70.

[58] Ibid. p.178.

[59] Henry Adam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 (New York, 1919), p.206.

[60] 比如,有人说“精神活动之所以受人尊敬,那是因为它有用处,仅此而已……因为喜欢科学的成果而喜欢科学的人,是对上帝最不可饶恕的亵渎”。Benda, *The Great Betrayal*, p.121; 学者的失败“开始于他声称使用的那一时刻”。

Ibid. , p.151.

[61] Albert Schweitzer, *The Deca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 (London, 1932), p.32.

[62] Thorstein Veble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9), p.4.

[63] John, Viscount Morley, *On Compromise* (London, 1921), p.6.

[64] J. M. Clark, *Alternative to Serfdom* (New York, 1948), p.65.

[65] E. E. Kellett, *Fashion in Literature* (London, 1931), p.282.

[66] Louis Cazamian, *Criticism in the Making* (New York, 1929), p.72.

[67] Ibid. , p.64.

[68] Ibid. , p.129. 小说家斯摩莱特 (Smollett)、菲尔丁 (Fielding)、斯特恩 (Stern)、里查森 (Richardson)、笛福 (Defoe) 和伦敦土话艺术家霍加希 (Hogarth) 都一致感觉到, 他们与“早期的新闻业关系亲密, 和新闻界对时间感觉相同, 觉得时间是一连串离析的时刻。他们都不固守自己的感觉, 都持有新闻界‘具体’的观念, 所谓具体寓于具体感觉到的实体或事件之中”。Milton Klonsky, “Along the Midway of Mass Culture”, *Partisan Review*, April, 1949, p.351.

[69] Lewis, *Time and Western Man*, p.27.

[70] Benda, *The Great Betrayal*, pp.78~80.

[71] Lewis, *Time and Western Man*, p.316.

[72] Ibid. , p.42.

[73] Cited *ibid.* , p.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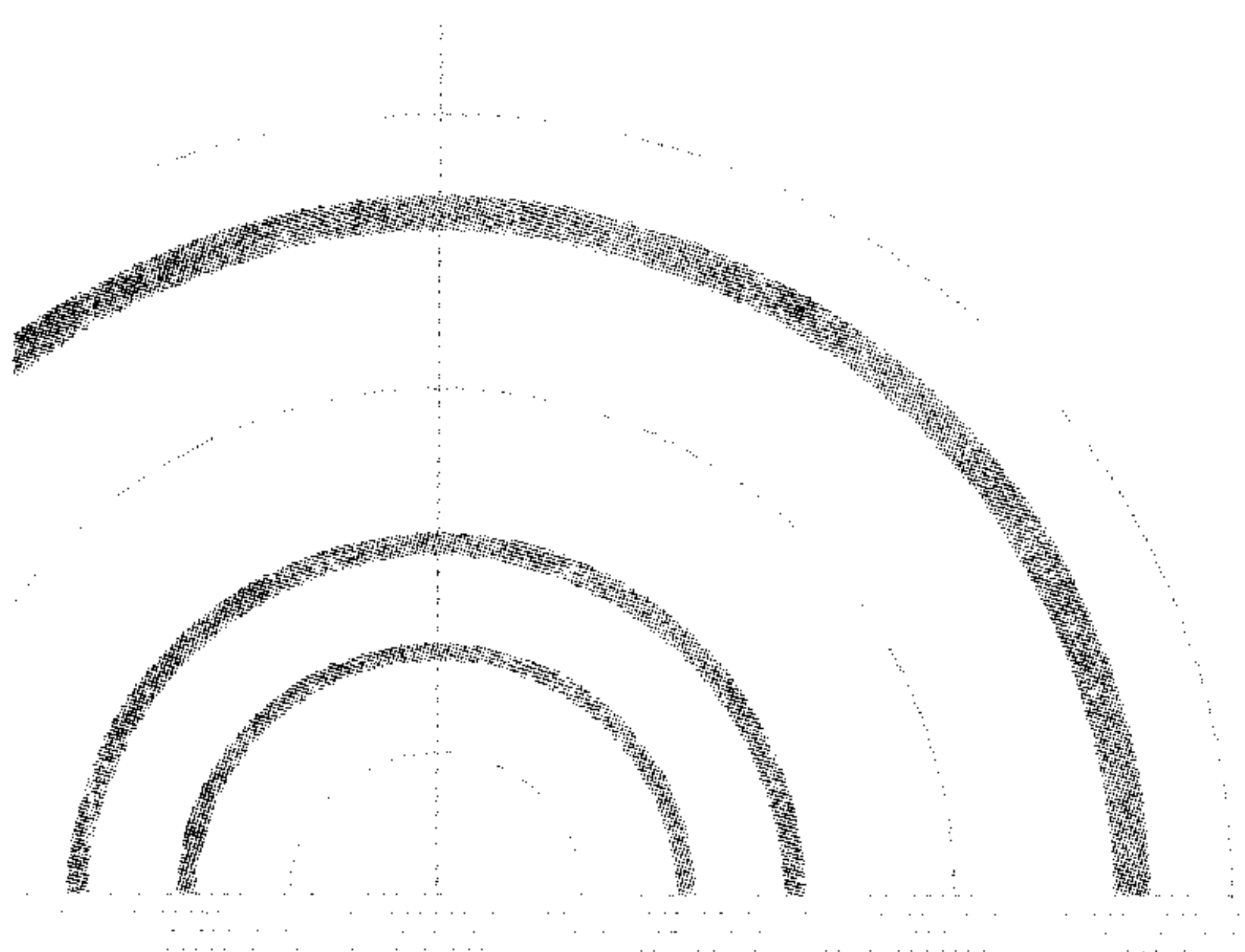
[74] Ibid. , p.29.

[75] Ibid. , p.285.

[76] Ibid. , p.295.

[77] Ibid. , p.299.

[78] Ibid. , p.419. 关于印刷对音乐的影响, 见 Constant Lambert, *Music Ho! A Study of Music in Decline* (London, 1934).



第四章

空间的问题

“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1]高斯认为，数是头脑的产物。相反，空间在头脑之外有一个外在的现实，它的规律是不能先验地加以描绘的。卡西尔说，在思想的历史上，尤其是数学史上，“有的时候，空间观念领先；有的时候，数字的观念领先”^[2]。

对空间和时间的关注，似乎是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发轫时期的特征。在这两个地区，从前王朝社会到王朝社会，或者说到有明确纪年社会的转变，似乎与文字、宏伟建筑和雕塑出现的时间相偶合。在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似乎是明显的季节性农业的产物，这种季节性与河水的泛滥有关系。

长长的尼罗河从南到北，其洪流消散在河口三角洲无数的河道之中。这就给建立人工渠道和堤防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这些工程拓宽了河谷，在洪水高位时拦截洪水，以利灌溉。漫长的河流，广阔的三角洲，对单一运输线的依赖，以及与此相关的游移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

削弱了严密的政府和稳定的政治组织。^[3]

也许，王权的兴起是为了适应统一行政管理需要。^[4]从公元前4241年7月14日出现了对时间的计量开始，王权可能就得到了加强。在那一年，埃及人观察到天狼星在黎明时升起，明白了一年有365天，推算的时间更加准确。公元前3400年之后，上埃及的国王（鹰家族的首领）征服了下埃及，南方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美尼斯国王定都提尼斯，以便巩固上下埃及的统一。三角洲和北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公元前30世纪初，孟菲斯取代提尼斯而成为首都，它的位置远离作为宗教中心的太阳城，这反映了北方地区和三角洲正变得日益重要。为了适应领土的扩张，保持王权的连续性，许多规定应运而生，以加强国王的威严和权力。国教由此而产生，寺庙拥有大量的财产，宗教仪式繁复，僧侣阶级形成，亡灵日益受到重视。第四王朝定都孟菲斯^[5]，开始修建金字塔，以便“给国王提供一个庞大的、无法进入、无法毁坏的安息之地”，以反映“一个驾驭一切的头脑所造就的、深远而全面的中央集权”^[6]。死亡的永恒性通过不死的观念、遗体的保存、墓室中的题记（用象形文字将咒语的魔力永远固定下来），成为连续性的基础。侍臣的墓地簇拥着国王的金字塔。他们分享国王神圣的荣光，最终和国王成为一体，他们的神性一半来自国王，一半来自自己。他们掌管着大批有组织的劳动力，其显著标志是一座雄伟的金字塔。该塔每边长755英尺，占地13英亩，高481英尺，用石料250万块，每块石料重2.5吨，修建时并无滑轮之利。

修建金字塔的巨大经济消耗，使太阳城掌管太阳神拉（Ra）崇拜的僧侣能够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在这一点上，由于前王朝时期的太阳神霍露斯（Horus）受到轻慢，僧侣的地位反而有所加强。第四王朝崩溃，继之而起的第五王朝约建于公元前2750年。其国王被认为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们的肉身。尽管依靠了金字塔这种设施，世袭制度作为王权绵延不绝的基础，还是有局限的。这说明，宗教崇拜不但作为控制时间的核心是有效的，作为控制空间的核心也是有效的。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不具备第四王朝国王的绝对权力，其特点是非集中化，地方贵族的独立性显著增加。文职官员掌握了僧侣文字，并拥有莎草纸产业的支持。在5个世纪里，他们把农业生产推向了更高的水平。但是，高度集中化的官僚体制使有学问和无学问的人产生了阶级分化。在非集中化的官僚体制中，行政管理的要求增加，书写的艺术受到鼓励，正字法得以确立，文官制度为中产阶级敞开大门。在中王国时期的第12王朝，贵族的权

利和特权经过调整，以适合国王的集权。

到第 12 王朝，太阳神阿蒙－拉（Amon-Ra）成为正式的主神，国王的权力下降。同时，权力中心向南方转移。到了公元前 22 世纪中叶，首都从孟菲斯迁移到底比斯。奥西里斯（Osiris）神在人民中间取得了胜利，他是冥神和判官、极乐世界之王。国王和人民共享永生不死。大众的权利也就是大众的宗教仪式。^[7]永生不死的信仰成为埃及军队的力量源泉，正如后来的德鲁伊特人^①和穆斯林一样。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一种稳定的组织出现，中王国取代了古王国。

集中化的官僚政体力量衰落，金字塔反映了对时间控制的强调，对空间的重视转移到对连续性和宗教的强调。文字普及，莎草纸出现，咒语从金字塔中的象形文字扩散到莎草纸书卷之中，从国王扩散到平民之中，这一切都反映了上述转移。对空间的控制因此而削弱，喜克索人从北方乘虚而入。雅赫摩斯一世动员新的资源，尤其是战马^[8]和战车，大约在公元前 1580 年赶走了喜克索人，恢复了对空间的控制。他把埃及变成他个人的地产，摧毁了中王国时期的非集中化官僚体制。到了第 18 王朝又出现了对时间的关注。与此同时，各地的僧侣都臣服于阿蒙神（Amon）的高级僧侣。公元前 1501 年，阿蒙神的一位高僧成为图特摩斯三世^②。公元前 1479 年，他在美吉多摧毁了喜克索人的军队。战马的使用意味着胜利，进攻战的胜利。这是用改进了的传播手段来巩固对空间的控制。埃及人企图建立的帝国，是一个关注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的组织。这个意图的实现，靠的是强大的僧侣和与异族结盟，例如，图特摩斯四世娶米坦尼王国^③国王的女儿，与其联姻，就是这样的结盟。

帝国向北部的延伸、空间组织的扩展、新民族的纳入，对首都底比斯的官僚体制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因为它地处南方。阿蒙霍特普四世^④决定迁都到北方的阿赫塔顿（Akhetaton）并根据其谐音将自己的姓氏改为阿克那顿（Ikhnaton），以争取受压的太阳神拉的支持。他试图摧毁象形文字的魔力，使口语和书面语更加和谐一致，然而阿蒙僧侣的影

① 德鲁伊特人（Druids），欧洲西部克尔特人中战斗力强的一部分人。

② 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前 1450），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在位 22 年，击败叙利亚强大的反埃及联盟，取得努比亚战役的胜利，征伐强大的米坦尼王国，使埃及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四面八方来朝贡。

③ 米坦尼（Mitanni），印度—伊朗王国。

④ 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宗教改革家，立阿顿为新国家主神，迁都至新建的阿赫塔顿，后根据其谐音改姓氏为阿克那顿。

响还是占了上风。他的继任者图坦卡顿（Tutenkhaton）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图坦卡蒙（Tutenkhamon），并将首都迁回到底比斯。

公元前 1350 年，第 18 王朝结束，阿蒙僧侣复辟，首都迁回底比斯，这个南方首都的诸多不便日益明显。军事首领出身的哈姆哈比（Harmhab）国王试图扭转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后继的几位国王通过协定和联姻，和赫梯人作出了一种共管的安排。这和公元前 1289 年至公元前 1260 年间与米坦尼人建立的关系有相似之处。阿蒙僧侣实现了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据估计，寺庙控制了 $1/5$ 的人口和 $1/3$ 的可耕地。帝国对空间的控制遭到削弱，帝国版图缩小。公元前 945 年至公元前 745 年，埃及受入侵的利比亚人统治。公元前 668 年，亚述人洗劫了埃及首都底比斯。在依赖尼罗河所必然要面临的困难中，埃及文明没有能够在两种倾向——倚重金字塔的石头和倚重莎草纸和象形文字——之间求得平衡。

与尼罗河流域集中化的倾向相反，虽然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两河流域具有支配地位，但是其泛滥却没有规律，也难以预计。黏土在此地位突出，整个流域土壤肥沃，没有埃及那样独特而永恒的石砌的丰碑。国家的影响呈离心趋势，其经济呈分散状态。每个城市与其砖结构的寺庙共同构成一个居住区。虽然其性质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但是其本质是神权统治。神是神权及其属地的象征。每个以寺庙为中心的居住区都是一个神的属地，若干个这样的居住区组成一个城邦。这个城邦就属于其中拥有最大属地的那位神。它的高僧就担任行政长官，负责把各个社区合为一体。这些社区是按照连续性和时间组织起来的。人口的增加，设施的改善，金属工具的推广，使田地连成一片，冲突随之发生，空间问题抬头，王权应运而生。^[9]王权由短暂走向长久。在势力最大的寺庙的高僧辅佐之下，国王实行了最有力的领导^[10]，国王这个血肉之躯被赋予了神授的自由，由于受到该市庇护神的挑选而享有神圣的地位。他就根据这个神授的权威施政。城邦之间和各城主神之间的冲突，由众神大会来决定。这个大会把国土的世俗统治权赋予一个又一个的城市。^[11]

军事手段对解决一个社会的时间问题，有其局限；统一对于开发精心布局的灌溉系统，却显而易见。阿卡得人征服苏美尔并建立帝国，在其开国君主萨尔贡的统治下，空间问题得到暂时的缓解。在君主政体和版图辽阔的帝国，富有个性的立法取代了宗教性城邦的地方习俗。阿卡得语取代了苏美尔语，不过宗教的力量继续表现在苏美尔语的文字之

中。^[12]这两种语言成为两种迥然不同的载体文化，其摩擦给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可或缺的灵活性。

大型政治组织的经济优势与活力表现在新的艺术自由之中：浅浮雕突然出现，作为表现物质现实的载体；治印章的工匠被解放出来，不再受到神权政治眼光的束缚，也不再受市场过分需求的束缚。^[13]政治组织的连续性问题在宗教城邦的韧性中表现出来，在维持王朝血统的困难之中也表现出来。在古蒂（Gutium）的入侵面前，这个政治组织灰飞烟灭，并且最终被乌尔城（Ur）的苏美尔王朝取代。苏美尔文化的代表是寺庙、图书馆和学校。神权政治的苏美尔城邦被置于本土国王的统治之下。他们从过去的征服者手里学到了文官制度。宗教垄断时间和连续性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一种司法行政制度的发展而受到抵消。大约在公元前 2450 年，乌尔城的这个苏美尔王朝把许多阶级从僧侣的压榨下拯救出来。

他们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办法受到传播媒介的性质的影响，即黏土的影响。黏土从一开始就迫使象形文字转向符号和楔形文字。反过来，这些符号和楔形文字又经过修正，以适应数学、会计和文字发展的需要。这些对于寺庙社区的经济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受时间垄断支配的文明具有其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数学发展中暗示着的抽象观念。在处理日常事务中，文字和数学的关系刺激了数学思辨，于是苏美尔和阿卡得人的国土就成为代数的摇篮。这个文明的局限性反映在政治组织和空间控制所面临的问题中。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后半期，已经可以见到无数的合同、收据和协议，文书增长了“一千倍”^[14]；治印章的人对设计失去兴趣，他们看重的是仪式的场面，把仪式当作最重要的图像成分进行处理。这一切都耐人寻味。

历史再次证明，这样的政治组织无法抵挡外族的侵犯。汉穆拉比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定都巴比伦。公元前 1600 年，赫梯人又摧毁了巴比伦。接着，喀西特王朝^①得到了相对的稳定。经过苍天神安努^[15]和风暴神恩里尔召集的诸神大会，马尔都克^②被推举为巴比伦的主神。安努能够影响整个宇宙，而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恩里尔是力量的代表，他把社会界定为国家。^[16]各个城邦的神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体的束缚，政治统一的趋势通过最暴烈的措施而得到认可。征服者作为

① 即巴比伦第二王朝。

② 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

风暴神恩里尔在世上的代表，成为城邦的仲裁者和判官。^[17]他凌驾在神职人员之上^[18]，任命高级僧侣，受推举成为诸神的仆人。诸神是人的绝对主宰，人生而为神的奴仆^[19]，阐述神的意志。^[20]在新年庆典中，唱主角的是神，国王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

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21]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通过对国王在位年代的计算，对时间的控制也得到加强。苏美尔人的语言成为神圣的语言，成为宗教和连续性的力量源泉。在这一点上，它和征服者的语言截然相反。征服者的语言关注的是空间问题和司法行政问题。国王和主神成为法律和秩序共同的源泉，不过法律摆脱了宗教的羁绊，法官成为世俗的权威。以抄书为生的文书先生代人起草合同，成为专职的公证人，他们未必和寺庙有任何关系。^[22]汉穆拉比法典铭刻在石头上。一个庞大而有效的政治组织，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

巴比伦僧侣位高权重，这表现在公元前 747 年那波勃来萨王朝的建立，以及月亮大周期的发现中。他们发现，每过 18 年又 11 天，月亮回归到那个与太阳相对的几乎完全相同的位置。^[23]天象周期性的发现大大加强了宗教的地位，使之对时间和连续性的控制更加牢固。公元前 729 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① 成为巴比伦国王；在巴比伦的万神殿中，阿舒尔取代马尔都克成为主神^[24]；亚述国王每年到巴比伦来祭神。^[25]公元前 722 年，萨尔贡夺取王位，在杜尔－夏鲁金修建了一座行宫，又盖了一座图书馆，以抗衡巴比伦僧侣的影响。其儿子西拿基里继续扩大该图书馆的资源，还修建了另一座行宫。他和巴比伦僧侣的关系难以维持，一怒之下把巴比伦夷为平地（公元前 689 年）。但是，西拿基里的儿子以萨哈顿又被迫重建巴比伦。亚述国王巴尼拔^② 征服埃及之后，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规模迅速扩大。公元前 625 年，巴比伦土著人的尼布甲尼撒王朝摆脱了亚述人的枷锁，他的后继者是尼布甲尼撒二世^③。最后，拿波尼度^④ 试图引进新神时，引起了僧侣的对抗，这就给波斯人以可乘之机，导致了公元前 539 年波斯人的入侵。公元前

① 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前 727），亚述国王（公元前 745—前 727），改革行政制度，扩展领土，政府巴勒斯坦攻占巴比伦，控制整个两河流域。

② 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 668—前 626），亚述末代国王。

③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公元前 605—前 562）巴比伦国王，在位时修建了巴比伦塔和空中花园。

④ 拿波尼度（Nabonidus），巴比伦国王（公元前 556—前 539），公元前 539 年被居鲁士俘获，逐出国门。

536年，居鲁士（Cyrus）成为波斯帝国国王。国王又成为社会和神的中介，两河流域的统治者被搁置一边。这种行政管理机构，又继续下去。^[26]

埃及的国王享有绝对权威，他养成了对来世和永生的兴趣。与之相反，由于宗教的重要性，苏美尔和巴比伦僧侣对后世毫无兴趣，他们关注的是把知识系统化^[27]，他们偏重的是秩序和法律。在这里，宗教的重要地位，使僧侣顶住了剧烈的变化，迫使征服者承认连续性的重要地位。巴比伦条理化知识的重要性，迫使亚述人在新首都也倚重图书馆。另一方面，僧侣对新的征服者的适应力，又使宗教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这给帝国的持久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空间垄断和时间垄断，倚重首都和闪米特语的垄断与倚重建筑和泥版文字的垄断，蛮族入侵者和被入侵的先进文化——在所有这些关系的妥协之中，埋藏了终极的不稳定和相互调整。不同语言保留下来，这就阻止了文化的相互侵蚀，有利于政治和技术的调节。

文字传统给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留下了强烈的印记。从埃及人对口语的强调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口头传统。中近东使用楔形文字的抄书人，不断剔除过时的拼写和语法，系统修正文书。这突出说明，人们对文字越来越熟悉。^[28]他们非常细心地抄写宗教和世俗的文书。闪米特人处在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之间，他们修正埃及人的文字，以适应广泛的口头传统。字母表应运而生，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流传。^[29]为了便于重复计算和强化记忆，新的手段发明了，包括结绳。^[30]记忆辅助手段开始于勤快的重复，继后又开发出韵律和押韵，还有结绳记忆法，最后是书写之中的记忆术。^[31]文字作为最彻底的革新，享受着宗教的庇护。摩西奉上帝之命，发明了写的艺术。根据犹太学者的记述^[32]，在去世之前，摩西把《托拉经》^①加以简化，抄写成13部经卷，给12个犹太部落各一部，剩下的一部给了利未人的部落。最后这部《圣经》用于校勘，以防止口头传统随着长老的死亡而湮灭。这部托拉经并非意在实用，实际上是封存起来的，直到公元前622年乔赛亚发现《律法书》（Book of Law）为止。大约在公元前444年，埃兹拉将《托拉经》正式出版。但是，500年之后，人们还能够一口气背诵整部经书。在埃兹拉的时代，犹太人说的是阿拉姆语，但是《旧约》的前5卷还是用希伯来语背诵的。这5卷书成为神圣的经书。口头传统的延续，包含了预言和

① 《托拉经》（Torah），即希伯来《圣经》。

先知的启示。每个字都具有深刻的涵义，充满神秘和魔力。借助音韵和韵脚背诵并保存下来的语言，后来就成了诗歌。^[33]文字和经书联系在一起，就成为神圣的东西，成为权威的原则。

移居巴勒斯坦之前，以色列人的一些祖先，大概已经在埃及生活了几百年。^[34]占领迦南之后，一首史诗的内核大概已经拓宽，纳入了摩西的故事，而且和利未人及职业吟诵诗人的叙事诗结合起来。希伯来字母表用墨水书写，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已在普遍使用。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腓尼基已经在大宗地从埃及进口莎草纸。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联盟被菲利士人瓦解之后，这首史诗分别产生了北部和南部两个文本，以色列北部的史诗叫做第十史诗，南部则将之简称为史诗第五。到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两部史诗的校勘本合而为一。^[35]传统的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相比较，其本质是更加始终如一、合乎逻辑，因为它可以经常不断地迁移、提炼和修正不符合传统的那些成分。^[36]在口头传统的积累效应中，宏伟大厦的构件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被拼装成不同的传说。事实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变得松散，离开了原来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在幻想、激情、偏见、宗教假设和审美本能的作用之下，故事一次又一次地被加工和塑造。^[37]口头传统也许传播了黛博拉、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的诗篇，传播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等部中的许多内容，以及《列王纪》中部分内容，还包括《先知篇》。《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中的许多东西，也许是公元前10世纪写就的，虽然其形态属于公元前7世纪。^[38]《先知篇》的大多数内容是文集，据信是先知的预言，经过口头和书面的流传，被搜集编订在一起。以色列人以戒律形式出现的律法不容置疑，因为它们是耶和华的意志。这样的律法独特而有创意。文字的发明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因素。在定都耶路撒冷，削弱地方圣所之后，《圣经》的力量得到了强化。

口头传统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有一个隐含的命题，这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关切。“艺术家表现的是在空间中的共存，诗人表现的是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莱辛1810年在柏林大学的讲话）^[39]口头传统以摩西的名义反映了埃及的积极影响，其中包括：上帝是惟一造物主，上帝的名字叫耶和華，上帝是惟一的神，确立一神教的教义，承认上帝的国际性和宇宙性等等。埃及的负面影响，暴露在对“埃及宗教的一切外部特征”的反叛上。这些外部特征有：复杂、古怪的偶像崇拜，第19王朝时期魔力对日常生活的支配，自私地沉溺于来世生活的物质准备等。口

头传统中也有明显的希伯来成分。这些成分包括：上帝和崇拜者的密切关系，其表现是取名和祭礼、神与信徒之间的圣约、神在人间的表现、神与风暴山川的联想。^[40]希伯来人是迁徙的民族，他们被迫放弃神固定在一个特定地点的观念，而且提出了耶和华和及其选民建立圣约的观念。

菲利士人占有垄断铁的优势。面对他们的进攻，以色列人的结盟原则被国王的推选制度取而代之。他们首先从力量最弱、位置最居中的本杰明部落中推举扫罗为国王。后来又推举大卫为王（约公元前 1000—前 960）。^[41]所罗门国王在位时的贪婪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一死，北方部落立即反叛。大约在公元前 925 年，南北两地分为两个以色列国。作为对世俗和宗教集权的反动，耶罗波安一世在贝瑟尔和丹恩为耶和华修建了圣所，目的是要抵消所罗门国王圣殿的影响，这个圣殿里安放了圣约中的挪亚方舟。^[42]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这两者之间求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在从依靠青铜器转向依靠铁器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动荡。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马拉车取代了人力车。公元前 14 世纪以后，叙利亚北部开始驯化并使用马。埃及国王麾下有一只战时能够迅速调遣的军队，他与辽阔领土上的官员和总督保持联系。这成为埃及帝国扩张的重要因素。^[43]赫梯人发现铁之后，由于它丰富而价廉，使青铜时代大约于公元前 1200 年就结束了。铁的使用，以及利比亚小体形马与亚洲高大体形马的杂交，使亚述人建成了骑兵部队，而不是战车部队。他们企图建立与时间组织相关的新型空间组织，但是在巴比伦和底比斯盘根错节的时间组织面前，这个企图不能得逞。公元前 612 年，尼尼微陷落，亚述帝国土崩瓦解。

亚述帝国崩溃之后，发生了政治重组。公元前 587 年至公元前 539 年，巴比伦人控制了耶路撒冷。接着，波斯人征服巴比伦尼亚，重建了类似于亚述人的政治组织。公元前 525 年，他们又征服了埃及。传播得到改善，驿道驿站修建起来，文字简化，征服埃及之后大量使用莎草纸，总督分区引起非集中化——所有这一切都使波斯人建立起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帝国。统治者对宗教组织的宽容是显而易见的。其表现是：公元前 538 年至公元前 522 年，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并且于公元前 520 年至公元前 515 年之间修建了圣殿。公元前 444 年，在阿塔泽克西兹一世^①

① 阿塔泽克西兹一世 (Artaxerxes I)，波斯阿契美尼亚王朝国王。

统治下，朱迪亚的自治总督尼希米^①使耶路撒冷圣殿的活动得到官方认可，将其载入僧侣的法典，并使之成为犹太教的标准。公元前397年，时任长老和律法家的埃兹拉，经国王授予特权，重组朱迪亚地区的教会组织。他“开创了犹大国自治和以神权统治的时期”^[44]。

早期波斯宗教与印度古经《梨俱吠陀》信仰相当一致。《波斯古经》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5世纪经过口头流传，大概在公元1世纪写成经书，到公元3世纪又形成权威的文本。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②宣讲福音，主张一个最高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该教废除献祭，净化崇拜仪式，把过去众多的波斯神贬低到鬼怪之列。主神具有善恶二元性，其下的天使等级分明、井然有序。主神还有一个人格化的对手。该教相信末日审判，死后赏罚。公元前2世纪之后，琐罗亚斯德对犹太教的影响一望而知。大约在公元前400年，阿塔泽克西兹二世废除了琐罗亚斯德的教义。^[45]时间组织上的问题加重了波斯帝国的困难，使之在公元前331年灭亡于亚历山大大帝手中。

希腊的口头传统和巴勒斯坦的一样，暗示着对连续性的强调。它创造了公认的标准、持久的道德和社会制度。^[46]它确立了社会组织的灵魂，维持其连续性。^[47]它形成了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口头传统和宗教的宗旨几乎相同。语言是口头传统的生理基础，宗教是确立传统的社会机制。宗教指导并实施人与人的合作，以谋求社区的利益。它维持群体的生活，造就一个持久的社会组织，使之独立于在世的领袖。^[48]教育包括了训练、培养和增强记忆力。专业的吟诵艺人是社会传统的承载者。他们的记忆取代了写作过程中的逻辑程序，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支撑沉重的词汇和复杂的语法，那是因为它借助韵文、音律和押韵，借助于大量的谚语。“诗歌是故事的链条。”（阿拉伯谚语）^[49]说过的东西不再修改，而是按照原作一字不变地硬背下来。在口耳相传中，眼睛、耳朵、大脑以及各感官之间都协同动作，在功能上互相引导、刺激和补充。^[50]

凭借耳朵的传播所关切的東西，隐含着一个预设的前提，这就是对时间的依赖。希腊的口头传统经久不衰，就隐含着对诗歌的依赖。而诗歌又与音乐和时间艺术产生密切的关系。^[51]口头诗歌可以回溯到本初的时间现实。诗歌形态需要一个有规则的灵活序列，像思想那样具有可塑性。诗歌再现了从媒介到对象的表现力的迁移。这个客观对象占据时

① 尼希米（Nehemiah），希伯来领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②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改革波斯多神教。

间，它在想象的王国里也同样需要秩序。人口的迁徙和征服削弱了地域对宗教的影响，加强了口头传统的重要性，提高了宗教对新地区的适应力。不同地区的感情色彩淡化，原始的观念和具体的取向被削弱。荷马史诗中的口头传统，反映了早期希腊社会的特性。^[52]《伊利亚特》反映的是君权，《奥德赛》反映的是寡头政治。奥林匹亚传统及其对哲学的影响，见诸对命运三女神和空间关系的强调。在习惯迁徙的民族之中，宗教庇护的地位比较虚弱，僧侣的影响比较有限。相反，在居所相对固定、使用文字的社会之中，僧侣的地位则比较高。

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它要求更高的效率。在这一点上，它比宗教组织对效率有更高的要求。希腊田园贫瘠，不适合养马，其武力依靠的是重甲步兵。公元前8世纪，这种兵法上的革命迫使世袭贵族依赖非世袭贵族。^[53]在军事妥协中，伊洛西斯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并入了雅典。于是，阿提卡两个分区的世袭贵族与伊洛西斯圣所分别代表三个地区，由三个执政官执政。在反对世袭贵族这个特权阶层的斗争中，德拉古颁布了法典。除了最高法院之外，他还建立了一个由非世袭贵族的重甲步兵组成的议事会。^[54]世袭贵族和伊洛西斯圣所表征的时间，被迫与其中的空间成分达成妥协。梭伦认识到时间成分即宗教成分。他把部落变成一个横跨地区的政治单位。^[55]他废除了债权人的个人债权，支持城市人口的流动，鼓励产业，于是外来移民纷纷拥入。^[56]以僭主庇西斯特拉图为代表的高地人和乡间阶级，被沿海人和平原人的联盟打败。但是，他们通过与沿海集团中的个别人单独结盟，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酒神获得了新宗教的钟爱。在新旧行政管理政权的间歇，僭主冒出来篡权。雅典是这样，其他城邦比如科林特（公元前657—前586）也是这样。新型的政权适合于对付经济困难和社会困难。后来，阿尔克迈尼翁家族在斯巴达人的帮助之下驱逐了僭主。该家族的克里斯梯尼和过去的奴隶及移民进入了公民的队伍，战胜了伊萨格拉斯。梭伦改革使一些望族如日中天。克里斯梯尼把各个部落人为地加以重组，企图借此使历史形成的三个地区趋向政治中立。他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得到庇护，借以抗衡被他抛弃的制度的宗教约束，由此避免了干涉宗教习俗的恶名。^[57]经过他干预，这个人为组织打破了地方主义，摧毁了对时间的控制。

德拉古法典的公布打破了世袭贵族对法律解释的垄断。梭伦改革打破了他们对政治公职的垄断。克里斯梯尼打破了他们对选区的控制，防

止了国家落入乡村阶级的手中。这些乡村阶级得到僭主的支持。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改革，意味着民众从世袭贵族手中夺取了最高法院的领导权。随着口头传统走向衰落，口头传统对时间的垄断也走向衰落。这表现在德拉古、梭伦和克里斯梯尼执政时世袭贵族和最高法院的削弱止。这里反映的问题是：空间问题日益重要，平民阶层兴起，文字得到普及。到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官吏的委任，空间成分占据了支配地位。阿波罗是可以适应罗马需要的。

与公元前5世纪这场革命同时发生的，是兵法战术的变化。城邦兴起，在吟诵艺术中成长起来的史诗传统开始陷入不断循环的境地。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任意插入诗行。由此产生了保护史诗，使之不被侵害的需要。^[58]口头传统的承载人，即史诗吟诵人和吟游诗人，抵制书面传统的威胁；而书面传统却借用文字来确保准确性。文字和准确性是宗教之必需。其成功之处表现在伟大的宗教书籍持久的显赫地位中。《圣经》、《吠陀经》、《古兰经》、《荷马史诗》就是这样的经典。公元前675年之后，培训史诗吟诵人的学校开始关注如何保存史诗和口头传统，它们抵制时代变革所产生的压力。伴随着准确勘定文本要求而出现的，是公元前7至公元前6世纪埃及人和西亚人对发掘古代宗教文献准确文本的兴趣，这主要是为了恢复古代的崇拜仪式。犹太国的抄书人回归摩西的传统，搜集和记录古以色列的史诗。搜求摩西传统的结果，是发现《旧约》中的《申命记》。公元前7世纪，腓尼基也兴起了好古之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希伯来文献中迦南文学的典故也如潮水扑面。在亚述和巴比伦王国，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2—前705）在他的文字中留下了大量的古语。亚述王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公元前668—前626）收藏了大量的图书，其兄弟巴比伦王国的国王沙斯度其努斯（Saosduchinus）用古代的苏美尔语发布文告。巴比伦尼亚国王拿波尼度对宗教复兴感兴趣。埃及赛斯（Sais）王朝的利比亚王子，第二十六王朝的诸位国王都有意识地恢复古代的诸神和崇拜形式，并企图恢复金字塔时代的传统。^[59]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宗教运动中，兴起了对诗歌抄本的兴趣，掀起了从口语向书面语转移的浪潮。也许，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作出的榜样，对这种兴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赫西奥德推动了公元前6世纪^①的宗教立法和严格的仪轨。梭伦提议用国家的名义编定文字准确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应为公元前8世纪。

的古代宗教文献，或许他也受到埃及赛斯王朝的影响。庇西特拉图成为僭主，并没有得到宗教的庇护。也许，他对勘定准确的文本也很关心。在公元前 566 年的泛雅典节日期间，史诗吟诵人举行了一场唱诗会。这就给搜集荷马史诗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他们用六音步诗行来表现荷马时代的口头文学。^[60] 俄尔甫斯和穆索斯^① 的诗歌，受到天启和神谕的先知的吟诵诗歌，表现严格的仪轨、预测未来的诗歌——都被搜集起来，笔录成文，并且得到阐释。做这个工作的，是有世袭贵族血统的人，他们由此可以把祖先法纳入城邦的框架之中。^[61] 耐人寻味的是，世袭贵族的湮灭和他们的适应能力差有关系，他们不能适应军事需要和空间问题。远征西西里的失败，打垮了他们拥有专业知识的傲气。自公元前 41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他们遭到传统的喜剧诗人持续不断的攻击。公元前 399 年梭伦改革之后，官方的注经人也许就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这些注经人被授予一定的权威，去阐释非正式立法的神圣法。于是，世袭贵族最后一个赖以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也被剥夺了。他们权威性的注经权被置于一个划分清晰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特殊影响也就只能局限在宗教和道德领域。^[62]

空间组织中立场的不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它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之中，而且表现在它与艺术的关系之中。公元前 900 年至公元前 700 年，雅典和阿提卡省花瓶上的几何图案，终于被图画取代。这反映了文学进行性叙事（progressive narration）原则的影响。^[63] 黑色的人物画花瓶尤其如此。人们口耳相传的叙事和对时间的关注，开始对原本关注视觉与空间的艺术产生影响。画家试图在一个场面中创造这样一个情景：时间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短暂的，所以在同一场面中，几种行为动作可以同时发生。到公元前 5 世纪，这种技法被另一种方法取代，它强调时间空间的统一。公元前 4 世纪，单景表现方法取得主要地位。^[64] 它在一个有限的场面中，集中表现一个单一的行动。^[65] 同样，戏剧中的两条平行线，台上人的行动和幕后超自然力的作用，用上下两层的方式在花瓶上表现出来。上层是肉眼不见的超自然力，下层是人的行动。^[66] 文学在强调与时间相统一的同时，也调整自身以适应空间的需要。

空间组织日益重要，其中的哲学内涵明显地反映在数学之中。在埃及，几何学发展成为以经验为基础的测量艺术。然而，希腊人急不可待

① 均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

地抓住几何学，把它作为真正的哲学知识的核心。他们认为，数学可以还原为具有科学内容的普遍规律。^[67]爱奥尼亚人痴迷于人与自然纠缠不清的关系，不过他们还是看到，他们能够确立世界万象的内在联系。泰勒斯认为，“万物充满神”。但是他也关心事物的内在联系。对一致性的关切包含着对经验数据的忽视，但是也包含着对思想独立的认知。阿那克希曼德^①认为，无限是无边无际的。一切明确的存在物的基础本身是不可能明确的。对立物是从无限者中分离出来的。赫拉克利特^②专心致志于研究如何认识未知事物，而不是专注于已知的事物。于是，人的抽象能力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思想塑造了思想者，它也因此控制了现象。整体是一个永恒的变化之流。宇宙是存在的动态过程。而存在是永恒的生成过程。巴门尼德^③说，时间和空间互相排斥，只有存在是真实的。他试图解决将存在和生成、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他的哲学的绝对命题是“圆满的真理中未曾动摇的核心”（the unshaken heart of well-rounded truth）^[68]。

毕达哥拉斯急于对存在进行定量研究。从他那个时代开始，数论和延展论之间就有一个密切的联系，不讨论数论和延展论之间不可消除的相关性，就是“不讨论数学和几何学的关系”^[69]。在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的无限空间观念中，毕达哥拉斯用几何图形中的点阵来代表数。数学中的空白（the void）区分出几何图形的性质，或者在一连串自然数项的空白中决定几何图形的性质。数的单位与空间中的几何点，即一个不可分割的量一致。^[70]数学空位是用来分离数位的。大约从公元前450年开始，几何学家意识到，他们需要连续的、无限延伸的空间，而不是毕达哥拉斯那种非连续的算术空间。毕达哥拉斯的空间是由点组成，它与数字集合相似，而数位也是由间隔的空白而分离的。几何学从算术中分离出来。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接受了几何学家的框架，主张无限空间的存在。他们把几何空间的无限延伸属性赋予物质空间。原子的数量无限，原子要求在空间中的无限延伸。无限空间是几何学家为了构建几何图形而作的假设。与此相似，原子论者和物理学家确立了自然界的无限空间。古代球形空间的边际随之

① 阿那克希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1—前547），希腊米利都派哲学家。

②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40？—前4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之一，认为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

③ 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515—前450？），古希腊哲学家，爱利亚学派创始人，认为思想与存在同一的、无生无灭的、不动的、单一的。

被摧毁，空间的圆周和中心随之被剥夺。^[71]希腊数学家发现的静态空间，支持柏拉图关于“理念”的观点。反过来，到公元前300年，受柏拉图影响的几何学在亚历山大城逐渐定型并走向完善。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希腊人逃避了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但是，口头传统的声势并未衰竭，它并没有因书面传统而遭遇灭顶之灾。它支持了希腊的怀疑论，避免了宗教文献的垄断。

战术效率的提高促成了菲力普王和亚历山大王的征战，空间问题的重要性随之增加。他们有优质马，有马其顿大量经过磨炼的贵族。于是，他们有效地组建了轻甲兵和骑兵，以支持重甲步兵。方阵的装备得以改进，阵形更加统一而固定，重甲骑兵成为进攻的力量。作战胜利依靠各种部队的协调行动。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随之兴起。

波斯帝国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拥有一个连续的宗教组织形式，并且认可了存在于朱迪亚和埃及等地区其他组织。亚历山大只有君权神授的观念，这个观念受到柏拉图智者治国学说的锤炼。除此之外，他没有可与上述国家相比的组织形式，所以他一去世，帝国就随之瓦解，分裂成为若干希腊化国家。塞琉西王朝试图利用巴比伦尼亚宗教和波斯宗教的区别。但是，后者却成为帕提亚帝国扩张的基础。公元前125年，巴比伦陷落，塞琉西王国萎缩并随之消亡。在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65年之间，希腊化时期的大僧侣耶逊（Jason）和墨涅劳斯（Menelaus）建议重组犹太教，使之成为叙利亚—希腊的一种宗教，以有利于塞琉西王国。但是，虔诚的犹太人支持马迦比^①。在西蒙的领导下（公元前143—前135），犹太人取得了朱迪亚地区的独立，使耶路撒冷成为圣城。^[72]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了新的首都，企图抵制底比斯和巴比伦宗教的影响。其办法是创立一个新的宗教，并且用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来组织知识。他们对空间问题的承认，表现在欧几里得的著作中；他们对时间问题的承认，则表现在对荷马史诗和《旧约》的修订中。

罗马的发展趋势大致和雅典的发展趋势差不多。君主政体之后又兴起了贵族政治，法律由四个僧团控制。雅典反对世袭贵族，争取法律中口头传统的控制权。这和罗马反对贵族的斗争不无相似之处。公元前5

^① 马迦比（Judas Maccabee，公元前？—前161），犹太游击队领袖，抵抗塞琉西王朝，使犹太人免于希腊化。

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4世纪初叶，雅典对注经人的委任，以及希腊对罗马的影响很可能促成了罗马的一个特殊阶级的兴起。那时，祖先法（ancestral law）还是很重要的。罗马高级僧侣权势显赫，他们和雅典的注经人形成强烈的反差。^[73]口头传统和宗教提供了一种连续的组织形式。曾经两度担任执政官的罗马统帅西庇阿在他的执政时期，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政府可以利用宗教。不过，这样一来，宗教在人民中就失去了意义。波里比阿在《通史》中说：“对神的敬畏，正是确保罗马帝国结为一体的原因。”罗马军队在意大利、北非、西班牙、高卢和东地中海节节胜利，与此相关的空间组织问题变得越来越显著。宗教组织和连续性的问题也随之加重。公元9年，罗马人被日耳曼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击败。随后，他们试图以莱茵河与多瑙河为防线来巩固帝国版图，并且试图以立宪政体和王朝交替的办法来解决连续性的问题。屋大维试图通过复兴垂死的宗教来支持道德和国家。“王权和祭坛的联盟自此开始。”

绝对王权独裁专制的倾向，使国家越来越需要依赖东方的神职人员。^[74]对空间问题的兴趣在斯特拉波^①的地理学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显著，他试图表现一个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兴趣也反映在托勒密^②的著作中。他搜集了一切已知的地理信息，绘制了全球地图。对战争和有组织力量的依赖，削弱了王朝长治久安的可能，使人对战功显赫的行伍之辈更加依赖，由此导致了连续性的缺乏。历代王朝苦心孤诣、使尽解数地加强自己的地位：吞并埃及、建立领养的法律观念、对建筑进行强调（以罗马尤盛）、利用文学进行宣传、推行角斗之风、铸造辅币、建造巨型廊柱以及对历法实行有效控制（尤其是以恺撒和屋大维命名的7月和8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皇帝神化。作为连续性基础的罗马宗教不再那么有效，官僚体制的重要性随之增长。官僚体制要求把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不可避免，这就削弱了罗马作为宗教圣地的地位。

罗马帝国向东方的扩张，使之与东方宗教接触。它被迫再次面对过去的帝国所面对的问题：对宗教的控制问题，以及对时间组织的控制问题。经过口头传入的波斯宗教，用书面形式写下来，这就成了帕提亚帝国扩张的基础。公元228年，萨桑王朝在斯宾国（Ctesiphon）建立新都。它支持手握大权的神职人员，让他们负责复兴的琐罗亚斯德教，给

① 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公元23？），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地理学》17卷、《历史概览》47卷，对区域地理和希腊文化研究有特殊贡献。

② 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了地心说。著有《天文学大成》13卷、《地理学指南》8卷。

《波斯古经》赋予神圣地位。在罗马和波斯的纷争中，罗马发展了利用宗教的政策，密特拉教迅速在罗马军队中蔓延。

罗马人试图对付波斯。这导致它与犹太教之间的麻烦。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里，伊朗对犹太教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75]伊朗宗教的善恶二元观念，在解决罪恶问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罗马人7位大天使的观念取自于伊朗。《圣经》在亚历山大城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之后，希腊化思想对犹太教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从公元前130年到公元70年，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Sadducees & Pharisees）的争论中，撒都该人认为，相信来世、末日审判、肉身复活、天使分层等等观念，都是不符合犹太经典的。他们坚持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反对斯多葛命运先定的主张。法利赛人承认二元观念，既信先定或上帝的天佑，又信人的意志的自由行动。在希腊化的影响下，法利赛人用注经和辩证的方法制定了仪规法，强调法学研究，倚重训练使徒的学校。^[76]他们以犹太法律为核心，制订了大量新的规章制度，使人严格遵守原有的律法。作为严格的执法者，法利赛人的目标是千秋万代保存犹太律法的纯净。^[77]他们喜欢口头传统，依赖民众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撒都该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撒都该人主要是贵族，他们坚守的是原有的《圣经》和希腊的思辨。口头传统阻碍了翻译，使法利赛人独占了新的资源。《塔木德经》及其正经《密西纳》^①都没有写下来。因此，它受到保护而没有翻译成其他文字，也没有广为流传。^[78]早期的基督徒批判律法中的法利赛内容，说“罪恶的力量就在律法中”。基督徒开发口头传统，从信徒到使徒都追溯口头传统。希腊语《福音书》的基础，也许是阿拉姆语口头传统的底层。记忆术对口头传统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福音书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反映了有关记忆术的内容，这两卷书就是由相关的口头资源形成的。^[79]早期以色列的口头传统和人格神有关系。书面传统的固化作用，使回归口头传统成为必然，使基督教回归人格神的上帝成为必然。^[80]他们编定福音书和祝祷文，旨在传播基督的生平和使徒的作品。面对迫害，经书的抄写和流传都遭遇到困难，所以不同的文本就随之增加。^[81]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拜占庭地区流行的文本得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承认。由于被承认的文本数量越来越多，使得1881年不得不确定最终的勘定本。^[82]与亚历山大城及君士坦丁堡流传下来的精确而权威的希腊经典比较而言，《新约》是在许多文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新

① 《塔木德经》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密西纳》为其正经。

约》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抄书人笔下的产物。^[83]

基督教最初是一个受迫害的宗教。适合基督徒的抄本最初恐怕是写在莎草纸上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2世纪。^[84]羊皮纸卷的文本内容更丰富，使用更方便。使用羊皮纸卷使文本的内容仅限于单卷上，比如《福音书》或《祝祷文》。羊皮纸比莎草纸优越，不容易毛边。到公元2世纪初，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已经完全成熟，作为第二等的抄书材料，它先用于帕加马，后用于罗马、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之后，羊皮纸取代了莎草纸。对权威基督教经典的需求，使《新约》取得了神圣的地位。《新约》和《旧约》合订的全本《圣经》面世。受迫害的历史结束之后，信徒对《圣经》的需求猛增。也许，这加速了从莎草纸到羊皮纸的革命。宽幅只有二三英寸的莎草纸卷继续保留在初期的羊皮纸卷之中，每一页的羊皮纸上都粘着三四张莎草纸。^[85]

公元4世纪从莎草纸到羊皮纸的转换，给微型画画家提供了耐久的材料，因为莎草纸只能保存两三代人的时间，其表面只适合精细的做画技巧。书籍插图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莎草纸的插图画家只限于线条和水彩，而羊皮纸却不能使用厚层的油彩。羊皮纸稳稳扎根，因为它容许插画和文字的亲密关系。羊皮纸的尺寸使画家不得不调整画的尺寸，以适合这种新的格式。^[86]从正方形改变为长条形以后，每张羊皮纸上只能写一两列字。许多书被重新抄在羊皮纸上。到公元350年，恺撒里亚的潘菲利亚图书馆已经藏有羊皮纸书卷。梵蒂冈和西奈的羊皮古卷也是这个时期留下来的。

密特拉教对于东地中海边上希腊化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行政官僚机器，必须更直接地关注帝国比较富裕的地区。皇帝有必要选择一个更加容易设防的首都。于是，君士坦丁堡成为新都，基督教成为官方的宗教。它综合了许多成分，包括许多与其他宗教共有的成分：一位感应而生的神，他与星光相联系，诞生在牲口棚中，受监禁，被处死，降入地下，失踪三天，最后是复活并升入天堂。^[87]基督教吸收了其他宗教的节日，比如密特拉教的2月25日。时间因素根据宗教的要求来组织，以满足帝国空间组织的需要。“那独一无二、真正的存在者，力量永恒的存在者，我们必须认为是神圣的。”（君士坦丁语）与莎草纸和字母表相连而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继续存在，与羊皮纸相连的教阶制度成为其辅佐。由此而产生的稳定性是非常显著的，拜占庭帝国延续到1453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埃及托勒密王朝成功地调整宗教，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其政策并非对罗马帝国没有影响。

教会随着《新约》、教士著作和口头传统的发展而发展。与此同时，围绕经文的拼写和词语的解说，围绕强大宗教组织的延续问题，在埃及出现了许多异端邪说。君士坦丁大帝所关心的是如何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拥护。^[88]为了解决阿里乌斯^①的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召开了基督教普世会议^②，通过了一个普遍接受的信条。这个信条由西部的主教提出，它来自于埃及宗教的团体观念。该信条认为，圣父和圣子应该是“同一个实质”。但是，东部教会认为，圣子不能和圣父是同一意义上的上帝，这可能是巴比伦王国传统的延续。^[89]一方面，普遍接受的信条很重要。另一方面，阿里乌思想在东部和哥特人中很有力量。所以，君士坦丁大帝不久又回到阿里乌的神学思想，而且这个思想的影响长期存在，直到公元381年。

西部几位主教把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说强加给基督教世界。接着出现了贝拉基主义^③、聂斯脱利派等异端教义。君士坦丁为东部教会树立了一个先例：只有皇帝才有权召开普世会议来解决异端问题。纳西昂的格列高利和恺撒里亚的巴西尔^④试图在“三位一体”说与东方教义之间进行折中，这种做法未能符合基督一位论的需要。公元451年在卡尔西登召开的普世会议拒绝了东方教义，这就引起了叙利亚和埃及教会的不满。随着皇帝地位的削弱，西部教会的政治地位加强了。也许，定都君士坦丁堡本身就削弱了罗马帝国，加速了它的崩溃，因为君士坦丁堡控制了小亚细亚富裕的省份、最好的征兵场地和伊利里亚省份（亚德里亚海东部地区）。^[90]由于罗马宗教不允许出现一个教士阶层，其大祭司和占卜官都是世俗的宗教专家，这就为罗马教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91]

拜占庭帝国未成文宪法的基础是元老院、军队、“德谟”选区和教会。^[92]皇帝是宗教和政治中的核心人物。帝国有组织力量的效率，一部分是来源于它对军队作战能力的承认。“拜占庭帝国的每一位士兵都手握帝国的权杖。”比如，色雷斯农家出身的查士丁（Justin）当上了皇帝，继承皇位的是他的侄子查士丁尼。他们加强了卡尔西登派的地位，

① 阿里乌斯（Arius, 256? —336），公元4世纪基督教异端教义神学家。

② 君士坦丁堡普世会议（Councils of Constantinople），共4次。天主教认为4次均为普世会议，东正教只承认前3次。第2次会议于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该会确立了《尼西亚信经》，详述圣灵、圣父、圣子平等的三一论教义。

③ 公元5世纪贝拉基等人在不列颠首倡的基督教异端教义。

④ 均为早期基督教教士。

削弱了基督一位论的宗派。公元482年，在芝诺（Zeno）皇帝治下，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阿卡丘斯（Acacius）在“联合饬令”中调和卡尔西顿派和基督一位论这两个宗派。但是，他遭到了教皇的谴责。宗教中的埃及传统，曾经因为亚历山大城神学家的努力而得到加强，如今它抵制君士坦丁堡的压力。公元518年7月9日，查士丁皇帝登基，东西教会的第一次分裂因此而结束。卡尔西顿派的政策，意味着在意大利和西部反对狄奥多里克国王。他是东哥特人，主张阿里乌派的教义。而阿里乌神学思想没有提出以一个集中的时间组织来维护政权的观念。他试图与日耳曼邻居联姻，以维持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地位。^[93]建立在这种联姻基础上的政治组织，力量虚弱，这就诱使查士丁尼向西部施加压力，正如他在遭遇到波斯和埃及的困难时所做的一样。教皇试图组织在东罗马帝国遭到迫害的哥特人中的阿里乌教派，但是，公元523年，继承霍尔密兹达斯（Hormisdas）而担任教皇的约翰，在公元525年到东方去给查士丁加冕。于是，罗马教廷就处在被拜占庭帝国支配的地位。直到扎迦利亚（Zacharias）教皇时代（741—752），情况才为之一变。他是最后一位希腊籍的教皇。^[94]

对于埃及的基督一性论宗派来说，要控制罗马教廷是越来越艰难了。帝国遭遇到的这个困难，给伊斯兰教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阿拉伯人中，诗歌促成了标准的民族语言的兴起，后来又促成了阿拉伯政治上的统一。^[95]诗歌是神圣的，而且和异教相联系。不过，到了穆罕默德的时代，诗歌已经出现颓势。在4个圣月中，战争是禁止的，诗人打擂台，竞相在集市上朗诵诗歌。集市是社会和文学生活的中心。^[96]起初，穆罕默德传教靠的是口头朗诵（《古兰经》之“古兰”即是朗诵）。其灵感来自于安拉，通过天使哲布勒伊来传达给穆罕默德。他去世之后，尤其是在633年也门战役中许多诗人战死之后，阿拉伯人采取措施把口头传统记录下来，以提供正式的文本。记忆成为经书的温床。最后一个校勘本在651年问世。^[97]

文字只限于在《古兰经》中使用，而《古兰经》里的法律和仪式内容又很受局限，于是就出现了口头传承的《圣训》^①。这是一个新的萨迦^②，它代替了阿拉伯人原来的散文萨迦。《圣训》获得了法律和宗教的威力。但是，文字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圣训》。书面的《圣训》之所

① 即穆罕默德言行录。

② 即传奇故事。

以迟迟未得到确立，部分原因在于写一部像《古兰经》一样大部头的经书代价太高，花的精力也太多。既然不同意其他书面的东西，伊斯兰教徒就被迫把注意力集中在《古兰经》上，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书籍。职业的诵经人靠的是记忆，而不是靠写下来的东西。他们反对把《圣训》写成文字。正如犹太人反对《旧约》之外的书籍一样，伊斯兰教徒反对任何可能与《古兰经》进行竞争的书籍。

在倭马亚王朝（651—750）时期，早些时候的异教作为一股反对宗教的世俗力量回到历史舞台。伊斯兰教和古老的诗歌传统也达成了妥协。后来，拥护诗歌传统的人对倭马亚王朝抱敌对的态度，因为其统治者哈里发是异教贵族的后代。这些异教徒曾经迫害穆罕默德。再后来，阿拔斯革命者也加入造反的行列，来反对倭马亚王朝。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98]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倭马亚的哈里发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另立了一个首都。

在拜占庭帝国，政教关系密切。这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总是禁不住一个危险的诱惑：迫害异教徒。^[99]异教徒成为帝国敌人的力量源泉。芝诺皇帝驱逐的聂斯脱利教派受到萨桑王朝的欢迎。^[100]“聂斯脱利牧首的教义，通过天才的穆罕默德，在宗教领域得到了恢复。”（巴克勒语）^[101]。雅典的学校关闭之后，那里的学者纷纷移居到波斯。拜占庭帝国向西部拓展利益，其代价是牺牲与波斯和解的可能。基督一位论者促成了波斯人对比莱索托和埃及的征服。赫拉克利乌斯^①即位之后，收复了失地。然而，波斯人和拜占庭人的斗争，帝国内部的宗教不满情绪，给伊斯兰教徒以可乘之机。他们以新宗教的狂热，攻城掠地，使其领土从巴勒斯坦直抵西班牙。聂斯脱利牧首在基督教会里的失败，使其在基督教之外的伊斯兰教中复活不可避免。拜占庭帝国基督教的基督一位论，成为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早期的哈里发遵从拜占庭帝国和萨桑王朝波斯的方法和体制。^[102]最后，公元718年，圣利奥三世教皇在君士坦丁堡遏制了阿拉伯人的进犯；公元732年，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在西部阻止了他们的进攻。这样的抵抗增加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困难，有助于波斯影响在阿拉伯的复兴。其表现是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和巴格达^②与科尔多瓦^③的决裂。存在于与宗

① 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拜占庭帝国皇帝（575—564），重整朝政，实行改革，击败波斯（628年），收复失地，后败于阿拉伯人（636年）。

② 指当时的阿拔斯王朝。

③ 指当时的倭马亚王朝。

教需求相关的空间组织，以及时间组织和连续性方面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伊斯兰教挥之不去的弱点。

拜占庭帝国退出埃及以后，它在西部的力量被削弱。特别是当法兰克人打败伊斯兰教徒之后，拜占庭帝国在西部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东部教会试图以牺牲皇帝权力为代价，通过静修制度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这势必引起皇权的抵制。公元730年至公元787年，围绕反圣像的斗争，教会就给自己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在拜占庭帝国，就像在王公小国一样，“帝王的权力是被合法革命权削弱了的独裁统治”（蒙森语）。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经过修正而适应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的组织。它面对着平衡这两种问题的困难，而这一平衡由于空间上的缩小而解决。“信仰和不信仰决不会听从人的命令。”（霍布斯语）公元491年，教皇尤菲米乌斯给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施行加冕礼。不过，皇帝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的先例，因为它似乎损害了皇帝无所不能的形象。与此同时，教皇参加加冕礼也有一个前提：皇帝“不能够把改革引进神圣的天主教会”^[103]。公元526年，教皇约翰一世为查士丁一世举行的加冕礼，后来带给东罗马帝国的却是灾难。教皇主持加冕礼，名义上是代表着人民，他与军队及元老院合作完成对皇帝的选举。西部的罗马教廷把加冕礼当做教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由于拜占庭虚弱，教皇扎加利（Zacharias）恩准皮平（Pippin）为法兰克国王。公元751年，他委托卜尼法大主教主持这个加冕礼。皮平夺取了墨洛温王朝的权力。于是法兰克王国的教会受到改造，国王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密切起来。在加洛林王朝复兴的同时，教皇给查理曼大帝举行了加冕礼^[104]。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赖士德和查理曼大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拜占庭帝国因此不得不于812年承认查理曼为皇帝。^[105]

由于公元9世纪至公元11世纪出了一些糟糕的教皇，使得教廷的独立地位被削弱，它与法兰克国王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教廷沦为奴仆。相反，东部的牧首却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威力、尊严和特权。^[106]蛮族入侵之后，欧洲的政治组织缺乏一个重要的延续性的基础。阿塔那修斯主教把静修制度引进了高卢。此后，静修制度就呈现出蔓延之势。罗马的政治组织被入侵的蛮族淹没之后，罗马贵族就成为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107]

罗马帝国的征服及其政治组织的扩张，摧毁了被征服民族的口头传

统，把文字强加到他们的头上。恺撒在其著作中描绘了德鲁特^①的口头传统。这个传统旨在培养记忆力，使学问的传承限制在自己的圈子里，不让外人参与。这个传统被消灭了。在爱尔兰和日耳曼地区，在罗马帝国还未征服的地区，口头传统得以流传。在爱尔兰，口头传统由本土的世俗教育来保存，外来的宗教在外族的学校里以文字的形式得到确认。基督教传入之后，德鲁特人遭到灭顶之灾。但是，中央王权的御用诗人，却谴责异教，并且与教会妥协。于是，尽管引进了用文字和书籍形式来表达的基督教，神话英雄文学还是在口头传统中留传下来。^[108]中央王朝崩溃之后，吟游诗人取代了御用诗人。到公元575年，御用诗人的骄矜张狂令人难以容忍，于是就出现了反制他们的措施。11世纪之后，世俗的书吏和教会的抄书人，都搜集口头传统中保存下来的故事和家谱。到1351年，诗人和学者已经开始聚会，这样的聚会具有政治意义。^[109]爱尔兰诗人坚持口头传统，反对基督教的书面传统。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法利赛人相近。法利赛人反对希腊书面传统、坚持本土传统的努力，导致犹太教的产生。而爱尔兰诗人的努力产生了爱尔兰民族主义。

日耳曼的英雄诗歌来源于宫廷。吟游诗人用竖琴伴奏吟唱韵文^[110]从4世纪到6世纪，宫廷诗成为史诗和叙事诗的基础。在英雄时代，血亲纽带逐渐解体，家族的原始庇护也在动摇^[111]，部落义务随之崩溃。^[112]和希腊英雄时代的《荷马史诗》一样，条顿民族的诗歌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半开化民族和已经开化的民族之间长期交往的时期。^[113]但是，希腊人的语言保存得完好无损，条顿民族的语言却深受拉丁语的影响。实际上，希腊口头传统顶住了东方文明的冲击之后，对罗马产生影响，而且它摧毁了法兰克人的口头传统。查理曼大帝试图搜集残存的诗歌。12世纪以后，这些残存的诗歌在上层阶级中间很受宠爱。它们成为摆脱罗马征服而享受自由的佐证，成为支持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耐人寻味的是，欧洲的小国寡民在民族主义的宣传中，主要依靠的是诗歌选集。这是他们最好的自我保护媒介，借以抗衡“纯粹精神产物”^[114]的影响。柏拉图对驱逐诗人表示关切，这和他对诗人角色的理解不无关系。

爱尔兰固守传统，使基督教受到局限，这就为爱尔兰的基督教向其他地区传播提供了释放能量的机会。爱尔兰人到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

① 古代凯尔特人一批有学问的人。

大陆去传教，他们在大陆的教团给加洛林王朝的复兴提供了动力，加强了西罗马帝国的力量，使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帝国的牧首享有同样的地位。在9世纪，加洛林王朝复兴了古代的拉丁文学。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使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接着，巴格达也出现了学术繁荣。这些复兴功德无量，使希腊经典保存下来并得以传世。^[115]野蛮人入侵罗马，西部教会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但是拜占庭帝国却没有经历这样黑暗的时期。西部教会独立于东部教会，独立于拜占庭帝国，可是它却与一个没有接受教会开化的新皇帝结盟。

在组织空间的能力上，在为了组织时间与确保连续性而与教会建立的相互关系中，西罗马帝国兼有集权和教廷的成分。但是，西罗马帝国缺乏政治力量。查理曼皇帝去世之后，条顿民族让继承人分享财产的原则保存下来，他控制的庞大帝国让继承人瓜分了。这个帝国核心力量组织起来，去对付北欧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在巴黎，抵抗入侵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个叫卡佩的家族。他们继承了条顿人的世袭制，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基础。德国实行选举的原则。就是说，皇帝不和任何一个地区挂钩，公爵的属地又分为若干市镇区。^[116]教会摆脱了政治的影响。1059年，教会组织了红衣主教团，由红衣主教来选举教皇，又由教皇来挑选红衣主教。这是教会走向独立的一步。就这样，国家对时间和连续性的控制权，被教会夺过去了。教会对时间的垄断建立起来。其核心内容是罗马的名义、拉丁语的使用、教士的禁欲、摆脱国家束缚的自由和修道院制度。教会组织十字军东征，把蛮族入侵带来的非集中化力量拓展到东方。1204年，教会把“罗马统一的残余痕迹”涤荡得一干二净。^[117]

对时间的垄断，刺激了空间组织中的竞争成分。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巴格达，然后又一站一站地传到科尔多瓦、意大利和法兰西，促进了草书的发展，也促进了空间组织的发展，这个空间组织和通俗语的分区有关系。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利用了拜占庭帝国日益衰落趋势。查理曼大帝把加洛林王朝的小书写体加以发展和推广，传播到意大利。于是，书写就趋向统一。阿拉伯数字取代了笨拙的罗马数字，方便了计算。在意大利，文字^[118]成为世俗生活中追求古风的一种工具。12世纪，在文字的实用方面，佛罗伦萨走在前头；文字用于国内的产业之中，也是组织贸易的媒介。羊毛成为工商业产品，给欧洲带来深刻的变化。在广袤的领土上，可以用法律和政治手段来组织生活。到12世纪末，佛罗伦萨大约有600位专业的文书，他们受雇于工商业界。13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工匠的行会，工匠手下有受雇的学徒。专攻商业法的

文书被派遣到遥远的国家，与银行合作，使佛罗伦萨与欧洲的商业和政治互通讯息，与外国保持接触。文书工作经过改造，更加趋向实用。用于商业计算的小册子出版发行了。有了阅读、书写和计算的知识之后，工匠也成为了了不起的师傅。1330年前后，佛罗伦萨会阅读的儿童，大约有8 000人~10 000人。其中，会用算盘（abacus）的大约有1 000人~1 200人，会语法和逻辑的大约有500人~600人。学校办成了企业，上学有了实用的宗旨。佛罗伦萨的公司用意大利文来书写，会计、集中控制的“小店”、名册、簿记、抄写和邮政成为公司建立的基础。书写迫使人的思想更加深刻。规则使表达变得更加清晰。计算能力使人更加聪明。合同制使商务财产增长。经济关系失去个人的色彩。伟大的艺术家等名人从文书的队伍中涌现出来。书写在思想和艺术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佛兰德斯地区和低地国家，出现了一个与意大利托斯卡纳文明相似的文明。荷兰语之所以和德语不一样，那是因为它很早就用文字固定下来了。在意大利之外，只有佛兰德斯地区才出现了原创性的复兴。^[119]

纸和文字，对教会对时间的垄断所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表现是，俗语地位上升，产业和贸易发展。为了保护最珍贵的天主教信仰，使之免于受持久多样的攻击，教会形成了信仰的使徒裁决制，组成了由主教参与的使徒团。除了依靠《新约》和《旧约》之外，这就成了捍卫基督教真理的又一保障。^[120]《圣经》流通的范围受到了限制；洗礼和圣餐被赋予了神秘的形式；洗礼的象征意义不允许用文字表达；洗礼的一些程序禁止俗人观看。阅读《圣经》的重要性受到强调，教会成了一所巨型的初级学校。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懂得他的信仰。^[121]希腊教会鼓励把《圣经》翻译成其他语言，这就给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学奠定了基础。为了向斯拉夫民族普及《圣经》和《祈祷书》而发明的西里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能够更加充分贴切地表达斯拉夫语，这就在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之间架设了一座更加便利的桥梁。^[122]作为犹太教女儿的基督教，捍卫了神圣的经典，使之在无数神秘宗教的包围中，不至于受到形形色色的僧侣的侵害。^[123]

在神秘宗教成分显示出重要性之前，罗马教会的隐修制度和经院神学已经牢牢扎根。在和蛮族文化的斗争中，教会强调自己的特立独行。它强调拉丁语，用教团（尤其是托钵修会教士）来支持拉丁语的地位。它强调建筑（尤其是哥特式教堂）、手稿（尤其是富有精致插图的手稿）

和音乐。建筑的石头和教会的经文都突出永恒性和持久性。在 13 世纪，“神学家、百科全书作者和《圣经》的阐释者们说过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已经由玻璃上的绘画或者雕刻表达过了”^[124]。用安布罗斯^①的话来说：“大声合唱圣诗是使大众联为一体的伟大纽带。”^[125]用书面形式表达音乐有其局限性。“如果不是用脑子来记忆音乐，那就会失去音乐，因为音乐是写不下来的。”^[126]

早在 11 世纪初，圭多^②谈到他记录乐谱的方法时就说：“我用这种方法教孩子们学唱，他们有的人很快就学会了，只用了三天。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旋律也一学就会。用过去的其他方法，许多个星期也得不到这样的成绩。”^[127]对位法大约是 1300 年发明的^[128]，其目的是“同时演奏几种旋律，用恰当的共鸣使之结合成一体”。

造纸工业靠近市区，因为在这里，市场需要纸，造纸用的碎布也货源充足、价格低廉。造纸工业的发展使写作从修道院向都市转移。14 世纪和 15 世纪，出现了写作大师。接着，印刷业促进了都市化的趋势。^[129]印刷工业是机器工业的初级形式和显著表现。在一个手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印刷术有效地渗入了自己的影响。手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着写作和绘画，写作和绘画又受到雕塑和建筑的影响。印刷工业的发展，摧毁了艺术相互关联、结为一体的关系。米开朗琪罗的雕塑至善至美。他有幸得到富裕的意大利城市和罗马教廷的支持。他把基督教和异教的传统结合起来。这是注定要和意大利城邦一道衰落的社会的一个最后姿态。在法国人的入侵和印刷书籍的冲击之下，这个社会衰落了。大教堂中的雕塑显示了《圣经》中的恐怖场面，这种恐怖被经典的影响抵消了。“末日审判”反映了一种文化的末日，这种文化的基础是石头、羊皮纸和绘画。石头是艺术家和文化表达永恒的媒介。萨沃那罗拉^③对这个社会的攻击，建立在书籍之上。他的造反是一个时期终结的象征，在这个时期，米开朗琪罗设计并修建了梵蒂冈的图书馆。

中世纪用雕塑和建筑来表现《圣经》的神圣。印刷术的大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它大量印制的是《圣经》。伊拉斯谟把希腊文本的《圣经》编定之后，人们关注的是可否把《圣经》翻译成各种俗语。这就打

① 安布罗斯 (Saint Ambrose, 374—397)，意大利米兰主教。

② 圭多 (Guido d'Arezzo, 990?—1050?)，意大利本笃会修士，五线谱发明人。著有《音乐理论剖析》、《旋律进行法》。

③ 萨沃那罗拉 (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建立民主政权，失败后被火刑处死。

破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因为原来教会的垄断，主要表现在垄断拉丁文本的《圣经》。宗教改革用印刷术来压制表现《圣经》的雕塑和建筑形式。翻译成俗语的《圣经》具有神圣的性质，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弥尔顿一心要用英语创作一首史诗，把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结合起来。

印刷术在一些地区快速发展，这些地区包括处于罗马人的征服强弩之末的地区，比如德国和英国，还有以莎草纸为基础的官僚体制鞭长莫及的地区。拉丁语强劲的地区，或者说罗曼斯语言发达的地区，都反对机器印刷。它们用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艺术形式来反对机器印刷。英格兰口头传统之盛，表现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之中。马丁·路德的德文版《圣经》问世之前，德国没有统一的方言。在这些地区，新教快速发展，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立。随着对时间垄断的削弱，新的空间垄断浮出水面。

新出现的对空间的兴趣，表现在罗盘和透镜的发展之中。^[130]哥伦布发现了新世界。麦哲伦证明地球是球体。在天文学中，当望远镜发明之后，托勒密的地心说崩溃，布鲁内莱斯基^①是第一位把焦点透视法用于建筑的艺术家的。^[131]在佛罗伦萨，这种新的空间观念转换成为与现代个人主义对应的艺术形式。^[132]其效果立竿见影，建筑中的巴洛克风格就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在哲学中，莱布尼兹率先把空间解释为纯粹的形式，一种生存秩序，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前后相续的秩序。

造纸术和印刷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对空间的垄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刷术着力于通俗语，减弱思想的运动速度，分裂欧洲人的思想。过去，哲学指引科学知识。如今，印刷品的增加使科学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德国与英国的隔绝比以前加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德语比法语难。试想这一点多么有趣：倘若纽曼和孔德懂德语，19世纪欧洲的历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印刷业的既得利益往往要阻碍思想的运动，先是促进垄断，可最终又使思想冲破羁绊而进入其他语言之中，这就导致思想运动中的潮起潮落。德国工业的发展先是滞后，1870年以后又狂飙突进。范布伦描绘的情况能够部分地说明这个问题。甚至科学也受到印刷术的影响。由于科学倚重俗语和翻译，它也受到知识垄断的影响。这些垄断表现为专利、秘密工艺和军事“安全”措施。科学逃避

① 布鲁内莱斯基 (Brunelleschi, 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其风格典雅、宁静、清晰。

了时间意义上的知识垄断，并从而得到发展。然而，在空间意义上的知识发展方面，科学最终还是失算了。对空间垄断的痴迷表现在军事主义对地理学的影响。作为军事工具，地理学在宣传上特别有效。他可以改头换面来适应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德国人抓住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论文，搞出了一门地缘政治学。他们企图造成宿命论和战争不可避免的印象。然而，正如康福德所描绘的那样，如果把战争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原因就不清楚了。

时间被摧毁、对空间的垄断日益重要，这个趋势彰显于黑格尔的著作中。他认为，进步是永恒的运动或斗争。这个趋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是非常显著的。马克思认为，时间是“无形的必然”（formless inevitability）^[133]。对叔本华而言，音乐是最高尚的形式，因为音乐是最理性的艺术形式，是生命本质最赤裸裸的没有被扭曲的形式，也是意志最赤裸裸的没有被扭曲的形式。^[134]瓦格纳^①在音乐中表现了对罗马和基督教的抗拒。“我永远不能原谅瓦格纳的是，他对德国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尼采语）^[135]在德国对建基于书籍和音乐的西方文明所做的贡献被摧毁以后，德国人努力恢复德国文化，使之从军事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足点中恢复过来，使之从战争所造成的德国文化的脱轨中恢复过来。

印刷术日益重要，反映在共和政体之中。共和政体偏向于制定宪法、发布文告、保证新闻自由和个人权利。它对时间控制的要求反映在政教分离之中。华盛顿总统在给的黎波里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利坚合众国绝对不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也许，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对国家的不同态度。人民态度之不同，在东西方国家之间、普通法国家和罗马法国家之间以及在工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有反映。作为经济因素的国家观念，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指针。没有宗教这个精神支柱，国家就会更加倚重文化发展。有了文化上的成熟之后，国家就成了一件可以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衣服。在紧急情况时期，这种招之如轻裘、挥之如敝屣的情况，以制度变迁的形式出现。法国就是如此。在文化未成熟的国家，这种急剧的改革却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些国家，法律汇编将被修宪和立法搅成一团乱麻。极权主义国家也好，法制僵硬的福利国家也好，都将被迫进行无休止的行政活动。

①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的写作和创新。作品有《漂泊的荷兰人》、《纽伦堡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等。

口头传统蕴涵的是精神，文字和印刷的固有属性却是追求物质。通过诉诸文字和印刷，通过对自身神圣性的强调，口头传统在《圣经》与《荷马史诗》中顽强地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口头传统使其对手瘫痪，以对手的武器攻击对手。在口头传统的影响下，诗歌的传统积累起来，支配着西方的历史。希腊和罗马维持了对口头传统的尊重。^[136]口头传统之式微，意味着对文字的倚重（因而倚重眼睛而不是耳朵），意味着对视觉艺术、建筑、雕塑和绘画的倚重（因而倚重空间而不是时间）。时间的重要性之经久不衰，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使用的物质材料之中，这些物质材料耐久，石料的性质尤其如此。对首都建筑的巨大投入反映了对控制时间和空间的关注，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君士坦丁堡、巴黎、柏林、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无一例外。首都给各国人民造成的负担，并非与其自身的衰颓和革命没有关系。法国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与时间相关的宗教垄断，倚重口头传统。它不得不诉求于圣地建筑的支持。罗马、耶路撒冷和麦加，概莫能外。同样，革命的部分原因，也是抗议首都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新教对罗马教廷的抗议就是一例。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反而加强了犹太人的口头传统，使这个城市无法适应政治的需要。巴勒斯坦地位的上升，一方面有利于口头传统的持久不衰，而这一传统还是时间组织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地位的上升，又有利于文字和印刷传统的扩张，使之走向空间组织。

不同的垄断类型之间会发生冲突，由此而产生出乎意料的自由。罗马天主教掌握着时间控制权。它吸收了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要素。这种要素对空间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它试图借此求得类似于拜占庭帝国的时空平衡。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不同的垄断类型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拆台。造纸术和印刷术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迫使西方人作出新的调整。德国逃出了罗马天主教的禁锢之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英国和德国之间就爆发了思想冲突。在西方，《圣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之后，对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因为荒谬、所以信仰”——实在是太高了。（德尔图良^①语）。信教的狂热和理性的狂热把欧洲搞得四分五裂，由此出现了对国家的狂热和对教会的狂热。调节这两种狂热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剧。结果，以科学之名义对

^① 德尔图良（Tertullian, 160?—220?），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用拉丁语写作，使之成为传播基督教的有力工具。著有《护教篇》、《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等。

信仰和不信加以利用的新型垄断，就变本加厉了。

【注释】

[1]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1934. Cited by F. M. Cornford, "The Invention of Space," in *Essays in Honour of Gilbert Murray*, (London, 1936), p.216,

[2] 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Philosophy, Science, and History since Hegel*, trans. By W. H. Woglom and C. W. Hendel (New Haven, Conn., 1950), p.98.

[3] J. H. Breasted,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New York, 1912), p.7,

[4] 欲知平等和没有发生分化的图腾家族如何过渡到按领土组织的个人统治的王权，以及母系氏族如何向父系氏族过渡，参见 A. Moret & G. Davy, *From Tribe to Empire* (London, 1929), pp.1~106. V. Gordon Childe 认为，经济需要使文字成为必需品。他认为，一般地说，文字的发展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向以领土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密切相关。See *Man Makes Himself*, also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London, 1945), p.ii. 关于政治扩张对文字的影响，see W. F. Albright, *The Vocalization of the Egyptian Syllabic Orthography* (New Haven, Conn., 1934).

[5] 耐人寻味的是，孟菲斯城的主神卜塔是艺术和手工艺之神，卜塔神的高级僧侣是为国王管理石匠和艺术家的。艺术家的主要创作是建筑，这意味着雕塑作为装饰，成了建筑的附属物。See M. A. Murray, *Egyptian Sculpture* (London, 1930), pp.xvii~xxiii.

[6] Breasted, *History of Egypt*, pp.117, 119.

[7] V.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New York, 1946), p.149. 在社会革命中，虚幻的满足被社会秩序中的危险取代。See Abram Kardiner, *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New York, 1945), p.427.

[8] 马在战车和骑兵中的重要作用总是被人过低估计。马的使用迫使军队提高智力水平，可能还导致了人道主义的兴起。E. J. Dillon 说，看到骑警骑的马那么聪明，他总是很吃惊。公元前 2000 年的东方帝国，比公元前 3000 年的帝国稳定，原因就是帝王可以频繁坐马车巡幸。马的使用促使一个独立的军事阶级产生。see Childe,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p.68.

[9] See Henri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A Stud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Relig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1948), pp.217~19,

[10] Ibid., pp.218~223.

[11] Ibid., pp.237~244.

[12] Ibid., p.225.

- [13] See Henri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A Documentary Essay on the Art and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1939), p.93.
- [14] Ibid., p.12.
- [15] Henri Frankfort etc.,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1946), p.139.
- [16] Ibid., p.43.
- [17] Ibid., pp.192~195.
- [18] Henri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A Study of Near Eastern Relig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Nature*, p.252.
- [19] Ibid., p.309.
- [20] Ibid., p.258.
- [21]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245.
- [22] L. R. Farnell, *Greece and Babylon: A Comparative Sketch of Mesopotamian, Anatolian, and Hellenic Religions* (Edinburgh, 1911), p.132.
- [23] J. T. Shotw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p.45, (New York, 1922)
- [24] Henri Frankfort etc.,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p.169.
- [25] Henri Frankfort, *Kingship and the Gods: A Study of Near Eastern Religion a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Nature*, p.327.
- [26] Ibid., p.338.
- [27] W. F.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Monotheism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altimore, 1940), pp.146~149.
- [28] Ibid., pp.45~46.
- [29] 公元前 17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 迦南人对此了然于胸。Ibid., p.43.
- [30] Solomon Gandz, "The Knot in Hebrew Literature, or From the Knot to the Alphabet", *Isis*, X IV, 1930, pp.190~214.
- [31] Solomon Gandz, "Oral Tradition in the Bible", in *Jewish Studies in Memory of George A. Kohut, 1874—1933*, ed. S. W. Baron and A. Marx, (New York, 1936), pp.254~255.
- [32] Ibid., p.286.
- [33] Solomon Gandz, "The Dawn of Literature: Prolegomena to a History of Unwritten Literature", *Osiris*, VII, 1939, pp.290~291.
- [34]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184.
- [35] Ibid., p.190.
- [36] Ibid., p.209.
- [37] F. M.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London, 1907), p.131.

- [38]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209.
- [39] John Edwin Sandys, *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Sixth Century B. C.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1915), p.294.
- [40]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206.
- [41] Ibid., pp.221~222.
- [42] Ibid., p.228.
- [43] Childe, *What Happended in History*, p.167.
- [44]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248.
- [45] Ibid., pp.277~278.
- [46] Gandz, "The Dawn of Literature", p.274.
- [47] Ibid., p.261.
- [48] Ibid., p.294.
- [49] Ibid., p.306.
- [50] S. H. Butcher,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Word", in *Some Aspects of the Greek Genius* (London, 1891), p.167.
- [51] Ernest Fenollosa,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in *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1920), pp.360~361.
- [52] F. M. Cornford,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Speculation* (London, 1912), p.143. see also Frankford et al.,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icent Man* 中所述巴比伦史诗对理解苏美尔社会的意义。
- [53] J. H. Oliver, *The Athenian Expounders of the Sacred and Ancestral Law*, (Baltimore, 1950), p.67.
- [54] Ibid., p.68.
- [55] Ibid., p.69.
- [56] Ibid., p.70.
- [57] Ibid., p.71.
- [58] H. L. Lorimer, "Homer and the Art of Writing: A Sketch of Opinion between 1713 and 1939",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LII 1948, p.22.
- [59] See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242.
- [60] J. H. Oliver, *The Athenian Expounders of the Sacred and Ancestral Law*, pp.1~4.
- [61] Ibid., p.17.
- [62] Ibid., p.30.
- [63] See Kurt Weitzmann, *Illustrations in Roll and Codex: A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Method of Text Illustration* (Princeton, N. J., 1947), pp.12~13.
- [64] Ibid., p.14.
- [65] Ibid., p.16. see also F. H. Robinson, "The Tridimensional Problem in Greek Sculpture",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VII, 1929, pp.119~168.

- [66] M. C. Cornford, *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p.196.
- [67] 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p.47.
- [68] Frankford et al.,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pp.378 ff.
- [69] Ernst Cassir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p.37.
- [70] Frankford et al.,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p.230.
- [71] M. C. Cornford, "The Invention of Space", p.224.
- [72]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p.271~272.
- [73] J. H. Oliver, *The Athenian Expounders of the Sacred and Ancestral Law*, p.121.
- [74] Franz Cumont, *The Oriental Religions in Roman Paganism* (Chicago, 1911), p.39.
- [75]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p.278~280.
- [76] Ibid., pp.272~273. See also E.R.Goodenough, *By Light, Light: The mystic Gospel of Hellenistic Judaism* (New Haven, conn., 1955).
- [77]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301.
- [78] Gandz, "The Dawn of Literature", p.447.
- [79]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p.296~297.
- [80] Ibid., pp.303~304.
- [81] F. G. Kenyon, *The Text of the Greek Bible* (London, 1949), pp.245~247.
- [82] Ibid., pp.165 ff.
- [83] F. G. Kenyon,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Discoveries* (Chicago, 1927), pp.42~43.
- [84] Ibid., p.40.
- [85] Ibid., pp.56~59.
- [86] Kurt Weitzmann, *Illustrations in Roll and Codex*, pp.77~84.
- [87]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306. See also L. G. Rylands, *The Beginnings of Gnostic Christianity* (London, 1940), and W. B. Smith, *Ecce Deus: Studies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Chicago, 1913).
- [88] See N. H. Baynes,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IV, 1929, 367.
- [89] A. H. M. Jones, *Constantine and the Conversion of Europe* (London, 1948), pp.140~162.
- [90] Ibid., p.237.
- [91] Ibid., p.250.
- [92] A. A. 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the Great* (Cambridge, Mass., 1950), p.75.

- [93] Ibid., p.321.
- [94] Ibid., p.216.
- [95] Gandz, "The Dawn of Literature", p.485.
- [96] Ibid., p.491.
- [97] Ibid., p.498.
- [98] Ibid., p.512.
- [99]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ed. N. H.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 (Oxford, 1948), xxv.
- [100] Ibid., p.117.
- [101] Cited ibid., p.309.
- [102] Ibid., p.310.
- [103] A. A. Vasiliev, *Justin the First*, pp.78~80.
- [104] F. M. Stenton,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1943), p.170.
- [105] F. W. Buckler, *Harunu'l-Rashid and Charles the Great* (Cambridge, Mass., 1931), p.27.
- [106] *Byzantium*, ed. Baynes and Moss, p.123.
- [107] See Theodore Haarhoff, *Schools of Gaul: A Study of Paga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Oxford, 1920); also C. E. Stevens, *Sidonius Appollinaris and His Age* (Oxford, 1933).
- [108] Gandz, "The Dawn of Literature," pp.353~360.
- [109] Ibid., p.368.
- [110] H. M. Chadwick, *The Heroic Age* (Cambridge, 1926), p.93.
- [111] Ibid., p.347.
- [112] Ibid., p.443.
- [113] Ibid., p.458.
- [114] Julien Benda, *The Great Betrayal* (London, 1928), p.64.
- [115] Werner Jaeger, *Humanism and Theology* (Milwaukee, Wisc., 1934), p.24.
- [116] See H. M. Chadwick, *The Nationalities of Europe and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deologies* (Cambridge, 1945), pp.94~97.
- [117] *Byzantium*, ed. Baynes and Moss, p.32.
- [118] Etienne Hajnal, "Le rôle social de l'écriture et l'évolution européenne", *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1934, pp.255~259.
- [119] Ibid., p.266.
- [120] Adolf von Harnack, *Bible Reading in the Early Church trans.*, J. R. Wilkinson (New York, 1912), pp.48~49.
- [121] Ibid., pp.85~86.

[122] D. Diringer, *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London, nd.), p.476.

[123] Von Harnack, *Bible Reading in the Early Church*, pp.145~148.

[124] Emile Mâle, *L'Art religieux du XIII^e siècle en France* (Paris, 1910), p.3.

[125] P. H. Lang,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41), p.43.

[126] Ibid., p.85.

[127] H. E. Woolridge, *The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Oxford, 1929), I, 281.

[128] P. H. Lang,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p.162.

[129] Hellmuth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of Gernsheim and Mainz*, (Rochester, N. Y., 1950), p.9; also S. H. Steinberg, "Medieval Writing Masters," *The Library*, 4th series, X X II, 1942.

[130] M. S. Bunim, *Space in Medieval Painting and the Forerunners of Perspective* (New York, 1940), p.105.

[131] Ibid., pp.187~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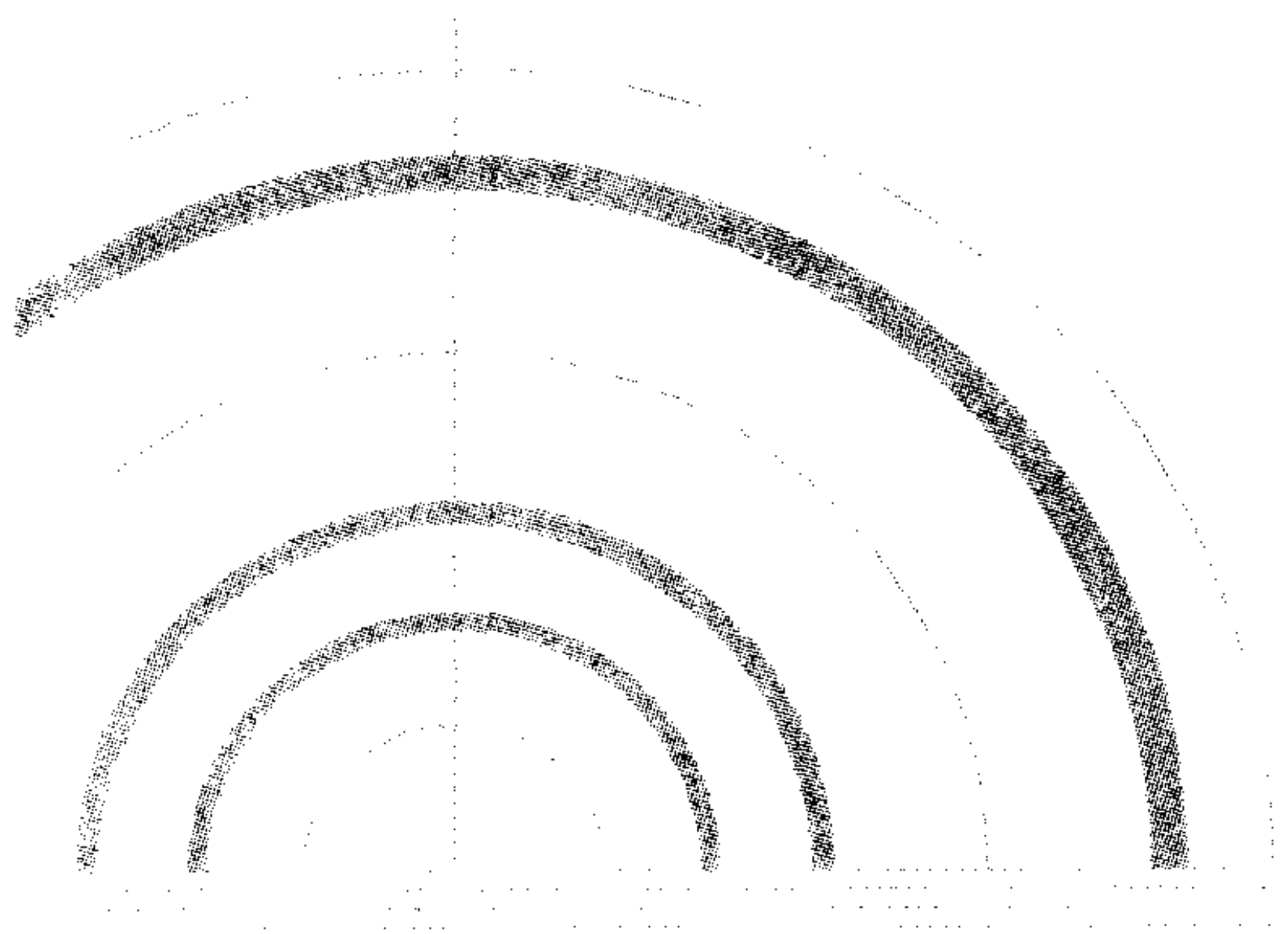
[132] Sigfried Giedio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 1941), p.31.

[133] Hans Koh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Mid-way Account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1949), p.55.

[134] Ibid., p.47.

[135] Cited by Julien Benda, *The Great Betrayal*, p.47.

[136]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p.46.



第五章

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

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一种文化的特质进行评价，其困难是异乎寻常，甚至是难以克服的——无论我们自己是否属于这种文化。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是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在20世纪，机器工业使我们积累了浩如烟海的信息，这明显地表现在百科全书、文明史和智力竞赛之中。20世纪人们对研究文明所给予的关注，就我们文明的特点来说，也许是顺理成章的。毫无疑问，这些研究的确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文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可能不受德国立场的影响。汤因比也不可能摆脱英语国家传统的影响，克罗伯^①也不可能逃避美国的影响，不可能逃避对科学客观性的执著。我们可以推定，一种文化的价值，以及人们看待自己文化的方式和原因，也是他们

^{*} 这是1950年12月3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会上宣读的论文。

^① 克罗伯 (Alfred Louis Kroeber, 1876—1960)，美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人类文化的性质及其过程。

那种文化的一部分。

或许，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每一种文明都相信它自己独一无二，相信它比其他文明优越。实际上，这可能就是文化的意义——例如，它相信某些特质是自己拥有而其他文明并不具备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文化著作可以分为两种：试图削弱别人的著作和试图加强自己的著作。圣奥古斯丁对原罪的强调，含沙射影地攻击代表世俗国家的人们。同样，洛克的“白板说”是他攻击基督教教阶制度的依据。斯宾塞^①论进步的著作，是他声称盎格鲁—撒克逊至上的依据。“理性正是而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理性只能服务激情、服从激情，它绝对不能硬撑着去承担任何其他的职能。”这句话不仅反映了他的著作的实质，也反映了休谟等人著作的实质。也许，每一种文化对自己独特性的迷恋，正是它最终衰落的基础。英奇教长说，文明几乎笃定是致命的疾病，除非能够及时控制其病根。印度教徒和中国人如蜗牛爬行，反而度过了艰难困苦而活到今天。^[1]

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作一番简短的扫描，就可以说明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在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它们的覆盖面有多大？在时间上延续了多久？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厌烦的情绪和停止不前的历史还没有人写。这样的历史不妨包括雅典政治家和将军亚里斯忒提斯的流放政策，因为希腊人听他的绰号“公正的亚里斯忒提斯”已经听腻了。休谟写到：“从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登峰造极的那一刻起，它们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里盛极一时之后，很难得甚至是不可能再一次在那个国家里复活。”激烈的文化运动之后必然是疲惫。

短期内专注于激烈的文化运动的能力，以及短期内在广阔的领土上调动思想资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高效的武力。文化运动意在强调威望，这在建筑和雕塑领域表现尤其明显，因为这样的活动能够在广袤的土地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运动成为权力的标志。各个

^①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代表作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等。

王朝都对连续性表示关切；作为王朝基础的父权制又受到生物学局限，生命苦短；长时期维持高水平的文化又遭遇到困难；所以各个王朝就不得不着力于建筑的风格，苦心孤诣地借此反映王朝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控制权力。金字塔成为时间控制权的标志。然而它们代表的王朝还是被后来的王朝取代了，新王朝又专注于新的纪念碑，以抬高自己的威望。尼罗河沿岸留下来的星星点点的都城，使我们想起一代接一代的王朝对威望的追求。埃及帝国的强大就是对它的历代王朝成功的礼赞。然而，都城这样的丰碑，由于装点着陵墓、宫殿、神庙和雕塑，其耗资庞大，所以它们恰好大大地加速了帝国的灭亡。都城里的政权需要书写等文化活动的支撑，历代官僚体制显然是需要文字支撑的。

两河流域的发展路径和尼罗河相似。但是，两河流域在空间问题和有组织力量的问题变得尖锐之前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时间问题的办法。等级森严的组织、虔诚的宗教社区——这是苏美尔文明的特点。尽管用三角洲黏土砖砌成的建筑地位显赫，泥版上书写的东西才是交流、行政和贸易的基础。萨尔贡是阿卡得王朝组织力量的典型代表。这种力量能够把宗教社区控制起来，再加上它拥有文字，所以它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有了以文字为基础的宗教，苏美尔文化就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它摆脱了一位外国的统治者，在乌尔建立了庞大的都城，而且持续了几个王朝的时间。后来，苏美尔文化被新的征服者控制；于是拥有宫殿和神庙的新都城在巴比伦建立起来。宗教折射的时间控制一旦和空间控制相结合，就产生很高的效率。这种效率清楚地表现在巴比伦悠久的历史中。在喀西特王朝统治下，巴比伦的首都地位保持不变。

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在早期文明中，技术进步的显著表现是：马的使用，非洲矮个马与亚洲高大马的杂交技术以及马术的引进和用骑兵取代马拉战车。接着就是铁器取代青铜器。赫梯人使用铁器之后，成功地建起一个帝国，其首都突出雕塑和建筑的地位。不过这个帝国南北受限，南方是巴比伦堵截，北方有希腊人挡道，希腊人在特洛伊城控制着出海口。继赫梯人之后而起的是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尼尼微建都，成功地抗拒了尼罗河和巴比伦的威望，建立了一个包括这两个文明的大帝国。其威望的确立，不仅仰赖建筑和雕塑，而且仰赖文字。图书馆成为帝王权威的一个了不起的工具。他们树立的榜样，对西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亚述

帝国关心图书的收藏。他们在首都尼尼微的图书馆收藏了苏美尔人的文书。其库藏之丰富，只有亚历山大城、罗马、巴黎、柏林、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图书馆可以与之媲美。我们加拿大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在渥太华奋起直追。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亚述人不仅仰赖图书馆，而且还利用民众对战争的狂热，在这一点上，只有20世纪可以与之匹敌。亚述帝国的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巴比伦和埃及文明的顽强生命力和丰富多样性。

在亚述帝国遭到失败的地方，波斯帝国却成功了。它用体育建筑和雕塑来突出首都的重要性；同时，它又承认区域都会的重要性和各个总督府的重要性。这些地区都会都是由帝国首都这个中心管理的。它承认巴比伦和埃及的宗教，鼓励耶路撒冷希伯来人的宗教。从这里可以看到“分而治之”原则的雏形。然而，正如亚述帝国的情况一样，波斯帝国的政治组织不能够满足连续性的要求。

政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武装力量，其特点是权力的集中化。它们突出首都的作用，并且给文化活动留下的印记，如建筑和雕塑。政治组织在陆地上兴起，从尼罗河谷到小亚细亚。它们给交通设施的发展提供了庇护，也给贸易的成长提供了保护，例如阿拉米人的陆上贸易和腓尼基人的地中海贸易。交流服从于宗教和政治组织里权力集中的需要。政治组织的特点，是使用眼睛而不是耳朵。职业抄书人在集中化的官僚体制中占据了战略地位。

我们试图以其他文明为镜子，借以理解自己的文化。在研究希腊文化及其后继者时，我们面对着很大的危险，因为我们的文化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尼罗河文明和小亚细亚文明对地中海北岸民族的影响，是有限度的。米诺斯文明，就表现出陆上文明向海上侵蚀的企图。由于来自地中海北岸的抵抗，这一文明的推进归于失败。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可它还是衰落了。希腊人避免了两河流域文明的那种集中化倾向。这一类文明的结果表现在都城、建筑、雕塑上，也表现在文字上，而文字又意味着官僚体制。希腊人在地中海岛屿和沿岸定居时，他们强调适应当地需求的文化因素。口头传统而非文字构成了希腊史诗和文学的基础，而史诗和文学又旨在团结分散的移民点，使之具有希腊文化的意识。他们借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加上元音，使之更加适合希腊口语的需要。于是耳朵就代替了眼睛。随着文字的流布，口头传统反而开发出了新的抵抗力，这表现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之中。对东方式首都的兴趣，显著地表现在公

元前 6 世纪的雅典僭主时代和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帝国时代。然而，正如史诗和悲剧反映了希腊文明的特点一样，希腊建筑和雕塑也同样反映了希腊文明的特点。“经典艺术家的雕像，是古代舞蹈艺术留下的遗迹。”（S. H. Butcher 语）“经过艰难跋涉，印度、波斯和埃及的艺术，创造出了神魔鬼怪。此后，人们却突然发现希腊的美丽和典雅。”（Sir James Mackintosh 语）“万事勿过”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的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 5 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衰落了。

希腊文化活力的兴旺，最终表现在军事技能之中，表现在马其顿王腓力五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扩张和征战之中。在希腊化的王国里，城邦中的希腊政治组织，和早期文明特有的观念接触，并且与之达成妥协。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首都的建设是恢复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新的首都，并且创造了一位新神，以摧毁旧都城底比斯的影响。他们修建了一座图书馆。这是为了利用希腊人的局限性，并抵消巴比伦人的影响。阿塔罗斯王朝^①在帕加马建都，修图书馆，其目的是为了抵消亚历山大城的声望。塞琉西王朝^②最终被复兴的波斯文明击败。

在东部，沿地中海北岸，罗马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摧毁迦太基后，他们继承了腓尼基人的商业传统，把自己的影响推广到东部的希腊化王国。在西部和北部，他们把罗马的影响推广到西班牙和高卢。埃及人对罗马人的影响，表现在神化统治者上，也表现在共和制的衰亡与罗马帝国的兴起，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的集中制上。他们试图抵制波斯文明的影响，这表现在罗马皇帝走向东方，并且最终在君士坦丁堡建都，其目的是要寻求希腊化文化的支持，其中也包括基督教。随着蛮族的入侵，罗马走向衰落，君士坦丁堡兴起并成为政治中心。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都城处境困难，因为他们的根子还扎在更加悠久的文明中。其反映是那个时期的宗教纷争。纷争的结果，是罗马成为西部的宗教之都，伊斯兰教在东方兴起。在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中，兴起了新的都城，它们是东方的巴格达和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他们有一种新的不同于莎草纸和羊皮纸的传播媒介，这就是纸。这就使穆斯林能够建立图书馆，并激发君士坦丁堡新的做学问的兴趣。在西部，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加强罗马威望的一个机构。同时，罗马的政治影响又提高了巴

① ② 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统治小亚细亚希腊王朝。

黎作为神学中心的威望。罗马教廷发动十字军东征，希望重新夺取耶路撒冷，恢复对东部教会的控制。接着就涌现出了一批小型的意大利城邦共和国，尤其是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火炮的使用促成了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努力。在东方，他们企图恢复基辅的威望；在西方，他们力图恢复在巴黎的威信。但是，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终于在1453年崩溃了。

位于北地中海沿岸的都城，虽然受到了尼罗河和两河流域都城的影响。但是，希腊的口头传统还是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埃及和东方的绝对君权演变成为罗马皇帝、英国都铎王朝、法国的路易十四和俄国沙皇的王权。绝对王权的影响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巴黎和圣彼得堡，都是显而易见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城邦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城邦共和国中得到了恢复，希腊城邦的影响使宫廷的暴政受到一定限度的制约。拜占庭帝国历时一千余年。它在寿命长度上堪称独特。尽管它的领土时大时小，然而它在解决空间问题上的成就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巴黎成为西部的文化中心，在路易十四时期尤其是如此。查理二世时期的英格兰，和俄国的宫廷都受到法国宫廷的影响。实际上，凡是西方文化盛行的地方，法国宫廷的影响都显而易见。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柏林、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华盛顿，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黎文化的支配。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文化却保存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法国被德国占领，法国文化也还是保存下来了。当时的法国作为国家被占领了，可是其文化未灭亡。和巴黎一样，伦敦也依赖文化的影响，而不是依赖政治组织。在英联邦国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的文化影响。

简单地对早期文明做了一番回顾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试着评价一下自己的文明了。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文明在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上，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强调过传播对早期文明的特征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传播方法变革的重要意义。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到眼睛占支配地位而非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中去。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记录在《圣经》对文字的关注中，记录在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崛起中。直到美国宪法中保证新闻自由的《人权法案》通过之后，印刷术的冲击力才全部释放出来，用印刷术来保证新闻自由，宗旨是把印刷词语神圣化，意图是为保护既得利益的大厦提供一

根坚强的支柱。印刷术承担了大批量生产和复制词语的责任。一旦它摆脱羊皮纸手稿的模式，它就促使我们印制数量庞大的新的文字材料，包括满足科学技术需要的新资料。传播的改善加速了市场和工业的发展。印刷工业之后，兴起了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蒸汽机被用于造纸和印刷业，给印刷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们的文明是随着印刷工业的大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也许，我们和这种文明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探察不到它的特征。用拉斯基的话说，教育成了教书匠教育人们如何用书面语言来欺骗自己的艺术。“报刊最重要的服务，就是教育人用不信任的态度去对待印刷品。”^[2]然而，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我们这个文明带有其他一切文明的特征，这就是它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相信自己比其他文明优越。对于印刷业的自我吹嘘，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它说，印刷业造就了一种崭新而优越的文明。它告诉我们，其他的任何文明都不具有我们所具有的优越性。民主、教育、进步、个人主义等美妙的词语，描绘出我们这个崭新的天堂。在这里，缓流成了急流，我们处境危险，可能会被自己描绘的景象卷进急流险滩。我们面临的危险在于：一方面我们可能失去看待问题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被禁锢起来。新闻自由始终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堡垒，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新闻垄断的堡垒，那也是危险的。任何文明都有其牺牲者，中世纪烧死离经叛道的人；现代世界也在用原子弹威胁离经叛道的人。

希腊文化有一句格言，叫做“勿过”（nothing in excess）。现代文明与希腊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明截然相反。现代文明以机器工业占主导地位，它关注的是专门化，而专门化总可以说是“过”（in excess）的。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痴迷于专门化和工业主义，而且都强调平等。对物质商品感兴趣是苏格兰人的特征，其代表就是亚当·斯密。撒缪尔·巴特勒^①对由此而生的态度进行了描绘：“一切有机体都渴望，他的生活能够比他现在的情况好，这是一个普世的固有特征。一切进步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妨碍我们理解这些文明。工业主义就是关注技术，这意味着把时间切分成精确的段落，以满足工程师和会计师的需要。由于无法避开工业主义

^① 撒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英国小说家、小品文作家和评论家。

对时间的要求，我们评价空间局限性的能力从而被削弱。技术不断的变化，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变化（比如广播电视的开发），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求得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就更困难。

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与其他社会的文化价值不同，而不同文化之间伦理价值是否均等，这个问题似乎比其他的价值是否均等，是更加成问题的问题，虽然柴尔德^① 教授对数学这样抽象领域可能会产生的价值变迁，进行了描绘。英奇教长提醒我们注意两种现象：一方面现代文明非常敏感，比如对虐待动物的态度就非常敏感；另一方面，对难以置信的不人道行为，人们又是极端地麻木不仁。与此同时，自发的和无意识的艺术生产就完全崩溃。^[3] 伴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兴起，英国和美国的城镇变得丑陋了，自然美景随即消失。埃肯（Von Eicken）提出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其结论是：人的运动挑起猛烈的反应。历史上不乏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实证。从激烈的民族主义中产生的罗马帝国主义，由于它摧毁统治者和臣民的民族性，而走向末日。其天主教抛弃现世，成为虚弱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普选预示着议会政府的末日。越是能够磨平差别的民主国家，越是无力抵抗暴政。法国革命对人道主义的兴趣，点燃了西班牙、德国和俄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烈火。^[4]

人类学家对甲文化入侵乙文化产生的危险，进行了探索，皮特-里弗斯^② 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议会制度引入欧洲大陆，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后果，历史学家对此做了评说。欧洲人进入北美，使美洲文明遭到灭顶之灾。这方面的著述真是车载斗量。在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向另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迁移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动荡。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欧洲的 30 年战争（1618—1648），20 世纪的战争都说明了文化变迁的代价。第四点计划^③ 对其他文化的冲击，所谓“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冲突，都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有些是战争中的直接损失，有些是文化变迁中的间接损失。共产主义从法国传播到俄国再传到中国，进一步说明了西方文明的非稳定性。早期某些文明所具有的稳定特征，并不是我们这个文明追求的目标。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杀的方法。

① 柴尔德（V. Gordon Childe, 1892—1957），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研究比较文明史，尤其是史前史，代表作有《欧洲文明的黎明》、《人类创造了自己》、《历史上出现的事物》等。

② 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英国考古学之父。

③ 1949 年杜鲁门总统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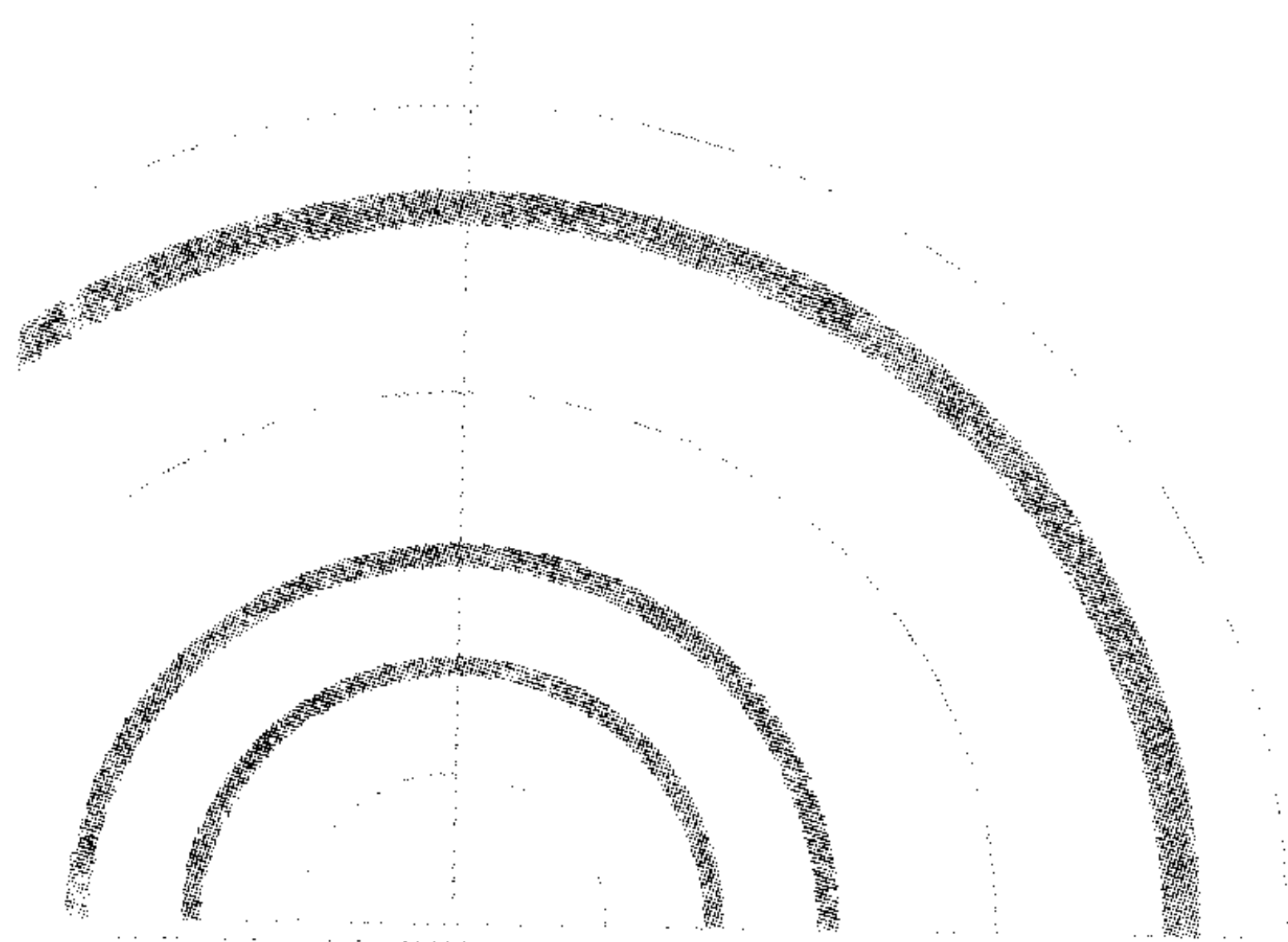
【注释】

[1] W. R. Inge, *Diary of a Dean, St. Paul's 1911—1934* (London, 1950), p.195.

[2] *Further Extracts from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Butler*, ed. A. T. Bartholomew (London, 1934), p.261.

[3] See his essay in *The Legacy of Greece*, ed. R. W. Livingstone (Oxford, 1923), p.40.

[4] W. R. Inge, *Diary of a Dean*, pp.208, 210.



第六章

18 世纪的英格兰出版业^{*}

印刷业的垄断对英格兰的启蒙时代具有重大意义。1689 年的革命之后，议会的地位日益重要。公共舆论作为权力基础，变得更加有效。要求对公共舆论作出更加有效回应的呼声，贯穿了整个 18 世纪。在该世纪后半叶，议会作出了许多让步。

公共舆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纸的供应和印刷的成本。18 世纪初，英格兰大约有 180 座造纸厂，每年生产 6 万令纸，包括供国内消耗的“低档次”的纸和白报纸，总金额在 3 万英镑到 4 万英镑之间。英格兰消耗的 40 万令纸中，大约有 2/3 是在国内生产的。1739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 278 家造纸厂，纸浆池 338 座。造纸工业能有如此业绩，部分原因是由于 1712 年起实行了强制性保护关税。1742 年，从荷兰进口纸品的高提耶兄弟公司，从伦敦发出一个报告称：“我们差不多已经歇业，垂头丧气，几乎是无立锥之地。这里的纸张贸易陷入低

^{*} 本文是 1949 年 4 月 19 日在密执安大学讲演时的讲演稿，现略有删节。

潮，贸易额越来越小，因为英格兰造纸业的生产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与日俱增。”^[1]18 世纪末的联合王国共有造纸厂 500 座，每年它生产的手工纸达 1 万吨，进口的碎布达到 0.9 万吨至 1 万吨。造纸厂的扩张只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其条件是水源丰富，地势开阔。此时造纸业和新闻业的机械时代尚未到来。人类思想还没有受到机器的主宰。

和 19 世纪相比，18 世纪造纸业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2]这样缓慢的增长，加强了出版业的垄断地位。18 世纪初，洛克抱怨说，文具公司垄断经典作品的经营，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他们的作品印得很糟糕，从字、纸张到正确性都是如此，几乎没有一本书是可以容忍的”。“……我们的印刷是如此糟糕，而书却是如此之贵。”^[3]1694 年，营业执照法被废除，这有一半是洛克的功劳。出版业的显著扩张随即出现。过剩的发展使限制成为必需。由于印刷商、造纸厂主和书商的请愿，1710 年 4 月 10 日颁布了版权法。该法对此前出版的书籍提供 21 年的保护，对此后出版的书籍则保护 14 年，如果作者仍然在世，保护年限再增加 14 年。英格兰的盗版受到了遏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盗版却仍然盛行，从欧洲大陆到英国的书籍走私活动持续不断。1739 年，英国立法对法国与荷兰的进口纸课以重税，对非法进口书籍从重处罚。

政治纷争和欧洲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作家营垒分明，支持不同的党派。对新闻的需要为咖啡店扩大了市场。营业执照法取消之后，新闻成了可以出售的商品。战争结束之后，新闻记者、邮差和报童的立场，用艾迪生的话来说：“比士兵的立场还要坚定，他们攻城掠地，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比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士兵们静卧的时候，他们却在组队发起进攻。当围攻的士兵在战壕里静候时，他们已经向许多地方发起了总攻。在将军们大功未成之时，他们已经给我们夺取了若干重镇。当我们最伟大的将官庆幸打了一个平局时，他们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尤金王子（Prince Eugene）在战场上击杀数以千计的敌人时，布瓦耶（Boyer）已经杀死了上万的手。”

1710 年以前，文学受委托人的支持，带有政治武器的性质。“什么东西也不如出色的讽刺题材好”。各个政党都争取斯威福特、笛福、艾迪生、斯蒂尔等作家为自己效力。哈利^① 首先认识到报纸对政府的威

^① 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英国政治家，托利党和圣公会领袖，为安妮女王之宠臣。

望至关重要。笛福的《评论》对托利党^①持比较温和的拥护立场。从1710年11月2日到1711年6月4日，艾迪生在《考察者》上发表的每周时评强化了笛福对托利党人的支持。“到那时为止，政治作家一直是走卒，常常与间谍无异。此前也好，此后也好，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用这种政治手腕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如今，报界总体上更加强大了；但是，没有哪一张报纸能够这样一举而跳入权力的圈子。斯威夫特成名时，政治写作的影响已经具有很大的威力。”^[4]对于托利党人而言，权力的重心已经由议会转向报界。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同盟的举止》，有力地促成了马尔伯勒公爵^②的倒台，并且最终促成乌特勒支条约^③的签署。笛福所受的教育博大精深，他能够敏锐而准确地知道公众的口味，而且对时代有深刻的洞见，所以他能够用精妙的细节描写来表现广博而抽象的主题。通过对赞助费的巧妙使用，1713年，在他返回都柏林时，给伦敦留下了一个有效的政治和新闻组织。安妮女王1714年驾崩之后，政府不再受到君主个人的干涉。正如史蒂芬（Leslie Stephen）所言：“人人皆知，乔治一世和万能的上帝没有关系。”

笛福深知，作家是否受欢迎，取决于那些并不关心政治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笛福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为当时的情况而写作，为最大多数的人最大利益而写作。他成为公众的神使，能够预卜未来。他在传单中引入一种清新而轻松的题材。他带给公众一种描写轰动事件和超自然事件的小品文。由于他对人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和政党的关系是比较弱的。在依靠赞助方面，他从辉格党人转向了托利党人。他能够“像讲真话那样撒谎”^[5]。在这方面，他的天才无与伦比。他将辛辣而具有说服力的政治批评，国内新闻及轻松的社会漫游，融为一体。他把报纸变成一个具有首创和改革精神的新闻工具。他还试图让报纸取得它期望的独立。

托利党人得到了斯威夫特的支持；辉格党人则得到了艾迪生的支持。笛福的温和立场对他们两人都助了一臂之力。英国保守党人、政治领袖哈里法克斯据此相信，小册子这种政治武器，必须用报纸来代替。报纸要突出新闻的地位，更要突出精心构想而简洁明了的观察的作用。艾迪

① 时为反对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的保守党人，后一直用以指保守党人。

② 马尔伯勒公爵（First Duke of Marlborough, 1650—1722），原名 John Churchill，英国海军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建功。

③ 乌特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为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于1713年4月至1714年9月期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

生首创了社论，用以代替小册子和短文。笛福把小册子的形式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社论，又使新闻记述成为报纸的一部分内容。艾迪生在此基础上又做了发展。斯威夫特抨击新的富豪，使之和地主贵族的关系恶化。相反，艾迪生和斯蒂尔缓和了新富豪和贵族之间的仇恨，使报纸成为有净化作用和建设性价值的力量，对政治家如此，对满怀宗教虔诚和博爱之心的人也是如此。报纸履行了教会社区的责任。由斯蒂尔主笔的《旁观者》和《闲谈者》，通过艾迪生的定期小品文，通过对安妮国王治下妇女读者地位的强调，在复辟时期的世俗放荡和清教徒的刻板僵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他们的文章在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制造了有组织的公共舆论。1716年，艾迪生写道：“这种政治幽默在大不列颠人民中迅速普及开来。在造就这种幽默的一切办法和手段中，最流行和普及的办法，恐怕是用报纸来发表国家大事，再也没有比这个潮流更加有效的办法和手段了。”^[6]“长期以来，风趣和美德分离，铸成灾难，风趣被放荡引入歧途，美德被疯狂送上邪路。如今的艾迪生把它们协调起来。”（Macaulay语）^[7]在艾迪生和斯蒂尔的努力之下，新闻业^[8]不再依靠赞助人的施舍。定期出版的文章抵制住了“报纸上短命的闲聊文章、恶毒的小册子、下流诗歌、淫荡故事的影响”。这些定期出版的文章集结成册，给人们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成为道德水准更高、富有教育意义的、轻松的读物。《旁观者》是一种首创的、最好的、风格独特的文学。它向公众述说自己，是“我们时代真正流行的文学”（Thomas Hill Greene语）。

1712年，在安妮女王治下，小册子、报纸和广告被课以印花税，这就使印刷品价格上涨。结果是发行量减少，政党的赞助随之增加。正如莫里逊^[9]指出的那样，6个版面（也就是一张半新闻纸）的周刊迅速增加，以逃避纳税，因为税法没有规定这样的报纸纳税。每周刊布的反对文章与周报的形式结合起来，道德训诫的文章和批判文章成为主要的内容。周报的新闻从日报或其他文章中搜集，因而成本降低。到1720年，报纸已不再是新闻的主要供应渠道。

沃尔波尔执政时期，反对势力偃旗息鼓，报纸受到了控制。^[10]作家不再享受慷慨的资助，他们的兴趣发生了转移。在爱尔兰，斯威夫特用《布商的信》向政府发起了有效的攻击。他在信中建议：“到历史中去寻找与我们要描绘的人物相似的人物，落笔时行使我们的绝对权威，该修正就修正，该增加就增加，该压制就压制，一切由我们随意决定。”戈登（Thomas Gordon）立即作出响应，他在《伦敦》杂志中用卡托（Cato）的笔名发起攻击。接着，斯威夫特自己又用《格列佛游记》来

讽刺政府。蒲柏写出了《群愚史诗》^①，盖伊^②写出了《乞丐的歌剧》。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追随他主要的兴趣。“笛福紧凑的语言让位于啰嗦的风格，目的是要把意义深深地包裹起来，以避免被抓捕的命运。”^[11]从那个时期狂热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新闻力量，被保留在儿童故事和盖伊的作品中。也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长期支配英语文学，直到柯尔律治^③ 和华兹华斯^④ 举起造反的旗帜。

由于报纸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沃尔波尔执政的时期，弥合了处决国王的制度（1649 年处决查理一世）和议会的灵活性制度之间的鸿沟。报纸的协调作用、内阁的出现、来自德国国王麾下的一位首相、还有一位难伺候的威尔士亲王^[12]，这一切产生的后果是：变革而可以不动君主。但是，伴随这一变革的，是直接间接控制公共舆论的手段。1715 年制订了《动乱法》，牛津和剑桥设立了钦定讲座教授，“目的是要在神职人员中养成普遍的依赖性和期望”^[13]。1737 年制订了剧院执照法。有人在 1731 年 2 月 18 日的《格拉布—斯特里特》杂志称：“受人讥笑‘博得普遍的尊敬，在行内人的心目中，受人讥笑是在印刷业获得同行认可的标志’”。^[14]公共舆论已经和大法官霍尔特的立场拉开距离。1704 年，霍尔特在审理约翰·图特钦的案子时曾经说：“如果允许有人利用对政府不满的舆论来控制人民，而又不承担责任，那么没有哪一个政府是能够生存的。因为人民对政府的良好看法，是一切政府生存之必须。”^[15]不过，那个时期的著作还是受到政府的压制。

报纸的影响延伸到乡村。1710 年邮费降低、邮路增加之后，报纸的影响尤其扩大。1723 年，爱德华·凯夫（E. Cave）在邮局任职以后，他在乡村给伦敦报纸提供新闻，又把伦敦的新闻送到地方的报纸。1725 年加税之后，报纸的价格上涨 1.5 便士~2 便士。但是杂志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却可以逃税，其售价为 6 便士。1731 年 2 月，凯夫创办了

① 《群愚史诗》（The Dunciad），蒲柏模拟史诗体的嘲弄诗，分四卷，嘲弄当代知识界愚不可及的自大狂。

② 盖伊（John Gay, 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乞丐的歌剧》，诗作《乡村游戏》、《琐事：漫步 London 街头的艺术》等。

③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19 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和思想家之一，其诗作进入英国文学中最伟大作品的行列，尤其以以下两首诗歌闻名：《忽必烈汗》、《古舟子咏》。对同时代的文学家有很深的影响，富有质疑问难的研究精神，引导人们去问：这诗的意义何在？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作品最主要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他崇拜大自然，人称“大自然的僧侣”、“湖畔诗人”杰出的代表。与柯尔律治合作的《抒情歌谣集》（1798）被认为是英国诗史的一个转折点。

《绅士》杂志。次年，议会新闻成为其固定栏目。他每月用专栏对所有的报纸做一番述评，其涵盖面超过200种半印张篇幅的报纸。他使出版业稳定下来，由此而挫败了沃尔波尔首相给杂志课税的企图。他不偏不倚地概述新闻，用历史杂录的传统来浓缩周刊里的记述。^[16]其中的索引增加了杂志的价值，使之成为很好的参考读物。沃尔波尔利用这些定期周刊，控制宣传。这比安妮女王治下不定期的小册子更加有效。小册子的时代寿终正寝，反对派的力量因而转向报纸，尤其是《工匠》报。这是1726年12月5日柏林布洛克（Bolingbroke）创办的报纸。议会新闻在期刊中大量出现。1738年禁止印刷出版议会的辩论录之后，《绅士》杂志和《伦敦》杂志又化名发表改头换面的议会辩论。两家杂志的竞争使文风更加明快。1747年4月，两家杂志的编辑被送到下院受审，并且被迫接受罚款处理。他们被迫停止出版议会辩论录，这使得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文学新闻和科学新闻上，同时也更加注意国外新闻。这使他们的杂志摆脱了周刊的束缚。为了增加销量，《绅士》杂志设计了诗歌竞赛。为了和《伦敦》杂志竞争，它到处宣传自己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关系。1750年之后，书评成为常设的栏目，政治评论压缩到很小的版面，这说明读者对文学和科学的兴趣增加了。这样的兴趣给另一家对手《每月评论》提供了支持。这是格里菲斯办的杂志。研究《绅士》杂志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凭借不偏不倚和与当事者拉开距离的报道，它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增长，促进了海外商业利益的发展。《绅士》杂志建立了一套新闻评价标准，确立了批判、公开报道的原则。公众一贯要求的新闻、议会辩论自由和报界的解放，这时已经成为习惯了。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民主传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伦敦出版发行的小型报纸，数量庞大。这反映了手摇印刷机印制能力的局限性。熟练印刷工人靠接力棒似的流水作业，在8个小时之内只能印2000张纸，而且仅限于印单面。发行量为3000份的报纸，需要12个小时高速度的印刷才能完成。一份流行的报纸需要4台印刷机，每两台负责印一面。所以，一张报纸至少要排两次版。这些困难不仅促进了杂志的发展，而且引导人们去解决广告的问题。1728年，咖啡店的代表抱怨说，他们被许多报纸当做工具来使用，他们在报纸打了广告，可是得不到回报。他们建议，办两份日报，专门发布本地新闻和广告。于是就诞生了《广告日报》，该报旨在克服反对者指出的弊端：少数几个人在许多报纸中打同一份广告，只有经营情况最好的咖啡店有财力买进所有的日报，于是能够看到所有报纸的就只有坐在咖啡店的少数

人。^[17]类似《广告日报》的报纸至少用 3/4 的版面来打广告，读者和广告人的地位都得到提高。1760 年，《公共分类报》用半个印张的版面印出安妮女王的肖像，也就是 4 个对开的版面，每版 4 栏，大概相当于双栏篇幅的 5 倍。但是，到了这一步，手摇印刷机已经到了极限，这个标准就固定下来了。

报纸的局限性对书籍的出版产生影响。纸张贵、排版成本低的结果，是每版的印数减少；书的开本也随之变化，安妮女王在位时从对开变为四开。出版商很快出现，他们能够给出版发行提供有效的渠道。于是，印刷商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由于宫廷鄙视文学，对文学的赞助迅速减少。1721 年之后，在沃尔波尔担任首相期间，作家普遍缺乏写作的兴趣。于是，作家就从依靠政府转而依靠出版商。约翰逊博士的赞助人“常常是一位恶棍，他提供赞助时傲慢无理，得到的回报是肉麻的吹捧”。他也可能“麻木不仁，看着落水人苦苦挣扎，不施援手，等到落水人挣扎上岸，他才给予帮助，使这个苦命人背上包袱”。到 1761 年，这样的赞助人更是少得可以略去不计了。^[18]

作家听凭出版商摆布。文学作品的市场有限，所以出版商把力量集中在信息手册之类的东西上。印刷商的胆怯成全了出版商，使出版商集中精力编纂依靠预订而出售的书籍，以取代依靠赞助出书的情况。这样的生产要消耗大量的资金，需要合伙制和股份制，合伙和股份的目的是减少风险，促进资金流动。1719 年，7 家出版商合股组成一个印刷公司。1736 年又产生了另一家合股公司。后来，这两家公司都被一家地区公司取代。原有版权的持有人结成同盟，把版权分散到许多书商的手里，以此减轻竞争的风险。1720 年之后，一支靠文字谋生的落魄大军，干起了文字的苦役：删节、编纂、注释，靠糢糊和剪刀，拼凑航海志、游记、历史和自然史。蒲柏设法为几位作家寻找赞助，但是赞助毕竟有限。作家依赖书商就是依赖市场，他们依靠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以此来取悦多数人。1728 年，钱伯斯《艺术与科学大词典》的第一版是依靠预订出版的。这本词典翻译成法文之后不久，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就出版了。1746 年，《百科全书》的 8 位合伙人同意给约翰逊博士支付 1 575 英镑，购买他的《英语辞典》的版权。

蒲柏的《愚人史诗》抨击了落魄文人和厚颜无耻的出版商。1730 年 1 月 8 日创办的《格拉布—斯特里特》杂志^[19]猛烈抨击书商。指控他们利用才能低下、无知的作者出版“胡编乱造的历史、下流的小说、剧本或诗歌”。它也抨击报纸和广告。不过，它本身也代表着一批出版商，只

不过他们是与出版业传统决裂了的出版商。因此，“书商及其御用文人普遍反对它、贬低它”。因为作家想尽量多写，而书商却尽量让作家少写，所以又长又臭的编纂和杂七杂八的书就出笼了。写书变成机械劳动的行当，书商变成作家的衣食父母和钱袋子。编纂在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印刷业的扩张与文学的阅读、写作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20]

18 世纪后半叶，一些批评杂志站稳脚跟，这说明数量庞大的阅读公众即将产生。1749 年，拉尔夫·格里菲斯创办《每月评论》。1756 年，阿切博尔德·汉密尔顿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创办了《批评月刊》。1760 年之后，有声望的作家可以从出版商那里得到可观的收入，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摆脱苦役的命运，这种状况到了 19 世纪仍然如此。18 世纪末，伊萨克·迪斯累里（Isaac D’Israeli）写了一本名为《作家的灾难》的书。R. H. 霍恩写的《揭开用假中介和障碍排斥天才作家的黑幕》，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不过，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承印人是激进的出版商埃芬翰·威尔逊。托玛斯·坎贝尔提议给拿破仑祝酒，因为他枪杀了那些用作家头盖骨作成酒杯庆贺发财的出版商。

1741 年，由于邮政发展，从伦敦出发的邮路更加频繁，报纸杂志的市场得到拓宽。对剧院和报业的限制，以及书籍发行的改进，加速了小说和儿童图书的发展。班扬^①的《天路历程》把对白引进小说，而对白原本是戏剧的媒介。笛福又把故事情趣引进英国小说。以印刷为业的里查森接受文顿和奥斯本公司的委托，编印了一套“以普遍关注的实用性话题为内容的日常书简丛书”，作为书信体的范本，“让乡下的读者……自己学会写信”。这个《帕梅拉》丛书的前两卷于 1741 年 1 月问世。菲尔丁^②先是写剧本。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在 1742 年 2 月出版。这本小说是模仿《帕梅拉》写的讽刺小说。里查森把情节、人物、描写和对白糅合起来，使他的作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小说。菲尔丁把小说从书信的暴政和控制中解放出来。斯摩莱特和斯特恩使小说的题材大大拓宽。^[21]流动图书馆，“神魔知识的这棵长青树”，自从它 1740 年在伦敦面世之后，很快就推广开来。

到 18 世纪中叶，儿童图书涌现出来，成为“英国文学一个明确而从属的分支”。1744 年，约翰·纽伯里出版了《小小袖珍书》，有意识地

① 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英国散文作家，清教徒牧师，反对王政复辟，因违反国教而被囚禁 12 年。代表作为《天路历程》。

②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善于政治讽刺喜剧和讽刺小说。代表作为《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和《约瑟夫·安德鲁斯》。

给读者带来乐趣。^[22]他“首创插图本儿童图书，把儿童图书作为特殊的商品来生产”^[23]。小商贩背着背囊推销儿童图书，乡间的交通也有改善，所以儿童图书市场已经培育起来了。图书和药品被放在一起出售。纽伯里公司尤其对詹姆斯牌的祛热粉感兴趣。我们亟须研究江湖药品和文学商务的历史。不过，书商和出版商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药品销售的利润。

图书市场是拓宽了，然而书商的垄断力量反而得到加强。铎兹利办的杂志《公共纪事》（1741）被扼杀。他受到威胁，说是要把他的杂志当做报纸来课税。各个报社都受到压力，不准登他这个杂志的广告。同样，亚瑟·杨的《寰宇博物馆》（1762）也受到压制。斯摩莱特被劝说写一本历史，以减少休谟的《历史》的销售量。作者们试图避开出版商，自己印书，但是这些书的销售受到阻挠。1774年2月22日，垄断地位受法律保护的状况被改变了。在唐纳森对贝克特的诉讼案中，法庭的裁决是，依照普通法否决永恒版权的要求。旧书的版权被否决之后，小书商就能够销售廉价而便宜的重印本了。过去受垄断保护的集团之间签订了互惠合约，以吸引一个缩小了的、更加专门的市场，牟取更大的利润。也许，竞争愈演愈烈的结果，是刺激大型出版社搞大型的书籍，包括罗伯森、亚当·斯密和吉本等人^①的大部头。这是18世纪的特征。1769年，休谟写道：“如今，人们对戏剧漠不关心，几乎和不关心布道坛一样。历史书成为受人喜爱的读物。我们的朋友罗伯森成为受宠的历史学家。”^[24]苏格兰的作者没有长期受到“苦役”的折磨。苏格兰书商抓住垄断市场的机会，他们在伦敦发展业务，在苏格兰印书销往伦敦。第一部《大英百科全书》是在苏格兰出版的，时间是1771年。垄断期间英格兰图书市场的真空，由苏格兰蜂拥而入的影响填补，其高潮是司各特作品的发行。

垄断打破之后，对报纸的限制促进了图书销售业的扩张。1753年的图书发行量是7 411 757册。1790年发行量就增加了一倍，达到14 035 739册，尽管书价翻了一番。1750年之后，书价和工资的上涨，使刊登广告的报纸处于有利地位。乔治三世对户外广告进行限制。文化普及，建筑物门牌号也普及，户外广告失去地盘，广告就被驱赶到报纸上去。^[25]经过朱尼厄斯和威尔克斯的努力，报界于1774年获得刊登议

^① 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著名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其在启蒙时期的代表作，在近代史学中占重要地位。

会辩论稿的权利。这就加强了报界的力量，使议会对公共舆论更加注意。然而，诽谤官司的威胁、印花税和广告税的压力，迫使政治性报纸依靠广告。《寰宇记事日报》——后来（1788年3月25日）的《泰晤士报》——的约翰·沃尔特，计划扩大该报的销售量。其途径是“刊登广告、记录时代大事、摘要发表议会的辩论稿”。到1777年，日报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周报。1764年邮费上涨，以后又涨过几次。1784年，伦敦到布里斯托尔的邮车首先开通。到1792年，已经有6班邮车从伦敦的邮政总局开往各地。

小册子文学作品的广泛发行，抵消了对报纸的限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是激发小册子流行的动力。斯威夫特的《同盟的举止》售出了1.1万册。普赖斯论美国革命的小册子卖了6万册。潘恩的《人的权利》销售了15万册！人们对通俗文学的要求日益增长。威廉·莱恩的密涅瓦出版社大获成功，就反映了这种需求。^[26]他成功地把发行量做大，销售了大量的浪漫故事和小说，还建立了一座流动图书馆。与此同时，约翰·拉金顿做成了庞大的二手书业务。到18世纪末，他的年销售量已经达到10万册。哈里森的《小说家》杂志创办于1779年，开始使用编号的出版形式。该刊一共出版了3卷，发行量达到每周1.2万份。女作家找到了辽阔的市场。1794年之后，浅显的读物取代了费力气的读物。恋爱故事的时代开始了。圣茨伯里^①注意到18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种变化：讽刺作家、革命鼓动家和恐怖小说派已经崭露头角。艾迪生的散文到世纪末几乎已经无迹可寻。

安妮女王去世后，君主的影响衰落；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国教遭遇困难，异教日见活跃。这一切都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神论的兴趣。一方面是自然神论，另一方面是对政治活动的压制，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指导下的福音运动因而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法国，抨击政治和社会秩序就是抨击教会，而在英国，宗教运动是脱离政治控制的。所以，出版商就抓住市场机会推销自己的产品。1780年，《格罗切斯特报》的老板罗伯特·雷克斯^②发起了主日学校运动。汉纳·莫尔^③在写《廉价寓意短文》

① 圣茨伯里（George E. B. Saintsbury, 1845—1933），英国文学史家、批评家。1875年开始以写作为生，《不列颠百科全书》撰稿人。代表作有《德莱顿》、《英国文学家丛书》、《伊丽莎白时代文学史》等。

② 雷克斯（Robert Raikes, 1736—1811），英国慈善家，倡导主日学校，1803年成立主日学校联合会。

③ 莫尔（Hanna More, 1745—1833），英国女作家，写宗教著作。代表作有《不屈的俘虏》、《乡村政治》、《廉价寓意短文》、《科埃莱布斯寻妻记》等。

的第一年，就卖出了 200 万册（1792 年至 1795 年每个月写 3 篇）。

手摇印刷机的功率有局限。英国文学分流到许多领域，而不仅仅是在报纸上发表，就说明了这种局限性。分流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英国本土的字钉制造业。1720 年，政府禁止从国外进口字钉，卡尔森建立了第一个字钉铸造厂。他生产的字钉使荷兰字母的统一形式固定下来，有别于法国字钉；这套字钉广泛用于印报，还出口到北美殖民地。巴斯克维尔开发的一套字钉，线条粗细变换、棱角分明，本书的英文版用的就是这一套字钉。此外，他还在改善新闻纸和油墨的质量上，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763 年，在剑桥大学的支持下，他在剑桥印制了对开本的《圣经》和《祈祷书》，“意在帮助开始用眼镜但又不好意思在教堂里戴的人”。他印制出了英格兰第一批精美的书籍。不过，他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也许要超过在国内的影响。1788 年，约翰·贝尔开办了一家铸字工厂，以改变印刷艺术受忽视的情况。他的“用心不在优秀而在探险——宁可取得暂时的收获，而不是永恒的优势和盛名”^[27]。他出的报纸说明，他的探险卓有成效，他可以摆弄各种字钉，影响别的报纸，各报纷纷购买他生产的字钉。他“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提高了印刷品的品味，寻找最优秀的艺术家来美化印刷品。在那个时代，这还是崭新的东西，而且也许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人民的钦佩”^[28]。

整个 18 世纪，英格兰都限制进口纸和书，本国造纸业发展缓慢。在这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护版权和镇压政治出版物使印刷业产生垄断。木制的手摇印刷机使报纸的扩张受限，伦敦和其他中心的交通得到了改善，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有利于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1712 年开始征收印花税，沃尔波尔担任首相，大陆上的战争结束。面对所有这些因素，作家被迫转向讽刺文学、杂文、小说和儿童图书。政治领域的写作受到压制，作家因此不得不将写作向其他领域不断拓展。虽然朱尼厄斯和威尔克斯为报纸争取到不少权利，虽然 1792 年颁布了“诽谤法”，但是出版业的合法垄断地位被取消之后，法律对报纸的限制反而日益增加。所以，报纸的扩张就以牺牲内容的深度为代价，浪漫主义文学也因此随之而兴起。这些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北美殖民地的反叛。

【注释】

[1] Cited by Charles Wilson,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1), p.61.

[2] H. A. Inni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Modern State* (Toronto, 1946), pp.35~55.

[3] Lord King,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Locke* (London, 1864), pp.204~207.

[4] Leslie Stephen, *Swift* (London, 1931), p.86.

[5] William Minto, *Daniel Defoe* (London, 1902), p.143.

[6] Cited by H. R. Fox Bourne, *English Newspapers* (London, 1887), I, 98.

[7] W. J. Courthope, *Addison* (London, 1919), p.192.

[8] See James R. Sutherland, "The Circulation of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Periodicals, 1700—1730," *The Library*, 4th series, xv, 1934—1935.

[9] Stanley Morrison, *The English Newspapers: Some Account of the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Journals Printed in London between 1622 and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1932).

[10] See C. B. Realey, *The Early Opposition to Sir Robert Walpole, 1720—1727*,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IV, nos. 2, 3 (Lawrence, Kan., 1931). also *The London Journal and Its Authors, 1720—1723*,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V, no. 3 (Lawrence, Kan., 1935).

[11] Laurence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1695—1763* (London, 1936), p.25.

[12] See W. T. Laprade,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o the Fall of Walpole* (New York, 1936).

[13] Cited *ibid*, p.278.

[14] Cited by Hans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 1695—1763*, p.58.

[15] Cited *ibid.*, p.2.

[16] C. L. Carson, *The First Magazine: A History of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Providence, R. I., 1938).

[17] See *Johnson's England: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His Age* ed. A.S.Turberville (Oxford, 1933), II, *passim*.

[18] See A. S. Collins, *Authorship in the Days of Johnson, being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uthor, Patron, Publisher and Public, 1726—1780* (London, 1928).

[19] See J. T. Hillhouse, *The Grub-Street Journal* (Durham, N.C., 1928).

[20] See E. E. Kent, *Goldsmith and His Booksellers* (Ithaca, N.Y., 1933), pp.95ff. also W. M. Sale, Jr., *Samuel Richardson: Master Print* (Ithaca, N.Y., 1950).

[21] See George Saintsbury,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1932), pp.77ff.

[22] F. J. Harvey Darton, *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 Five Centuries of So-*

cial Life (Cambridge, 1932), Chap. I.

[23] *Ibid.*, p.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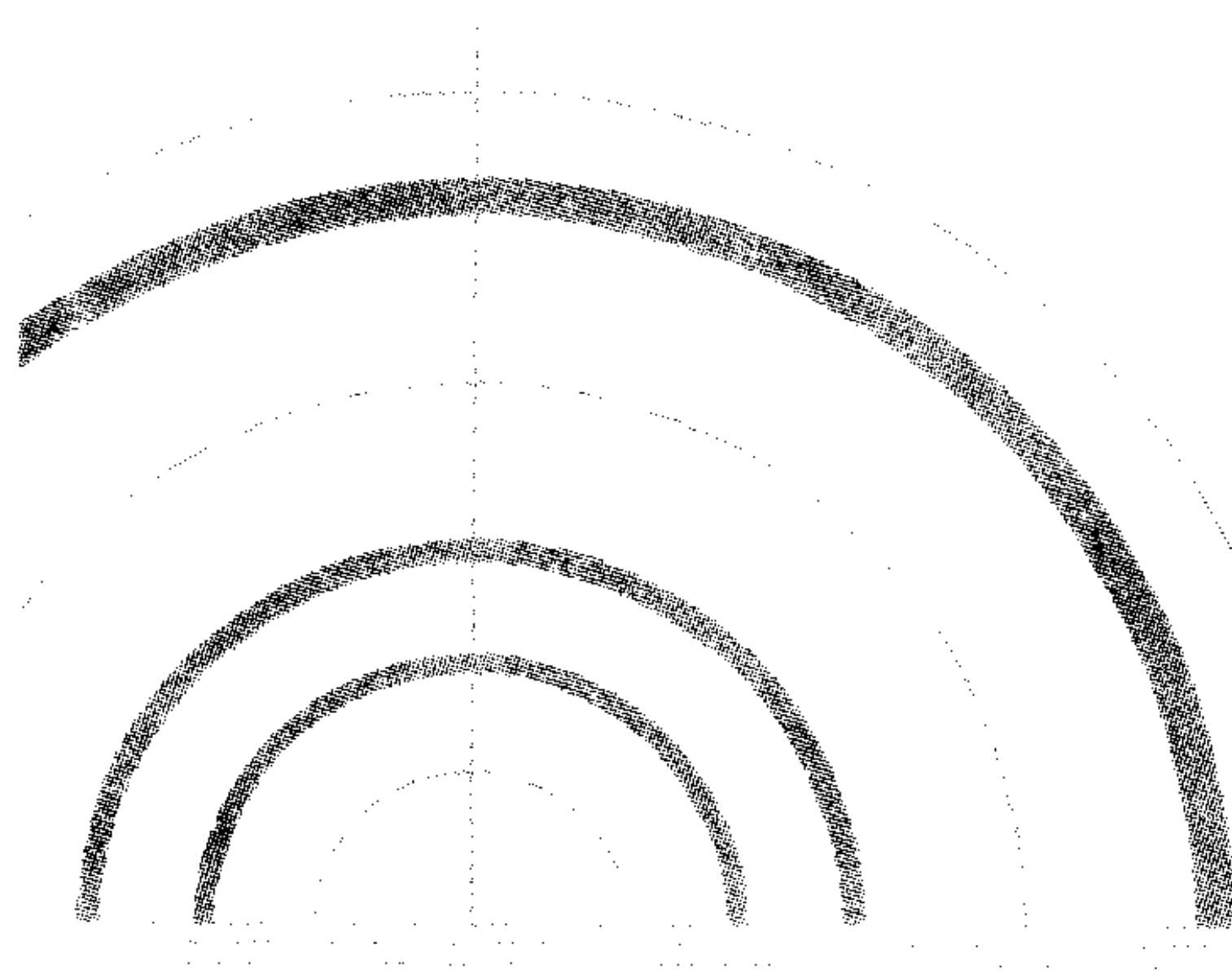
[24] *Letters of David Hume to William Strahan*, ed. G. Birkbeck Hill (Oxford, 1888), p15.

[25] Jacob Larwood and John Camden Hotten, *The History of Signboard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00).

[26] See Dorothy Blakey, *The Minerva Press: 1790—1820* (London, 1939)

[27] Stanley Morison, *John Bell, 1745—1831* (Cambridge, 1930), following p.16.

[28] *The Autobiography of Leigh Hunt*, ed. Roger Ingpen (Westminster, 1903), I, 169.



第七章

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

几乎没有任何学科会遭遇公共舆论研究所遭遇到的巨大陷阱，因为研究公共舆论的学者，总是很深地受到他所描绘的现象的影响。如果考虑长时期舆论的演变，研究的客观性可能会有所增强。然而，即使这样的描述，也必然记录着适应当前环境的“散光”。

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北美殖民地在 18 世纪与大不列颠的限制政策冲突时产生的结果。宗主国企图把国内的限制政策扩大到北美殖民地，引起了公共舆论塑造者的抨击，而这场冲突又发生在一个最敏感的时期。各地印刷厂的建立本来是为了印刷各殖民地议会的法律，但是与其相关的报纸也随之成长。报纸通过邮局搜集新闻和广告，又通过邮局发行。1765 年实行的印花税给报纸这种廉价商品强加了沉重的负担。报纸的售价便宜，因此与报业息息相关的人对印花税忍无可忍。他们鼓动民众起来反对，印花税被迫取消。接着又产生了一系列的辩论，最终导致革

^{*} 本文是 1949 年 4 月 19 日在密执安大学所作讲演的讲演稿，现略有修改。

命爆发。这场革命吸引了一批干练的作家。^[1]报纸在革命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由于《人权法案》^①对自由的保证而达到了顶峰。

《人权法案》中表现出来的新闻的威力，同样反映在1793年的《邮政法案》中。该法案第二十一条规定：“每个报纸印刷商，按照邮政总长的规定，都可以给美国的其他报纸印刷商免费邮寄一份报纸。”给订户寄报纸的邮费是一分钱，在一百公里以内不论远近；在一百公里以外是一分半美金，不论重量。“其道理是，邮报的成本靠信函的邮资来弥补，报纸应该享受这样的优待，这个优待是通过邮局同时投递而产生的。”^[2]

亚当斯总统落败，杰斐逊继任总统，1798年的“外侨及叛乱惩治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被废除。所有这些结果，都是对报界力量的礼赞，而且都说明，那些搞政治的人^[3]已经认识到，可以把报纸作为谋略的工具。杰斐逊^[4]鼓励菲力普·弗瑞诺办《国民记事报》（*National Gazette*），该报1791年10月21日开张，目的是与约翰·费诺主办的《联邦记事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相抗衡，后者是为联邦党人服务的报纸。杰斐逊抱怨说：“那些大商港不到全国的1/24，可是它们却控制着全国3/4的报纸。”^[5]由于杰斐逊的影响，史密斯主笔的《国民知识分子》（*National Intelligencer*）从费城迁移到首都华盛顿，得到了对国会新闻的垄断权，而且得到“很大一部分公共印刷品的配额”^[6]。除了这份政府支持的报纸之外，他还鼓励在里士满办另一份报纸，叫《询问报》（*Inquirer*），1804年开张，由托玛斯·里奇主笔。这些措施遭到其他报纸的抨击，所以杰斐逊在1807年写到：“如今报纸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相信的。”“没有哪一个细节是可以依靠的。我还要加上一句话：从来不看报的人，比看报纸的人更加消息灵通。”^[7]新闻自由成了滥用权利的通行证（Freedom had become license）。

到1812年，联邦党人办的报纸在海港城市中的主导地位，由于共和党人新办了许多报纸而受到削弱。这些共和党人的报纸是随着人口的西迁而纷纷出现的。^[8]由于商业广告和交流的需要，“商业城镇”中的报纸渐渐成长。革命之后，广告成为报纸收入更加重要的来源，这就加速了日报的出现。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约翰·邓拉普把《宾州广告报》加以扩版。从9英寸×15英寸的版面扩大到12英寸×19.5英寸，共4

① 《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1791年通过。该法案赋予公民、地方政府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版，每版3栏， $\frac{2}{3}$ 的版面用于广告。^[9]1783年，该报成为周三刊。次年，它成为美国第一家日报。1785年9月1日，弗朗西斯·柴尔德在纽约创办了《每日广告报》。

广告的增长提出了一个需求：增加造纸业的设备。为了鼓励造纸业，纸的进口税在1789年只有7.5%，第二年也只有10%。1804年，碎布的进口税就干脆取消了。到1810年，据估计美国的造纸厂是185家，40家在马萨诸塞州，60家在宾夕法尼亚州。为了节省纸，《每日广告报》把广告的字号减小到18号，文章的字号也相应缩小。19世纪的前25年，美国的报纸有一个特点：有许多小广告，这是“广告的合约展示期”。广告的合同是一年30美元，如果是40美元一年，那就是包括订阅费。稳定的收入，再加上商务印刷的回报，一个印刷商可以养一家发行量只有三四百份的报纸，尽管他要把7.5%的营业额用来支付账单。^[10]因此，许多新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800年的150家增加到1810年的360家，报纸的数量翻了一倍。^[11]

1812年的英美战争之后，报纸受到商业不景气的影响。1816年，在本州100英里范围内，邮寄报纸的费用减少到一美分，其中的半美分用来支付给邮政局长。为了给更多的广告提供版面，同时为了提高报纸的声望，1828年，报纸扩版为24英寸×35英寸，每版的分栏从4个增加到6个。^[12]广告作为报纸的收入来源变得更加重要，纸张成本提高，每令纸的价格为5元，也就是一分钱一张。报纸的卖价也随之增加到6分钱一份。到1832年，由于纸的供应量增加和价格的下降，报纸可以增加 $\frac{1}{4}$ 或 $\frac{1}{3}$ 的版面，其成本反而减少 $\frac{1}{4}$ 。定价折半的大尺寸报纸，着力于小广告，倚重适合商人胃口的阅读材料。但是，这些大报激起大都市廉价小报的竞争。

报纸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进步，使一种新型报纸变得更有竞争力。手摇印刷机用螺丝钉做配件时，只能每小时印150张。可是，到1828年，荷记公司开始在两家报社使用纳皮尔印刷机——这是从英国进口的两个汽缸的机器。这两家报纸是纽约的《商务广告报》和费城的《每日记事报》。印刷小型报纸使用的是华盛顿牌印刷机。撒缪尔·腊斯克对印刷机做了改进，用杠杆代替螺丝钉，使其效率在1829年之后增加到每小时印250张。1829年，纽约索加特的比奇（Y. M. Beech）造纸厂，研制并完成了福德里尼尔牌的印刷机。据估计其成本是3万美元，造纸业成为高度集中化的产业。铁路的延伸，原材料和终极产品的处理设备，规模更大的造纸厂，对廉价动力的需求——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

造纸厂内迁，尤其是迁往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伯克夏。1830年，一种漂白的工艺发明之后，就可以用有色碎布来造白纸了。1840年，全国20个州一共有426座造纸厂，其中的292座分布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13]碎布的供货从欧洲进口。欧洲政府的政策是对纸的消费实行限制，允许碎布当做原材料出口。1861年之前，英国实行对“知识课税”的政策。这就限制了报业的发展，而有利于《泰晤士报》的垄断；减少了国内对碎布的需求，而加速了美国报业的发展。以1839年9月30日结束的统计年度计算，美国进口的碎布总价值为58.8万美元。可是，按照1850年6月30日结束的统计年度计算，它进口的碎布价值就达到74.9万美元（折合2 069.7万磅，包括从意大利进口的1 027.7万磅）。到这一年，造纸业的总价值据估计是1 000万美元。

I

新型的报纸，旨在摧毁大版面报纸的垄断，所以它们更加倚重耸人听闻的新闻。在英国，廉价小报免税，故而盛极一时。这些小报大量从伦敦进口，给新的读者群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阅读材料。在霍乱流行期间，人们需要的是廉价文学^[14]，市场寻找承接零星印刷业务的报刊，由他们刊登求职信息。戴伊（B. H. Day）试刊的纽约《太阳报》，就是对这两种要求的呼应。^[15]这是一种廉价报纸。报纸的主要目的是刊登零星承印商的广告，同时它也筛选刊发一些新闻，以增加发行量。1833年9月5日的首期报纸，版面为11.25英寸×8英寸，共4版，每版3栏，含地方新闻、家常话、交易信息和广告。批发价是67美分100份，每个邮递员周六晚向订户收6分钱投递费，失业者到街上卖这种报可以得到诱人的折扣价。到当年12月17日，该报的发行量已经高达4 500份，仅仅比纽约发行量最大的《信使与询问报》略逊一筹。每小时印刷1 000张的印刷机取代了每小时只能印200张的印刷机。到1834年11月，《太阳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1万份。1835年，荷记公司装备了蒸汽印刷机。这使其印刷能力达到2.2万份，双面印，8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1835年8月12日纽约发生了一起重大火灾，这一事件使其发行量飚升到2.3万份，其号外一印就是3万份。耸人听闻的文章使其发行量增加到每天2.7万份。这些轰动一时的东西有里查兹·亚当斯·洛克的月球骗局，还有玛利亚·孟克披露的内幕。到1836年，报纸的版面从10英寸×14英寸增加到12英寸×19英寸。次年，其广告已经增加到13栏。

搜集新闻和表现新闻的方式、低廉的售价、舍弃对政治的兴趣——这些是《太阳报》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其销售对象主要为低收入群体，它尝到了经济低迷的苦头。广告收入下滑，金融投资失误，以及遭受了几场火灾，使它 1837 年的发行量急剧下降，所以它不得不以 4 万元的低价卖给比奇。比奇是碎布机的发明人，1829 年之后，他成为纽约索加特造纸厂的主要股东，工厂因此而更名为比奇造纸厂。新发明使纸的产量增加，这和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产生直接相关。他对纸张市场，对编印报纸机的改良，对搜集新闻的快速组织，都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兴趣。1839 年，他的《太阳报》一共有 24 栏，17 栏就用来登广告。共同的利益使《太阳报》和《公共分类报》结为联盟。它们对政治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兴趣，所以立即就得到了读者的宠爱。它们向合众国银行发起进攻。1841 年 3 月 4 日，它们联手组织快递业务，来刊登哈里森总统（1840—1841）的国情咨文。这一举措加强了它们在南方文摘报中的地位，使之能够在 1845 年把快递系统拓展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首府哈里法克斯。《公共分类报》安装了荷记快速印刷机。1847 年，这台机器解决了一个问题：圆压印刷机快速转动时，铅字不往下掉。

贝内特（J. G. Bennett）^[16]仿效《太阳报》，于 1835 年办起了《晨光先驱报》。他曾经积极支持杰克逊总统。这份报纸模仿伦敦的廉价杂志，声明绝对“不管自我束缚的框框，即所谓的原则，不搞党派，不搞政治。我们惟一的指南是良好、健全、实用的常识”。6 个星期之内，其发行量已经达到 7 000 份。到 1836 年 8 月 17 日，它的价格提高到每份 2 美分，可是其发行量反而跳升到 4 万份。到 1840 年，它的发行量又飚升到 5.1 万份。在 1837 年经济萧条时期，它耸人听闻的新闻，它的金融述评文章和股票栏目，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它充分利用华尔街的新闻价值，1839 年之后又充分利用年度宗教会议的议事录。贝内特对组织新闻社兴趣浓厚，他的欧洲之行就表现了这一点。1838 年 4 月 23 日，第一艘欧洲客轮“天狼星”号抵达纽约，他登上了回程的邮轮，去安排欧洲新闻中心的稿源。他在华盛顿建立了分社，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建立陆上快递业务。教会和商业公司都对他发起抨击，这反而是给他做广告，使他咄咄逼人的势头广为人知。他摧毁了《太阳报》对分类广告的垄断。到 1847 年，他的报纸已经成为最领先的广告媒体。价格低廉的报纸总是倚重两个东西，一是技术进步，一是新闻。它们把新闻作为宣传手段——给它自身打广告的宣传手段，因为报纸本身就是一种广告

媒体。纸张的价格单位从令改为磅，1853年每磅纸的价格涨到14分，广告又被迫按照每天每行字1分钱收费。这一切加起来使大版面的报纸走向末日。

II

大都会报纸的技术进步，与内陆城市尤其是政治都会的报纸，形成鲜明的对比。^[17]奥尔巴尼、里士满和首都华盛顿，都没有财力支持大报的技术进步。党派机器填补了政府和公共舆论之间的鸿沟。“为了获胜，政党使用了两大武器：一是报纸，一是公共舆论。”^[18]于是，邮局成为政党极其感兴趣的对象。1825年之后，联邦邮政总局从财政部分离出来，独立经营。^[19]华府的行政机构通过交换报纸，和内地的地区中心报纸建立了联系。首都成为新闻中心。华盛顿总统之后，门罗总统是第一位与公众见面的总统。1824年，公众对总统选举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候选人激动人心的辩论，促使地方报纸派记者到联邦首都来采访新闻。

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竞选期间，政府机构的垄断地位受到抨击。其开端是杜夫·格林对《美国电讯报》的收购。1826年，阿莫斯·肯德尔发起了类似的宣传攻势。肯德尔是《西美弗兰克福德阿古斯报》的主笔。斗争之惨烈，从杰克逊的话可见一斑：“他们沆瀣一气，目的是要给我抹黑，满天飞的传单，伪造的文书，最无耻的诽谤，这一切靠的都是国会议员免费邮寄印刷品的特权。”^[20]（1828年8月16日）杰克逊竞选获胜之后，对支持他的记者论功行赏。1929年，约翰·昆西·亚当斯说，他竞选失败的主要受益者是报人：“竞选进入后期，最卑鄙的中伤、最严重的歪曲，都成为炮弹，提供给了糟糕的报纸编辑。”^[21]杰克逊写道：“报纸社论说给候选人公职不恰当，我对此言论不予理会。”如果不给他们好处，“那么，在编辑队伍中，最不同流合污、最高尚的人，是再也找不到了”^[22]。杰克逊内阁的人中，有3人是资深记者。1829年，邮政总长也进入了内阁。阿莫斯·肯德尔起初担任财政部的第四审计官，后来又擢升为邮政总长。里奇抱怨杰克逊“有条不紊地给党派记者论功行赏，这是蔑视新闻界提倡的新闻自由”^[23]。给党派记者的其他好处包括：承印政府文书，承办邮局广告，担任邮局职务，邮政业务收入一半归己，免付的邮费每年大约四五百元，对不同观点的报纸尽量限制^[24]，免服兵役，免于陪审团义务，优先的知情权等等。

杜夫·格林任《美国电讯报》的主笔，他同时也是国会文件的编辑和承印人。该报取代《国民知识分子》，成为政府的喉舌。由于它倾向

于选拔卡尔洪（John Caldwell Calhoun）继任杰克逊，范布伦就另起炉灶，办起了《环球报》。这类报纸与其他报纸相互赠报，摘录其他报纸的内容，其重要性因此而上升。亚当斯写道：“在总统竞选期间，报人作为候选人的支持者，其重要性不亚于骑士时代的绅士对骑士的重要性。”^[25]《环球报》1830年12月7日创刊，由布莱尔主持。布莱尔是由范布伦从肯塔基州带进华府的。该报开始时是周二刊，定价一年5美元；后来改为周刊，定价一年2.5美元。不到一年，该报订户已经达到4万。他的经费来自官方广告、政府部门的招聘文书和朋友的捐赠。《环球报》添置了一台纳皮尔牌的印刷机之后，发展成为日报。布莱尔大篇幅摘录乡间报纸的文章，包括他自己创办的报纸。

杰克逊总统的胜利，不仅因为华盛顿新闻业的发展而得到支持，而且得到重要的地方首府新闻业发展的支持，奥尔巴尼、里士满这两个州府就是例子。1823年，范布伦在写到奥尔巴尼《阿古斯报》时，说需要这样一位编辑：“头脑健全、讲究实际，尤其是要谨言慎行的共和党人。如果没有在奥尔巴尼办的报纸，我们也许就会乐极生悲。有了这份报纸，党就可以安然渡过惊涛骇浪，渡过那些使我们周围的人焦躁不安、惊惶失措的惊涛骇浪。”^[26]1824年8月8日，《阿古斯报》同时出三种报纸：日报、周二报和周报。作为奥尔巴尼幕后摄政集团的声音，它“调控本州的政治”，把政治简化为科学。加上《环球报》和里士满的《询问报》，报界“造就了内阁官员和海关官员、总裁和稽查员、编辑和使节。它们控制着州议会，决定了州里的政治”^[27]。

1832年，由政党秘密会议决定总统候选人的现象结束了。报界的影响在结束这一历史现象中，发挥了显著的影响。《奈尔斯周报》和里士满《询问报》表现尤其不俗。据说，同意由政党秘密会议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报纸，在弗吉尼亚州的35种报纸中只有3种，在纽约的125种报纸中只有10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100种报纸中只有3种，在俄亥俄州的48种报纸中只有1种。^[28]在1832年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杰克逊指责联邦银行用金钱操纵新闻界。他的党推出《环球报特刊》。这是一张纸的竞选报，定价1美元。尽管有大约2/3的报纸反对杰克逊，他还是得到《环球报》布莱尔的支持，内阁成员、昔日新罕布什尔州《邮报》报人艾萨克·希尔的支持，得到范布伦在奥尔巴尼《阿古斯报》上的支持。这些支持确保杰克逊连任总统。自此，《环球报》被描绘为第一个总统喉舌，杰克逊被说成是第一位通过报界来治国的总统。^[29]通过杰克逊的“厨房内阁”、《环球报》、里士满的党团和《询问

报》，通过奥尔巴尼的幕后摄政势力和《阿古斯报》，民主党对邮局和报界实行了有效的控制。

这一年，邮政总局局长巴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宪法保证的新闻自由，向这些出版物收取的少量邮费，和运输这些邮件的庞大成本作一番比较，就能够说明，出版物受到政府控制的程度究竟是大还是小。”^[30]然而，大都会报业的发展开始对政治力量构成威胁。1835年，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年度咨文中，提醒公众“注意在南方出现的痛苦的激动情绪。有人通过邮局散布煽动奴隶情绪的言论”^[31]。报纸的邮费很低，这有利于大都会的大报，而小城镇的小报则温顺地在“调子、脾气和意见上”都模仿大报。^[32]1836年，邮政总长肯德尔抨击“为了大都会报纸的利益而给予地方报纸极不公平的待遇”这种现象。他建议，邮费应该根据报纸的版面和重量来计算。^[33]1838年，有人抱怨说，有的报商交换得来的五六百种报纸中，“不到一百种报纸是有用处的”^[34]。邮政总长奈尔斯1840年写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所有的报纸支付相同的邮费，虽然有些报纸的规模和重量是其他报纸的10倍。这不仅对纳税人不公平，而且对出版商也同样不公平。这使商业都会里的大报处于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同一地方的廉价报纸就处于劣势，乡间的报纸更是如此。要知道，地方的报纸远离邪恶的影响。一般地说，它们是健全的公共舆论最独立的渠道。”^[35]

1840年，范布伦竞选总统时，向新兴的都会大报寻求支持，把第一次记者会的采访机会给了《先驱报》。1840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推出了一个奇怪的论坛，在总统竞选中，这是首次吸引大批人积极参与的一次活动。^[36]1840年，肯德尔辞去邮政总长的职务，去编辑《环球报增刊》。他给邮政局长们送出私人通报，以确保订数，并确保他这份报纸免费送往华盛顿。不过他的民主党还是败下阵来。

1840年，辉格党人竞选获胜，就因为他们和大都会的廉价报纸保持密切的关系。1827年之后，铁路迅猛发展，公立学校普及，文化程度提高，大都会报纸的市场自然随之扩大。新型的读者要求的是事实，而不是观点。1829年，支持亚当斯的威德^[37]当选为纽约州的众议员，并主编《奥尔巴尼晚报》。他在公众中培养反对共济会的情绪，1826年发生威廉·莫根绑架案之后，共济会的情绪有所提高。威德代表的是北部和西部商界的利益，并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立法中反映这个阶层的力量。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战略地位，反映在纽约州日益增长的力量之中。美国银行宪章的废除和1837年的恐慌，显然都受到他有效的利用。1838年州

议会竞选期间，威德得到了霍倍斯·格里利主编的《杰斐逊人》周刊的支持。选举的结果，是辉格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西沃德当选纽约州州长。1840年竞选期间，格里利又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圆木屋》。他们使用的口号，说明哈里森热爱民主。哈里森是第一位登台向公众发表演说的总统候选人。以上几个因素对他夺取胜利都至关重要。为了使辉格党人的地位更加稳固，为了对抗《先驱报》耸人听闻的办报风格，格里利又于1842年4月10日创办了一份廉价报纸，叫《论坛报》。到1842年11月，其发行量已经达到9500份。《论坛报》有了影响之后他又办了一份周刊，给予该报强有力的支持，使之扩大影响。他发动了猛烈的广告宣传，用低廉的订费促销。

Ⅲ

大都会的廉价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电报的发明和推广。电报快速准确地提供信息，从而使它们能够及时地得到新闻，这能够满足股票和农产品交易的需要。格里利说：“电报是伟大的转折点”^[38]，他又说社论在美国的影响不如在英国影响大。电报促使报纸联手搜集和传递新闻。1848年，《信使与询问报》、《论坛报》、《太阳报》、《快报》、《商报》等组建了一个合作新闻社。后来它成为合众社的基础。^[39]这家新闻社搜集的消息卖给了费城《公共记事报》和巴尔的摩的《太阳报》。向它订购新闻的报社越来越多，这就降低了纽约读者的读报成本。

电报的延伸、新闻的增加，使报业对快速印刷机的要求更高。^[40]加快印报速度是低价、大量发行的前提。1852年，纽约《论坛报》添置了一台6个汽缸的印刷机，其印刷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0张。还有一些印刷厂用上了10个汽缸的印刷机，其印报能力达到每小时25000张。但是，印刷机台数增加，必然意味着排字的重复，也就是时间的损失。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被迫提前印报的时间，省略最新的新闻，失去一大销售市场，并且承担郊区发行量下降的损失。1862年，《论坛报》用上铅版之后，这种受限制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了。同年，费城的布洛克（W. H. Bullock）发明了自动送纸机，代替了人工送纸。这台机器可以用两个滚筒两面印报。有了这些改进之后，包括字钉磨损的成本都降下来了，发行量大的报纸可以更快地送到读者手中。铁路和运河修好之后，大型印刷机运到新的中心，尤其是芝加哥。这就加速了地区主义的发展。

通过邮局和报纸交换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控制体制，由于电报的出现

而受到削弱。新闻垄断被摧毁了。地方日报摆脱了政治大报和都市报业的支配。《奈尔斯周报》由于报纸交换制度的兴起而繁荣，又由于电报的出现而消亡。^[41] 邮局继续反映报界的力量，它给报纸提供廉价的邮运。1845年，信件邮费高得不合理的情况受到重视，并下调了很多。不过，报纸的邮资还是很优惠。30英里之内免费，30英里到100英里邮资1美分，超过此限在本州内投递还是1美分，州外投递费是1.5美分。“有人建议，编辑可以免费邮寄一定数量的报纸，以便与其他报纸进行交换。”这个建议没有能够实行。^[42] 邮政总长1848年12月2日在工作报告中说，报纸“始终受到公众的尊敬，被认为极其重要，是在人民中间传播知识的最好媒介，所以报纸始终享受最低廉的邮费，目的是促进其发行”^[43]。

在这样的情况下，《论坛报》通过出版周刊^[44]，以及在大都市发行，而产生广泛的影响。1848年，纽约《信使与询问报》的格里利和詹姆斯·维布与政治家威德联手，利用选民对军队英雄的兴趣，使泰勒将军当选总统。辉格党人对格里利日益增长的影响心存疑虑，又不同意他对时尚的兴趣，于是就在1851年鼓励雷蒙德创办纽约《时报》。格里利利用激进运动，吸引了论述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家布里斯班^①、达纳^②、马格丽特·富勒^③等人。他们和傅立叶的布鲁克农场^④有过联系，与《论坛报》驻欧洲记者卡尔·马克思也有联系。阿克顿爵士^⑤认为，纽约《论坛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不民主的极端民主派。纽约《时报》设计的目标，是要用令人尊敬的风度和语气，来吸引那些不喜欢《先驱报》和《论坛报》的中产阶级读者。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很快就达到2.6万份，虽然1852年价格翻番之后减少到1.8万份。金融信息从《论坛报》转到了纽约《时报》。威德支持雷蒙德角逐纽约州副州长。1854年，格里利解散了“西沃德、威德和格里利集团”。辉格党瓦

① 布里斯班 (Arthur Brisbane, 1864—1936)，美国报纸编辑和作家，先后主持《太阳报》、《世界报》、和纽约《时报》。

② 达纳 (C. A. Dana, 1819—1897)，美国新闻记者，纽约《太阳报》、纽约《论坛报》编辑。

③ 富勒 (Margaret Fuller, 1810—1850)，美国评论家、教师和作家。编辑《日晷》杂志，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代表作有《19世纪的妇女》、《文艺论稿》、《海内外》等。

④ 布鲁克农场 (Brook Farm, 1841—184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在美国进行的社会试验，地点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

⑤ 阿克顿爵士 (Lord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主张基督自由伦理观，主编《剑桥近代史》、《徘徊者》月刊、《评论季刊》，其他著作有《古代自由史》、《基督教自由史》等。

解之后，格里利与自由土地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芝加哥论坛报》合作，为共和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86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西沃德^[45]失败，林肯胜出，被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格里利在林肯获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电报和快速印刷机，使大都会地区政党的权力摧毁殆尽，这种权力的基础是邮政局、报纸交换制度和各州首府。1840年之后，不稳定的局面削弱了中心权威。权力从华盛顿转移到地方，问题不再通过联邦国会解决。大都会的报业摧毁了依靠中央指挥的政府。布坎南是最后一位在华盛顿拥有政府喉舌——一份报纸的总统。

内政爆发之后，林肯被迫直接与报纸编辑打交道，他苦心孤诣地控制报纸，包括委派报纸编辑担任外交使节。报界的力量，见诸谢尔曼^①将军的喟叹：“报界扼杀了麦克莱伦、比尔、波特尔、萨姆纳、富兰克林和伯恩赛特等内战中南北两军将领。还可以把我的名字加上去，我不会为与他们搅在一起而感到羞愧的。”^[46]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满足不了报纸编辑的要求，报界对弹劾他的兴趣，对政府的地位构成威胁。

格兰特将军的战功，使他在1868年当选总统。但是，他这届政府明显的腐败，迫使报界调动反对的力量。1872年，民主党提名格里利作总统候选人，但是报界调动的力量，还不足以唤起选民对他的兴趣。与辉格党的《论坛报》唱对台戏的报纸，退出支持民主党的营垒以后，支持他的力量尤其削弱了。

大都会的报纸有局限性。其表现是，发行基本上局限在本地，周报的影响力下降，地区中心的报纸反而变得更加重要。^[47]电报突出了新闻的重要性。其结果是，报纸^[48]无法成为全国性的媒体，无法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和公众喜欢新闻同时发生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从英格兰进口的其他读物对美国人产生影响。这些读物不像报纸，它们不受“知识税”的限制。版权事宜还是一片空白，大规模盗版很早就存在。1836年11月8日，马蒂诺^②说：“纽约哈泼斯出版社无耻地侵犯（我们的版权）。”爱默生^③转述一位英国人的话说：“只要你们不把版权赠

① 谢尔曼（William Sherman, 1820—1891），美国内战期间联邦著名将领。

② 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 1802—1876），英国女作家，著作涵盖政治、历史、社会。代表作为25卷本《政治经济学解说》。

③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思想家、作家、诗人，超验主义运动主要代表，强调人的价值，提出个性的绝对自由，主张社会改革。代表作为《论自然》、《诗集》、《五月节》等。

送给我们，我们就要教训你们。”美国作家大量涌入报业，布赖恩特（W. C. Bryant）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发现在英国出书比较有利。有了大西洋的汽船以后，纽约成为印刷和出版的中心。纽约出版商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尽快把来自英国的书重印出来。一般报纸对小说的忽视使纽约《记事报》的伯纳（Robert Bonner）之类报人利用这个机会，取得令人震惊的业绩。他吸引广为人知的大牌作家比如狄更斯等，赚了个钵满罐满。朗费罗^①《绞鹤记》的稿酬是3 000美元。报纸尤其是《先驱报》忽视广告技巧。这就使广告中介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报纸无法成为全国性的媒介，达不到这个要求。而周刊可以集中精力搞图片，从而取得极其明显的效果。卡通吸引文化水平比较低的阶层，发行遍及全国各地。许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格里利的报纸，不如纳斯特的漫画影响大。格兰特说：“两样东西使我当选总统，一个是谢尔曼将军的利剑，一个是托玛斯·纳斯特的画笔。”^[49]最后，到1874年，国会的立法削弱了大都会报业的力量。按这个立法，报纸的邮资根据重量计费，和邮运的距离无关，而且是统一实行预先付费。周报或一周几期的报纸每磅付2美分，一周以上出一期的报纸支付的邮费是每磅是3美分^[50]。海斯总统（1877—1881）说到政府办报时，留下了一句名言：“政府不办报是明智之举。”^[51]（No organ is wise.）

IV

内战时期，报纸需求量大增，对碎布替代品的开发加速了。^[52]1850年之后，草已经被广泛用来造纸。1866年，从德国进口的两台瓦尔特纸浆机落户在马萨诸塞的柯蒂斯维尔。1867年11月，第一批磨木浆从这里运到史密斯造纸公司。到1870年，已经有18座纸浆厂建成，主要分布在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各州。造纸机的速度，1867年是每秒100英尺，1872年增加到每秒175英尺，到1880年就高达每秒200英尺。1884年，在普罗维登斯引进了亚硫酸盐纸浆的生产工艺。于是，生产现代新闻纸的初级原材料、磨木浆和亚硫酸盐纸浆，都万事具备了。1890年，美国国内新闻纸的产量达到19.6万吨，1899年增加到59.9万吨。人均消费新闻纸，1890年是8磅，1899年就增加到15磅。与此同时，纸的价格也随之下降。1866年是每吨334美元，1870年是

^① 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8），美国诗人。代表作有《夜吟》、《伊凡吉林》。译作有但丁的《神曲》。

每吨 246 美元，1880 年是每吨 138 美元，1890 年降到每吨 68 美元，1900 年再降到每吨 36 美元。1878 年组建的美国纸业联合会，就是要推动纸张出口，稳定纸业市场，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纸的产量增加，价格下降，促使人们寻求发明创造^[53]，以促进报纸的发行，尤其是在大都会的发行。快速印刷机的发展很快。到 1893 年，印报机的速度达到每小时印 9.6 万份 8 版的报纸。1886 年，整行铸排机取代了普通排字机。排字的速度因而增加了 4 倍。接着，打字机的使用大大普及。这使得现代意义的报纸成为可能。流动排字工的时代画上了句号。采集地方新闻时，电话取代了电报。新闻记者发现，他的工作分解为两部分：跑新闻的现场工作和改写新闻的文案工作。现场记者用电话把稿子传给报馆的文案记者，由后者编定稿子。美国人口众多，语言单一，电话的地位很重要，大大超过了电报在欧洲的地位，因为欧洲使用许多语言。

邮费调低，印刷技术和编报技术的改进，木纸浆使用量的增长，都加快了大都会地区的发展，使报纸集中在各自特别感兴趣的领域。70 年代的纽约《时报》猛攻特威德集团^①，摧毁了政党机器给竞选人的大笔广告补贴。结果，该集团资助的 89 家报纸中，有 27 家被迫停业，其他的报纸也改换门庭，对管理、人事和政治都做了调整。^[54]积极进取的出版商能够利用技术进步，而保守的出版商却败下阵来。普利策在圣路易斯城取得办报的经验后，购买了纽约《世界报》。收购价不高，因为控制该报的杰伊·戈尔德已经失去威望。他向费城《公共记事报》柴尔兹贷款，买了一台新型印刷机，他要向《太阳报》的达纳报一箭之仇。^[55]普利策采用了低价位的大规模广告，摧毁了《论坛报》的突出地位。这家报纸痴迷新闻，在广告上是极其保守的。《世界报》以咄咄逼人的势头突飞猛进，《论坛报》、纽约《时报》和《太阳报》的地位随之下滑。《世界报》的攻势成效显著。它支持民主党人，攻击共和党人的政治垄断，都卓有成效。政党长期控制公务员的委任制度，因而受到搞腐败的指控。一位求职未遂、失望至极的人刺杀了加菲尔德总统（1881），更是给这种指控火上加油。在 1884 年的总统竞选中，布莱恩落选，克利夫兰胜出。《世界报》等报纸在竞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指责《世界报》是“沾血的衬衣，杀人不眨眼的骑墙派”^[56]。选举的结果对这种指控是有力的驳斥。

① 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由美国政客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组织的集团，结党营私、侵吞巨款，特威德本人锒铛入狱，死于狱中。

报界采用新的发明，报纸发行覆盖面更宽，资本更加雄厚，公司组织规模更大。于是，报界对共和党的政治控制，不再那么惟命是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个人色彩浓厚的新闻工作开始退潮。广告业和百货商店开辟更加重要的财源。整行铸排机投入使用之后，广告可以每天更换，所以广告也成了新闻。广告经理开始承担责任，报纸的经营由经营部门来控制，出版商的地位更加重要了。

克利夫兰当选总统，将共和党人的政治垄断打开了一个缺口。这种垄断曾经得到过报界和军队的支持。不过这个缺口的时间不长。“大家普遍承认，我们镇里的邮局和报纸应该形影不离，它们联手经营，小有赚头”^[57]，结果就必然引起抗议。人们抗议克利夫兰，因为他留下的遗产是：“几乎所有的乡间邮政局都让给了咄咄逼人的共和党人——这些人是公众几乎天天都要打交道的人。”^[58]在保护主义政策的庇护之下，产业的利益更加盘根错节。1888年，克利夫兰专注于关税问题，导致他竞选败北。^[59]他向选民呼吁：“人民支持政府，但是政府不应该支持人民。”但他还是败下阵来。1892年的总统竞选中，报界出身的里德(Whitelaw Reid)被提名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由此可见报界对共和党人感兴趣。里德在党内落选。原因有两个，一是对立的报纸攻击他，二是他采用整行铸排机印报纸，引起工会的仇视。共和党人在总统竞选中失败，民主党人又短期回到白宫。这是时事使然。当时经济萧条。两党的候选人，用亨利·亚当斯^①的话说：“一个没有朋友，一个只有敌人。”^[60]

V

1896年之前，政治上的动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报纸与电报关系的调整。内战对新闻的要求增加，报业在大的地区中心得到迅猛发展，其结果是，一个松散的西部联合通讯社^②产生了。1862年，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梅迪尔(Joseph Medill)提出，希望能够把它重新组建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团体。他认为该通讯社是“一个恶劣的、压制性的垄断组织”。西部报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新闻是从东部向西部传递。对于纽约报纸支配商务信息的局面，西部报纸总是怨

① 亨利·亚当斯(Henry Brooks Adams, 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编辑《北美评论》，代表作有《美利坚合众国史》(9卷)、《艾伯特·加勒廷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等。

② 西部联合通讯社(Western Associated Press)，即后来的美联社。

声载道。在市场报告方面，纽约报界占据优势。西部报界认为，这个优势后果尤其严重，因为它们被迫高价购买这些市场报告。^[61]1866年，大西洋电缆终于完工。用阿诺德^①的话说，那是一根粗大的绳子，两端各有一位平庸的市侩，说的是一些废话。电报线的地位得到加强。内战后社会对新闻的需求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西部的独立倾向。1866年11月5日，克雷格（Daniel Craig）被西部联合通讯社解雇之后，他唱起对台戏，组建了美国—欧洲电报新闻协会（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elegraph News Association）。加盟的有西部协和电报公司，该公司当年刚刚把美国电报公司吸收到自己旗下。克雷格成为西部联合电讯社（Western Union Telegraph News Association）的总代理。西部联合通讯社和欧洲的新闻社建立联系，借以对此进行还击。这些欧洲通讯社有哈瓦斯、沃尔夫、路透社和斯铁芬尼。同时，该社又加强了对华盛顿和纽约财经新闻的控制。于是，它控制了国内新闻。形势迫使两个集团达成协议，同意再次让所有的西部报纸加入西部联合通讯社，同意互换新闻。协议的签署日期是1867年1月11日。电报公司找不到办法形成一个类似的联合电报公司，所以该协议要求电报线路由西部联合电讯社专用。1877年，西部联合电讯社吸纳了大西洋太平洋电报公司，后来又吸纳了国民协和电报公司。1883年1月，西部联合电讯社又签署了新的合约。1887年，它续签合约，继续对东部和西部的新闻实行完全的控制。

被摺在西部联合电讯社合约之外的报纸，开始组建合众社（United Press）。它通过合众新闻社（United News Press）和电报新闻公司（Cable News Company），来确保获得国外新闻的资源。合众新闻社是英国一家与路透社唱对台戏的新闻社。合众新闻社得到芝加哥《论坛报》沃尔什和《太阳报》拉方的支持，所以它能够和西部联合电讯社展开竞争，一比高低。结果，不但芝加哥《论坛报》买合众社的新闻，就连西部联合电讯社的成员也纷纷向它买新闻。1876年，道尔蒂和斯通创办芝加哥《每日新闻》，1881年3月20日又接收《早晨新闻报》。他们向合众社买新闻。西部联合电讯社规定，禁止非成员的电报公司使用本公司专用的新闻。然而，成员的犯规，竞争对手的小恩小惠和威胁，也造成了麻烦。1882年，它允许《新闻报》接受自己的电报稿。1883年，斯通成为《新闻报》的主任。1888年，劳逊收购了斯通的股份，他立

① 阿诺德（Ma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19世纪著名评论家和诗人。

即抱怨纽约金融公司对新闻的垄断。西部新闻协会（Western Press Association）经过重组之后，他成为主管，推进改革。西部报界需要拓宽新闻范围，所以能够写出很好的独家新闻的记者，取代了靠电报技术知识任职的雇员。处理新闻的手法有所变化，各报派驻西部新闻协会的代表有所增加。西部联合通讯社被迫转轨，从日常的新闻报道转入整个新闻事业。但是，其发展受到阻碍。挡道的是大都会的日报，比如《先驱报》和芝加哥《时报》。这些日报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闯劲，常常就激动人心的事件推出特别报道。1892年，终于爆发了两冤家的冲突。有消息披露，西部联合电讯社的一个成员在合众社控股。^[62]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西部联合电讯社从此结束。纽约的联合通讯社被合众社吸收。西部联合电讯社并入伊利诺伊州的联合通讯社，经理是斯通。

伊利诺伊州的联合通讯社，发展成为一家全国性的合作采集新闻的协会。它是报业的代理人和服务机构，但是它不卖新闻，不赢利，不支付红利。芝加哥承办的世界博览会使它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实惠。1893年，它与一些外国通讯社在伦敦签署了合约。东部的报纸纷纷加盟，尤其是前西部联合电讯社的成员。比如，《世界报》的普利策、《晚邮报》的霍拉斯·怀特、《商业广告报》的约翰·柯克里尔都纷纷加入伊利诺伊州的联合通讯社。普利策加盟的目的，是防止赫斯特搞到联合通讯社的特许经营权。由于合众社的成员数量减少，东部报纸的成本增加，于是它们就纷纷转向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属于合众社系统，它濒临破产时^[63]，被茶塔努加的《时报》收购，该报的老板叫奥克斯。它与合众社的合同到期之后，改换门庭，参加联合通讯社，因此它能够充分享受比以前更丰富的新闻资源。^[64]1897年，《先驱报》和《论坛报》加盟联合通讯社。剩下《太阳报》和纽约的《日记报》（Journal）留在合众社里。1897年3月9日，合众社宣布破产。于是，合众社一部分没有加盟联合通讯社的成员，组建了出版者通讯社。《太阳报》组建了拉方新闻社。《太阳报》的一位老雇员亨曼成为芝加哥《洋际报》（Inter-Ocean）的编辑。这家报纸是1897年由耶基斯收购的。《洋际报》使用拉方新闻社的电讯稿，所以它的成员资格被联合通讯社吊销，时间是在1898年5月16日。于是，联合通讯社被告上法庭。法庭的裁决是解散联合通讯社。

一个新的联营社在纽约立即组建起来。其成员均为产权所有者，它们参加股份，分摊成本。它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俄国迅猛延伸。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华盛顿成为更加重要的新闻中心。1918年，

德国资助的联合通讯社分社垮台之后，联合通讯社对南美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12年，G. M. 亚当斯组建的特稿辛迪加迅速扩张。但是它提高特稿的售价，所以联合通讯社也乘机进入特稿市场。1925年之后，联合通讯社允许电台广播其新闻。1928年，它首次提供特稿服务。1935年到1936年之间，它开始提供有线图片服务。在一定的限度上，联合通讯社的历史，就是打破纽约报纸的地方垄断的历史。西部报纸适应新闻的需求而崛起，打破了纽约报界的垄断。美联社的历史，也是适应电报需要而形成新的垄断并增强垄断的历史。

美联社促进共和党报纸调动资源，结成统一战线。1896年，麦金莱总统的当选表明了美联社的力量。芝加哥的斯通和柯尔萨特（Kohlsaat）坚持认为，共和党人应该有一个纲领，排除复本位制（bimetallism），帕特森（R. W. Patterson）的立场略微温和一些。^[65]商务组织的新形式受到利用，托拉斯方法被用来把45个州里的共和党机构组织起来。用威廉·阿伦·怀特和马克·汉纳的话来说，“贪婪的商业力量和贪婪的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只有威尔逊总统时期例外。193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当选之前，共和党人的报纸始终处于垄断的地位。

反对美联社和共和党垄断的斗争，出现了几次。主要由于普利策的干预而被美联社排除在外的赫斯特，创建了国际新闻社。他研究了普利策办《世界报》所用的方法，又在旧金山的《考察者》报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学会了扩大发行的策略。1895年9月25日，他耗资18万元购进纽约的《晨报》。1902年10月17日，他将该报改名为《美利坚报》。在围绕银币自由铸造问题^①的大辩论中，普利策背离了民主党的立场，这就使赫斯特成为民主党在东部地区的领头羊。在民主党的鼓励之下，他在若干中心地区创办或收购报纸。他攻击《先驱报》的个人专栏，指控其目的不道德。这反而削弱了他在周刊竞争中的地位。他对地方圣战者感兴趣，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感兴趣。其表现是，他觊觎纽约市市长、纽约州副州长的职位，还想当美国副总统。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他这些兴趣，都是为了对抗美联社的垄断。民主党竞选失败之后，在和普利策竞争的过程中，赫斯特用新的办法来扩大发行。从大字号的标题、美西战争的轰动噱头，到用优厚的薪水从普利策的手下挖人才，再到特

^① 银币自由铸造问题（free silver issue），19世纪最后30年围绕铸造银币是否要实行限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此前，美国已经形成金币和银币并行的货币复本位制。1873年国会提出终止银币本位法案，引起既得利益集团反对。

写和滑稽漫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66]1898年，大卫·哈鲁姆（David Harum）成为畅销书作家，据说这和赫斯特的扶持不无关系。他在广大读者的脑子里激发了对小说的需求^[67]。对特别报道的倚重，大概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欣赏布里斯班^[68]：“这样聪明的脑袋竟然对政治一窍不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6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联社和资源雄厚的欧洲通讯社关系密切。赫斯特就强调反对英国和协约国的新闻介入。结果，英国、法国、葡萄牙、日本和加拿大，都在战争期间对赫斯特进行限制。他不得不依靠美联社和其他通讯社的新闻资源。可是他又因此而受到盗版的指控。接着，美联社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裁定，美联社的新闻一经发布之后，任何商业机构都无权盗用。从此确立了新闻的版权。美联社的垄断地位也因此而加强。1928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称：“赫斯特留下了恶劣的记录，美国新闻业中最恶劣的记录。他对一个自由的报界的权利进行了最严重的滥用，在这个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这都是最严重的滥用。”^[70]也许，这是对美联社力量的一次礼赞。丹尼尔斯^①写道：“政治野心和新闻实用是难以结合的。”^[71]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格拉斯蒂也说：“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公职是你我能够接受的，任何像我们这样坦诚而聪明的人，如果接受公职，那真是得不偿失。”（1912年9月9日）^[72]1932年，加纳被提名并当选为副总统，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赫斯特的权势。“新闻和政治是了不起的一对搭档。”（拉加地亚语）^[73]

美联社的垄断，在晨报领域里很突出，所以报界的竞争主要是在晚报的范围里。电报的改进，削弱了晨报的地位。民主党在选举年想办晨报的时候，遭到不少困难。1852年、1872年和1880年，民主党人在克利夫兰办晨报时就困难重重。^[74]晨报主要依靠订户，基本上是贵族报。民主党办晨报的困难，正说明共和党在晨报中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在内战期间，星期天报纸地位显要，开始争夺广告^[75]，并摧毁老式的周刊。星期天报纸和晚报是通过报贩发行的。1867年，相互竞争的报贩联合组建为美利坚新闻公司，使星期天报纸和晚报发行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在晚报领域，新闻和政治评论都经过调整，以便适合劳工阶层日益增长的需要。格里利把劳工的兴趣吸引到共和党一边。他支持工会，使竞争对手民主党处境尴尬。但是，印刷机的改进，尤其是整行铸排机的使

^① 丹尼尔斯（Daniels，1862—1948），美国记者，政治家，在北卡州办报起家，后在威尔逊、罗斯福总统政府中担任公职。

用，又使他和工会格格不入。劳森（Victor Lawson）说得好：“无论多聪明的人，都只能办好一份报纸，再多了就不行，虽然他可以拥有十来份报纸。”^[76]他这句话既适用于晚报，也适用于晨报。下面引用的话，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不想让世界晚报搞社论。如果你想写出好的社论，你就要认真重写，让社论进入世界晨报。”^[77]

午报和晚报的发展适应劳工的需要，这使斯科利普斯家族^[78]能够办几种报纸。1897年，他们组建了斯科利普斯—麦克雷报业协会。在此基础上，斯科利普斯新闻协会在太平洋滨海地区取得长足的发展。出版商报业联盟网罗了美联社之外的报纸，后来它发展成为新的合众社。一般人认为，美联社保守，面向资本家，总是用很坏的一招把新闻压后到第二天的晨报上去发表。与此同时，合众社逐渐在欧洲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新闻采集网络。它与南美洲反对协约国宣传的报纸达成协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购买新闻，1918年，它又在日本办起了一家小型的电报公司。欧洲和美国的时间差使日报占有优势，使之能够比较早地刊发新闻。合众社也因此而扩张。但是，1918年它抢发不真实的停战新闻，这又说明了合众社的局限性。随着业务的扩大，合众社办了一些新的报纸。罗伊·豪威尔创办斯科利普斯—豪威尔新闻社，他的作用得到了承认。1921年，他在底特律说：“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干新闻买卖。我们要出售广告，我们的收费标准要让打广告的人有利可图。不过，我们办好报纸，首先是要让新闻有吸引力，我们的发行量要大，广告的效益才能显著。”^[79]合众社的新闻表现形式，收到良好的效果。于是，美联社被迫用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运作，被迫放弃昔日那种踩高跷式的呆板的风格。^[80]随着时间的推移，斯科利普斯—豪威尔新闻社买到了大量的报纸，它对劳工的同情得到了某种限度的中和。

在和美联社竞争的过程中，赫斯特和斯科利普斯两个报系，被迫采用大规模连锁企业的办法。中心公司覆盖广大的地区，成为增加分公司和新闻覆盖面的手段，以此减少大型新闻社的成本。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独立的报纸受到灾难性冲击。达纳死后，纽约《太阳报》发现拉方新闻社跟不上要求。1908年，芒西（Frank Andrew Munsey）写道：“报纸出版业大声呼唤组织与合并，再也没有什么商务比它更加迫切地需要组织与合并了。”^[81]他收购了《太阳报》，将其与《先驱报》合并。他取消广告合同，引进更加严格的工作进度表，以适应更大的发行量。^[82]后来，《先驱报》卖给了《论坛报》，《太阳报》苦苦支撑，直到最近寿终正寝。纽约《世界报》在社论版发起了有效的攻势。据说，这个社论版

的力量和普利策眼睛失明不无关系，因为这些社论必须要读给他听。^[83]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世界报》送上法庭，告它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犯诽谤罪。1911年1月3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被告无罪。这个裁决被认为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最压倒性的胜利”^[84]。《世界报》和圣路易斯的《快邮报》抨击三K党，取得胜利。然而，尽管《世界报》特立独行，它最后还是被斯克利普斯—豪威尔报系收购了。

独立报纸消失的同时，报纸的内容也发生变化。^[85]周报、月刊、季刊，布道坛、讲台和法庭，知识分子、社区和大学校园，都给“扒粪”活动、无党派利益和激进的写作提供了发泄的渠道。^[86]报纸接过了“扒粪”的手法，干得很出色。“美国经历了一段圣战的时期。热心社会改良的人把每一个大城市都搅了个底朝天。任何一家雄心勃勃的报纸，都参加了这场令人沮丧的游戏。”^[87]后来，特写取代了圣战活动。小丑滑稽戏闪亮登场，取代了富有个性的新闻。风趣的滑稽噱头决定发行量的大小。^[88]千人一面的倾向，造成其他媒体不时爆发抗议。“你绝对不能写富有争议的题材，首先是不能写宗教……凡是可能会冒犯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事情，你无论如何是不能报告真相的。”^[89]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胁》的发行量蔚为奇观。政治活动走下坡路。1921年兴起的大规模政治宣传，就说明了这一点。^[90]

报纸的政治影响开始下降。其他媒体日益重要。1891年国际版权制度建立以后，这一势头更加明显。在此之前，报纸对书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报纸宣传过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往往有人为之树碑立传。^[91]1860年，豪威尔斯为林肯的竞选活动写了一本书，他得到的奖赏是到威尼斯当领事。^[92]纽约《时报》的雷蒙德在林肯被刺后给他立传。格里利写了一本关于内战的书，竟然一时洛阳纸贵，直至他为戴维斯^①支付保释金而声名陨落。出版商开发具有新闻价值的题材，其宣传效果极好，在报纸忽视广告的时期尤其如此。乔治·琼斯成为纽约《时报》的股东。柴尔兹^[93]出版了凯恩写的北极探险家富兰克林遇难的书之后，1864年成为费城《公共记事报》的股东。英格兰出版商盗印美国作家的书籍。抵挡不住这种不公平竞争之后，作家只好转向报纸杂志，或者为各种社团写东西。^[94]纽约这个出版中心日益支配出版市场，因为它有与英格兰的交通之便。所以，其他中心的作家纷至沓来，比如

^① 戴维斯 (Jefferson Davis, 1808—1889)，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联盟政府总统，曾任联邦政府陆军部长，战后曾锒铛入狱。

豪威尔斯。“商业影响压倒了纯文学的影响。出版商成为掌舵人。”^[95]

1891年之后，纽约的哈泼等出版商装备了大型的印刷厂，可以很快印制来自伦敦的书籍。他们与美国作家的接触反而有限。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出版商陷入财务困境，受到报纸和金融机构的掣肘。1902年，具有《世界报》工作经验的乔治·哈维^[96]执掌哈波，哈波公司由摩根公司重组。哈泼出版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美国人民史》。据说，哈维1902年就认为威尔逊可能当总统。1906年，他又提名威尔逊为总统候选人^[97]在威尔逊竞选的过程中，共和党垄断报纸的局面被打破。威尔逊当选总统，靠的是其他媒体，而不是报纸^[98]，他所依靠的还有南方政治力量的复兴。^[99]

政治活动曾经是推广报纸、增加其发行量的直接而有效的手段。如今，政治的这个功能开始下落。1860年4月3日，格里利写过这样一句话：“注意……纳税人需要的报纸，比消耗税收的人需要的多。”他建议实行一种与税收相对的政策。^[100]报纸对城市的抨击，意图是削弱其他媒体，包括与之竞争的报纸。报界对托拉斯的抨击，并非与托拉斯对报纸广告的威胁没有关系。据说，发酵粉的托拉斯对广告业是致命的打击。^[101]在争夺食品和药品的广告中，一方面大多数报纸喜欢靠优质产品的广告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布里斯班打广告时，把成药分组推出，当做新闻和社论来处理，他的收费标准按照当时的价位保持不变。^[102]用切斯特顿的话来说，新闻记者成了追随广告写东西的人。铁路的收费限制由于州际商会的建立而被取消，地方报纸的地位随之削弱，因为地方报纸和受制于铁路的政治机器有关系。地方报纸的削弱，使赫斯特^[103]等人控制的大都会报纸有力量敦促直选举参议员。铁路收费限制消失之后，在门廊上发表竞选演说的现象随之消失。日报和周刊的普及，摧毁了协商的制度^[104]。参议院的审议不如从前那样深思熟虑，而是更加受报纸的影响。大州的预选开始之后，腰缠万贯的总统竞选人用小册子互相攻击。这是一场使人道德堕落的竞赛。^[105]“既然行政部门控制着报纸的衣食之源，所以报纸杂志始终有一个倾向，那就是贬低议会部门。”^[106]

报界的力量，在要求原材料降价中，充分显示出来。原材料降价可以有效地满足广告商扩大流通量的要求。报界反对国际纸业公司维持和增加新闻纸价格的企图。在佩因—奥尔德里奇的关税分类中，塔夫托总统把新闻纸的进口税从每吨6美元降到3.75美元，可是报界还攻击他降价的力度不够大。1909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建议增加第二类邮件的

邮资，又受到报界的攻击。他自己认识到，他的一些言论犯了致命的错误。他骂“杂志出版商那些猪”，尤其是骂阿尔伯特·肖，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07]，因为这使他和报纸杂志的关系疏远。降低关税本来是要通过互惠谈判才能实现的。不过，威尔逊总统采纳的关税政策是民主党的低关税政策。美国报纸对公共舆论构成有效的压力，加拿大政府又鼓励造纸。于是，大批的造纸厂就在加拿大修建起来。

报纸积极支持控制新闻纸价格、增加新闻纸生产的政策；报纸刺激了广告业，使其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经济向着大批量生产倾斜，资金周转快、销售渠道畅通的产品受到青睐。广告商随时关注的是增加财富。金融领域的“扒粪”活动结束后，对投机活动的限制也随之减少。意味深长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里，有两位出版商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们是考克斯（James M. Cox）和哈定。哈定当选为总统，这是历史上第一位当选为总统的出版商。柯立兹总统听信傻主意，他发出的咨文受到批评。他本来是想加强股市。胡佛总统大谈新时代。在投机盛行的20年代，报纸文明（newspaper civilization）进入其发展的总结阶段。新闻工作的偏向最终成为对眼前的痴迷。用亨利·詹姆斯的话来说，新闻业成了当前批评当前的工具（a criticism of the moment at the moment）。达罗^①描写这种情况时说：“最意味深长的讽刺……我们独立的美国新闻界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扭曲和曲解新闻的自由。这是美国人民在获得自由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之一。”^[108]长期形成的报界垄断，引起其他媒体的竞争。新闻自由是这种垄断的组成部分，它抹杀了垄断的特征。技术发明^[109]，是为了适应传播垄断的保守传统，其后果是给公共舆论和政治组织造成动荡。印刷机及其相关的发明，包括插图技术的进步，都是指向借助眼睛的传播。它引起的后果，是强调地方主义和非集中化。这些技术的改良，是为了适应对辽阔地域的控制。印刷机及其相关的技术改良的后果，是时间和连续性的摧毁。

广播这种新媒体是一个挑战，它诉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眼睛，因此它强调的是集中化。空间垄断的灾难性后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高潮。随之而来的是战后萧条时期的时间垄断。政治组织对广播这种新媒体的可能性作出了回应。政治领袖在代表大会上，可以直接诉求于

① 达罗（Clarence Darrow, 1857—1938），美国名律师，以重大刑事案和劳工保护案而著名，尤其是在维护达尔文进化论的“猴子”辩论中，名震世界。

公众。1924年，史密斯在纽约州议会讲话时，就直接向公众呼吁，从而控制住反对派的声音。1928年之后，电台上的广告可以赚取大笔的利润。在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把广播当做面向人民的主要手段。新闻界非集中化的传统，被新的集中化传统取代。时间上的连续性，反映为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邮政总长不能再通过赞助来维持自己的控制权。^[110]民主党痴迷这样的理论：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福利机构。^[111]党的机器中的权势人物比如塔米·霍尔，被新的媒体毁掉了。

向新媒体转轨的过程，总是充满深刻的动荡，向广播的转轨也不会例外。^[112]广播倚重连续性和时间，与倚重空间的媒体形成反差，它需要关注的是官僚主义、计划安排和集体主义。但是它缺乏满足这些关注的经验，所以它不得不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在克利夫兰总统解决委内瑞拉争端的时候，在威尔逊总统任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在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政之时，民主党^[113]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它不得不诉诸武力。对有组织权力的依赖，对有色民族传统的反感^[114]，都削弱了人们对政治的敏感。在处理连续性和帝国的问题上，西方缺乏经验。经验的缺乏是一种危险，西方世界面对着不确定因素和战争。

【注释】

[1] See Philip Davidson, *Propagan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 (Chapel Hill, N.C., 1941).

[2] S. N. D. North,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atalogue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ensus Year* (Washington, 1884), p.138. “通过这些载体（报纸）传播的政治智慧，被认为是防止一个自由政府堕落的最可靠的保证，它能够推荐一切有利的公共措施，使各种公民自信与合作。这样的看法恰如其分。”（众议院对1792年咨文的回复）W. E. Rich,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ost Office to the Year 1829* (Cambridge, Mass., 1924), p.91.

[3] E. S. Corwin, *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 (New Haven, Conn., 1935), p.5.

[4] See F. L. Mott, *Jefferson and the Press* (Baton Rouge, La., 1943).

[5] J. E. Pollard, *The Presidents and the Press* (New York, 1947), p.75.

[6] Ibid. p.70.

[7] L. M. Salmon, *The Newspaper and the Historian* (New York, 1923), p.426. 新闻界的低水准被归罪于英格兰和爱尔兰新闻记者带进美国的辱骂风格。

英格兰的 Cobbett 就是其一。Binns 占有一家最激烈抨击英格兰人的喉舌。《奥罗拉》的编辑 William Duane 的谴责最为猛烈。1827 年 6 月的《爱丁堡评论》对 Cobbett 就是这样抨击的：“当代最恶毒、最低贱的诽谤者，背信弃义的政客，搞欺诈的债务人，忘恩负义之徒；他两次被英格兰唾弃而不得不流亡美国，虽然绝不敢太放肆，但是他还是两次信口雌黄，向英格兰吐了一大堆脏物。”又 N. N. Luxon, *Niles' Weekly Register, News Magazin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ton rouge, La., 1947), p.45. See A. L. Burt,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fter the War of 1812* (New Haven, Conn., 1940), p.301.

[8] Mott, *Jefferson and the Press*, p.53.

[9] Frank Presbre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 (New York, 1923), p.159.

[10] Ibid., p.177.

[11] North,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p.38.

[12] Presbrey,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dvertising*, p.186.

[13] See L. T. Stevenson, *The Background and Economics of American Paper Making* (New York, 1940), p.14.

[14] H. M. Hughes, *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 (Chicago, 1940).

[15] G. W. Johnson et al., *The Sunpapers of Baltimore* (New York, 1937), p.30.

[16] See D. C. Seitz et al., *The James Gordon Bennetts, Father and Son, Proprietors of the New York Herald* (Indianapolis, Ind., 1928).

[17] “政治首府的优势，对代议制构成……严重的伤害。它使现代共和国遭遇古代共和制度同样的缺陷。古代的一切共和制度，由于没有实行代议制而全部消灭了。” Alexis de Tocqueville, *American Institutions*, trans. Henry Reeve, rev. and ed. Francis Bowen (Cambridge, Mass., 1870), p.371.

[18] Ibid., p.239.

[19] Rich,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ost Office to the Year 1829*, p.165.

[20] J. E. Pollard,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s*, p.152.

[21] Ibid., p.141.

[22] Ibid., p.163.

[23] Ibid., p.163. 许多报纸编辑被任命为地方邮局局长 (Ibid., p.161)。

[24] Dorothy Ganfield Fowler, *The Cabinet Politician: The Postmasters General: 1829—1909* (New York, 1943), pp.16~20.

[25] Pollard, *The Presidents and the Press*, p.142.

[26] Frederic Hudson,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690 to 1872* (New York, 1873), pp.276~277.

[27] Ibid., p.277.

[28] Luxon, *Niles' Weekly Register*, p.132.

[29] Pollard,,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s*, p.195.

[30] North,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p.140.

[31] Ibid., p.142. 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31 年 1 月创办 *Liberator*, “激起了南方的愤怒”。W. A. Butler, *A Retrospect of Forty Years, 1825—1865*, ed. H. A. Butler (New York, 1911), p.80.

[32] North,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p.112.

[33] Ibid., p.143.

[34] Ibid., p.144.

[35] Ibid., p.148.

[36] A. K. McClure, *Our Presidents and How We Make Them* (New York, 1900), p.70. Ostrogorski 指出了传播技术的改进对政党的影响。他说, 伊利运河修好之后, 纽约州的政党竞选会随之召开。铁路网完成之后就出现了政党竞选的全国代表大会。电报出现之后, 全国的竞选活动就在一个中心进行指挥了。See M. I.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1902), II, 53.

[37] See *Autobiography of Thurlow Weed*, ed. H. A. Weed (Boston, 1883—1884).

[38] 格里利的观点可以和梭罗^①的观点比较: “我晚上围着篝火, 阅读破碎的报纸。这是有人郊游时包过午餐的报纸。里面登载着纽约和波士顿的物价、广告, 还有被认为合适的、独具慧眼的社论, 可是他们不知道, 有人会在什么情况下读这些东西。我读这些东西时, 得到很多好处。对我来说, 广告即所谓商业版, 好像是最好、最为有用、最自然、最值得尊敬的。几乎广告表现的所有观点和情绪, 都不会引起人的思考。它们浅薄之至, 使我不能不去想, 商业版的纸质一定要差一些, 一定更容易磨损。当前的广告和物价与自然的关系最紧密; 在一定程度上, 它们是潮流的晴雨表。另一方面, 如果我记的不错的话, 最被看重的文章是放在广告的下面, 除非这篇文章是什么不起眼的科学记录, 或经典作品摘录。这些阅读栏目, 倒是给我一种莫名其妙、心血来潮、粗制滥造的感觉, 就好像小学生的作文题那样只有一个念头, 像年轻人写的、灰烬中残存的片言只语。其中的观点, 就如同人们的衣着, 在明天注定就是别样的打扮, 就像去年时兴的衣服, 明日黄花; 仿佛人类还很幼稚, 几年之内, 过了这个幼稚的年代之后, 人就会感到羞愧。况且, 人还有风趣幽默的天性, 不过这天性难得真正成功。如今它表面的成功是对鄙视的讽刺。人身上的邪恶的天才开怀大笑, 最会戏弄人。我已经说过, 严肃的广告, 而不是现

① 梭罗 (Henry D. Thoreau, 1817—1862), 美国 19 世纪重要思想家、作家, 超验主义代表人物, 亲近自然, 代表作为《沃尔登湖》等。

代江湖骗术那一种广告，能够勾起令人愉快的诗意联想，因为商业真是和自然一样有趣。商品本身的名字就富有诗意、意义隽永，仿佛它们就插在诗歌中，木材、棉花、糖、皮货、海鸟粪、洋苏木。一些头脑清醒、个性鲜明、富有创意的人，在那里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心存感激。他会感到与周围的环境非常和谐，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就在这个山头上写的。它们的写作风格是永恒不变的，就像值得尊敬的皮货、洋苏木或其他的自然产品一样。这样一张碎报纸居然成为价值连城的伙伴，包含着成熟生命的累累硕果。珍贵的文物！珍贵的诀窍！仿佛是神的发明。凭借这样的发明，我们可以不仅在那里生产闪光的金钱，而且生产有闪光的思想。” Henry D. Thoreau,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Boston, 1867), pp.197~198.

[39] See Oliver Gramling, *AP: The Story of News* (New York, 1940).

[40] See Robert Ho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rinting Press and of the Improvements in Printing Machinery* (New York, 1920).

[41] Luxon, *Niles' Weekly Register*, p.9; See also Victor Rosewater, *History of Coöperative News-Gath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0), p.95. and E. S. Watson, *A History of Newspaper Syndic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5—1935* (Chicago, 1936).

[42] North,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p.150.

[43] Ibid., p.151.

[44] “影响最大的杂志是 *New York Weekly Tribune*。1854 年，其发行量高达 11.2 万份，其读者当是该数字的好几倍。” J. F. Rnodes, “Newspapers as Historical Sources”,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1909), p.90.

[45] 西沃德和威德利用反对共济会的感情，但是他们受到罗马天主教的影响。这激起了对此一无所知的党的反感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反对，有利于格里利胜出。

[46] Salmon, *The Newspaper and the Historian*, p.203. See R. S. Harper, *Lincoln and Press* (New York, 1951).

[47] “所有这些利益促进了报纸的发展，报纸又推动了政治和铁路的发展。” Ma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86—1901*, p.27. 商业公司的经纪人都得到指令，要“在各州的每一个城镇，只要是在铁路沿线的，只要是有教堂尖塔的，只要是有银行的或报社的”，停下来推销，带上商品目录和价目表去扣响房门。1899 年，经纪人的足迹已经抵达加利福尼亚。J. M. Richards, *With John Bull and Jonathan* (New York, 1906), p.19. “你的首要责任，就是在每一家体面的面向家庭的报纸上打广告。不要在世俗的或文学的周刊上打广告。在许多日报上打广告也难以取得收支平衡……与报纸签订广告合同时，务必牢记，你的广告费成本是不受限制的。关键是要‘引起轰动’。” Ibid., pp.21~22.

[48] “报纸，无赖和笨蛋为笨蛋和无赖办的报纸。它们只忠诚于我们制度中的

愚蠢和弊端，此外不会讲什么操守。它们拼死抵抗任何消灭它们的明智企图。它们给智慧戴上镣铐，使笨蛋的偏见更加固执。它们给暴众溜须拍马，对个人则如狼似虎。” Ambrose Bierce (March 26, 1881) Cited in Carey McWilliams, *Ambrose Bierce: A Biography* (New York, 1929), p.168.

[49] A. B. Paine, *Th. Nast, His Period and His Pictures* (New York, 1904), p.129.

[50] North,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ress*, p.156. 由于辛迪加报纸的努力，邮局给读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每一位订报人在他订阅的报纸中，有一份可以免交邮费，无论这报纸是全部或部分在美国印刷的。” Watson, *A History of Newspaper Syndic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5—1935*, p.21.

[51] Pollard,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s*, p.467.

[52] 美国碎布进口的价值，截至1860年6月30日达到154万美元；截至1863年6月30日为124.5万美元（含意大利进口的碎布，一共是37330.4万磅，）；截至1871年6月30日为374.9万美元（共进口1035.2万磅，含意大利进口的3066.5万磅，从英国进口的4340.4万磅）。

[53] See H. A. Innis, *The Press: 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49).

[54] Paine, *Th. Nast, His Period and His Pictures*, p.141.

[55] J. H. Harper, *I Remember* (New York, 1934), p.260.

[56] J. L. Heaton, *The Story of a Page* (New York, 1913), p.141.

[57] Fowler, *The Cabinet Politician: The Postmasters General: 1829—1909*, p.191.

[58] Ibid., p.228.

[59] McClure, *Our Presidents and How We Make Them*, p.334. 关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易于“挑起派别感情和利益，并搅动全国的激情”。*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George Ticknor* (Boston, 1880), p.214.

[60]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1918), p.320.

[61] Rosewater, *History of Coöperative News-Gath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p.117~118.

[62] See Melville E. Stone, *Fifty Years a Journalist* (New York, 1921).

[63] Rosewater, *History of Coöperative News-Gath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242. also G. W. Johnson, *An Honorable Titan: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dolph S. Ochs* (New York, 1946).

[64] M. Koenigsberg, *King News,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41), p.172.

[65] Stone, *Fifty Years a Journalist*; also H. H. Kohlsaatt, *From McKinley to Harding* (New York, 1923).

[66] See J. K. Winkler, *W. R. Hearst, an American Phenomenon* (New York, 1928).

[67] See Coulton Waugh, *The Comics* (New York, 1947).

[68] J. L. Ford, *Forty-Odd Years in the Literary Shop* (New York, 1921), p.286.

[69] Valentine Williams, *World of Action* (Boston, 1938), p.142.

[70] O. Carlson & E. S. Bates, *Hearst, Lord of San Simeon* (New York, 1937), p.229.

[71] *Editor in Politics* (Chapel Hill, N.C., 1941), p.567.

[72] G. W. Johnson et al., *The Sunpapers of Baltimore*, 311.

[73] Emile Gauvreau, *My Last Million Readers* (New York, 1941), p.121.

[74] A. H. Shaw, *The Plain Dealer: One Hundred Years in Cleveland* (New York, 1942).

[75] G. P. Rowell, *Forty Years an Advertising Agent, 1865—1905* (New York, 1926), p.434.

[76] Gene Fowler, *Timber Line: A Story of Bonfits and Tammen* (New York, 1933), p.129.

[77] Oliver Carlson, *Brisbane: A Candid Biography* (New York, 1937) p.102.

[78] N. D. Cochran, *E. W. Scripps* (New York, 1933).

[79] George Seldes, *Lords of the Press* (New York, 1939), p.78.

[80] C. B. Driscoll, *The Life of O. O. McIntyre* (New York, 1938), p.193; also Ernest Gruening, *The Public Pays: A Study of Power Propaganda* (New York, 1931), p.174.

[81] F. M. O'Brien, *The Story of the Sun, New York: 1833—1928* (New York, 1928), p.206.

[82] George Britt, *Forty Years—Forty Millions: The Career of Frank A. Munsey* (New York, 1935).

[83] Ford, *Forty-Odd Years in the Literary Shop*, p.218.

[84] W. G. Bleyer, *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Boston, 1927), p.348.

[85] 他说：“在学校、杂志和报纸的影响下，许多人扬名显声。财富迅速积累，富人不仅尽情享乐，而且坚信自己已经达到能够达到或想要达到的高度，无论在社会、心智、道德上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他们处理当下问题时都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不管别人怎么想。对男人女人的问题，对儿童的权利和义务，对婚姻、教育、普选的问题，对生死和长生不死的问题，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他们有自己的吹捧出来的胡说八道的预言家、英雄、诗人、演说家、文人和哲学家，并且以野

蛮的热情对其顶礼膜拜。结果，社会上出现了思想和道德的混乱。在一片混乱之中，人类几千年千辛万苦积累的生存规则，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似乎顷刻间就可能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E. L. Godkin, *Reflections and Comments, 1865—1895* (New York, 1895), pp.203~204.

[86] See E. A. Ross, *Changing America: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1919).

[87] H. L. Mencken, *Newspaper Days, 1899—1906* (New York, 1945), p.37; See also Silas Bent, *Newspaper Crusaders: A Neglected Story* (New York, 1939).

[88] G. L. Edson, *The Gentle Art of Columning—a Treatise on Comic Journalism* (New York, 1920).

[89] Seldes, *Lords of the Press*, P. 171. “要像对待银行董事长那样对待天主教徒。” (Brisbane) Gauvreau, *My Last Million Readers*, p.240. see Paul Blanchard, *American Freedom and Catholic Power*, (Boston, 1949), Chap. IX and Reuben Maury, *The Wars of the Godly* (New York, 1928).

[90] Daniels, *Editor in Politics*.

[91] See W. L. Mackenzie,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rtin Van Buren* (Boston, 1846).

[92] L. F. Tooker, *The Joys and Tribulations of an Editor* (New York, 1924), p.237.

[93] G. W. Childs, *Recollections* (Philadelphia, 1890).

[94] Antonia Gallenga, *Episodes of My Second Life* (London, 1884).

[95] G. W. Smalley, *Anglo-American Memories* (London, 1910), p.188.

[96] W. F. Johnson, *George Harvey* (Boston, 1929).

[97] E. P. Mitchell, *Memoirs of an Editor: Fifty Years of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1924), p.387.

[98] 书籍的影响有限，尤其是1900年书价上涨、杂志降价之后，更是如此。邮寄费使其局限更加严重。直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时期寄书的邮费才有所减少。用杜利先生 (Mr. Dooley) 的话来说，“书籍是为那些不会在其他东西中寻找乐趣的人准备的”。而柯里尔的话反映了杂志的影响：“然而，虽然基本的症结并没有完全找准，但是一切迹象表明，我们不可能既保持刊物的思想水准，同时又达到50万份的发行量。如果定价维持在35分，我们就不可能既增加一倍的发行量，又维持其水准，就我而言，我始终相信，无论怎么定价，杂志的发行量都可以在维持50万份，同时又对最精明的读者有所启发……” Norman Hapgood, *The Changing Years: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30), pp.282~283. 1918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书籍杂志的影响深受技术进步的影响。照相术的兴起一方面毁掉了杂志中的插图，迫使其倚重文字，另一方面它又为独特的出版物打下基础。书籍杂志的冗长为

文摘的发展开启了方便之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袖珍本出版业迅速发展，对作家的地位构成威胁 See J. T. Farrell, *The Fate of Writing in America* (New York, 1946); also W. T. Miller, *The Book Industry: A Report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New York, 1949).

[99] See T. D. Clarke, *The Southern Country Editor* (Indianapolis, Ind., 1948).

[100] J. M. Le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Boston, 1917), p.406.

[101] See *Printer's Ink, Fifty Years, 1888—1938* (New York, 1938).

[102] Carlson, *Brisbane: A Candid Biography*, p.189.

[103] Mrs. Fremont Older, *William Radolph Hearst, American* (New York, 1936), p.348.

[104] Champ Clark, *My Quarter Century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20), II, 355.

[105] H. L. Stoddard, *As I Knew Them: Presidents and Politics from Grant to Coolidge* (New York, 1927), p.187.

[106] Clark, *My Quarter Centu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 427.

[107] Pollard,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s*, pp.610, 613, 625.

[108] Irving Stone, *Clarence Darrow for the Defence* (New York, 1941), p.48.

[109] 熊比特 (Schumpeter) 在《商务周期》中强调孔德拉铁夫 (Kondratieff) 周期的重要性，但是，他忽视了传播的组织问题。发明就是凭借这样的组织来流布的。与印刷机相关的传播垄断，由于长期受到新闻自由的保护，逐渐加强，致使时间的中断和摧毁加重。最终，这种垄断走向自我毁灭，它不得不承认一种偏重时间和连续性的媒介。范布伦金钱和产业的二分法，忽略了技术的意义，比如印刷技术的意义，忽略了在金钱社会里技术对信息传播的意义。强调快速传播的垄断，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动荡。

[110] 关于这个变化，参见 J. A. Farley, *Jim Farley's Story: The Roosevelt Years* (New York,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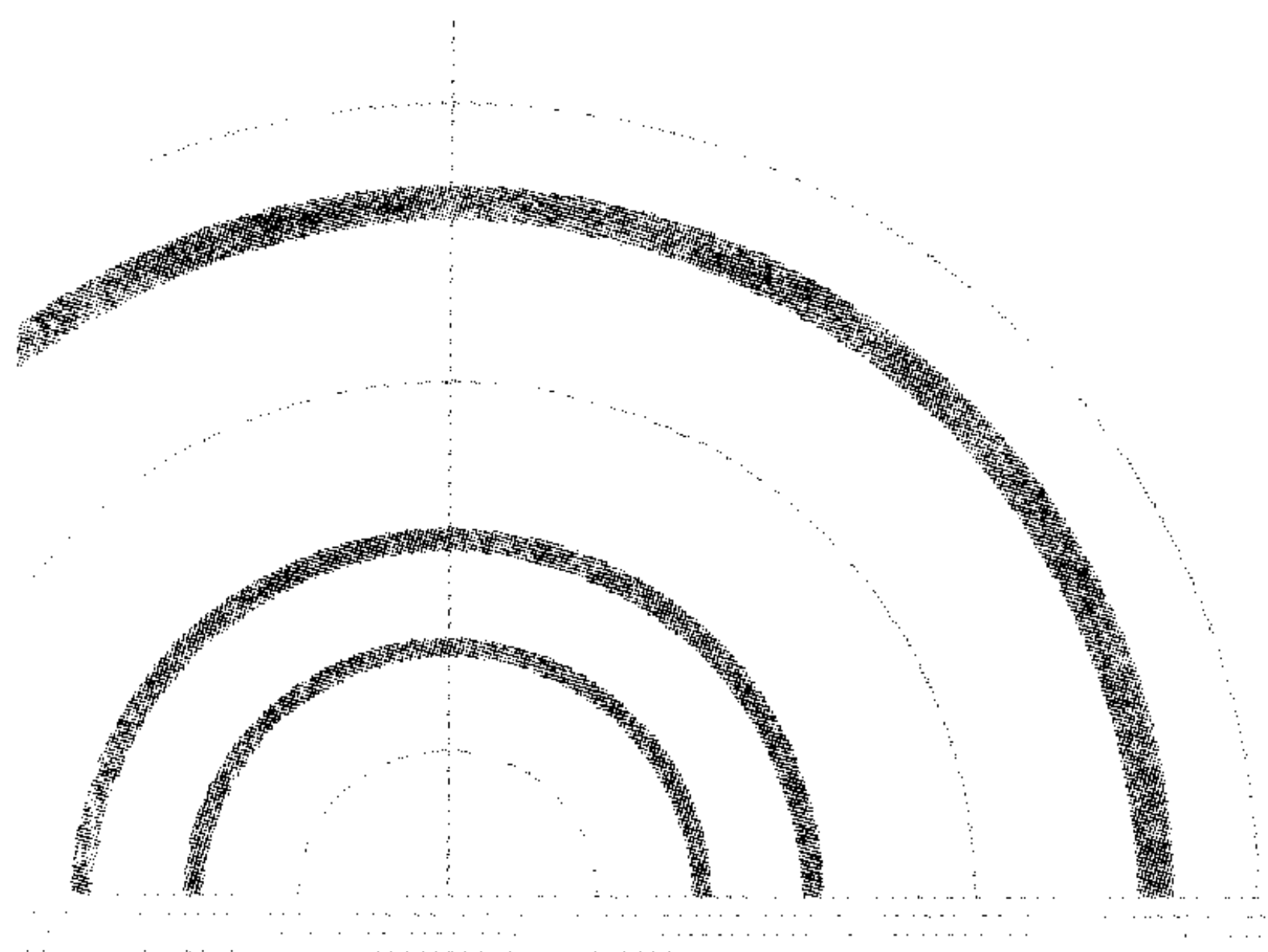
[111] 纽约《时报》13 位记者合著 *We Saw It Happen* (New York, 1938), p.25。

[112] “电话、电传打字机和收音机，使最高层可以直接向最低层发布命令。命令背后的绝对权威使基层盲目执行一切命令。许多机关和指挥中心同最高领袖直接联系，并且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就接受他们灾难性的命令。上述技术的结果，是对公民进行广泛的监视，也可能使罪恶的活动成为高度的机密。外来者一看，这套政府机器好像是一台电话总机，有一堆乱糟糟的电话线。但是，正如一个电话总机一样，它是可以由一个中心控制和操纵的。过去的独裁者需要下层领导中高素质的官员合作，需要这些可以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官员。在现代技术时代，一个权威主义

的体制，可以不需要这样的官员。结果就出现一种新的组织模式：盲目接受命令。”这段话是1942年德国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皮尔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转引自Hjalmar Schacht, *Account Settled* (London, 1949), p.240。

[113] “部长先生，你是共和党人。我们民主党承担着这场战争的重任。我知道你的履历不错，但是我找不到用你的位置。”这是海军部长丹尼尔·福尔曼对前任海军副部长萨特利说的话。Arthur Train, *My Day in Court* (New York, 1939), p.350. 这是人们普遍的态度。在一次关于公务员改革的政治集会上，有一个人说：“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也反映了这种态度。

[114] “以上帝的名义，如果我们用高压迫使俄国政府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而我们在南方用私刑对付有色人种中的公民，世界将会怎么想呀！”这是罗斯福总统对众议员格兰奇说的话，转引自Champ Clark, *My Quarter Centu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 439. See H. C. Brearley, *Homic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el Hill, N.C., 1932).



第八章

挑剔的批评^{*}

机械化强调复杂性和混乱。它应当为知识领域的垄断负责。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不想被知识垄断压倒的话，就应该做一番批判的审视和报告。这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1]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为此目的，我们应该弄懂那些对生活（或者生活传统）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对活生生的传统重要的东西。这些重要的东西，是口头传统独有的、与机械化传统相悖的东西。我们还应该了解，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

^{*} 本文是 1948 年 7 月 23 日在牛津大学举行的“英联邦大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这里略有删节。

论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

我提议严格按照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来展开论述。这个主题是：“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我请诸位自己试试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个主题的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对经济学的兴趣暗示着对专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工作的忽视。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我沿着会议主题指引的方向，提议大家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以至于这个会议的与会者，竟然主要是大学的行政领导。无意之间，这个会议预设了一个学问分割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整体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用一般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在这里相聚，似乎就说明西方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可以这样说？也许你们有人记得瑟伯^①的故事，那位大学教授指着一个学生说：“你就是这个大学不对的地方。”（You are what is wrong with this institution.）

我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说的是知识的经济史。在这一点上，我对华莱斯^②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他指出一种危险：知识增长太快，我们不可能用知识来作出成功的社会判断，因为人生苦短，人的悟性和才智都有局限。^[2]对他而言，布道坛上的偶像和实验室里的偶像，都阻碍有效的社会判断。这些偶像的源头是有组织的基督教，是专业科学家的形而上预设。^[3]他认为，原创性思想要依靠口头传统，随着知识的日益机械化，有利于创造性思想的条件，正在慢慢化为乌有。阅读比听讲来得快，个人集中精力思考，比争辩中的口头阐述与反驳来得快。印刷机和收音机的对象是世界，而不是个人。当辩题是人的行为和感情时，口头的辩难是极端重要的。在发现真理上，口头的辩难至关重要。在传播真理上，其价值却乏善可陈。口头讨论固有的特点是亲自接触，是要考虑对方的感情。这和机械化传播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已经注意到现代世界的一些趋势，口头讨论和这些趋势也形成强烈的反差。现

① 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美国幽默作家、漫画家，《纽约人》杂志编辑和撰稿人。

② 华莱斯（Graham Walls, 1858—1932），美国教育家和政治学家，倡导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长期在英国牛津等大学执教；对社会问题基本上持乐观态度；激烈抨击现代社会科学，认为它缺乏科学性。

代知识需要量化的压力，是口头辩难和会话衰减的原因。我们被动阅读报纸及其告示，阅读那些为数不多的、意义重大的杂志和书籍。这表明报纸对谈话起支配作用，表明非连续性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非连续性当然是报纸的特征，正如它是词典的特征一样。彼此熟悉是有效会话的基本要素。然而，一个脑袋通过自由联想和另一个脑袋接触并追踪其思路时，未必能实现彼此的熟悉。华莱斯指出，每天为报纸撰稿的人，很少能够搞出什么重要的创新之作。我们还可以借用叔本华^①的话来做结论：“把自己的思想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那是对圣灵的亵渎。”

科学对文化发展的冲击，表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之中，尤其是对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播的贡献之中。反过来，在被传播的知识中也可以看到科学的冲击。换句话说，科学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不仅生活在它提供的播撒知识的机制之中，而且生活在被播散的那类知识中。随着信息的传播，人们对奇迹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奇迹是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为奇迹提供要求，一直是具有很高补偿价值的任务。伯里^②写道，英格兰对书籍和讲稿的需求日益增长，科学的成果走向大众，门外汉对之也饶有兴趣。这是19世纪后半叶了不起的一个特征。大众化书籍解说物质世界奇观，又激发人们的幻想。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的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优越得多。这个时代不用背包袱，既不怕衰落，也不怕灾难。他们相信科学资源无穷无尽，几乎肯定自己可以不听凭命运的摆布”^[4]。“进步本身就有这样一层意思：它作为一种教义的价值是相对的，正如神意观念只具有相对价值一样。这种观念盛行的时代对应着一个欠发达的阶段。”^[5]一般读者牢记奇迹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相反，那些科学的卫道者——更公平地说他们是科学的伪僧侣——用很高的效率开发出了各种疯狂的东西，他们特别强调的当然就是原子弹了。我曾经想在这篇文章中对原子弹避而不谈。但是我发现根本避不开。

杰夫利·斯科特说过，浪漫主义运动给自然抹上了一层民主的色彩。对自然的迷信成为一种政治教条，这个教条提出自然权利的理论。自然崇拜取代了更加明确的形而上信念。崇拜自然的教条，强调的是一种对

① 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认为意志是人生命的基础，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性。代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界的意志》等。

② 伯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英国古典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罗马帝国史》、《拜占庭史》、《剑桥古代史》等。

自然事实的忠诚再现，它对文艺复兴、秩序和比例存有偏见。^[6]我们不妨听听他说了些什么：“因此，自然取代了艺术之后，对自然的迷信就成为一种人造文明没落的迹象了。”^[7]

痴迷科学已经给科学本身的地位，带来严重影响。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于绝对的规律”^[8]。卡佐邦^①大概是对的，他说：“对科学和文学的推动几乎总是靠个人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观念总是有利于压制和扭曲文化，尤其是通过国家对科学的影响完成这种压制。在国家的影响下，来自同一政治背景的科学家都越来越难以相互交流；由于被战争的重要性所束缚，不同政治背景的科学家根本就无法交流了。数学和音乐曾经被当做普世的语言，尤其是在拉丁文衰落以后。然而现在，就连数学都成了工具。在高度机械化的文明中，数学作为交流的目的也不灵光了。这个文明已经和战争绞结在一起。

受科学影响的机械化知识对大学有何影响，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战后时期，学生人数众多。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对机械化知识的依赖随之增加。亨利·亚当斯写道：“凡是在校人数众多的地方，学生都受到压抑。谁也无法同时向很多学生传授知识，六七个人就到顶了。整个教育问题，是花费多少钱的问题。”^[9]战后学生人数的增加，迫使我们依靠教科书、直观教具、行政管理，依靠我们今天这样的行政管理者的研讨会。这里暗含着的是：我们对书面传统和考试制度的关切与日俱增。关于考试制度，马克·帕蒂森说过这样一句话：“考试对刺激学习所产生的益处和精神追求需要的质量成反比。”^[10]我们可以同意他这一个意见，他说：“考试的螺丝钉已经拧紧过好几次，现在它已经成为纯粹折磨人的工具。它无法达到教育的目的，连学习的愿望都被它摧毁了。”^[11]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大学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记住这样一句话：“科学的整个外部历史，就是学者和大学抵抗知识进步的历史。”斯蒂温^②评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时候说，那个时候没有教育制度。他是这样说的：“在英格兰的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有那么多穷人崛起而扬名显身。”“中小学和大学培养鼓励的那种信息授

① 卡佐邦 (Issac Casaubon, 1559—1614)，法国新教神学家、古典学者。

② 斯蒂温 (Leslie Stephen, 1832—1904)，英国传记作者、评论家。代表作有《18世纪英国思想史》。

受方式，与教育完全是两回事。这种教育有时是在逆境中获取的。逆境使人抓住学习和进步的机会。”我们只需提出彭斯^①、潘恩^②、科贝特^③、吉福德^④、道尔顿^⑤、波尔森^⑥、约瑟夫·怀特^⑦、罗伯特·欧文^⑧和约瑟夫·兰开斯特^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12]义务教育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是它并没有使人增长见识。有人或许记得，一位研究生在课堂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当然了。我们本科要毕业的时候学过的，是一本绿封皮的书。”^[13]教育很可能要变成“纯粹读书认字那样的事情，而不是训练年轻人的头脑接受什么原则，它丝毫不顾及美德，甚至连体面都不顾及了”^[14]。

我们被迫承认机械化知识作为力量源泉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国家这个工具，机械化知识屈从于权力的要求。大学处在危险之中，可能成为军事力量的一个分队。英联邦的大学必须了解机械化知识的后果，要坚定不移地解决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是由于西方文明忽视文化的立场引起的。为了政治组织的利益而实行集中化，意味着灾难。这已成为英联邦大学会议的危险之一，因为正如赫克托尔·赫瑟林顿勋爵指出的，寻求真理的涵义很宽，远远超越了任何政治组织承揽的范围。一百年前，司各特爵士说起集中化的危险：“伦敦野心勃勃，它开辟了一个更强大的市场，舔尽了我们面包上的奶油。要不是因为宗教和法律的差异，可怜的苏格兰就没有力量养活一个值得养活的人了。”^[15]也许，对于更大范围的英语世界来说，由于共同的普通法传统，问题可能还要更加尖锐。美国是主要的力量中心，它的影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这个优势说明，普通法在使政治法治化的过程中，在强调国家地位的过程中，受到严重的局限。在那些拥有书面宪法的国家中，情况尤其突出。在罗马法的国家中，尤其是法国，文化有机会扩张，政治不再那么令人着迷，领导人喜欢西方文明。文化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局限而保存下来。换言之，文化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置于它经常

① 彭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英国讽刺诗人、学者。

② 潘恩 (Thomas Paine, 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政治鼓动家。

③ 科贝特 (William Cobbett, 1736—1835)，英国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

④ 古福德 (William Gifford, 1856—1926)，英国诗人。

⑤ 道尔顿 (John Dalton, 1766—1844)，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提出许多著名定律。

⑥ 波尔森 (Richard Porson, 1759—1808)，英国古典学者剑桥大学教授。

⑦ 约瑟夫·怀特 (Joseph White, 1775—1841)，英国诗人、新闻记者、散文作家。

⑧ 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 1801—1877)，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

⑨ 约瑟夫·兰开斯特 (Joseph Lancaster, 1878—1938)，英国教育家，提出集体互教的兰开斯特教学体制。

性的批评之下。但是，它经常就我们的生活方式发出哀鸣，这和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脾气是格格不入的。

大学在文明中扮演什么角色？对于这个问题，大学应该经常检查自己的观点，修正自己的机制。凭借这些机制，大学可以在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比如，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学术成就推向欧洲大陆的大学。我们应该鼓励大学老师写书。这是迫使他们开新课的办法。大学关注的必须是活人，而不是死人。

【注释】

[1] See S. H. Butcher,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Word" in *Some Aspects of the Greek Genius* (London, 1891), also, V. H. Galbraith, *Studies in the Public Records* (London, 1949).

[2] Graham Wallas, *Social Judgment* (London, 1934), p.29.

[3] Ibid., p.161.

[4] 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an Inquiry into Its Origin and Growth* (London, 1920), pp.345~346.

[5] Ibid., p.352.

[6]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aste* (London, 1924), pp.75~80.

[7] Ibid., p.92.

[8] Albert Guérar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oston, 1935), p.80.

[9]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1918), p.302.

[10] *Essays by the Late Mark Pattison* (Oxford, 1889), I, 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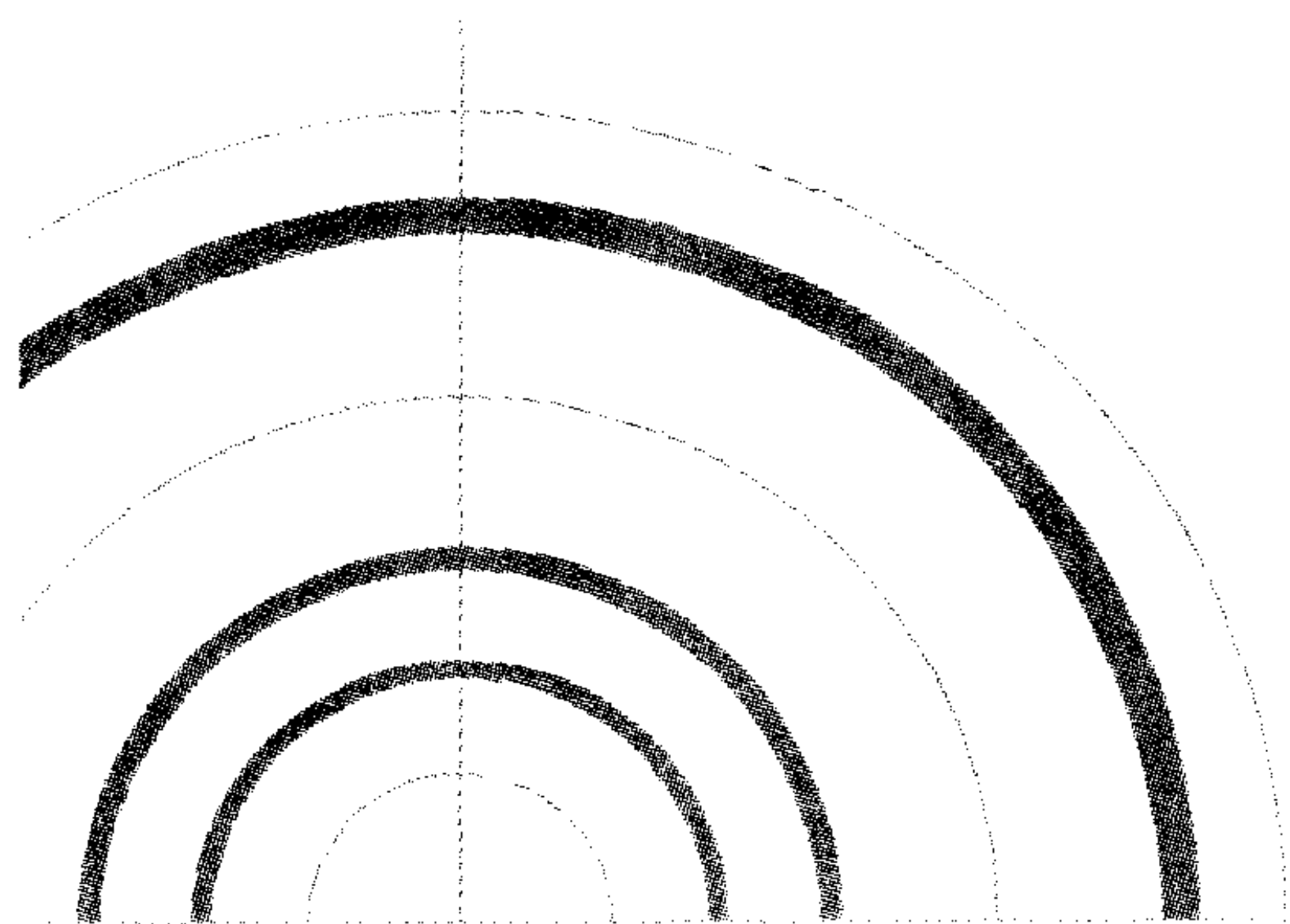
[11] Mark Pattison, *Memoirs* (London, 1885), p.303.

[12] A. V. Dicey,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0), pp.113, 114.

[13] H. W. Boynton,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1904).

[14] Cyrus Redding, *Fifty Years' Recollections* (London, 1858), III, 316.

[15] *The Journal of sir Walter Scott* (Edinburgh, 1890), II, 256.



译者后记

2000年5月，我在《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后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有了《麦克卢汉精粹》，难以理解的《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2001年2月，我在《数字麦克卢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的后记中说：有了《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就更容易理解了。

今天我要说，有了伊尼斯这本《传播的偏向》之后，麦克卢汉思想的来龙去脉，就更加清晰了。传播学的加拿大派或多伦多学派，有一个开山祖，这就是伊尼斯。可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媒介决定论”的帅旗还没有撑起来，他已经辞世（1952），来不及充分发挥和阐扬他的“媒介决定论”。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麦克卢汉的身上。麦克卢汉不但是媒介决定论的主帅，而且是数字时代的先驱和圣贤。他们的承继关系，从麦克卢汉的谦辞里就可窥见一斑：“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麦克卢汉撑起多伦多学派的帅旗，成

为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媒介思想家。他使多伦多大学文化与技术研究所成为传播学的圣地，直至 1980 年他不幸去世为止。

本书中的法语难题，承蒙深圳大学文学院段映虹博士协助解决，特此致谢。

何道宽

2003 年 4 月 3 日